列宁全集

列宁全集

第十五卷

1908年3月—1909年8月

人民出版社

列 宁 全 集

第 十 五 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印张15$\frac{1}{4}$・插页6・字数340,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1・448　定价（四）1.65元

“列宁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譯出的。“列宁全集”俄文版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联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于1941年开始出版的。

第十五卷說明

第十五卷包括列宁在1908年3月至1909年8月这段时期写的著作。

收入本卷的有列宁发表在"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和短評，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和"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文件。

在"走上直路"、"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論俄国革命的'本性'"、"对目前时局的估計"、"走上軌道"等著作中，列宁說明了六三政变的性質，提出了和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任务和策略，揭露了孟什維克的取消主义。

"关于两封来信"、"关于'論迫切問題'一文"、"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取消取消主义"这几篇文章，以及"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文件，是为了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即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說。

在"十九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原作者的摘要"、"彼·馬斯洛夫的歇斯底里发作了"、"对彼·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見"、"編輯部的話"和"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怎样維护修正主义"等著作中，列宁捍卫并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問題的理論。

在"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好战的軍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

軍国主义的策略"、"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議"这几篇文章中，列宁闡明了极其重要的国际事件，規定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軍国主义作斗爭的策略。

本卷有六个文件第一次編入"列宁全集"。在"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中，列宁揭露了資本家的侵略野心和他們的备战活动，指出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成长。"布尔什維克的声明"和"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員会"这两个文件是为了說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上布尔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取消派的斗爭。在"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上的两次发言以及"布尔什維克中央給喀普里学校委員会的信的草稿"，是为了反对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第十五卷説明 ……………………………………………………VII—VIII

1908 年

走上直路 ……………………………………………………………1—5
論俄国革命的"本性" …………………………………………6—12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13—21
沿着老路走去! ………………………………………………22—29
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結成了联盟? ……………30—31
議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 ………………………………………32—44
第二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 …………………………………45—49
十九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 …………………………………50—121
　　一 …………………………………………………………………50
　　二 …………………………………………………………………61
　　三 …………………………………………………………………70
　　四 …………………………………………………………………82
　　五 …………………………………………………………………93
　　六 ………………………………………………………………102
　　七 ………………………………………………………………109
論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 ………………………………………123—131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 原作者的摘要 …………132—155

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156—162
編輯部的話……163—164
好战的軍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軍国主义的策略……165—175
一……165
二……167
三……171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176—183
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184—186
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187—193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194—204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議……205—220
彼·馬斯洛夫的歇斯底里发作了……221—230
对彼·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見……231—242
对目前时局的估計……243—255
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怎样維护修正主义……256—261
关于两封来信……262—278
第三届杜馬关于土地問題的討論……279—29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294—302
1.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議草案……294
2. 給組織問題委員会的指示……298
3. 关于預算表决問題給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具体指示……299
第一种方案……299
第二种方案……299
4.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决議的补充……301
5. 布尔什維克的声明 事实的声明……302

1909年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結革命，革命又怎样給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結……303—317
走上軌道……318—328
关于“論迫切問題”一文……329—332
无产阶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爭目标……333—352
一……333
二……340
三……343
四……348
五……351
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員会……353—355
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356—368
資产阶級的“向左轉”和无产阶級的任务……369—375
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376—387
各阶級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388—396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1909年6月8—17日〔21—30日〕）……397—419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公报……397
关于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問題的講話（6月11日〔24日〕）……406
关于布尔什維克在杜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講話和決議草案……408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決議……411
1. 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411

2. 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 ……415
3. 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維克代表会議的宣传 ……417
4. 关于在国外某地的党校 ……418
5. 关于断絕和馬克西莫夫同志的关系 ……419
取消取消主义 ……420—427
評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428—432
关于馬·利亚多夫給"无产者报"編輯部的信 ……433
給喀普里党校組織者的信 ……434—435
布尔什維克中央給喀普里学校委員会的信的草稿 ……436—437
給喀普里党校学員尤利、万尼亚、薩維里、伊万、弗拉基米尔、斯塔尼斯拉夫和弗馬諾同志的信 ……438—444
注释 ……445—470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471—477

插图

1908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第1版，該号刊載了列宁的"論俄国革命的'本性'"和"关于扩大杜馬預算权的辯論"两篇文章 ……7
1908年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一文手稿第1頁 ……177

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第1版，
該号刊載了列宁的"走上軌道"一文 ……………………………319
1909年列宁"关于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問題的
講話（6月11日〔24日〕）"手稿第1頁 ………………………406—407

走上直路[1]

第二届杜馬的被驅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2]，是我国革命史上的轉折点，是我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独特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始。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从俄国阶級力量的总的对比和未完成的資产阶級革命的任务的角度談过这个曲折时期的意义。現在，我們想談談在革命发生这个轉折以后，我們党的工作状况。

反动的六三政变已經过去半年多了，毫无疑問，在政变发生后的头半年，所有的革命組織，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在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动搖、渙散和瓦解——这就是这半年的一般情况。当然，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反动势力的极度的囂张和暂时的胜利，直接的阶級斗爭的遭受挫折，不能不引起革命政党的危机。

現在已經看得十分清楚，有很多迹象証明，这一危机已經停止，最坏的时期已經度过，正确的道路已經显露出来，党正在重新走上直路：堅定不移地領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革命斗爭。

就拿党的危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来說吧！这个表现当然远不是最深刻的，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突出。这就是知識分子的脫党。今年2月出版的我們党的中央机关报[3]創刊号，提供了很多可以說明党内生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我們都轉載了），而且非常清楚地說明了这种脫党現象。有一篇来自庫列巴茨工厂（中部工业区弗拉基米尔专区党組織）的通訊报道說："最近由于缺少知識分

子工作人員，专区党組織已經灭亡了。"来自烏拉尔的通訊报道說："我們的思想力量正象雪一样地在融化。""那些根本不願参加秘密組織……而只是在高潮时期，在很多地方眞正有自由的时期才混入党內的人，都离开了我們的党組織。"中央机关报的"論組織問題"一文在总結这些（以及其他未刊登的）报道的时候写道："大家知道，最近知識分子在大批地开小差。"

但是，党摆脫了半无产者、半小市民的知識分子，就能使那些在无产阶級群众进行英勇斗爭的时期积蓄起来的新的純粹无产阶級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我們上面引用的那篇通訊所說的那个陷于絕境、甚至完全"灭亡了"的軍列巴茨組織，现在已經复活了。那篇通訊写道："散布在整个专区的大量的工人党組織，虽然多半沒有知識分子，沒有出版物，甚至同党的中央机关沒有任何联系，但是它們都不願意灭亡……参加組織的人数并沒有减少，而是增加了……由于沒有知識分子，最有觉悟的工人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宣传工作。"可見，总的結論是，"在很多地方，由于知識分子脫党，重要的工作落到先进工人的手里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創刊号第28頁）。

要在另外的即所謂阶級的基础上改組党組織，当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做起来一定会发生搖摆。然而，困难的只是第一步，而这一步已經走过了。党已經走上了直路：由工人群众来領导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識分子"。

起初在工会和合作社中摸索着进行的工作，现在已經完全就緒，而且有了固定的形式。中央委員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工会和合作社的两个决議，就是从日益发展的地方工作中总結出来的。在一切非党組織內建立党支部；本着无产阶級的战斗任务的精神，革

命的阶級斗爭的精神領导这些組織；“从沒有党性到有党性”（“社会民主党人报”創刊号第28頁），——这就是这里的工人运动已經走上的道路。偏僻的省城明斯克的一个党組織的通訊員报道說：“比較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离开了它們（遭到当局破坏的合法工会），他們愈来愈贊成成立秘密工会。”

在完全不同的方面的工作，即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工作，也是沿着这种“从沒有党性到有党性”的方向开展起来的。这听起来当然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們不能一下子就把我們的議会代表的工作提到党的高度，就象我們不能一下子就“按照党的方式”在合作社內进行工作一样。我們的社会民主党杜馬代表是按照假造民意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是从保持了合法地位、在头两届杜馬期間遭到迫害后人数大减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間选举出来的，因此，在开始的时候他們在事实上必然会更象非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象真正的党員。

这很可悲，但这是事实，在同农奴制有千絲万縷联系的資本主义国家，在公开的工人党总共才存在了两年的情况下，事情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不仅是非党的知識分子，甚至那些象蒼蝇麕集在盛蜜的盘子上一样，集聚在杜馬党团周围的“无头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化的知識分子，也想根据这种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建立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些可敬的伯恩施坦派的努力好象是落空了！这里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好象也开始有了起色。我們不猜測，但是也不閉上眼睛不看，在我国条件下比較象样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議会工作还要費多大力气。我們要指出的是，中央机关报創刊号刊載了党对杜馬党团的批評和中央委員会关于杜馬党团比較正确的工作方針的明确决議。我們决不認为中央机关报上的

这个批評把一切缺点都談到了，譬如，我們認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該投票贊成把收到的土地稅首先交給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該投票贊成城市貧民按照不高的价格赎买他們租用的土地(見中央机关报創刊号第86頁)。但是比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問題。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問題是，从我們一切工作中已經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馬党团正在轉变为眞正的党組織；也就是說，不管需要花費多少气力，不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驗、动搖、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点的。

眞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眞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道："烏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紙，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薩出版了一种，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很快也会出版报紙；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民族組織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規模。"尽管警察阻撓得很厉害，除了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以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机关报"工人旗幟报"[4]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談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經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更主要的是——工人当中的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領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們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搖的坚强核心所依靠的基础。这个秘密的核心将会通过杜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闊地伸展自己的触角，扩大自己的影响。

初看起来，这种党的工作情况和德国在特别法[5]时期(1878—1890年)的党的工作情况十分相似。俄国工人运动在三年(1905年底到1908年)內走的道路，就象是德国工人运动在資产阶級革

命以后走了30年（1848—1878年）的那条道路。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实質上却有极大的区别。在德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以后的30年中間，彻底完成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这一革命无論在60年代初的立宪議会中，无論在联合了大部分日耳曼国家的王朝战爭中，或是在利用普选权建立帝国的活动中，都完結了。在俄国，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敗以后不滿三年的期間，不但沒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而且第一次使广大的无产阶級和农民群众了解到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的时間內，立宪的幻想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賴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現，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純粹經济的、专門財政的、国內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銳化。无产阶級政党（它已經走上一条直路：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組織，使之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散布影响的工具）会比1905年10月和12月更有决战准备地迎接这一危机。

载于1908年3月19日（4月1日）
"无产者报"第26号

按报紙原文刊印

論俄国革命的“本性”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立宪民主党的“言論报”[6]在它最近一篇社論中这样感叹地写道。我国反革命自由派的正式机关报这个宝貴的自供是必須特別强調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俄国革命的本性問題。布尔什維主义对农民資产阶級革命的“本性”的基本观点就是認为这个革命只有反对动搖的、不穩定的、反革命的資产阶級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我們必須堅持說，事变已經十分有力地証实了这种观点。

在1906年初第一屆杜馬以前，司徒卢威先生曾写道：“杜馬中的农民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这在当时是这个自由派的大胆断言，他还想把庄稼汉从幼稚的保皇派改造成为反对派的拥护者。当时，官僚的机关报，維特先生的走狗們的报紙“俄罗斯国家报”硬說，“愚民会来搭救的”，就是說，广大的农民代表会对专制政体有利。这种看法在当时（已經过去很久了！有整整两年了！）非常流行，甚至从孟什維克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7]上的发言中也可以清楚地听到这样的調子。

但是，第一屆杜馬就使保皇派的这些幻想和自由派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最愚昧閉塞的、政治上无知的、沒有参加政党的庄稼汉竟比立宪民主党人左得不可比拟。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精神”和劳动派政策[8]的斗爭，是头两屆杜馬期間自由派“活动”的主要內

1908年3月26日（4月8日）“无产者报”第27号第1版，

該号刊載了列宁的“論俄国革命的‘本性’”和

“关于扩大杜馬預算权的辯論”两篇文章

（按原版縮小）

容。第二届杜馬被驅散以后，司徒卢威先生（反革命自由派中的先进人物）对劳动派进行了激憤的批評，宣布对农民的"激进知識分子"領袖进行十字軍討伐，从而表明了自由派的彻底破产。

自由派經过两届杜馬的試驗，結果遭到失敗：他們沒有能"使庄稼汉馴服"。他們沒有能使庄稼汉謙逊一些，肯于讓步，願意同地主专制制度妥协。資产阶級的律师、教授以及其他一些胡言乱語的知識分子的自由主义未能"适应""劳动派"的庄稼汉。它在政治上和經济上都落在他們后面。因此，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可以概括如下：自由派已經彻底証明自己是反革命的，不能領导农民革命；农民还沒有完全了解，只有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領导下，走革命的共和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自由派的破产意味着地主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被这个反动派吓倒，受到他們的輕視和侮辱，成为斯托雷平立宪滑稽剧中的农奴主帮凶，因此現在，有时由于怀念过去而伤心落泪。当然，同劳动派精神作斗争是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不管怎样……一旦这种精神再次加强起来，我們再作一次斗爭还能不胜嗎？那时，我們扮演調停人的角色还能不成功一些嗎？我国德高望重的名人彼·司徒卢威不是在革命以前就写过，在两头的政党彼此进行尖銳斗爭的时候，中間的政党总能坐收渔人之利嗎？

于是同劳动派斗爭得筋疲力尽的自由派就向反动派摊出一张劳动派精神复活的王牌来！"言論报"的同一篇社論写道："刚刚提交国家杜馬的右派农民的土地草案和司祭的土地草案表現了过去的劳动派精神。正是劳动派精神，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有个草案是农民提出的，41 个国家杜馬代表签了名。另一个草案是司祭提出的。前者比后者激进一些，就是后者在某些方面（請听立

宪民主党的"言論报"是怎么說的！）也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草案远远抛在后面了。"自由派不得不承認，按照有名的六三选举法对选民进行了多次篩选以后，这个事实所証明的（这一点我們早已指出；見"无产者报"第22号）就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俄国革命的本性①。

"言論报"写道，农民有后备土地，不是一种临时办法，"而是一种固定的制度"。立宪民主党人承認这一点，但又謙逊地閉口不談，他們自己为了迎合反动派，奉承反动派，在从第一届杜馬轉到第二届杜馬的时候，把后备土地这个主张（即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承認土地国有化）从自己的綱領删去了，而贊成古尔柯[9]的土地完全私有的观点。

"言論报"写道，农民按公道的估价（就是說，按立宪民主党的估价）購买土地，但是（这个"但是"，真是意味深長！），要由"各地的全体居民选出的"地方土地机关来估价。

有些东西，立宪民主党先生們又不得不閉口不談。他們不得不絕口不提，这种全体居民的选举使人很快就連想到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馬的有名的"劳动派"草案，即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記名的投票选出地方土地委員会的草案。他們不得不絕口不提，头两届杜馬的自由派如何卑鄙地反对这个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唯一可行的草案，如何可鄙地支吾搪塞，轉弯抹角，希望不要把他們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言論报"的社論（后来米留可夫的"斗爭的一年"轉載了这篇社論）中，在庫特列尔的草案和楚普罗夫的文章（立宪民主党的"土地問題"文集第2卷）中說到的东西，在杜馬講坛上全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33—436頁。——編者注

都說出来。那就是他們在自己的报刊上承認，按他們的意图，参加地方土地委員会的代表，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地主，外加一名政府代表第三者参加。換句話說，立宪民主党人把庄稼汉出賣給了地主，处处保証地主占多数（地主加上地主专制政府的代表，总是比农民占多数）。

我們完全了解，为什么資产阶級議会自由派的騙子不得不絕口不提这一点。他們以为工人和农民会忘記俄国革命道路上这些最大的路标，这是枉費心机。

連司祭这些极端反动分子，这些政府特地豢养的黑帮极端反动分子的土地草案也要比立宪民主党人进步一些。他們也談到了降低"人为提高的"土地"价格"，談到土地累进税，以及土地不超过消費額免繳任何賦税。为什么农村的司祭这个官方正教的巡官，要比資产阶級自由派更偏向于农民方面呢？因为农村司祭不能不同庄稼汉生活在一起，許多事情要依靠他們，甚至有时——在教士利用教会的土地經营一点农业的情况下——还要当一当农民。农村的司祭，不管他是哪个极端社巴托夫式的杜馬的代表，都要回农村，而要回农村——不管农村受到討伐队和斯托雷平常駐軍队怎样清洗——站在地主一边是回不去的。因此，把庄稼汉出賣給地主，这对最反动的僧侣来說，比对有学問的律师和教授要难一些。

一点不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农民的俄国，伟大的資产阶級革命的本性就是这样：只有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沒有无产阶級的領导，这种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才能不顧資产阶級自由派內在的反革命性而把这个革命引向胜利。

現在，自由派或者是不相信劳动派精神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俱在），或者是打算再来一次政治欺詐。下面就是"言

論报”的結語中提出的这种欺詐的綱領:“只有認眞地实际地提出这类改革(即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礎”上的土地改革),才能医好居民的空想企图。”应讀作:斯托雷平先生閣下,尽管你到处布滿絞架,实行六三选举法,但并沒有“医好”居民的“空想的劳动派精神”。讓我們再来試驗一次:我們答应人民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用向地主贖买土地和地主在地方土地机关中占优势的办法来把人民“医好”!

我們衷心感激米留可夫、司徒卢威先生之流这样热心“医治”居民对和平立宪道路的“空想”信仰。他們正在医治,看来是会医好的。

載于1908年3月26日(4月8日)
“无产者报”第27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的。自然历史理論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見，引起了并且直到現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爭。馬克思的学說直接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会的先进阶級服务，指出这一阶級的任务，并且証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經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資产阶級的科学和哲学就沒有什么可以說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規定講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級的青年，为了“訓練”他們去反对內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馬克思主义連听都不願听，就宣布馬克思主义已經被駁倒，已經被消灭。无論是借駁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遺教不放的龙鍾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馬克思。馬克思主义的发展、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級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資产阶級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級的斗爭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阶級中間流传的学說中，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紀中（从 19 世紀 40

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論进行斗爭。在40年代前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場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末，在經济理論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魯东主义的斗爭。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爭：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說。在60年代，斗爭从一般的理論方面轉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在第一国际中清除了巴枯宁主义。在70年代初，蒲魯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在70年代末，实証論者杜林也暫时显露过头角。但是他們两人对无产阶級的影响都已經微不足道了。馬克思主义已經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紀90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已經完成了。就是在蒲魯东主义传統保持得最久的拉丁語系各国，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是拿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綱領和策略的基础的。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組織，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立刻而且几乎沒有經过什么斗爭，就在一切重大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义立場上来了。但是，在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較完整的、同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說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說所表現的趋向便开始給自己另找出路。斗爭的形式和原因已經改变，但是斗爭还是繼續着。馬克思主义創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紀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馬克思主义內部的一个反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爭。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經是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馬克思学說的修改，对馬克思学說的修訂，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經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躪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們眼前轉变成修正主义了。我們的社会民粹派无論在土地問題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綱領），或者在綱領和策略的一般問題上，都不断地以对于馬克思学說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們那自成一派而与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中日益消亡、日趋沒落的残余。

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潰了。它已經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継續斗爭了。現在我們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內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資产阶級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們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蹣跚而行。教授們重复僧侶們已經說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濫調，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囔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囔着），說唯物主义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蔑視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10]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揚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

者在这里大講特講的庸俗不堪的濫調的唯一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須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現在有些人极其錯誤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諾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偸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

在政治經济学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詳細得多，他們竭力用“經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們說，积聚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沒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緩慢。他們說，現在危机已經更少見，更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給資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們說，阶級矛盾有減弱和緩和下去的趋势，所以資本主义必然“崩潰的理論”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們說，就連馬克思的价值理論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維克[11]的观点来加以糾正。

在这些問題上对修正主义者进行的斗爭，正象20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論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論思想有了頗見成效的活跃。修正主义者的論据被人們用事实和統計数字作了詳細的分析，証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貫地粉飾現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經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辯駁的材料証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比較不发达，而現代的統計学家和經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愈益卷入世界經济交換范圍的农业特殊部門（有时甚

① 見波格丹諾夫、巴札罗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这里不是分析这本書的地方，我現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論文或专門写一本小册子来說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說的一切，实質上也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謨派和新貝克萊派修正主义者。（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編者注）

至是特殊作业)。在自然經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飲食无限恶化，經常挨餓，延长工作时間，家畜質量及其飼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資本主义工場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維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資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經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現的往往是錯綜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証明，他們在資本主义統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經济在資本主义統治下沒有出路，农民必須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科学方面来說，修正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毛病，是他們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象普遍的現象，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資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方面来說，他們的毛病就是他們不可避免地、有意或无意地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私有主的观点(即資产阶級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們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論和崩潰論的問題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間内，只有最近視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馬克思学說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沒有过去，这是客观現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个别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統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們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級的生活更加沒有保障，資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級矛盾尖銳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資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潰，无論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經济危机来說，或者就整个資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潰来說

都是如此。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的财政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加，更不用說已經有許多迹象出現的、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所有这些都使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論”被一切人忘記了，似乎連許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記了。但是这种知識分子的不坚定性所給予工人阶級的教訓，是不应当忘記的。

在价值理論的問題上要說明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維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絕对沒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改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級斗爭学說。他們說，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經把阶級斗爭的根据消灭掉，幷且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沒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成不正确的了。他們說，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阶級統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絕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資产阶級結成联盟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見，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資产阶級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說，資产阶級議会制度是会消除阶級和阶級区分的，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預国家事务的权利。19 世紀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 20 世紀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謬。在“民主”資本主义的自由下，經济上的差别幷沒有縮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議会制度幷沒有消除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共和国作为阶級压迫机关的本質，而是暴露这种本質。議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組織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議会制度幷不能以此促使危

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使内战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最高限度地尖銳化。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經再明显不过地証明这种尖銳化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資产阶級連一秒鐘都沒有犹豫，立刻就同民族公敌，同蹂躪其祖国的外国軍队勾結起来鎮压无产阶級运动。誰不懂得議会制度和資产阶級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內在的辯証法（这种辯証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爭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議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則的宣传鼓动工作，去眞正培养工人群众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这种“爭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經驗，已經十分确凿地証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識，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爭的眞实意义，把努力斗爭的人同最不能斗爭、最动搖、最容易叛变的人联系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是在眞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內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試，它給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級永远不会忘記的实际評价。

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他們的經济傾向和政治傾向相輔相成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話，要比許多长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質。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整个資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犧牲无产阶級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質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

有預先覚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內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綫）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級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現象。每一个稍有見識、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絲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統派和伯恩施坦派的关系、法国盖得派和饒勒斯派（現在尤其是布魯斯派）、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独立工党、比利时勃魯克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关系实質上都是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現状来說，彼此有极不相同的民族条件和历史特点。現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分化”，現在实質上在世界各国都已經是按一条路綫进行着，这表明比三四十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三四十年前在各个国家內相互斗爭的并不是統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一些同一性質的派别。而現在在拉丁語系各国表現为“革命工团主义”[12]的“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依附于馬克思主义，同时把它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开口閉口都說他們反对向来被人了解得不正确的馬克思，而求助于現在被他們正确地了解了的馬克思。

我們在这里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內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沒有国际化，甚至还沒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因此，我們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資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資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阶級并存的总是有广泛

的小資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資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誕生的，現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誕生出来。資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許多"中間阶层"(工厂附屬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車工业和汽車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級队伍的。所以，小資产阶級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滲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級革命发生的时候还会繼續存在，以为必須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級化以后才能实現无产阶級革命，那是极其錯誤的。現在我們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經历着的事情，即我們同修正馬克思理論的人們所进行的爭論，現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問題的实踐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們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級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級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規模上再次經历到，因为无产阶級革命将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們在斗爭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給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19世紀末叶革命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爭，只是不顧市儈們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級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級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写于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1908年載于"卡尔·馬克思(1818—1883)"文集

署名：弗·伊林

按文集原文刊印

沿着老路走去！

对俄国革命，即对革命头三年如何估計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了。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級面目，不分析各阶級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級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在本文中，我們打算同讀者談談对这种分析所作的一次尝試。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3]第3号上，費·唐恩和格·普列汉諾夫都发表了文章，一个对革命的結局作了系統的估計，另一个就工人政党的策略作出了結論。唐恩的估計可以归結为一点，即認为对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不能不是一种幻想。“无产阶級实行新的、广泛的革命发动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产阶級的立場。”“在它（新高潮）的最初阶段，当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还沒有把城市小市民卷进去，而城市革命的发展还沒有在农村燃起火焰时，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就面对面地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出現。”

从这种“真理”中应当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結論，費·唐恩显然沒有說完。他显然是不好意思写完那种自然而然地会从他的話里得出的东西：向工人阶級推荐孟什維克的著名的策略——支持資产阶級（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对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閣的口号的支持、普列汉諾夫提出的全权的杜馬等等）。

可是普列汉諾夫替唐恩作了补充，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3号上写了一篇杂文，最后几句是：“如果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在1905—1906年能够避免半个多世紀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所犯的这些錯誤”（即对当时的資本主义能够发展这一点估計不足，对无产阶級能起革命作用这一点估計过高），“那对俄国是一件好事！”

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唐恩和普列汉諾夫不是直截了当地說出，而是小心翼翼地企图証明孟什維克要无产阶級依賴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是正确的。現在我們就来仔細观察一下他們在这件事情上的“理論根据”吧。

唐恩是这样論述的，他說“农民运动”是以“城市革命在它的資产阶級道路和无产阶級道路上的成长和发展”为轉移的。因此，随着“城市革命”的高潮而来的是农民运动的高潮，而随着城市革命的低落，“被革命高潮压下去的农村內部的对抗又重新尖銳起来”，“政府的土地政策、离間农民的政策等等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从这里就得出我們在前面引証过的那个結論：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将是新高潮最初阶段的主要政治力量。按照費·唐恩的意見，“无产阶級应当而且可以利用这种状况来发展革命，使这种发展远远超过革命新高潮的起点，并且造成以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为标志（原文如此！）的社会完全民主化”。

不难看出，发表这种議論完全是由于对我国革命中的土地問題的根本无知，而且这种无知又掩飾得很不高明，只是說說以“解决”問題“为标志”的“完全民主化”这种廉价的空話。

費·唐恩以为，“对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抱希望”，这在現在和过去都是出于民粹主义的偏見，是由于忘記了农村內部的对抗

和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質。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普通的孟什維克观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未必有誰象費·唐恩在我們所分析的文章中这样突出地把他們的全部謬論都摆出来。这位最可尊敬的政論家竟然会沒有觉察到，他所提出的互相对立的两种"解决"土地問題的办法都是符合于"农民运动的个人主义性質"的！实际上，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照唐恩的說法）的斯托雷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筑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这是毫无疑問的。那末，費·唐恩称之为"彻底的"、同"社会完全民主化"相联系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又怎样呢？最可尊敬的唐恩是不是認为，这个办法不是建筑在农民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呢？

不幸的是：唐恩用"以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为标志的社会完全民主化"这种空話来掩飾他的糊塗透頂。他象瞎子一样不知不覚地偶然碰上两种客观上可能实現但是还沒有被历史最終选定的"解决"土地問題的办法，同时又不能明确地說明这两种解决办法的性質和条件。

为什么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呢？因为在我国农民中間，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早已形成了农民資产阶級和农民无产阶級这样两个敌对阶級。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能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是表示什么？要是形势只对斯托雷平有利，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它表示土地問題在資产阶級俄国的"解决"使地主和农民的全部土地私有制得到彻底的（在无产阶級革命以前）巩固。这将是普魯士式的"解决"，这种解决办法确实能保証俄国发展資本主义，但是异常緩慢，把政权长期交給容克；对无产阶級和农民来說，比起另一种客观上可能的、也是資本主义的"解决土地問題"的办法，要痛苦一千倍。

唐恩不加思考，就把另一种解决办法称为“彻底的”解决。这种話沒有什么价值，沒有絲毫意义。斯托雷平式的解决办法也是很彻底的，因为它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旧的村社和旧的土地制度。农民解决俄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土地問題的办法和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人解决土地問題的办法的眞正差别在于：前者必然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且很可能也废除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份地这个个别問題，我們暫且不去談它，因为就是从我們目前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綱領的观点来看，唐恩所有的議論也都是錯誤的）。

現在試問，第二种解决办法在客观上确实有可能嗎？无疑是可能的。这是一切有头脑的馬克思主义者都会同意的，否則无产阶級支持小私有者的沒收大地产的願望，就是反动的詐騙行为。在其他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都沒有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会写出支持农民沒收大地产的願望的綱領。在俄国，无論是布尔什維克还是孟什維克，都一致認为有支持这种願望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在俄国，在客观上有可能走另一条資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一条不是“普魯士式的”，而是“美国式的”，不是地主資产阶級的（或容克的），而是农民資产阶級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立宪民主党人，专制制度和資产阶級，尼古拉二世和彼得·司徒卢威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須通过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資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們分歧的地方只是如何更好地保存这种所有制和保存到什么程度。

工人和农民，社会民主党人和民粹主义者（包括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彼此一致的地方是：必須通过以暴力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办法为資本主义“清洗”俄国腐朽的土地制度。他們分歧的地方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解，在現代社会中，不論

是土地地方公有化，土地国有化，土地社会化，或是土地分配，任何土地革命，即使是最彻底的土地革命，都是資本主义性質的，而民粹派却不了解这一点，他們用关于平均制的庸俗而空想的詞句来粉飾他們爭取农民資产阶級的农业演进而反对地主資产阶級的演进的斗爭。

費·唐恩之所以十分糊塗、十分愚蠢，是由于他根本不了解俄国資产阶級革命的經济基础。他只看到俄国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小市民社会主义有意見分歧，在目前革命中农民爭取土地的斗爭的經济內容和經济意义如何这一問題上有意見分歧，而“沒有觉察到”在这种分歧后面各种現实的社会力量为爭取这种或那种客观上可能实現的資本主义农业演进的道路而进行的斗爭。而且他还用斯托雷平的“一定程度的胜利”和“以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为标志的社会完全民主化”这种詞句来掩飾他的这种完全无知。

事实上，現在俄国的土地問題是这样的：斯托雷平的政策要取得胜利，就需要长期用暴力鎮压和屠杀不願意餓死、也不願意流落他乡的农民群众。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胜利的例子。如果我們說这种政策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那这是民主派的空洞而愚蠢的漂亮話。可能的！但是我們的任务是明确地向人民指出，这种胜利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換取，我們应当全力爭取另外一条比較短、比較快的道路，即通过农民革命实現資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在資本主义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級領导的农民革命是困难的，是很困难的，但是革命是可能的，必須为实現这一革命而斗爭。三年的革命使我們和全体人民不仅懂得必須为实現这一革命而斗爭，而且懂得如何去斗爭。不論孟什維克在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政策上耍什么“花招”，都不能使工人忘記这些革命教訓。

其次，尽管群众进行斗爭，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长久地維持下去而足以順利实現“普魯士式的”道路，那又怎么办呢？那时候俄国的土地制度将完全是資产阶級的土地制度，富农将几乎把所有的份地都拿到自己手里，农业将成为資本主义的农业，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解决”土地問題的办法，无論是彻底的还是不彻底的，都是不能实現的。那时忠誠的馬克思主义者就会直截了当地公开地干脆把任何“土地綱領”都拋掉，并且向群众說，工人已經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来保証俄国发展美国式的資本主义，而不发展容克式的資本主义。工人現在号召你們进行无产阶級社会革命，因为在按斯托雷平的精神“解决”土地問題之后，任何其他能够真正改变农民群众的經济生活条件的革命都不可能有了。

俄国資产阶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問題，即唐恩在他用德文轉述他用俄文写的文章时（《*Neue Zeit*》[14]第 27 期）弄得混乱不堪的問題，就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問題。

在俄国，就是实現了斯托雷平-立宪民主党的农业发展道路，資产阶級革命也还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但是，在 1830 年和 1848 年的法国革命这样的革命中，是談不上“以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为标志的社会完全民主化”的。或者确切些說，在这样的革命中，只有庸俗的 *quasi*① 社会主义者还会喋喋不休地嚷着要“解决”（特别是“彻底地”）成熟的資本主义国家已經解决了的土地問題。

但是在俄国还远沒有建立起資本主义的土地制度。这一点，不仅我們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很清楚，不仅同情革命和希望革命出現新高潮的人們很清楚，甚至那些彻头彻尾的、自觉的、公开

① 冒牌。——編者注

放肆的、革命的敌人和黑帮专制制度的朋友，如彼得·司徒卢威先生，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他“大声哭叫道”，我們需要俾斯麦，需要自上而下地把反动变成革命，那末这正是因为司徒卢威在我国既沒有看到俾斯麦，也沒有看到自上而下的革命。司徒卢威看到的，是仅仅依靠斯托雷平的反动和成千的絞架决不能建立起地主資产阶級的、巩固的、雇佣农民的俄国。需要采取另外的办法，另一种类似解决（哪怕是按照俾斯麦的方式）全国性的历史任务、类似統一德国、类似实行普选制的办法。而斯托雷平只能把杜姆巴澤和里加博物館[15]的英雄們統一起来！甚至不得不废除根据1905年12月11日法令[16]制定的維特选举法！斯托雷平甚至不得不撇开那些对唐恩所說的土地政策的“一定程度的胜利”感到滿意的农民，而从参加第三届杜馬的农民那里听取“劳动派的”要求！

当彼得·司徒卢威清楚地看到，我国沒有、到現在还沒有一个开始起作用的、有保留的、有限制的、残缺不全的、可靠的“宪法”，他怎能不“喊叫”、不呻吟、不嚎哭呢？

司徒卢威很清楚地知道他正在往哪里走。而費·唐恩在三年的革命中却什么也沒有学会，什么也沒有忘掉。他仍然象瞎子一样，把无产阶級拉去受司徒卢威先生們的庇护。他仍然嘟噥着那些反动的孟什維克的話，說什么在我国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能够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那末反对誰呢，最可尊敬的先生？反对古契柯夫嗎？反对君主政体嗎？

費·唐恩用德文写的这篇文章表明，他在这里給自由派脸上貼金已經到了多么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甚至不害臊地对德国讀者說，城市小市民选了“进步的复选人”（即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第三届杜馬，而农民却选了40%的反动的复选人！向斯托雷平鼓掌的

"进步的"米留可夫們和司徒卢威們万岁！唐恩們和米留可夫們为了反对在第三届杜馬中表現劳动派精神的"反动"农民而結成的联盟万岁！

为了迎合那些反动的孟什維克理論，普列汉諾夫还伪造了恩格斯的話。恩格斯說，馬克思在1848年的策略是正确的，这个策略，而且只是这个策略眞正給了无产阶級以正确可靠的、永远忘不了的教訓。恩格斯說，虽然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但是它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是无产阶級的准备不够和資本主义还不够发达[17]。可是普列汉諾夫，好象是为了侮辱恩格斯，好象是为了讓伯恩施坦們和斯特列尔措夫[18]們大大地开心，就这样来解释恩格斯的話，說什么他对馬克思的策略"后悔"了！他后来承認馬克思的策略是錯誤的，并且傾向于支持德国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

明天格·普列汉諾夫会不会又对我們說，恩格斯在談到1849年的起义时認为"不应当拿起武器"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教給无产阶級的是革命的策略，是把斗爭推进到最高形式的策略，是引导农民跟着无产阶級走，而不是引导无产阶級跟着自由派叛卖者走的策略。

載于1908年4月16日（29日）
"无产者报"第29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結成了联盟？

4月1日（14日）的«Frankfurter Zeitung»[19]上登載了一篇发自彼得堡的私人电訊，电文报道說："十月党人、溫和的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和平革新党[20]从3月底起就进行秘密談判，討論他們能否結成联盟的問題。計划是已經沒有希望得到极右派支持的十月党人提出的。极右派由于对杜姆巴澤問題的質問而特别不滿意十月党人，他們打算同反对派一起投票反对中間派。这种做法会給杜馬工作造成困难，因为极右派和反对派联合起来共有217票，而中間派和溫和的右派一起有223票。第一次会議（討論联盟問題）是在4月12日（旧历3月30日）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議的有30个按比例选出的受托人。这次会議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决定在下星期內再召开会議。"

这条消息的可靠程度如何，我們不知道。不管怎样，俄国报紙的沉默幷不是表示否認，我們認为，有必要把外国报紙的报道告訴讀者。

秘密談判正在进行，这是沒有什么不可能的。从1905年11月司徒卢威拜訪維特起，直到1906年夏同特列波夫之流进行秘密談判[21]等等为止，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治历史都証明了，他們的策略的实質就是从后門投奔当权派。但是，即使这个关于談判的消

息不可靠，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是在第三届杜马中，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向右转，在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默契联盟。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许多次投票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立宪民主党人发言的内容和他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早在第三届杜马召开以前就说过，在第三届杜马中有两个多数（见"无产者报"和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①）。我们当时就证明过，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象孟什维克那样），而且主要是不愿对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多数进行阶级分析，就等于让资产阶级自由派牵着自己走。

立宪民主党人的阶级本质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现在事实迫使那些在1906年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人或者承认这一点，或者完全滚到机会主义者方面去。

1908年4月16日（29日）
"无产者报"第29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106—115、127—129页。——编者注

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22]

現在，俄国不会有人再想照馬克思那样进行革命了。不久以前，一家自由派的——甚至几乎是民主派的，——甚至几乎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維克的）“首都邮报”[23]，就是这样或者几乎就是这样宣揚的。应当为这个箴言的作者說句公道話：他們确实抓住了目前在最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受过一些教育的小市民中間，也許还在許多完全沒有受过教育的小資产阶級群众中間普遍存在的政治情緒以及对待我国革命教訓的态度的实質。

这个箴言不仅反映了对整个馬克思主义及其对无产阶級的革命使命的堅定信念的憎恨，对支持广大群众的一切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斗爭并把斗爭进行到底的无畏决心的憎恨。不，不仅如此，这个箴言还反映了对不久前在俄国革命的实踐中实际考驗过的斗爭方法、活动方式和策略的憎恨。我們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确切些說，初步的胜利，微小的胜利），完全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級領导非无产阶級的劳动群众进行直接的革命冲击而取得的。一切失敗都是由于这种冲击的削弱造成的，都是由于迴避这种冲击、指望不发生这种冲击、有时（立宪民主党人）甚至是干脆取消这种冲击的策略而产生的。

現在，在反革命迫害猖獗的时期，小市民正在怯懦地巴結生活的新統治者，討好称霸一时的人，摈弃以往的一切，竭力把它忘掉，

要自己和别人相信，现在俄国已經不会有人再想照馬克思那样进行革命，不会有人再去考虑“无产阶級专政”，等等。

在其他資产阶級革命中，旧政权以武力鎮压起义人民而取得的胜利也总是使广大的“有教养的”社会人士灰心丧气，分崩离析。而在那些真正为自由而斗爭、在真正的革命事件中起过一些显著作用的資产阶級政党中，却总是出現一些同現在俄国知識分子小市民中普遍存在的幻想相反的幻想。这就是幻想“自由、平等和博爱”必然会取得迅速和彻底的胜利，幻想建立一个天下太平和人間幸福的全人类的共和国，而不是資产阶級共和国。这就是幻想在君主制和中世紀制度压迫下的人民中間沒有阶級糾紛，幻想暴力手段不能战胜“思想”，幻想过时的封建制度同新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对这种共和制度的資产阶級性，人們还根本沒有認識到，或者認識极端模糊）截然对立。

因此，在反革命猖獗时期，探索到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級代表人物就要起来反对（如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所做的那样）資产阶級共和派的幻想，反对对革命传統和革命本質作唯心主义的理解，反对用浮夸的空話来代替在特定阶級中間进行坚韌不拔和严肃認真的工作[24]。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們沒有看到阻碍在新的变化了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繼續进行革命工作的原始共和制度的幻想。我們沒有遇到夸大共和国的作用，并把这个反对封建制和君主制所必須的口号变成全体被剝削劳动群众进行各种解放斗爭的口号的現象。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脉相承的、培育这类思想的集团只是一小撮人，在三年革命风暴时期（1905—1907年），他們成立了机会主义小市民、人民社会主义者的新政党，加强了反对政治的暴动行为和无政府主义活动，而不

是广泛地迷恋于共和制度了。

小市民的德国在1848年革命冲击开始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现出小資产阶級民主共和制的幻想。小市民的俄国在1905年革命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現出而且日益表现出小資产阶級机会主义的幻想，这种机会主义希望妥协而不要斗爭，它害怕斗爭，一遭到失敗就急忙放弃自己过去的东西，就以灰心、沮丧和变节行为来毒化社会气氛。

显然，这种差别是社会制度不同和两个革命的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但是問題并不在于俄国的小資产阶級居民群众同旧制度的矛盾比較不尖鋭。恰恰相反，我国农民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进行的农民运动比以前19世紀的資产阶級革命中的农民运动，要强大得多，明确得多，政治上自覺得多。問題在于，在欧洲构成革命民主派核心的阶层，如城市行会手工业，城市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在俄国却一定轉向反革命的自由派。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大軍携手并进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自覺性，世世代代受农奴主压迫而陷于絕境、要求沒收地主土地的农民的坚决的革命性，——就是这些因素使得俄国的自由派比欧洲的自由派更容易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因此俄国工人阶級就更加負有这样的任务：保持知識分子和小市民急于抛弃的革命斗爭传統，发揚和巩固这种传統，把它灌輸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識中去，把它保持到不可避免的民主运动的下一次高潮。

工人們自发地执行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綫。他們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伟大的十月和十二月的斗爭。他們十分清楚地看到，只有通过这种直接的革命斗爭，他們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現在他們所說的，或者至少他們所感覚到的，就象一位織布工在給他的工会机

关的信中所写的一样：工厂主夺去了我們的果实，副工长仍旧象过去一样嘲諷我們，你們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

你們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們的想法。对于工人来說，这一年的斗爭提供了*怎么办*的范例。对于知識分子和变节的小市民来說，这是“疯狂的一年”，这是*不該怎么办*的范例。对于无产阶級来說，研究和批判地掌握革命經驗，就是要学会更有效地运用当时的斗爭方法，使这种十月罢工斗爭和十二月武装斗爭更广泛、更集中、更自覚地进行。对于支配着变节的知識分子的反革命自由派来說，掌握革命經驗，就是要永远避免“野蛮的”群众斗爭“幼稚地”突然爆发，而代之以建立在斯托雷平“立宪主义”基础上的“先进的、文明的”*立宪*活动。

現在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掌握和批判地检驗革命經驗。社会党人和自由派在談論。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談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各种各样掌握革命經驗的方法都不会超出上述两种对立的掌握方法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确提出問題：我們是应当掌握并且帮助群众掌握革命斗爭經驗以进行更頑强和更坚决的斗爭呢？还是应当掌握立宪民主党人背叛革命的“經驗”并把它传授給群众呢？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基本理論著作中談到了这个問題。他在已經譯成欧洲所有主要文字的名著“社会革命”的第二版里，对談到俄国革命經驗的地方作了許多补充和修改。第二版序言上注明的日期是1906年10月，这就是說，作者掌握的材料不仅可以判断1905年的“风暴和冲击”，而且可以判断我国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时期”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判断全国（几乎全国）都迷恋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和迷恋于第一届杜馬的时期。

在俄国革命的經驗中，考茨基認为哪些問題是相当重大并且是主要的呢？或者至少是比較重要，可以作为新的材料向一般研究“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考茨基著作第7节、即根据1905—1906年經驗增补的一节的标題）的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呢？

作者提出了两个問題。

第一，能够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并且使俄国革命成为眞正胜利的革命的那些力量的阶級成分問題。

第二，俄国革命提供的、按革命力量的使用情况和攻击性質来說都是最高形式的群众斗爭（就是十二月斗爭、即武装起义）的意义問題。

任何一个多少能以严肅認眞的态度对待俄国革命事件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馬克思主义者）都应該承認，这些确实是在估計俄国革命以及估計目前形势要求工人政党执行的策略方針方面的主要的基本問題。如果我們对哪些阶級由于客观經济条件能够使俄国資产阶級革命成为胜利的革命这一点不十分明确，那末我們說竭力要把这种革命变成胜利的革命，就是一些空話，就只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豪言壮語，我們在資产阶級革命中的策略就必然是无原則的和摇摆不定的。

另一方面，要具体确定革命政党在目前全国性危机的风暴时期的策略，只是指出能够抱着胜利完成革命的决心来行动的阶級，显然是不够的。革命时期同所謂和平发展时期，同經济情况沒有引起严重危机、沒有产生强大的群众性运动的时期的区別是：革命时期的斗爭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群众的直接革命斗爭比領导人在議会、报刊上进行的宣传鼓动活动要多得多。

因此，我們在估計革命时期时，如果只限于肯定不同阶級的行动方針，而不分析它們的斗爭方式，那末我們的論斷，从科学方面說來，就是不全面的、不辯証的，从政治实践方面說來，就蛻化成死板的說教（附带說一句，普列汉諾夫同志在他論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的著作中，十分之九都是滿足于这种說教的）。

如果要真正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估計革命，就应当把革命当作在某种客观条件下、进行某种活动以及多少順利地运用某些斗爭方式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的斗爭。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估計斗爭的技术方面和它的技术問題才是完全合适的，而对馬克思主义者来說是完全必要的。承認一定的斗爭形式而不承認学习斗爭技术的必要性——这就等于我們承認需要参加一次选举而不重視規定这次选举的技术問題的法律一样。

現在我們来談談考茨基对上面两个問題的回答。大家知道，这两个問題在整个革命时期，即从1905年春天起（当时在倫敦举行的布尔什維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25]和同时在日內瓦举行的孟什維克代表会議都在明确的决議中規定了自己策略的原則基础），到1907年春天举行統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倫敦代表大会[26]时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引起了长时期的热烈爭論。

对于第一个問題，考茨基作了如下的回答。他說，在西欧，无产阶級包括大量的居民群众。因此民主派在目前欧洲的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級在政治上取得統治地位。"在俄国，由于农村居民占大多数，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当然，社会民主派在最近的（德文是

absehbar，即看得見的，在視綫內的）将来也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有依靠无产阶級和农民的联盟（Koalition）才能取得。”考茨基甚至还說，这种胜利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西歐的无产阶級革命。

因此我們看到，資产阶級革命这个概念还不足以說明在这种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的那些力量。商业資产阶級或工商业資产阶級充当主要动力的資产阶級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发生过。这种革命是可能取得胜利的，这是上述資产阶級阶层对其敌人（如享有特权的貴族或专制的君主）的胜利。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資产阶級革命的胜利，要作为資产阶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农奴制大地产残酷的压迫（占一半），已經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級的力量和自覺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的資产阶級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質。这一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資产阶級性質（而馬尔托夫和普列汉諾夫在他們对考茨基的立場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評中却企图說明是排斥的）。这一特点完全决定了我国資产阶級的反革命性質和为了在这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而实行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的必要性。因为在資产阶級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級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种情况就是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内策略分歧的出发点。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了解各种局部的爭論（关于一般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問題，关于左派联盟及其性質的問題等）和个别的冲突。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05—1907年）的意見分歧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基本的策略分歧，而决不是象一

些不知內情的人有时所想的那样，在于“冲击主义”或“抵制主义”。

必須十分注意研究这种分歧的根源，必須根据上述观点来分析两届杜馬和农民直接斗爭的經驗，这是无論如何必須堅持到底的。如果我們現在不做这样的工作，那末在下一次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我們在策略方面每走一步都会在党內引起旧的爭論或引起派别冲突和纠纷。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农民資产阶級民主派的态度，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經驗来确定。否則，我們就不会有原則性强的、堅定的无产阶級的策略。順便說一句，决不能把“无产阶級和农民的联盟”理解为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不同的阶級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說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定，都会危害工人阶級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爭。农民必然会在自由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之間搖摆不定，这是它的阶級地位所决定的，我国革命在各个不同的斗爭領域都提供了許多这样的例子（如抵制維特杜馬，选举，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馬中的劳动派等）。无产阶級只有执行革命先鋒队的絕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絕关系，使它摆脫自由派的影响，并在斗爭过程中領导他們，从而眞正实現“联盟”，也就是农民进行革命斗爭条件下的联盟。只有无情地批評劳动派的缺点和动搖，而不是奉承他們，只有宣传共和主义的、革命的农民政党的思想，才能实現无产阶級和农民的“联盟”，是眞正为了战胜共同敌人而不是为了玩弄联合和协議的联盟。

我們所說的俄国資产阶級革命的特殊性質，决定了这个革命不同于現代其他的資产阶級革命，但是又使这个革命接近于过去农民曾起过显著革命作用的几次資产阶級大革命。在这方面非

常値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一篇思想十分深刻和丰富的文章“論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英文版序言，恩格斯本人把这个序言譯成德文，在“新时代”杂志1892—1893年創刊第11年第1卷上发表）中所写的一段話。恩格斯写道：“奇特的現象是，所有三次資产阶級大革命”（16世紀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爭，17世紀的英国革命和18世紀的法国革命）“中的战斗大軍都是农民。而农民正是在取得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經济后果而遭到破产的阶級。在克倫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农民（yeomanry）几乎完全絕迹了。然而只是由于这种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參加，斗爭才坚决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为了使資产阶級能够获得哪怕只是那些在当时已經完全成熟可以收获的胜利果实——为了这一点，就必須使革命远远超过这一目的。1793年法国和1848年德国的情形也完全是这样。大概，实际上这就是資产阶級社会发展的規律之一。”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斗爭进行到底、进行到使交战的一方即貴族完全被消灭而使另一方即資产阶級获得彻底胜利的起义”[27]。

俄国革命的进程明显地証实了恩格斯的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观察或概括；同时証实了，只有农民、无产阶級和“城市平民”的干預，才能把資产阶級革命大大向前推进（在16世紀的德国、17世紀的英国和18世紀的法国，农民可說是占着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20世紀的俄国，这种关系无疑必須顚倒过来，因为沒有无产阶級的主动精神和領导，农民将一事无成）；証实了必須使革命远远超过当前直接的、已經完全成熟了的資产阶級的革命目的，才能真正实現这些目的，才能坚定不移地巩固資产阶級最起碼的成果。

因此可以断定，事先就把革命仅仅局限在直接的資产阶級的和狭隘的資产阶級的范围內，象高加索的孟什維克在1905年他們的決議中写的"为了不使資产阶級走开"，或者象普列汉諾夫在斯德哥尔摩說的要找到"防止复辟的保障"，对于这种做法恩格斯是会十分蔑視的！

另一个問題，关于对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估計問題，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的第二版序言中作了分析。他說："我現在已經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莫斯科巷战的經驗十分清楚地說明不是这样，当时少数人在街垒战中同大批軍队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革命运动遭到失敗，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几乎就要取得胜利。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了革命者，而軍队的士气却很低落。但是誰能够肯定說，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形呢？"

当时起义过去差不多已有一年，已經用不着特意給战士們直接鼓气了，但是象考茨基这样謹愼的研究家还是肯定莫斯科起义是街垒战所取得的"一定的胜利"，并且認为必須修改自己認为巷战在未来革命中不可能起很大作用这个总的結論。

1905年十二月斗爭証明，在現代軍事技术和軍事組織的条件下，武装起义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十二月斗爭說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今后应当重視在最近无产阶級革命中采取这一类战斗形式的可能性。这就是从我国革命經驗中眞正得出的結論，这就是广大群众应当吸取的教訓。而普列汉諾夫对十二月起义的臭名远揚的評語是"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可見上述結論和教訓同他的

这种論断方向有多大的距离啊！普列汉諾夫的这种估計引起了数不清的背叛性的評論！无数双龌龊的自由派的手牢牢地抓住了他，想把有害的思想和庸俗的妥协精神灌輸給工人群众！

普列汉諾夫的估計没有絲毫的历史眞实性。馬克思虽然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就說过，起义是狂妄举动，然而后来却把这种“狂妄举动”估計为19世紀最伟大的无产阶級群众运动，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現在就有多一千倍的理由使群众相信，十二月斗爭是巴黎公社以后最必要、最合理和最伟大的无产阶級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內一部分知識分子怎么說和怎么抱怨，俄国工人阶級正是要有这样的看法。

考虑到这篇文章是給波兰同志写的，因此这里也許必須說明一下。很遺憾，我不懂波兰文，只是听到一些波兰的情况。因此很可能有人反对我的意見，說正是在波兰，全党（所謂波兰社会党[28]“右派”）因为从事软弱的游击方式的活动、恐怖活动和一連串的突然行动、而且正是为了起义的传統和无产阶級同农民的共同斗爭，才遭到失敗的。很可能，从这一观点看来，波兰的情况和俄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不能对这一点下結論。但是我应当指出，除了波兰以外，我們沒有在其他地方看見过这种荒謬的、会引起正当的反击和斗爭的离开革命策略的現象。这里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波兰本来就沒有发生过1905年12月那样的群众性武装斗爭！可是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在波兰，而且只是在波兰“制造”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常的荒謬策略曾經风行一时嗎？不正是因为那里的条件不容許群众的武装斗爭哪怕有一个短暂时期的开展嗎？难道这样的斗爭传統即十二月武装起义的传統有时不正是克服（克服的办法不是靠陈腐庸俗的小市民的道

德，而是放弃无目的的、无意义的、分散的暴力行动而采取有目的的、群众性的、同广泛开展运动和加紧无产阶級直接斗爭联系起来的暴力行动）工人政党內部无政府主义傾向的唯一有效手段嗎？

对我国革命的估計問題决不只有理論意义，而且有最直接的現实意义。我們的整个宣传、鼓动和組織工作現在同最广大的工人阶級和半无产阶級的群众掌握伟大的三年教訓的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們現在不能只是空洞地說（象波兰社会党“左派”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議那样），目前的情况不容許我們确定，我們現在面临的是革命爆发的道路，还是长期地、緩慢地小步前进的道路。当然，現在世界上沒有一种統計学能确定这一点。当然，将来不論遇到多么严重的考驗，我們都应当使我們的工作全部貫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內容。但这还不是一切。停留在这一点上，就意味着不善于建立无产阶級政党的任何实际領导。我們应当直接提出并且尽力解决这样的問題：我們現在应根据什么方針来总結三年的革命經驗呢？为了使动搖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取得教訓，为了使背叛和脫离社会主义的人感到耻辱，我們要公开声明：工人政党認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爭，1905年十月斗爭和十二月斗爭是巴黎公社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級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爭，才能保証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爭的榜样应当成为我們在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

如果我們根据这一方針进行日常工作，而且記住，只是由于党进行了多年的实实在在和坚定不移的准备工作，才保証了党在1905年对无产阶級的巨大影响，那末我們一定能够使工人阶級不管事件怎样发展，不管专制制度以什么速度崩潰，都会不断壮大起

来，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

载于1908年4月
"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第2期
署名：尼·列宁

1908年5月10日(23日)
用俄文(譯自波兰文)載于
"无产者报"第30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并根据杂志原文作过校訂

第二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

今天本报“科学新聞”栏发表的一篇寄自俄国的通訊，值得讀者特别注意。通訊作者講的事实，我們在报紙快要出版时得到了証实，因此应当比較詳細地談一談。

一个新的政治組織正在产生，出現了社会运动的某种新的轉折。一些想“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想把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拉过去的資产阶級民主派分子聚集起来了，他們模模糊糊地似乎已經有些認識到第三届杜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必須撇开它“做点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还很不明确，但是已經勾画出从革命头三年的教訓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現象。

第一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是在1905年夏天踏上公开的革命舞台的。他們支持了不到三年，还沒有来得及开花，就雕謝了。于是第二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就起来代替。这种替換有什么意义呢？它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哪些任务呢？

在1904年，第一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宴会上大叫大嚷，进行地方自治派的运动，他們在各阶級同专制制度之間以及彼此之間的关系还很不明确的时候，即在群众的公开斗爭和阶級政策（而不是小集团的政策）还沒有确定这些关系的时候，反映了社会热潮的开端。当时，立宪民主党糾集了資产阶級社会即所謂知識

界的各种各样的分子，从宁肯要鲟鱼蘸辣根而不要宪法的地主一直到当职員的、受雇的知識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曾經准备在“历史上的政权”即沙皇专制制度同进行斗爭的工农群众之間进行調停。1905年夏天的朝見沙皇，是卑躬屈节的开始，因为俄国自由派所了解的調停，无非就是卑躬屈节。从那时候起，在俄国革命中的确沒有一个比較重要的阶段，資产阶級自由派不是用向专制政府和黑帮地主匪帮的奴仆卑躬屈节的办法来进行“調停”。1905年8月，它反对过抵制布里根杜馬的革命策略。1905年10月，它分裂出了公然反革命的十月党，同时派彼得·司徒卢威去拜見維特，鼓吹适度和謹愼。1905年11月，它譴責邮电职工的罢工，对士兵起义的“慘祸”深表同情。1905年12月，它吓得偎在杜巴索夫[29]的怀里，为的是在第二天击破（看来应当說踢倒）“魯莽的自发势力”。1906年初，它竭力为自己辯解，以免受“可耻的”嫌疑：似乎自由派可能在国外进行宣传，反对借亿万外債来巩固专制制度。在第一届杜馬中，自由派空談人民自由，同时又偸偸地从后門进去見特列波夫，反对劳动派和工人代表。他們发表了維波尔格宣言[30]，企图一箭射双雕，他們看风使舵，以便能根据需要任意解释自己的行为，既能解释成支持革命，也能解释成反对革命。关于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馬，更沒有什么可說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在这里已經把自己的十月党人的本性暴露无遺了。

三年来，立宪民主党人已經“吃不开了”，要想重新活跃起来，就得提出“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的口号！第一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已經使自己无所作为。由于彻底背叛人民自由，他們自己埋葬了自己。

但是，新換上来的第二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有沒有沾染

同样的尸毒呢？在新組織周围鬧得特别厉害的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們，你們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难道不想再走我們从三年的經驗中所知道的原来的进化道路嗎？

对于这个問題，不应当用对未来的猜测而应当用对过去的分析来回答。这一分析雄辯地証明，“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維克”即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在他們那个“美好的日子里”（例如在第一届杜馬时期）曾經活动过的劳动派农民政治組織中，确切些說，在他們的政治运动中，实际上是扮演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角色。請回忆一下人民社会“党”（小集团？）在俄国革命中的主要历史事实吧。他們在“解放社”[31]接受了洗礼。在1905年12月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他們这些永远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間搖来摆去的人，主张采取一种荒謬的、曖昧的立場，希望同社会革命党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十月的自由的日子里，他們同社会革命党人合办政治报紙。在第一届杜馬时期也是一样：玩弄“高超的”外交手腕，“巧妙地”掩飾分歧，蒙蔽世人的耳目！在第一届杜馬被驅散、第二阶段起义遭到失敗、斯維阿波尔格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这班紳士便下定决心向右轉。他們使自己的党“合法化”，当然只是为了在刊物上合法地詆毁起义思想，証明积极宣传共和制是不合时宜的。在第一届杜馬中，他們在农民面前战胜了社会革命党，在自己的土地草案上征得了104人的签名，而在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上签名的只有33人。农民小业主要求土地国有化这种“清醒的”、資产阶級的願望，吹散了“社会化”的迷霧。我們看到，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渴望的不是农民的政治革命組織，不是起义的組織，而是玩弄合法地位和議会主义，保持狹隘的知識分子小組习气。俄国农民动搖的結果，离开了立宪民主党和知識分子机会

主义者人民社会党，轉向带有知識分子那种不坚定性的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这就証实了小农民的双重地位，証明沒有无产阶級的領导，农民不可能进行坚定的阶級斗爭。

現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們又开始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混在一起”，而且把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傻瓜也領了去，这就表明，这伙人在三年的革命中沒有学到任何东西。他們說，經济要求会使人們分离。他們希望在比較接近的政治要求方面联合起来。他們在革命进程中什么也沒有了解，俄国的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表明，只有群众斗爭才是有力量的，然而群众斗爭只有以重大的經济改革为目的才能开展得起来。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再追随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这已經不是新聞了。在彼得堡进行第二屆杜馬选举时，情况就是如此。在前者对待立宪民主党內閣和全权杜馬問題上，在后者对待同人民社会党人秘密結盟的問題上，情况也曾是如此。很明显，市儈知識分子的“病态欲望”，即寄身于自由資产阶級卵翼之下的欲望，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当然，这种欲望照例是用所謂利用新的高潮和新的力量配置情况等的花言巧語掩盖起来了。

是啊，先生們，我們也贊成利用……尸体，不过不是为了使它“复活”而是用来肥田，不是为了姑息陈腐的理論和庸人的情緒，而是为了讓它去担任“魔鬼的辯护士”的角色。我們將利用人民社会党人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个新的絕妙的例子来教育人民，教会他們不应当做什么，教会他們避免立宪民主党人的变节和小市民的萎靡不振。我們將密切注視这个新生的怪胎（只要不是死胎）的成长和发育，时刻記住，在現代的俄国，一切类似的胚胎只要不

是死胎，都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工农阶級群众斗爭的前奏。“解放社”又复活了。如果眞是这样，那就是說，上层人物已經开始嗅出什么来了。如果眞是这样，那就是說，开了头就会有繼續，在知識分子忙乱一陣之后，就会有无产阶級的斗爭。

我們趁第二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踏上舞台的机会，要教育人民学会斗爭，学会只是在斗爭中并且只是同进行革命斗爭的农民群众建立革命的联系。

載于1908年5月10日(23日)
"无产者报"第30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十九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32]

本文的任务是概略地叙述一下俄国农业中的全部社会經济关系。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具有专門研究的性質。它应当总結馬克思主义的研究情况，指出我国农业經济的每个比較重大的特征在俄国国民經济整个結构中的地位，描繪出俄国土地关系的总的发展方向，揭示出这样或那样决定这种发展的阶級力量。因此我們将从这个观点出发考察一下俄国的土地占有情况，接着再考察一下地主經济和农民經济，最后对19世紀我国的演进引起了什么后果和它給20世紀遺留了哪些任务这两个問題作出一般性的結論。

一

我們可以根据1905年最新的土地統計資料（中央統計委員会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公布[33]）来叙述19世紀末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

根据这次調查的数字，欧俄的土地共有39 520万俄亩，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私有土地……………………	10 170 万俄亩
第二类	份地……………………………	13 880 万俄亩
第三类	官地及其他土地……………	15 470 万俄亩
	欧俄总共……………	39 520 万俄亩

必須指出，我国的統計机关把远在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奥洛涅茨和沃洛果达三省1亿俄亩以上的土地都列入官地。既然我

們談的是欧俄实际农业用地总額，那就应当把很大一部分官地除去。我在自己那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的著作（这部著作在1907年末就写好了，但是由于某些不取决于作者的原因，該書迟迟沒有出版）中，推算出欧俄实际农业用地总額約为28 000万俄亩①。这里包括的官地不是15 000万俄亩，而是8 950万俄亩。因此在欧俄，除了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剩下的土地不到总面积的 $^1/_7$。$^6/_7$ 的土地掌握在两个对抗阶級的手中。

現在我們来看一下这些在等級上也彼此不同的阶級的土地占有情况，因为大部分私有土地是貴族的土地，份地是农民的土地。在10 17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1 580万俄亩屬于各团体和协作社，其余8 590万俄亩都屬于私人所有。請看私有土地在1905年和1877年按等級分配的情况：

占有者的等級	1905年 占有土地的数量（单位百万俄亩）	1905年 %	1877年 占有土地的数量（单位百万俄亩）	1877年 %	1905年的增(+)减(-)情况 絕对数（单位百万俄亩）	1905年的增(+)减(-)情况 %
貴族	53.2	61.9	73.1	79.9	−19.9	− 28.56
僧侣	0.3	0.4	0.2	0.2	+ 0.1	+ 74.00
商人和荣誉公民	12.9	15.0	9.8	10.7	+ 3.1	+ 30.00
小市民	3.8	4.4	1.9	2.1	+ 1.9	+ 85.00
农民	13.2	15.4	5.8	6.3	+ 7.4	+121.00
其他等級	2.2	2.5	0.3	0.3	+ 1.9	+707.00
外国臣民	0.3	0.4	0.4	0.5	− 0.1	− 34.21
全部私有主	85.9	100.0	91.5	100.0	− 5.6	− 8.25

由此可見，俄国的私有主主要是貴族。他們占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发展的趨势是貴族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土地占有的非等級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02頁。——編者注

性日益增长，而且是飞速增长。在1877—1905年期間，土地增加得最快的是“其他等級”（在28年中增加了7倍），其次是农民（增加了1倍多）。因此从农民中日益分化出一些轉变成为土地私有主的社会分子。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我們在分析农民經济时，一定要揭示出产生这种分化的社会經济結构。現在必須确切地肯定，俄国土地私有制正在由等級的所有制向非等級的所有制发展。到19世紀末，貴族的封建地产或农奴制地产仍然占私有土地的絕大部分，但是发展的趋势显然是造成資产阶級的土地私有制。由侍从、世袭领主、官宦及其他等人那里繼承下来的私有土地正在减少。干脆用錢买进的私有土地正在增加。土地的权力在削减，貨币的权力在增长。土地日益卷入商业周轉。我們在后面的叙述中将看到，卷入商业周轉的数额比仅仅从土地占有情况的材料中所看到的要大好多倍。

在19世紀末的俄国，“土地的权力”，即农奴制地主的中世紀土地占有制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从私有土地按地产大小划分情况的材料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我們所使用的資料特别詳細地列出了最大的私有地产的数字。按地产大小划分的一般情况如下：

戶别	戶数	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戶土地俄亩数
10俄亩和10俄亩以下	409 864	1 625 226	3.9
10— 50俄亩	209 119	4 891 031	23.4
50— 500俄亩	106 065	17 326 495	163.3
500— 2 000俄亩	21 748	20 590 708	947
2 000—10 000俄亩	5 386	20 602 109	3 825
10 000俄亩以上	699	20 798 504	29 754
500俄亩以上者共計	27 833	61 991 321	2 227
欧俄总共	752 881	85 834 073	114

由此可見，在全部私有地产中，小地产是微不足道的。占总数 $^{6}/_{7}$ 的土地占有者，即 753 000 个土地占有者中的 619 000 个，一共只有 650 万俄亩土地。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一望无际的大地产：700 个私有者平均每人占有 3 万俄亩土地。这 700 个人占有的土地比 60 万个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还要多两倍。因此，大地产一般說来是俄国私有土地占有情况的一个特点。我們把 500 俄亩以上的地产单独列出来，这就可以看到 28 000 个私有者占有 6 200 万俄亩土地，平均每人占有 2 227 俄亩。这 28 000 个人掌握着占总数 $^{3}/_{4}$ 的私有土地①。按占有者的等級来說，这些大地产主要是貴族的。在 27 833 項地产中，有 18 102 項，即差不多有 $^{2}/_{3}$ 的地产，屬于貴族，他們拥有土地 4 450 万俄亩，就是說，占总数 70% 以上的土地都是大地产。由此可見，在 19 世紀末的俄国，大量土地——而且大家知道，都是最好的土地——仍然（同中世紀一样）集中在享有特权的貴族手中，集中在昨天的农奴制地主手中。至于这些大地产用什么方式經营，我們到下面再作詳細敘述。这里只簡单地提一下魯巴金先生在其文章中描述得很清楚的那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个高官显貴都出身于占有大地产的貴族門第[34]。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份地的占有情况。除了沒有按地产多少划分的 190 万俄亩土地，其余的 13 690 万俄亩土地都掌握在 1 225 万个农戶手中，平均每戶有地 11.1 俄亩。但是，份地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差不多有一半份地，即在 13 700 万俄亩份地中有 6 400 万

① 为了使正文不致因引文过多而淩乱，我在这里总的注明一下，我引用的大多数材料都是引自上述那一著作和“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1908 年圣彼得堡第 2 版。（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編者注）

俄亩掌握在210万个占有大量土地的农戶手中，这些农戶占农戶总数的 $^1/_6$。

欧俄份地分配情况的綜合数字如下：

农戶类别	戶数	共有土地（单位俄亩）	平均每戶有地（单位俄亩）
5俄亩以下	2 857 650	9 030 333	3.1
5—8俄亩	3 317 601	21 706 550	6.5
8俄亩以下的共計	6 175 251	30 736 883	4.9
8—15俄亩	3 932 485	42 182 923	10.7
15—30俄亩	1 551 904	31 271 922	20.1
30俄亩以上	617 715	32 695 510	52.9
欧俄总共	12 277 355	136 887 238	11.1

这样看来，一半以上的份地农戶，即1 230万戶中有620万戶，每戶不到8俄亩土地。就全国一般情况来看，这点份地是絕对不能維持全家生活的。为了判断这些农戶的經济状况，我們来看一下軍用馬匹調査（这是一种唯一进行得定期而經常的全国性的統計）的一般数字。在1896—1900年期間，欧俄48省（除去頓河区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共有11 112 287个农戶。其中无馬的有3 242 462戶，占总数29.2%。有1匹馬的有3 361 778戶，占总数30.3%。在俄国，什么叫做无馬农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然，这里我們講的是总的情况，而不是講的城市近郊的牛奶业以及烟草业等带有某种特殊性的地区）。至于有1匹馬的农民的貧困状况，也是大家都知道的。600万戶就是意味着2 400—3 000万居民。而所有这些居民都是非常貧困的穷人，他們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

块份地，靠这点份地維持不了生活，只能餓死。假定一个农戶至少要有 15 俄亩土地才能勉强維持生活，那末就有 1 000 万个农戶达不到这个水平，他們一共只有 7 290 万俄亩土地。

其次，必須指出份地占有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农民中間，份地分配方面的不平均現象虽然远沒有私有土地分配方面那么严重，但是在有份地的农民中却存在着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別、划分和区分。这是好多世紀以来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类农民之間的差別。为了清楚地說明这些区分，我們先来看一下整个欧俄的一般材料。1905 年的統計材料把农民分为如下主要几类：前自耕农，平均每戶有份地 6.7 俄亩；前国家农民，平均每戶有 12.5 俄亩；前皇族农民，平均每戶有 9.5 俄亩；移民，平均每戶有 20.2 俄亩；欽舍維克，平均每戶有 8.1 俄亩；列澤施，平均每戶有 5.8 俄亩；巴什基里亚人和帖普佳里[35]，平均每戶有 28.3 俄亩；波罗的海沿岸的农民，平均每戶有 36.9 俄亩；哥薩克人，平均每戶有 52.7 俄亩。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份地占有制是純粹中世紀的制度。农奴制至今还存在着，表現在农民中間保留下来的許多区分中。各类农民的差別不仅表現在土地的数量方面，而且还表現在贖金的多少、贖买的条件以及土地占有的性質等等方面。如果我們撇开整个俄国的一般材料而来看一看每个省份的材料，我們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区分意味着什么。現在就拿薩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統計汇編[36]来看一看。这里除了上面我們所說的那些全国共同的类別以外，地方調查人員又把农民分成如下几类：有賜地农民、完全私有农民、有村社土地的国家农民、有四分之一份地的国家农民、地主經济中的国家农民、官地佃农、常住私有农民、移居农民、解放农民、免役农民、自由耕作农、前工厂农奴等等。这种中世紀的区分甚至

細到同一个村庄的农民也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类，如“前某某老爷的”和“前某某太太的”。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中的作家們不会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俄国的經济关系，看不到农奴制度正在被資产阶級制度所代替，因此他們通常都忽視这一事实。事实上，如果不了解这个事实的全部意义，就根本不可能了解19世紀俄国的历史，特别是它的直接后果，即俄国20世紀初的事件。一个交换不断扩大和資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国家，如果它的国民經济的主要部門处处受到中世紀关系的妨碍和阻撓，那它就不可能不經受各种各样的危机。有名的村社（关于村社的意义，后面我們还要談到）防止不了农民无产阶級化，事实上它起了中世紀的壁障的作用，使农民隔离开来，把农民牢牢地束縛在小联合中或束縛在失去任何“存在意义”的类别中。

在給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作結論以前，还应当指出問題的另一方面。无論是关于“3万个上层”地主和几百万个农戶的土地数量的材料，或者是关于农民地产方面的中世紀壁障的材料，都不足以估計出至今还保存着的农奴制残余究竟把我国农民“压迫”、压制和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在所謂1861年大改革的那次地主对农民的剝夺之后留給农民的份地，其質量要比地主的土地坏得不可比拟。各地大量的記載材料和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調査材料都証实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有大批的确凿材料証明，农民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低于地主的土地；誰都承認，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首先是份地的質量低劣，其次是耕种不良，貧穷的农民經济存在許多缺陷。第二、在1861年地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时，他們給农民土地所划的地界，往往使农民最后陷入了“自己的”地主所設的陷阱。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統計文献記載了极其奇怪的、异常独

特的、世界上少見的地主經济的經营方式，从而丰富了政治經济学这門科学。这就是靠割地来經营的經济。在1861年，农民从他們的經济所必需的飲馬場、牧場等方面"被解放出来"。农民的土地象楔子一样被嵌在地主的土地中間，这样地主老爷就可以得到一种非常可靠的（而且是非常光明正大的）收入，就是用踐踏庄稼等等名义对农民处以罰金。"連放鷄的地方都沒有"，这是农民說出的令人伤心的真情，这种"受絞刑者的幽默"比任何長篇引証都更好地說出了統計数字表現不出的农民在土地占有方面的特征。不用說，这种特征无論就其渊源来說，或者就其对于地主經济的組織方式的影响来說，都是不折不扣的农奴制。

現在我們就对歐俄的土地占有情况作一个总結。上面我們分別說明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条件。現在我們应当来看一看这两者之間的关系。为此目的，我們就根据前面引用过的歐俄农业用地面积概数（28 000万俄亩）考察一下所有这些土地在各类土地占有者之間的分配情况。至于有哪几类土地占有者，后面我們要作詳細的叙述。現在我們稍微提前一点，先权且大致划分四大类。我們把占有15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戶列为第一类，这是受农奴制剝削的破产农民。第二类是中农，每戶占有15—20俄亩土地。第三类是富裕农民（农民資产阶級）和資本主义地产，占有20—500俄亩土地。第四类是农奴制大地产，占有500俄亩以上土地。我們把农民的地产和地主的地产都按这几类算在一起，并采用凑整数①的大致的算法（我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詳細数

① 譬如，在大地产一类，除了6 200万俄亩地主的土地，还应加上510万俄亩的皇族土地和360万俄亩屬于272个工商业公司（每个公司都有1 000俄亩以上土地）的土地。

字)，这样19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19世紀末欧俄的土地占有情况

	戶数 (单位百万)	土地俄亩数 (单位百万)	平均每戶土地俄亩数
(一)受农奴制剝削的破产农民………	10.5	75.0	7.0
(二)中农……………………………	1.0	15.0	15.0
(三)农民資产阶級和資本主义地产…	1.5	70.0	46.7
(四)农奴制大地产…………………	0.03	70.0	2 333
共　計	13.03	230.0	17.6
未按类别划分的地产……………		50.0	
总　共	13.03	280.0	21.4

我再說一遍：这里对上述四类土地占有情况的經济特征的說明是正确的，这在下面的叙述中会得到証明。如果这个表(它实質上是一个大致的表)的个别地方受到了非議，那我們請讀者留心注意，不要讓人在批評的幌子下偷偷地否定事情的实質。事情的实質就是：在俄国土地占有情况中，以1 050万农戶(大約包括5 000万人口)为一端，他們占有7 500万俄亩土地，以3万家(大約包括15万人口)为另一端，他們竟占有7 000万俄亩土地。

为了把土地占有問題告一段落，現在我們需要越出欧俄本部的范圍，大致地来考察一下墾殖的意义。为了使讀者对俄罗斯帝国(芬兰除外)土地总面积有一些了解，我們利用一下美尔特瓦哥先生的材料。为了看得清楚些，我們把这个材料列成一个表，并加进1897年人口調查的数字。

	土地总数		其中		其中种植地				1897年的人口	
	(单位一千平方俄里)	(单位百万俄亩)	无統計材料的土地	有統計材料的土地	耕地	草地	森林地	总共	总共(单位一千)	每一平方俄里的人口
			(单位百万俄亩)		(单位百万俄亩)					
波兰王国10省……	111.6	11.6	—	11.6	7.4	0.9	2.5	10.8	9 402.2	84.3
伏尔加河以西38省……	1 755.6	183.0	—	183.0	93.6	18.7	34.0	146.3	—	—
伏尔加河以北以东12省……	2 474.9	258.0	—	258.0	22.3	7.1	132.0	161.4	—	—
欧俄50省总共……	4 230.5	441.0	—	441.0	115.9	25.8	166.0	307.7	93 442.9	22.1
高加索……	411.7	42.9	22.1	20.8	6.5	2.2	2.5	11.2	9 289.4	22.6
西伯利亚……	10 966.1	1 142.6	639.7	502.9	4.3	3.9	121.0	129.2	5 758.8	0.5
中亚細亚……	3 141.6	327.3	157.4	169.9	0.9	1.6	8.0	10.5	7 746.7	2.5
亚俄总共……	14 519.4	1 512.8	819.2	693.6	11.7	7.7	131.5	150.9	—	—
全俄帝国……	18 861.5	1 965.4	819.2	1 146.2	135.0	34.4	300.0	469.4	125 640.0	6.7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对俄国边区还了解得很少。当然，認为向边区移民就可以“解决”俄国內地的土地問題的想法是极端荒謬的。毫无疑問，只有那些招摇撞騙的人才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我們在上面指出的那种欧俄旧的大地产同欧俄新的生活条件和經济条件之間的矛盾，应当通过在欧俄內地而不是在欧俄以外进行某种变革来“解决”。問題不在于用移民的办法使农民摆脱农奴制，問題在于除了內地的土地問題，还存在着垦殖的土地問題。問題不是要用垦殖問題来掩盖欧俄的危机，而是要指出农奴制大地产对內地和边区都发生极有害的影响。俄国垦殖的障碍是俄国內地的农奴制残余。不在欧俄进行土地变革，不使农民摆脱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就不能在俄国自由地开发和調整垦殖地。这种調整不应当是象官僚那样“关心”移民，也不是象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中的那些著作家常講的那样“組織移民”，

而是要鏟除使俄国农民世世代代受大地产占有者奴役而变得愚昧、閉塞和野蛮的那些条件。

美尔特瓦哥先生在他同普罗柯波維奇先生合写的“俄国有多少土地，我們怎样使用”（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小册子中正确地指出，耕作文化的提高会使不宜耕种的土地变成耕地。貝尔院士和格尔美尔先院士这两位专家在1845年曾經写道，塔夫利达草原“就其气候和水源不足的情形来說，将永远是最貧瘠最不宜耕作的土地!!”[37]。当时塔夫利达省的居民生产了180万俄石谷物。60年以后，人口只增加了一倍，而谷物的产量是1 760万俄石，差不多增加了9倍。

美尔特瓦哥先生的这段言論非常正确，非常重要，但只是忘記了一点：使新俄罗斯的垦殖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条件乃是俄国內地农奴制的崩潰。只有內地的变革，才能向南部迅速地、广泛地、美国式地移民，才能使它工业化（关于1861年以后俄国南部的美国式的发展，人們已經談得非常多了）。因此現在只有在欧俄进行变革，只有彻底鏟除那里的农奴制残余，把农民从中世紀大地产中解放出来，才能够真正开辟垦殖的新时代。

俄国的垦殖問題，同內地的土地問題相比，是一个从屬性的問題。19世紀末，我們面临着一种抉择：要么坚决地消灭俄国“古老”省份中的农奴制，那样，我国边区的垦殖事业就保証可以获得迅速的、广泛的、美国式的发展；要么把內地的土地問題拖下去，那样，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长期停滞不前，垦殖事业方面的农奴制传統也必然会被保存下来。在前一种情况下，經营农业的将是自由的农場主，在后一种情况下，經营农业的将是受盘剝的农夫和用割地办法“經营的”地主。

二

我們現在來談談地主經济組織。大家知道，这种經济組織的基本特征就是資本主义制度（“自由雇佣”）同工役制度結合在一起。什么是工役制度呢？

要回答这个問題，必須看一看农奴制度下的地主經济組織。大家知道，从法律上、行政上和生活上来看农奴制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在农奴制度下，地主同农民的經济关系的实質是什么。当时地主把土地分給农民，有时还貸給农民以其他生产資料，如森林、牲畜等等。这样把地主土地分給农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拿适用于現代关系的話來說，当时的份地就是一种工資形式。在資本主义生产中，是用貨币付給工人工資的。資本家的利潤是以貨币形式实現的。在工厂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維持工人生活的劳动和給資本家創造无酬的剩余价値的劳动）結合为一个劳动过程，結合为一个劳动日，等等。徭役經济則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同奴隶經济一样，也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是这两种劳动在时間和空間上是分开的。农奴三天替地主干活，三天为自己干活。替地主干活，他或者在地主的土地上干活，或者为地主生产粮食。为自己干活，他是在份地上干活，給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謀得为地主維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粮食。

因此，农奴制經济或徭役制經济同資本主义經济就有一个相同的方面，这就是在两种經济制度下，劳动者只得到必要劳动的产品，而把剩余劳动的产品无償地交給生产資料所有者。然而农奴制經济同資本主义經济又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农奴制

經济是自然經济，資本主义經济則是貨币經济。第二、农奴制經济的剝削手段是把劳动者束縛在土地上，分給他們土地；資本主义經济的剝削手段則是把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奴制地主要得到收入（即剩余产品），就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占有份地、农具和牲畜的农民。沒有地、沒有馬、沒有家业的农民，是不宜于农奴主进行剝削的。資本家要得到收入（即利潤），就必須有沒有地、沒有家业而不得不在劳动的自由市場上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第三、領得份地的农民必然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他旣然占有土地，如不实行強制，他是不会去为地主干活的。于是这种經济制度就产生了“超經济的强制”、农奴制、法律上的依附关系、沒有充分的权利等等。反之，“理想的”資本主义就是私有者和无产者有最充分的自由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訂合同。

只有把农奴制經济或徭役制經济的这种經济实質了解清楚，我們才能够了解工役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工役制是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从徭役制向資本主义的过渡形态。工役制的实質就是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耕种地主的土地，从而得到一部分貨币报酬和一部分实物报酬（如使用土地、割地、牧場，以及获得冬季貸款等）。大家都知道的对分制經营方式就是变相的工役制。地主要实行工役制，就需要有領得份地的农民，哪怕他們拥有最坏的牲畜和农具也好；还需要使农民迫于穷困，去受盘剝。工役制的必然的旅伴是盘剝制，而不是自由雇佣。在实行工役制的情况下，地主不是以掌握貨币和全部劳动工具的企业資本家的姿态出現的，而是以高利貸者的姿态出現的，利用邻近农民的穷困，可以非常便宜地使用他們的劳动。

为了更清楚地說明这一点，我們来看一下农业局的材料，这

些材料可以避免对土地占有者老爷們怀有恶意的嫌疑。“业主經济中的自由雇佣劳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編的农业統計資料”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5輯）[38]这部著名的著作，提供了中部黑土地带8年（1883—1891年）的資料：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包种1俄亩秋播谷类作物的平均报酬为6卢布。該書又指出，如果計算一下，自由雇佣来的工人干同样的活价值多少，那末单是徒手劳动就要6卢布19戈比，馬的劳动还不包括在內；而馬的劳动不会少于4卢布50戈比（該書第45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第141頁①）。这样說来，自由雇佣的价格是10卢布69戈比，工役制的价格則是6卢布。既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正常的、一般的，那应該怎样解释这种現象呢？“盘剝”、“高利貸”、“重利盘剝”等等字眼只是描述了契約的形式和性質，并沒有說明它的經济实質。农民怎么能够长期地干价值10卢布69戈比的活而只領取6卢布呢？农民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的份地弥补了他家庭的一部分开支，因而使工資能够低于“自由雇佣”的标准。农民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正是由于貧瘠的份地使他无法依靠自己的經济維持生活，只好依附邻近的地主。显然，只有把这种現象看做是資本主义排挤徭役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才是“正常的”。因为这些情况使农民不可避免地会破产，会緩慢地然而是无疑地变为无产者。

这里再看一下薩拉托夫县的性質相同的、但稍微比較完全的材料。这里耕种1俄亩土地（包括收割、运送和脫谷在內），如果是冬季訂合同并預付工資80—100%，那平均价格为9.6卢布，如果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69—170頁。——編者注

是用工役来租地，为 9.4 卢布，如果是自由雇佣，则为 17.5 卢布！每俄亩地收割和运送这两项工作的价格，如果是工役制为 3.8 卢布，如果是自由雇佣，则为 8.5 卢布，如此等等。这些数字，每一个都是一长篇倾訴农民遭受无穷无尽的困苦、盘剝和破产的自白。每一个数字都証明，19 世紀末俄国的农奴制剝削和徭役制残余多么严重地存在着。

工役制度盛行的程度很难加以估計。一般情形是，在地主經济中，工役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是結合在一起的，它們被用于各种农活。极少一部分土地是由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和牲口来耕种的。大部分土地則是按对分制或工役制租給农民耕种的。我們从考夫曼先生那部搜集了許多私有經济的最新資料的詳尽著作①中举几个例子来說明。土拉省（1897—1898 年的資料）"地主还依然采用旧三圃制……远地由农民分种"；地主土地的耕种情况最糟。庫尔斯克省："……把土地按亩分給农民耕种，租金較高，有利可图……但是結果耗尽了地力。"沃龙涅什省：……中小地主"大都是全靠农民的农具和牲口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是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大多数农户的耕作方法沒有任何改善"。

这些評語告訴我們，安年斯基先生在"收成的影响"一書中对欧俄各省占优势的是工役制度还是資本主义制度所作的一般說明，也完全适用于 19 世紀末。现在我們把这个說明列成下表：

① 見"土地問题"，多尔哥魯科夫和彼特龙克維奇印行，1907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442—628 頁："私有地产的文化經济意义問題"。

	省份数目 黑土地带	非黑土地带	总計	私有主的播种总面积（单位千俄亩）
一、資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9	10	19	7 407
二、混合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3	4	7	2 222
三、工役制度占优势的省份…………	12	5	17	6 281
共計	24	19	43	15 910

由此可見，工役制在黑土地带占着絕对优势，但在本表所包括的43个省份中，却居于次要地位。然而这里必須指出，列入第一类的（資本主义制度）恰恰是那些对內地农业区并不典型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西南各省（甜菜区），南部各省，两个京都所在省。在这里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至于工役制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考夫曼先生的著作所搜集的材料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說明。他写道："毫无疑問，小农租佃和对分制是农业进步最大的障碍之一……"在波尔塔瓦省农业概述中可以經常看到，"佃戶耕作很差，播种的种子不好，使土地荒蕪不堪"。

在莫吉廖夫省（1898年），"由于对分制經营存在种种弊病，經营方面的任何改善都受到阻碍"。"德涅泊县的农业所以根本談不上什么革新和改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着粮擦租[39]。考夫曼先生在第517頁上写道："我們的材料給我們提供許多明显的事实，証明甚至在同一田庄范圍內，在自己經营的耕地上已經采用比較完善的耕作制度，在出租的土地上却仍然保持着过时的旧經营方式。"譬如，在出租土地上，还保持着三圃制，甚至根本不施厩

肥，而在自营地上，已經采用了多区輪作制。对分制妨碍了牧草的种植，限制了肥料的施用，阻挠了改良农具的推广。这一切的后果在产量的数字上表現得很明显。例如，辛比尔斯克省有一个大地产，自营地每俄亩黑麦的产量是90普特，小麦是60普特，燕麦是74普特，而实行对分制的土地则是58—28—50普特。下面是一个县（下新城省哥尔巴托夫县）的一般材料：

每俄亩黑麦产量（单位普特）

土地类别	份地	私有土地：自营地	私有土地：实行对分制的土地	私有土地：租地
一	62	74	—	44
二	55	63	49	—
三	51	60	50	42
四	48	69	51	51
各类平均	54①	66	50	45①

由此可見，凡是以农奴制方式耕种（对分制和小租佃）的地主土地，产量都比份地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它无可爭辯地証明，俄国的农业所以落后，整个国民經济所以停滞不前，俄国农民所以遭受世界上見所未見的屈辱，其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工役制度。只要还有农奴制大地产、农奴制传統和农奴制經营方式的压迫，不管什么样貸款，不管怎么样改良土壤，不管給农民什么样的“帮助”，不管官僚和自由主义者喜欢采用什么样的“促进”措施，都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結果。相反地，实行土地变革，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摧毁古老的中

① 这两个数字在考夫曼先生該書第521頁上显然是印錯了。

世紀村社（譬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就可以摧毁村社，而且不是用的警察手段和官吏手段），就一定可以为非常迅速的、真正广泛的进步打下基础。实行对分制的土地和出租的土地的产量所以极端低微，完全是由“替老爷”干活这种制度造成的。同样是現在这些农民，如果他們能不再“替老爷”干活，那不仅这些土地的产量可以提高，而且仅仅由于消除了农奴制对經营的障碍，連份地的产量也会提高。

在現在的情况下，私有經济当然已有一些資本主义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非常緩慢，它必然使俄国长期受“野蛮地主”的政治統治和社会統治。現在我們来看一下这种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并且設法确定这种进步的某些一般的結果。

“自营”耕地即按資本主义方式耕种的地主土地的产量高于农民土地，这一情况說明了农业資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这种进步是同工役制度向自由雇佣制度的过渡分不开的。农民破产，失去耕馬和农具，日益无产阶級化，这一切迫使地主改用自己的农具耕种土地。农业中使用机器愈来愈多，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結果必然会发展純粹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俄国从国外输入的农业机器，在1869—1872年是788 000卢布，1878—1880年是290万卢布，1881—1888年是420万卢布，1889—1896年是370万卢布，1902—1908年是1 520万到2 060万卢布。俄国农业机器的产值（根据相当粗略的工厂統計得出的大致数字），1876年是230万卢布，1894年是940万卢布，1900—1908年是1 210万卢布。毫无疑义，这些数字証明农业取得了进步，当然是取得了資本主义的进步。但是，同样无可爭辯的是，这个进步同現代資本主义国家（譬如美国）所能达到的速度比起来，是非常緩慢的。根据1900年6

月1日的調査，在美国，农場占有的土地为83 860万英亩，大約等于32 400万俄亩。农場有570万个，平均每个农場有146.2英亩(将近60俄亩)土地。在1900年，为这些农場主生产的农具价值*15 770*万美元(1890年是14 580万美元；1880年是6 210万美元)①。相形之下，俄国的数字则小得可怜，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国的农奴制大地产还非常强大。

关于地主和农民使用改良农具的比例，农业部在上一世紀90年代中曾进行过专門的調查。考夫曼先生詳細地記述了这次調査資料，現将該資料总括于下表：

	使用改良农具的百分比	
区　　域	地　主	农　民
內地农业区	20—51	8—20
伏尔加河中游	18—66	14
新俄罗斯	50—91	33—65
白俄罗斯	54—86	17—41
刺多牙湖沿岸	24—47	1—21
莫斯科郊区	22—51	10—26
工业区	4—8	2

所有这些区域平均起来，地主是42%，农民是21%。

关于厩肥的使用情况，所有統計材料同样无可辯駁地証明，"在这方面，地主經济无論过去和現在都一直远远超过农民經济"(考夫曼，第544頁)。不仅如此，在改革后的俄国，地主向农民購买厩肥的現象相当普遍。这是农民极端貧困的結果。目前这种現

① «Abstract of the Twelfth Census». 1900, Third Edition, Washington, 1904, pages 217 and 302—agricultural implements.("第12次調査概况"。1900年第3版，1904年华盛頓版第217頁和第302頁：农具。——編者注)

象日趋減少。

最后，在关于地主經济和农民經济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問題的大量而精确的材料中，还有关于牧草种植情况的材料（考夫曼，第 561 頁）。其主要結論如下：

欧俄牧草种植面积

年份	农民	地主
1881 年……………	49 800 俄亩	491 600 俄亩
1901 年……………	499 000 俄亩	1 046 000 俄亩

地主經济和农民經济之間所有这些差别产生的結果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只有产量的数字才能說明。整个欧俄在 18 年（1883—1900 年）中的平均产量如下（单位俄石）：

	黑麦	冬小麦	春小麦	燕麦
地主……	6.0	5.75	5.0	8.5
农民……	5.0	5.0	4.25	7.0
差额……	16.7%	13.0%	15.0%	17.6%

考夫曼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差額“不是很大的”（第 592 頁）。这里不仅要注意到 1861 年留給农民的是一些坏地，而且要注意到全体农民的总平均数掩盖了（我們馬上就会看到）巨大的差别。

我們从对地主經济的考察中应当得出如下的一般結論。資本主义正在这个領域內十分明显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徭役經济正在被自由雇佣經济所代替。資本主义农业同工役制农业和小农农业相比，处处都十分明显地表現出它在技术上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对于一个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来說，还是异常緩慢的。在 19 世紀末的俄国，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同农奴制之間产生了极为尖銳的

矛盾。这种农奴制表現为地主貴族的大地产和工役經济制度，它是經济发展的障碍，是俄国实际生活中产生压迫、野蛮和无穷无尽的暴力統治的根源。

三

农民經济是俄国現代土地問題的中心点。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現在我們应当来考察一下农民經济組織，但不是从技术方面，而是从政治經济方面来考察。

这里我們首先遇到了农民村社問題。論述这个問題的文献极其浩繁。我国社会思想界的民粹派就把自己世界观的基本点同这种“平均”制度的民族特点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問題上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論述俄国土地村社的文献經常把問題的两个不同方面即耕作技术和生活方式方面同政治經济方面糾纏在一起，甚至往往混为一談。論述村社的大部分著作（如瓦·奥尔洛夫、特利罗果夫、凱斯列尔、瓦·沃·等人的著作）[40] 对問題的前一个方面非常注意，占的篇幅很大，以致后一个方面就被忽略了。其实这种做法是极其錯誤的。俄国的土地关系同任何其他一个国家相比，无疑有它的独特性，但是，就拿两个公認的純粹資本主义的国家来說，它們在农业生活方式、土地关系史、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形式等方面，也不可能沒有很大的差别。使俄国村社問題这样有意义、这样尖銳，使我国社会思想界从19世紀后半期起分为两个主要派别（民粹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决不是問題的耕作技术方面，也不是生活方式方面。很可能，地方上的研究人員必須更多地注意問題的这一方面，以便全面地考虑耕作习慣的地方特点，反对官僚无知地、十分粗暴地制定浸透警察精神的細則。但是对于經济学家来

說，无論如何不允許因研究重分土地的各种形式以及重分土地的技术等問題而抹杀以下的問題：村社內部正在形成什么类型的經济，这些类型正在怎样发展，雇用工人的业主同受雇干粗活的工人之間、富人同穷人之間、改善經营并实行技术改良的人同經济破产、抛弃家业、离乡背井的人之間的关系正在怎样形成。无疑，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統計人員（他們为研究俄国国民經济提供了非常宝貴的材料）認識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們从上一世紀80年代起也抛弃了官方的农戶分类法，不按村社、份地、登記的或現有的男性人口来分类，而采取了唯一科学的分类法，按农戶的經济实力来分类。我們記得，在研究俄国經济的兴趣特别浓的时候，甚至象瓦·沃·先生这样一位在上述問題上"党性"很强的著作家都衷心欢迎"新型的地方統計出版物"（这是瓦·沃·先生在1885年"北方通报"[41]第3期上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題），并声称："必須使数字适合农民的各种經济类别，而不是去适合象乡村或村社这种包括各类农民的混合体。"

我国村社的基本特点是土地平均使用制，民粹派認为这一点使村社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們把村社怎样达到土地的平均使用的問題完全擱在一边，直接来看一看經济事实，看一看这种平均制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經用确切的材料証明，欧俄全部份地的分配情况远远不是平均的。在各类农民之間，在各村农民之間，甚至在同一村庄的不同地主的（"从前的"）农民之間，份地的分配也根本談不上是平均的。只有在村社的小范圍內，重分机构才在这些規模不大而又与外界隔絕的团体中建立起平均制。現在我們就来看一下地方自治局关于各农戶之間份地的分配情况的材料。当然，这里我們不应当按农戶人口的多少和劳动力的多少来分类，而必

須按各农户的經济实力（耕地面积，耕畜和奶牛的头数等等）來分类，因为小农业的資本主义演进的全部实質，就是在宗法式团体內部形成並加剧財产上的不平等，就是由单純的不平等轉变为資本主义的关系。因此，我們如果不去专門研究农民內部在經济实力方面的差别，那我們就会抹杀新的經济演进的一切特点。

我們先看一个典型的县份（地方自治局統計机关按戶的調查列成了詳細的綜合表，調查是按县进行的），然后再談一下，我們把自己感兴趣的結論推及于全俄农民有什么根据。材料引自"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一書第2章①。

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全部都是村社农民土地占有制，那里份地的分配情况如下：

	每戶	
	男女人口	份地（单位俄亩）
不种地者…………………	3.5	9.8
种地不滿5俄亩者………	4.5	12.9
种地 5—10俄亩者 ……	5.4	17.4
种地10—20俄亩者 ……	6.7	21.8
种地20—50俄亩者 ……	7.9	28.8
种地50俄亩以上者 ……	8.2	44.6
总共	5.5	17.4

我們看到，随着农戶經济实力的提高，家庭人口也无条件地相应增加。显然，家庭人多是农民富裕的因素之一。这是无可爭辯的。問題只是在目前的整个国民經济的状况下，这样的富裕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經济关系。至于份地，我們看到它的分配是不平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49—156頁。——編者注

均的，虽然不太严重。农戶愈富裕，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份地就愈多。下等戶每人(不分男女)的份地不到3俄亩。其他各类农戶分別为：約3俄亩——3俄亩——約4俄亩——4俄亩。在最高一类农戶中，每人(不分男女)的份地在5俄亩以上。可見，家庭人多和份地多只是少数农民富裕的基础。因为两类上等戶只占农戶总数的1/10。农戶数目、人口和份地的分配三者的百分比如下：

农戶类别	总数的百分比		
	戶数	男女人口	份地
不种地者 …………………	10.2	6.5	5.7
种地不滿5俄亩者 ……	30.3	24.8	22.6
种地 5—10俄亩者……	27.0	26.7	26.0
种地10—20俄亩者……	22.4	27.3	28.3
种地20—50俄亩者……	9.4	13.5	15.5
种地50俄亩以上者……	0.7	1.2	1.9
总共	100.0	100.0	100.0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份地分配的比例和我們所估計到的村社平均制的結果。各类农戶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和份地所占的百分比相当接近。但是这里已經开始表現出某些农戶的經济实力的影响：下等戶土地占的比例小于人口占的比例，上等戶土地占的比例則大于人口占的比例。这不是个别的、一个县的現象，而是全国的普遍現象。我在上述那部著作中，曾把俄国不同地区的7省21县的同类材料綜合在一起。这些包括50万农戶的材料証明各地的比例都是相同的。20%的富裕戶，人口占26.1—30.3%，份地占29.0—36.7%。50%的貧苦戶，人口占36.6—44.7%，份地占33.0—37.7%。份地的分配到处都存在着一定的比例，而且到处都表現出村社正在受农民資产阶級控制；不合比例的現象在任何

地方都有利于上等农戶。

因此，認为我們根据經济实力来研究农民的分类就会忽略村社“平均制的”影响，那是极其錯誤的。恰恰相反，我們正是用精确的材料对这种平均制的眞正經济意义作了估計。我們正是指明这种平均制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整个重分制度最終会导致什么結果。即使这个制度可以使不同質量的土地和各种农业用地得到最理想的分配，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爭辯的，即富裕戶对貧苦戶的优势在份地分配方面也表現出来。我們立刻就会看到，非份地的分配，更不平衡得多。

租佃在农民經济中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土地的需要，在租佃的基础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盘剝关系。前面我們已經講过，农民的租佃其实往往就是地主經济的工役制度，就是地主老爷获得劳动力的一种农奴制手段。所以，我国农民的租佃无疑具有农奴制的意义。既然在我国发生着資本主义演进，我們就应該来专門研究一下，在农民租佃中，有沒有表現出和怎样表現出資产阶級的关系。为此需要的也不是关于整个村社和村庄的材料，而是关于农民的各种經济类别的材料。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在“地方自治局統計总結”中承認，在任何地方，实物地租（即不是貨币地租，而是对分制地租或工役地租）通常总要比貨币地租高，而且高得多，有时甚至高一倍；其次他承認，实物地租在最貧苦的农戶中特別普遍。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尽量用貨币租种土地。“租地者尽可能用貨币繳納租金，以便減低使用他人土地的費用。”（卡雷舍夫，同書第265頁）[42]

这就是說，我国租佃具有农奴制特征，貧苦农民受害最严重。富裕农民竭力摆脫中世紀的桎梏，能摆脫多少要看他們是否有足

够数量的貨币。有貨币就能够按照一般的市場价格用現錢租得土地。沒有貨币就只好受盘剝，只好通过对分制或工役制以非常昂貴的价格繳納地租。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役制的劳动价格比自由雇佣制的劳动价格低多少。旣然經济实力不同的农民租地的条件各不相同，那我們显然不能够只按份地来划分农民（象卡雷舍夫經常做的那样），因为这样分类会把經济实力不同的农戶人为地混在一起，把农村无产阶級同农民資产阶級混淆起来。

我們拿几乎全省都是村社的薩拉托夫省（全省有2455个村社，其中2486个村社有村社占有的土地）的卡梅申县的材料来說明吧。各类农戶在租地方面的比例如下：

农戶类別	农戶的百分比	每一有份地的农戶平均有 份地（单位俄亩）	租地
无耕畜者…………………	26.4	5.4	0.3
有1头耕畜者…………	20.3	6.5	1.6
有2头耕畜者…………	14.6	8.5	3.5
有3头耕畜者…………	9.3	10.1	5.6
有4头耕畜者…………	8.3	12.5	7.4
有5头以上耕畜者……	21.1	16.1	16.6
总　共	100.0	9.3	5.4

份地的分配情况，我們已經知道了：按人口平均計算，殷实户占有的份地比貧苦戶要多。租地分配的不平均比份地严重几十倍。最高一类农戶的份地比最低的一类多两倍（16.1比5.4）。而最高一类农戶的租地則比最低的一类多*50多*倍（16.6比0.3）。可見，租地不但沒有把农民之間在經济实力方面的差别拉平，反而几十倍地加深和加剧了这些差别。我們从民粹派經济学家（瓦·沃·、

尼·—逊[43]、馬列斯、卡雷舍夫、維赫利亚也夫及其他等人)那里多次看到的相反的結論，是由以下錯誤造成的。那就是他們通常采用按份地划分农民的方法，証明份地少的农民租种的土地多于份地多的农民。他們就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沒有指出，租种土地的多半是那些份地少的村社中的富裕戶，因此村社表面上的平均制只是掩盖着村社內部在分配方面最大的不平均。譬如，卡雷舍夫自己就承認："使用租地很多的是（一）土地較少的那几类农戶，然而是(二)其中比較富裕的农戶"(同書第189頁)，但是他并沒有对这几类农戶的租地分配情况进行系統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民粹派經济学家的这个錯誤，我們再举馬列斯先生的一个例子("收成和粮价的影响"一書第1卷第84頁)。他从麦里托波尔县的材料中得出結論說："租地大致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如果按男劳力的多少来划分农戶，那情况便是这样：沒有劳动力的农戶"平均"租地1.6俄亩，有1个劳动力的租地4.4俄亩，有2个劳动力的租地8.8俄亩，有3个劳动力的租地14俄亩。問題的关鍵就在于，这些"平均"数字把經济实力极不相同的农戶都混在一起了，譬如在有一个劳动力的农戶中，有的农戶租地4俄亩，种地5—10俄亩，有2—3头耕畜，有的农戶租地38俄亩，种地60俄亩，有4头以上的耕畜。所以馬列斯所得出的平均数是虛假的。事实上，麦里托波尔县20%的富裕戶尽管有最多的份地和購买地，却集中了全部租地的66.3%，即占全部租地的$^2/_3$，而占农戶一半的貧困戶只占有全部租地的5.6%。

其次，我們看到，一方面，无馬戶和有1匹馬的农戶只租地1俄亩，甚至还不到1俄亩，另一方面，有4匹馬以上的农戶則租地

7—16 俄亩。显然，这里正在由量变进到質变。前一种租佃是迫于貧困，是受盘剝的租佃。在这种情况下，“租佃者”不能不成为别人用工役制、冬季雇佣制、貸款等等进行剝削的对象。相反，有份地12—16 俄亩、另外还租地 7—16 俄亩的农戶，它們租种土地显然不是迫于貧困，而是由于富裕，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发財，为了“賺錢”。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租地变成了資本主义农場，农业中产生了企业經济。下面将会看到，这样的农戶非雇用农业工人不可。

現在試問：这种明显的經营租佃是不是一般現象呢？下面我們引証的材料将告訴我們，企业經济的增长在不同的商业性农业区表現也不同。現在，我們再举几个例子，先作出有关租佃的一般結論。

在塔夫利达省德聶泊县，种地 25 俄亩以上的农戶占总数18.2%。它們每戶有份地 16—17 俄亩，租地 17—44 俄亩。在薩馬拉省新烏晋斯克县，有 5 头耕畜以上的农戶占总数 24.7%，它們每戶种地 25—53—149 俄亩，租种非份地 14—54—304 俄亩（第一个数字指有 5—10 头耕畜的农戶，共占农戶总数 17.1%；第二个数字指有 10—20 头耕畜的农戶，共占农戶总数 5.8%；第三个数字指有 20 头以上耕畜的农戶，共占农戶总数 1.8%）。它們从别的村社租种份地，每戶平均为 12—29—67 俄亩，在本村社內租种的份地分别为 9—21—74 俄亩。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占农戶总数 10.1% 的农戶，每戶耕地在 20 俄亩以上。它們每戶平均有份地28—44 俄亩，租耕地 14—40 俄亩，租草地 118—261 俄亩。在奥勒尔省的两个县（叶列茨县和特魯勃乔夫斯克县），有 4 匹馬以上的农戶占农戶总数 7.2%，每戶平均有份地 15.2 俄亩，此外还用購买

和租佃的方法使自己种地面积达到 28.4 俄亩。在沃龙湼什省扎顿斯克县，有 4 匹馬以上的农戶占农戶总数 3.2%，每戶平均有份地 17.1 俄亩，耕种的面积达 33.2 俄亩。在下新城省的三个县(克尼亚吉宁、馬卡里也夫和瓦西里)，9.5% 的农戶每戶有馬 3 匹以上，有份地 13—16 俄亩，而耕种的面积达 21—34 俄亩。

由此可見，农民中的經营租佃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一般的、普遍的現象。无論什么地方，都有一些富裕戶从村社中分化出来，它們总是占极少数，总是靠經营租佃来組織資本主义农业。因此泛泛地談論糊口租佃和資本主义租佃是根本不能說明我国农民經济問題的，必須研究关于农奴制特点在租佃中的发展以及其中資本主义关系形成的具体材料。

前面我們引用的材料說明了 20% 最富裕的农戶在人口和份地中占多大部分。現在我們可以补充一点：在农民租种的全部土地中，他們集中了 50.8—83.7%，而 50% 下等戶則只占全部租地的 5—16%。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人問我們，哪一种租佃在俄国占优势？是糊口租佃还是經营租佃？是迫于貧穷的租佃还是富裕农民的租佃？是农奴制的（即工役制的，盘剝性的）租佃还是資产阶級的租佃？那末，答复只能有一个。就租佃戶的数目来看，无疑大多数租佃者是出于貧穷而租种土地的。对于絕大多数农民来說，租佃就是受盘剝。就租地的数量来看，无疑一半以上都集中在富裕农民手中，集中在这些組織資本主义农业的农村資产阶級手中。

关于租地价格的材料通常都是只算出全部租佃者和全部土地的“平均”数。这些平均数把农民极端貧困和备受压迫的情况掩盖到什么程度，这从地方自治局关于塔夫利达省德湼泊县的統計材

料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材料中，凑巧提供有各类农户的租地价格：

	租佃戶的百分比	每戶租佃的耕地（单位俄亩）	每俄亩的价格（单位卢布）
种地不满5俄亩者………	25	2.4	15.25
种地5—10俄亩者………	42	3.9	12.00
种地10—25俄亩者………	69	8.5	4.75
种地25—50俄亩者………	88	20.0	3.75
种地50俄亩以上者………	91	48.6	3.55
总　計	56.2	12.4	4.23

由此可見，租地的“平均”价格（每俄亩4卢布23戈比）完全歪曲了实际情况，抹杀了那些构成問題的本質的矛盾。貧农不得不冒破产的危险以高出平均价格两倍多的价格租种土地，而富人則以廉价“成批地”購买土地，当然，有机会时就以275％的利潤轉讓給貧穷的邻居。租佃有各种各样。既有农奴制的盘剝，又有爱尔兰式的租佃，还有土地的买卖，資本主义的农場。

农民出租份地这一現象更加清楚地表明，村社內部出現了資本主义关系，貧农破产，少数人靠剝削这些破产的群众发財致富。租种土地和出租土地这种現象同村社和村社的平均制是毫无联系的。既然貧农迫不得已把按平均制分得的土地出租給富人，那这种份地分配的平均制在現实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实际生活摈弃了官方根据人口登記①規定的份地平均制，那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把“村社”观点駁斥得更明显呢？貧农出租份地和富农集中租地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証明，无論什么样的平均制在日益

① 指俄国为計算人头税而进行的人口登記。——譯者注

发展的資本主义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出租份地的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已經过时的上一世紀80年代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調查（我們現在还不得不利用这个材料），出租土地的戶数和出租的份地所占的百分比看来并不大。例如，在塔夫利达省德涅泊县，出租份地的农戶占25.7%，出租的份地占14.9%。在薩馬拉省新烏晋斯克县，出租土地的农戶占12%。在薩拉托夫省卡梅申县，出租的土地占16%。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28 500个农戶中有8 500戶，即有1/3以上的农戶出租可耕份地；在41万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50 500俄亩，約占12%。在沃龙涅什省扎顿斯克县，在185 600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6 500俄亩，占5%弱。在下新城省的三个县，在488 000俄亩份地中出租的有19 000俄亩，也占5%弱。这些数字看来都不大，因为这些百分比包含着一种默然的假設：似乎各类农戶出租的土地大致是平均的。然而这种假設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事实上出租土地的主要是貧农，租种大部分土地的則是富裕农民。这一事实比租种土地和出租土地的絕对数字，比出租土地或出租土地的农戶的平均百分数要重要得多。地方自治局統計調查材料使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20%的富裕戶出租的土地占全部出租土地的0.8—12.5%。相反地，50%的下等戶竟占全部出租土地的68.8—98.0%。租賃这些土地的自然还是那些富裕农民。这里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在各类农戶中，出租土地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貧农出租土地是迫于穷困，沒有条件耕种土地，旣无种子、牲畜和农具，又极其需要錢用；富农出租土地很少，他們或者是为了經营的方便交换土地，或者是直接做土地买卖。

下面是塔夫利达省德涅泊县的具体材料：

	出租份地的农戶的百分比	出租的份地的百分比
不种地者	80	97.1
种地不滿 5 俄亩者	30	38.4
种地 5—10 俄亩者	23	17.2
种地 10—25 俄亩者	16	8.1
种地 25—50 俄亩者	7	2.9
种地 50 俄亩以上者	7	13.8
全　县	25.7	14.9

从这个材料难道还不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批地抛弃土地和无产阶級化的現象是同一小撮富人买卖土地密切相关嗎？出租份地的百分比提高的恰恰是在那些每戶平均有 17 俄亩份地、30 俄亩購买地和 44 俄亩租地的大耕作者，这难道不値得注意嗎？总的說来，德涅泊县 40% 的貧苦戶共有份地 56 000 俄亩，租地 8 000 俄亩，出租 21 500 俄亩。而 18.4% 的富裕戶則有份地 62 000 俄亩，出租份地 8 000 俄亩，租地 82 000 俄亩。在塔夫利达省的三个县中，这些富裕戶租种份地 15 万俄亩，占全部出租份地的 $^{3}/_{5}$！在薩馬拉省的新烏晋斯克县，出租份地的是 47% 的无馬农戶和 13% 的有 1 匹馬的农戶，而租份地的是有 10 头以上耕畜的农戶，即只占农戶总数 7.6% 的农戶，租地数量各有 20—30—60—70 俄亩不等。

关于購买地的情况可以說同租地的情况是大致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在租地中存在着农奴制的特点，租地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是工役制的和盘剝性的，就是說，它是把邻近貧苦农民的劳动力束縛在地主經济中的一种手段。而份地农民購买土地作为私有財产，則純粹是資产阶級現象。在西方，有时人們把小块土地卖給雇工和短工，用这种办法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在我們俄国，类似的办

法官方早就实行过了，这就是1861年的"大改革"。目前农民購买土地，只是說明从村社中正在分化出农村資产阶級分子。关于1861年以后农民購买土地的发展情况，我們在前面分析土地占有情况的材料时已經講过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絕大部分購买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0%的富裕戶集中了59.7—99%的購买地，而50%的貧苦戶只占全部农民購买地的0.4—15.4%。因此我們可以大胆地断言，在农民从1877年到1905年間購为私有的750万俄亩土地（見前）中，$^2/_3$—$^3/_4$掌握在极少数富裕戶的手中。农民村社和协作社購买土地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在1877年，农民村社占有購买地765 000俄亩，到1905年，已达870万俄亩，这时农民协作社的私有土地为760万俄亩。如果認为村社購买或租种的土地的分配情况不同于个人購买或租种的土地，那就錯了。事实恰恰相反。例如，根据塔夫利达省三个大陆县份关于农民村社租种的官地的分配情况的材料，76%的租地都掌握在富裕戶（約占农戶总数20%）手中，而40%的貧苦戶只占全部租地的4%。农民只是"根据錢多少"来分配租地或購买地的。

四

从上面引用的关于农民的份地、租地、購买地和出租地的全部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农民实际使用土地情况愈来愈同官方即政府所規定的农民份地占有情况不相符合。当然，如果拿总的数字或"平均"数字来看，那出租的份地就同租地抵銷了，剩下的租地和購买地似乎是在全体农民中平均分配的，于是就給人一种印象：实际使用土地情况同官方規定的即份地的使用情况，并沒有多大的出入。但是这种印象是虛假的，因为在两极农戶中，农民实

际使用土地情况同最初的平均使用份地的情况出入最大，所以使用“平均”数字，就必然要歪曲事实。

事实上，下等戶出租土地多，租进土地少，因此使用的土地总面积相对地（有时还絕对地）少于份地占有面积；而上等戶由于集中了購买地和租地，他們使用的土地总面积无論相对地或絕对地都多于份地占有面积。我們已經看到，占总数50%的貧苦戶占有33—37%的份地，而使用的土地一共只占18.6—31.9%。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減少了一半，例如，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貧苦戶的份地占37.4%，使用土地只占19.2%。占总数20%的富裕戶占有29—36%的份地，而使用的土地則占34—49%。这里再引証一些具体材料来說明这种关系。在塔夫利达省德涅泊县，占总数40%的貧苦戶有份地56 000俄亩，而使用的土地总共只有45 000俄亩，就是說少了11 000俄亩。富裕戶（占农戶总数18%）有份地62 000俄亩，而使用的土地共有167 000俄亩，就是說多了105 000俄亩。下面是下新城省三个县的材料：

	每戶平均占有份地	每戶平均使用土地
	（单位俄亩）	
无馬者	5.1	4.4
有1匹馬者	8.1	9.4
有2匹馬者	10.5	13.8
有3匹馬者	13.2	21.0
有4匹馬以上者	16.4	34.6
总　共	8.3	10.3

这里最低一类农戶租进和租出的土地抵銷以后，使用的土地絕对地減少了。而这类下等戶即无馬农戶占全体农戶整整30%。

这就是說几乎有$^1/_3$农戶租进和租出土地的結果，使用的土地絕对地减少了。有1匹馬的农戶（占农戶总数37%）增加了自己的使用土地，但是增加极少，其比例还小于农民使用土地的平均增加数（即从8.3俄亩增加到10.3俄亩）。因此这类农戶在全部使用土地中的比重减少了；就所有三个县份来看，这类农戶的份地占36.6%，而使用土地只占34.1%。另一方面，极少数上等戶的使用土地則大大地超过了平均数。有3匹馬的农戶（占农戶总数7.3%）的地产增加了一半：从13俄亩增加到21俄亩。有許多匹馬的农戶（占农戶总数2.8%）的地产增加了一倍多：从16俄亩增加到35俄亩。

由此我們看到，份地在农民經济中的作用日益縮小是一种普遍現象。这种現象在农村两极正在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貧农的份地作用日益降低，是因为日益加剧的貧困和破产迫使貧农出租份地，拋弃土地，由于缺少牲畜、农具、种子和貨币資金而縮小土地經营，从而或者是去当某种雇工，或者是……升入天国。飢荒、坏血病和伤寒使下等戶农民大批死亡。上等戶的份地意义也日益縮小，是因为日益扩大的經营不能不远远超出份地的范围，不能不在新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种土地占有制不是劳役性的，而是自由的，不是世代相传的，而是在市場上可以購买和租种的。农民的土地愈多，农奴制的痕迹愈少，經济的发展愈快，則份地的作用就降低得愈快，全部土地卷入商业周轉的过程就愈快，在租地上建立商业性农业的过程就愈快。新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我們方才已經看到，那里的富裕农民經营的主要是購买地和租地，而不是份地。这似乎是怪論，但这是事实：在俄国土地最多的地区，份地最多的富裕农民（每戶有份地16—17俄亩）竟把土地經营

的重心从份地轉到非份地上去了！

份地在迅速发展的两极农戶中的作用日益縮小这一事实，对于估計由19世紀遺留給20世紀的、并在我国革命中引起了各阶級間斗爭的那种土地变革的条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包括地主的和农民的土地占有制）已經是經济上絕对必需的了。这种破坏是絕对不可避免的，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拦不住的。現在斗爭的焦点是破坏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采取按斯托雷平的方式还是采取农民的方式进行？在前一种情况下，地主土地占有制得以保存，富农可以掠夺村社；在后一种情况下，通过土地国有化来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紀的壁障。关于这一点，后面我們将作更詳細的論述。这里必須指出一个重要的現象，即份地作用的日益縮小使各种賦稅攤派极不平均。

誰都知道，俄国农民所担負的賦稅带有很深的中世紀的痕迹。这里我們不能对涉及俄国財政史的細节作深入的闡述。我們只指出贖金就够了。贖金是中世紀代役租的直接繼續，是农奴制地主靠警察国家勒索来的一种貢賦。我們只要提醒一下貴族土地和农民土地納稅不平均以及繳实物稅等等的情况就够了。我們現在只引用一下沃龙涅什省农民收支統計資料[44]中的納稅总額。一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总額（根据66份典型戶收支資料）是491卢布44戈比，支出总額是443卢布，純收入是48卢布44戈比。每戶“平均”担負的賦稅总額是34卢布35戈比。这样，賦稅占了純收入的70%。当然这只是就賦稅的形式而言，而事实上，这仍然是对“劳役等級”的农奴制剝削。一个中等家庭的貨币純收入只有17卢布83戈比，这就是說，一个俄国农民繳納的“賦稅”超过了他

的貨币純收入的一倍。这是1889年的数字，而不是1849年的数字！

但是在这里，平均数字也掩盖着农民的貧困，大大地美化了农民的实际状况。关于賦税在各类經济实力不同的农戶間的分攤情况的資料表明，无馬农戶和有1匹馬的农戶（即占俄国农戶总数的$^3/_5$的农戶）繳納的賦税不仅大大超过貨币純收入，而且也大大超过純收入的总額。下面就是这种材料：

每戶的收支数字（单位卢布）

	总收入	支出	各种賦税	賦税在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
(一)无馬者	118.10	109.08	15.47	14.19
(二)有1匹馬者	178.12	174.26	17.77	10.20
(三)有2匹馬者	429.72	379.17	32.02	8.44
(四)有3匹馬者	753.19	632.36	49.55	7.83
(五)有4匹馬者	978.66	937.30	67.90	7.23
(六)有5匹馬以上者	1 766.79	1 593.77	86.34	5.42
平　均	491.44	443.00	34.35	7.75

无馬农戶和有1匹馬的农戶所繳納的賦税在他們的总支出中各占$^1/_7$和$^1/_{10}$。农奴制代役租也未必有这么高，因为屬于地主所有的大批农民必然破产对地主是不利的。賦税分攤的不平均現象也是很严重的：富裕农民所繳納的税同其收入比較起来，少繳納了$^2/_3$或$^1/_2$。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均現象呢？因为农民是按土地分攤大部分賦税的。对农民来說，税額和份地数量已合为“人口”一个概念了。我們根据上面的例子，計算一下各类农戶每俄亩份地的賦税額，可以得出以下数字：(一) 2.6卢布；(二) 2.4卢布；(三)2.5卢布；(四)2.6卢布；(五) 2.9卢布；(六) 3.7卢布。除了最

高一类上等戶因有大的加工业作坊須要特別課稅外，我們看到賦稅的分攤大致是平均的。在这里，份地数量同稅額大体上是适应的。这种現象是我国村社的劳役性質的直接残余（和直接証明）。就工役制經济的条件本身來說，也不能不是这样：如果不把邻近农民束縛在使人挨餓的份地上，逼迫他們为这种份地繳納很高的賦稅，那在“解放”后的半世紀中，地主就不可能从邻近农民中获得供盘剝的劳动力。不要忘記，在*19*世紀末的俄国，經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現象：农民不得不赎免份地，为了放弃份地不得不繳納“額外費用”，就是說，向承种离村者的份地的人額外繳一笔錢。譬如，日班科夫先生在“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馬版）[45]一書中描写科斯特罗馬农民生活时写道，在外出做工的科斯特罗馬人当中，“很少有人从出租土地取得一点租金，他們出租土地的唯一的条件通常是租佃者必須把土地拦起来，而一切賦稅則由主人繳納”。1896年出版的“雅罗斯拉夫里省概述”一書也举出許多同样的事实說明外出做工的工人不得不赎免份地。

当然，在純农业的省份里，这样的“土地权力”是沒有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省份里，份地在农村两极中的作用降低的現象也是絕对存在的，不过形式不同罢了。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旣然如此，那按份地分攤賦稅就必然使課稅愈来愈不平均。經济的发展从各个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导向一个結果，这就是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形式在遭到破坏，等級的壁障（份地、地主的土地等等）正在被摧毁，新的經济形式正在用各种地产建立起来。19世紀遺留給20世紀的必須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清洗”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形式。斗爭焦点是：这种“清洗”是通过农民的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来进行呢，还是通过由富农加速掠夺村社并把地主經济变为容克經济的

方式来进行？

我們进一步分析現代农民經济結构的材料，就应該从土地問題轉到畜牧业問題上来。在这里，我們也象通常一样仍然必須确認，牲畜在各类农戶之間的分配情况要比份地的分配情况更加不平均。例如，塔夫利达省德涅泊县农民的畜牧业的規模就是这样：

	每戶平均有份地（单位俄亩）	每戶平均有牲畜（单位头）
不种地者	6.4	1.1
种地不滿 5 俄亩者	5.5	2.4
种地 5—10 俄亩者	8.7	4.2
种地 10—25 俄亩者	12.5	7.3
种地 25—50 俄亩者	16.6	13.9
种地 50 俄亩以上者	17.4	30.0
平均	11.2	7.6

两极农戶之間在牲畜数量上的差額要比份地数量上的差額大 9 倍。根据畜牧业的材料来看，实际經营規模同人們通常只是根据平均数字，根据份地决定一切这种假設所想象的很少有相似之处。无論我們拿哪一个县份来看，任何地方牲畜的分配都比份地的分配不平均得多。占总数 20% 的富裕戶共占有份地 29—36%，而它們的牲畜則占該县或几个县农民所有的牲畜总数的 37—57%。而占总数 50% 的下等戶却只占牲畜总数的 14—30%。

但是这些数字还远远沒有完全反映出实际存在的深刻差別。除了牲畜的数量問題，牲畜的質量問題也同样很重要，甚至是更重要。不言而喻，半破产的农民，經济貧困，备受盘削，是买不起也飼养不起較好的牲畜的。主人（可怜的主人）挨餓，牲畜也不可能不挨餓。沃龙涅什省的收支材料极其清楚地表明，无馬农戶和有

1 匹馬的农戶（即占俄国农戶总数 $^{3}/_{5}$ 的农戶）的畜牧經济都小得可怜。現在我們从这些材料中挑一些来說明农民的畜牧經济：

	每戶平均有牲畜（折成大牲畜）	一年的平均支出額（单位卢布）	
		补充农具和牲畜	牲畜飼料
(一)无馬者……………………	0.8	0.08	8.12
(二)有 1 匹馬者…………	2.6	5.36	36.70
(三)有 2 匹馬者…………	4.9	8.78	71.21
(四)有 3 匹馬者…………	9.1	9.70	127.03
(五)有 4 匹馬者…………	12.8	30.80	178.24
(六)有 5 匹馬以上者……	19.3	75.80	510.07
平 均	5.8	13.14	98.91

在 1896—1900 年期間，欧俄的无馬农民有 325 万戶。他們每年每戶用于牲畜和农具的支出为 8 戈比，因此他們的农业“經营”情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有 1 匹馬的农戶是 330 多万。他們每年每戶用于添置农具和牲畜方面的支出是 5 卢布，因此他們只能够終生劳苦，而摆脫不了貧困。甚至有 2 匹馬的农戶（250 万戶）和有 3 匹馬的农戶（100万戶），每年每戶用在耕畜和农具方面的支出也不过 9—10 卢布。只有两类上等戶（在全国 1 100 万个农戶中，这样的农戶有 100 万戶）用在耕畜和农具方面的支出才稍微接近于正常的农业經营。

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农戶的牲畜質量不可能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譬如，一匹耕馬在有 1 匹馬的农戶中价值 27 卢布，在有 2 匹馬的农戶中价值 37 卢布，在有 3 匹馬的农戶中价值 61 卢布，在有 4 匹馬的农戶中价值 52 卢布，在馬匹很多的农戶中价值 69 卢布。两极农戶之間的差額竟超过了 100%。凡是有小經济和大經济的

資本主义国家里都普遍存在这种現象。我在“土地問題”(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① 一書中曾經指出，德雷克斯勒尔对德国农业和畜牧业所作的調査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果。在德国，一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在大田庄是619公斤（見德雷克斯勒尔所著一書1884年版第259頁），在占有土地25公頃以上的农戶中是427公斤，在占有7.5—25公頃的农戶中是382公斤，在占有2.5—7.5公頃的农戶中是352公斤，在占有2.5公頃以下的农戶中則是301公斤。

土地的管理，特别是土地的施肥，同牲畜的数量和質量也有关系。我們在前面曾經指出，全国的統計材料都証明地主土地的施肥情况比农民土地的施肥情况要好。現在我們看到，那种在农奴制时代曾經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划分已經过时了。現时在各类农戶之間有很大的懸殊，因此凡是根据“一般”农戶这种概念作出的一切研究、計算、論断和理論都会在这个問題上得出絕对錯誤的結論。遺憾的是，地方自治局統計的材料只限于按村社調查的資料，极少研究各类不同的农戶。但是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却例外地在按戶調查資料时收集了各类农戶土地施肥情况的精确材料：

	施肥农戶占的百分比	每一施肥农戶施肥車数
种地不滿 5 俄亩者 ……	33.9	80
种地 5—10 俄亩者 ……	66.2	116
种地 10—20 俄亩者 ……	70.3	197
种地 20—50 俄亩者 ……	76.9	358
种地 50 俄亩以上者 ……	84.3	732
平　均	51.7	176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168—177頁。——編者注

这里我們已經看到，由于經营規模的不同便出現了各种不同的耕作技术类型。在另一个地方，注意这个問題的調查人員得出了类似的結論。奧勒尔县的統計工作者們說，富裕农民每1头大牲畜所积的厩肥比貧苦农民的几乎多一倍。每戶平均有7.4头牲畜者，每头牲畜积肥391普特，而每戶平均有2.8头牲畜者，每头牲畜只能积肥208普特。每头牲畜“正常的”积肥数量是400普特，可見，只有很少数富裕农民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貧农还不得不用谷草和厩肥当燃料，有时候甚至出卖厩肥等等。

說到这里，还必須考察一下农民中无馬农戶增长的問題。在1888—1891年期間，在欧俄48省1 010万戶中，无馬农戶有280万戶，占农戶总数的27.3%。大約过了9—10年，即在1896—1900年間，在1 110万农戶中，无馬农戶有320万，占农戶总数29.2%。可見，对农民的剝夺无疑是愈来愈厉害了。但是如果从农艺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那就会得出一种驟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結論。这个結論是著名的民粹派著作家瓦·沃·先生早在1884年(1884年“欧洲通报”[46]第7期)作出的，他把我国农民經济中和“正常的”三圃制經营(从农艺学观点看来是正常的)中一匹馬的耕地亩数加以对比之后作出了这个結論。他发現农民飼养的馬匹过多，因为农民每匹馬所耕种的土地不是如农艺学所要求的7—10俄亩，而只有5—8俄亩。瓦·沃·先生得出結論說：“因此，对俄国这个区域(中部黑土地带)的部分居民丧失馬匹这一現象，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看作是耕畜数量和耕地面积之間正常比例的恢复。”事实上，得出这种奇怪結論的原因是在一部分农民丧失馬匹的同时，富裕戶把土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从而使馬匹数目同耕地面积达到了“正常的”比例。这种“正常的”比例并不是“恢复”(因为在我国农

民經济中从未有过这种比例)，而只是由农村資产阶級达到的。“不正常現象”則表現为小农經济的生产資料分散：同样数量的土地，100万个有1匹馬的农民要用100万匹馬来耕种，而富裕农民用50万匹馬或75万匹馬来耕种就可以了，而且耕种得更好更精細。

关于农民經济中的农具問題，应当把普通农具同改良农具区别开来。普通农具的分配同耕畜的分配两者大体上是相适应的；在这类材料中，我們还沒有发現說明农民經济的新材料。价值昂貴的改良农具，只有比較大的农戶使用才合算，只有順利发展的农戶才用得起。这种农具的集中程度高得无比。关于改良农具集中的材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根据这种材料才能准确地判断出，农民經济的进步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从1861年以来，在这方面无疑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进步不仅在地主經济中而且在农民經济中所具有的資本主义性質却时常引起人們的爭論和怀疑。

地方自治局关于改良农具在农民中的分配情况的統計材料如下：

	每百戶平均有改良农具数	
	奥勒尔省两县	沃龙涅什省一县
无馬者……………………	0.01	—
有1匹馬者………………	0.2	0.06
有2—3匹馬者…………	3.5	1.6
有4匹馬以上者…………	36.0	23.0
平　均	2.2	1.2

在这些地区，农民使用改良农具比較不普遍。有改良农具的农戶所占的百分比非常小。下等戶几乎根本不使用这种农具，上

等戶还經常使用。在薩馬拉省新烏晋斯克县，有改良农具的农戶只占 13%，但是，这个百分比在有 5—20 头耕畜的这类农戶中提高到40%，在有 20 头以上耕畜的农戶中提高到 62%。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的三个区中，每百戶有 10 件改良农具，这是总平均数字，种地 20—50 俄亩者每百戶有 50 件改良农具，种地 50 俄亩者每百戶有 180 件改良农具。拿我們在上面为了比較不同县份的材料而使用的百分比来看，占农戶总数 20%的富裕戶的改良农具占全部改良农具的 70—86%，而 50%貧苦戶的改良农具只占总数的 1.8—8.6%。因此毫无疑問，在农民中間推广改良农具的进步（上面引用的考夫曼先生在 1907 年写的著作中也談到这种进步）是富裕农民的进步。占农戶总数 $^3/_5$ 的无馬农戶和有 1 匹馬的农戶几乎根本沒有力量利用这些改良。

五

我們在考察农民經济时，一直是把农民主要作为业主来看待的，同时指出，下等戶不断被推出业主的行列。被推到哪里去呢？显然被推到无产阶級的行列中去。現在我們应当詳細地考察一下，无产阶級尤其是农业无产阶級是怎样形成的，农业劳动力市場是怎样形成的。工役制經济的典型的阶級人物是农奴制地主和受盘剝的有份地的农民，資本主义經济的典型的阶級人物則是雇主-农場主和雇工或短工。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地主和富裕农民如何变成了雇主。现在我們来看一下农民如何变成雇工。

富裕农民使用雇佣劳动是否很多呢？如果拿有雇工的农戶在农戶总数中的平均百分比来看（象通常人們所作的那样），那这个百分比是很小的：在塔夫利达省德涅泊县是 12.9%，在薩馬拉省新

烏晋斯克县是9%，在薩拉托夫省卡梅申县是8%，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是10.6%，在奥勒尔省两个县是8.5%，在沃龙涅什省一个县是3.8%，在下新城省三个县是2.6%。但是这种数字其实是虛假的，因为这是有雇工的农戶同包括騰出劳力去当雇工的农戶在內的全体农戶之間的比例。資产阶級在任何資本主义社会中都只占人口的极少数。有雇佣工人的农戶任何时候都是"很少的"。問題在于，这里是在形成一种特殊的經济类型呢，还是雇佣現象不过是偶然的。地方自治局的統計材料对这个問題作了肯定的答复，它处处都表明，在富裕戶中雇用雇工的农戶的百分比要比全县的总平均数高得无比。我們引用一下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的材料，那里例外地不仅有关于雇用雇工的資料，而且有关于雇用短工即农业中更典型的雇用形式的資料。

	每戶男劳动力	雇用工人的农戶占的百分比			
		季　工	收割工	收获工	脫谷工
不种地者…………………	0.6	0.15	0.6	—	—
种地不滿 5 俄亩者………	1.0	0.7	5.1	4.7	9.2
种地 5—10 俄亩者………	1.2	4.2	14.3	20.1	22.3
种地 10—20 俄亩者………	1.5	17.7	27.2	43.9	25.9
种地 20—50 俄亩者………	1.7	50.0	47.9	69.6	33.7
种地 50 俄亩以上者………	2.0	83.1	64.5	87.2	44.7
平　均	1.2	10.6	16.4	24.3	18.8

我們看到，殷实戶的特点是他們有較多的家庭成員，自己家中的劳动力比貧苦戶更多。但是，尽管如此，他們还是使用非常多的雇佣劳动。"家庭协作"是扩大經营的基础，进而就变为資本主义协作。在上等戶中，雇用工人显然成了扩大經营的办法和条件。

此外，雇用短工甚至在中等戶中也极其普遍：在两类上等戶（占农戶总数10.3％）中，大多数农戶都雇用工人，在耕地10—20俄亩的这一类农戶（占总数22.4％）中也有$^2/_5$以上的农戶雇用工人帮助收获。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富裕农民如果沒有数百万雇工和短工大軍为他們做工，他們是存在不下去的。我們看到，各县有雇工的农戶所占的平均百分数有很大的出入，然而有雇工的农戶集中在上等戶中間，富裕戶在变为企业主，这一現象则无疑是普遍的。占总数20％的富裕戶占有雇工的农戶总数的48—78％。

关于农村的另一极，統計材料一般地都沒有告訴我們，有多少农戶騰出劳力去当各种雇佣工人。我国地方自治局的統計同省長工作报告和各局的官方旧統計相比，在許多問題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一个問題上，即在所謂农民的“外水”問題上，地方自治局的統計也保持着官方的旧观点。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耕作被認为是正业；除此以外的一切活計都属于“外水”或“副业”。有一点政治經济学常識的人都应該加以区别的經济范疇，在这里都被混淆起来了。譬如在“从事农业副业者”这一类别中，既包括大批雇佣工人，又包括企业主（如瓜田主）；此外，乞丐、商人、仆役和手工业业主等等都被列为“有外水的农戶”。这种政治經济学上的惊人的糊塗观念显然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在地主看来，他的代役租的农民在外边干什么，是做生意，当雇工，还是經营加工业，确实无关紧要；所有农奴都一律要繳納代役租，一切从事副业的人都被看做是暂时地和有条件地离开自己的正业。

在农奴制废除以后，这种观点同現实的矛盾一天天地尖銳化。大多数有外水的农戶无疑都是騰出劳动力去当雇工的农戶，但是这里我們不能知道十分确切的情况，因为少数企业主也包括在这

类农戶的总数中，从而粉飾了貧苦戶的状况。我們举个例子来說明这一点。薩馬拉省新烏晋斯克县的統計把“农业副业”从全部“副业”中单独列出[47]。当然，这个名詞是不确切的，不过职业統計表起碼告訴了我們这样一个情况：在从事这种“副业”的14 063个人中間，雇工和短工就有13 297个。这就是說，雇佣工人占絕大多数。該县农业副业的分配情况如下：

	从事农业副业的男劳动力所占的百分比
无耕畜者……	71.4
有 1 头耕畜者……	48.7
有 2—3 头耕畜者……	20.4
有 4 头耕畜者……	8.5
有 5—10 头耕畜者……	5.0
有 10—20 头耕畜者……	3.9
有 20 头以上耕畜者……	2.0
全 县	25.0

从上表看来，在无馬农民中，7/10都是雇佣工人，在有1匹馬的农民中，几乎一半是雇佣工人。在皮尔姆省紅烏菲姆斯克县，从事农业副业的农戶平均占16.2%，在不种地的农戶中，“从事副业者”占52.3%，在种地不滿5俄亩的农戶中，占26.4%。在其他沒有专門分出农业副业的县份里，情况虽不很清楚，但是那里一般說来，搞“副业”，找“外水”通常都是下等戶的专业。占农戶总数50%的下等戶中有外水的农戶占60—93%。

由此可見，下等戶尤其是有1匹馬的和沒有馬的农戶，就其在国民經济整个結构中的地位来說，都是有份地的雇工和短工（說得广泛一些就是雇佣工人）。关于1861年以后全国使用雇佣劳动

增多的材料、关于下等戶收入来源的收支調查以及关于下等戶生活水平的材料都証实了这个結論。現在我們把这三方面的証据稍微詳細地来談一談。

关于全俄农业雇佣工人增长的一般材料只是統計了外出的工人，而且沒有把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明确地区别开来。至于在总数中究竟是前者占优势还是后者占优势的問題，民粹派的著作認为前者占优势，但是我們在下面将提出相反看法的論据。1861年以后，农民中外出工人迅速增加，这个事实是絲毫不容怀疑的。一切資料都証实了这一点。关于居民証收入和发出的居民証数目的資料大致地說明了这一現象。居民証收入在1868年是210万卢布，在1884年是330万卢布，在1894年是450万卢布，一共增加了一倍多。在欧俄发出的居民証和通行証的数目在1884年是470万张，在1897—1898年是780—930万张。我們看到，在13年間增加了一倍。所有这些数字大体上都是与其他一些計算如烏瓦罗夫先生的計算相符合的。烏瓦罗夫先生綜合了20省126县的地方自治局的統計材料（大部分是陈旧的），推算出外出工人大概有500万[48]。謝·柯罗連柯先生根据地方过剩的工人的材料，推算出这个数字是600万。

尼古拉—逊先生認为，在这个数字中"絕大多数"外出是作农业副业的。我在"資本主义的发展"① 一書中曾經詳細地說明过，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材料和調查都充分証明这个結論是不正确的。大多数（虽然不是絕大多数）外出工人是非农业工人。請看关于1898年欧俄各省发出的居民証的最完全和最新的材料：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19—532頁。——編者注

省　　别	1898年发出的居民証的数目
(1)外出主要从事非农业副业的17个省……	3 369 597
(2)过渡性質的12个省……………………	1 674 231
(3)外出主要从事农业副业的21个省………	2 765 762
50个省总計	7 809 590

假定在过渡性質的省份中有一半外出工人是农业工人，那大概的分配情况很可能是这样：非农业雇佣工人大約是420万，农业雇佣工人大約是*360*万。我們应当把魯德涅夫先生[49]的数字同这个数字比較一下。魯德涅夫先生在1894年綜合了19省148县的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資料，推算出农业雇佣工人大致是360万。根据80年代的材料，这个数字既包括当地的农业工人，也包括外出的农业工人。在90年代末，光是外出的农业工人就有这么多。

农业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我們在前面分析地主經济和农民經济时所探討过的农业中的資本主义企业經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就拿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来說吧！富裕农民使用机器，意味着向企业經济的过渡，这一点我們已經用确切的材料說明过了。地主經济使用机器和一般改良农具，則意味着工役制必不可免地为資本主义所排挤。現在农民的农具被地主的农具所代替；旧的三圃制被新的技术方法所代替，而且由此引起了农具的更换；受盘剝的农民已經不适用于使用改良农具的农活，因此正在被雇工或短工所代替。

在改革后的歐俄，使用机器最广泛的区域，使用外来工人雇佣劳动力也最广泛。这个区域就是歐俄南部和东部各边区。农业工人的迁入这个区域，造成了非常典型和鮮明的資本主义关系。这种关系应該談一談，以便把直到現在还占优势的旧工役制同冲击

愈来愈猛烈的新潮流作一番比較。首先应当指出,南部区域的特征是农业中的工資最高。根据整整10年(1881—1891年)十分稳定的統計数字来看,塔夫利达、貝薩拉比亚和頓河三省的工資在俄国是最高的。这里年工的工資包括膳宿在內是143卢布50戈比,季工(夏季)的工資是55卢布67戈比。工資其次高的是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即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里省。这里农业年工的工資是135卢布80戈比,季工是53卢布。工資最低的是中部各农业省(喀山省、平兹省、唐波夫省、梁贊省、土拉省、奥勒尔省和庫尔斯克省),即保存着工役制、盘剝制和农奴制各种残余的主要地区。这里农业年工的工資只有92卢布95戈比,比資本主义最发达的省份少$^1/_3$,季工的工資是35卢布64戈比,比南部的季工(夏季)少20卢布。正是在这个中部区域,我們看到了大批工人外流。每年春季有150多万人离开这里,一部分去干农活(主要到南部,也有一部分到工业省份,这一点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到),一部分到首都或工业省份去做非农业的工作。在这些人口移出最多的区域同人口移入最多的两个区域(南部农业区和包括两个工业省份的京城区域)之間有一些中等工資的省份。这些省份一方面从工資最"低廉"和挨餓最厉害的中部吸收一部分工人,另一方面又向工資較高的区域放出一部分工人。謝·柯罗連柯先生在論"自由雇佣劳动"一書中曾經根据大量材料詳細地描述了工人飘泊和人口流动的过程。資本主义就这样使人口的分布更加平衡(当然是根据資本的需要),使全国的工資平均化,建立起真正統一的全国性的劳动市場,用高額工資来"誘惑"受盘剝的农夫,从而逐渐地破坏旧生产方式的基础。由此引起了地主老爷們无穷的抱怨,抱怨当地工人腐化堕落,抱怨外出做工养成了放蕩和酗酒

的习气，抱怨城市"腐蚀了"工人，如此等等。

19世紀末，在外来工人最多的区域，农业中建立起了規模相当大的資本主义企业。資本主义协作是在使用象脫谷机这样的机器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帖賈科夫先生在描写赫尔松省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著作[50]中指出，一部馬拉脫谷机需要14—28个以上的工人，而一部蒸汽脫谷机則需要50—70个工人。有些农場有500—1 000个工人，这在农业中是非常大的数字。資本主义創造了以妇女劳动和兒童劳动代替工資較高的男子劳动的条件。例如，在卡霍夫卡鎮(它是塔夫利达省主要的劳动市場之一)，以前集中过4万工人，而在上一世紀90年代有2—3万工人；在1890年登記过的工人中妇女占12.7%，到1895年已經达到了25.6%。1893年童工占0.7%，到1895年已經占1.69%。

資本主义大农場把工人从俄国的各个角落集中起来，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分类，造成一种同工厂工人等級制类似的工人等級制。譬如把工人分为整工、半工——其中又分出"力气大的半工"(16—20岁)和"力气小的半工"(8—14岁的兒童)。地主同"自己的"农民之間过去那种所謂"宗法"关系，在这里連一点痕迹都沒有了。劳动力象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商品。"眞正俄罗斯"型的盘剝正在消失，代替它的是按周計算的貨币工資制，是瘋狂的竞爭，是工人的罢工和业主的抵制。由于大批工人集中在雇佣市場，由于极端恶劣的不卫生的劳动条件，人們試图对大农場实行社会监督。这种尝試是农业中的"大工业"所特有的，但是，在沒有政治自由和公开的工人組織的情况下，这种尝試是絲毫不能持久的。外来工人的劳动条件坏到什么程度，这从劳动日长达12个半小时至15个小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在机器旁操作的工人受伤已

經是普通現象了。患职业病的工人（操作脱谷机的工人）增加了，如此等等。在19世紀末的俄国，不仅可以看到最发达的、美国式的純粹資本主义剝削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看到純粹中世紀的、在先进国家中早已消失了的工役制和徭役制的經营方式。俄国紛繁复杂的土地关系使农奴制的剝削方式和資产阶級的剝削方式交錯在一起了。

在叙述俄国农业雇佣劳动条件的最后，我們还要看一看下等戶的收支材料。这些材料中的“外水”或“副业”是雇佣劳动的婉轉說法。这种外水收入同农业收入之間的比例是怎样的呢？沃龙涅什省无馬农戶和有1匹馬的农戶的收支数字对这个問題作了明确的回答。无馬农戶的总收入是118卢布10戈比，其中农业收入是57卢布11戈比，“副业”收入是59卢布4戈比。在这后一个数字中，36卢布75戈比是“个人副业”的收入，22卢布29戈比是其他收入，其中也包括出租土地的收入；有1匹馬的农戶的总收入是178卢布12戈比，其中农业收入是127卢布69戈比，副业收入是49卢布22戈比（35卢布是个人副业的收入，6卢布是馬車运輸的收入，2卢布是“工商业作坊和企业”的收入，6卢布是其他收入）。如果我們扣除耕作方面的开支，那末农业收入便是69卢布37戈比，副业收入是49卢布22戈比。占俄国农戶总数$^3/_5$的农戶就是这样謀生的。不用說，这些农戶的生活水平是不会比雇工高的，有时还要低些。在1881—1891年这10年中，沃龙涅什省雇工每年的平均工資是57卢布，加上生活費42卢布。可是，无馬农戶（以4口人計算）全家一年的生活費是78卢布，有1匹馬的农戶（以5口人計算）全家一年的生活費是98卢布。工役制、賦稅和資本主义剝削使俄国农民的生活降低到在歐洲难以想象的赤貧的、飢

餓的水平。欧洲人把这种社会分子叫做贫民。

六

为了把上面关于农民分化所說的一切加以总結，我們先引用一下我国文献中唯一談到整个欧俄的总結性材料，它可以使我們对各类农民在各个时期的情况作出判断。这份材料就是軍馬調查材料。我在"資本主义的发展"① 一書的第2版中，曾經綜合了欧俄48省在1888—1891年和1896—1900年这两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现在把其中最重要的总結数字摘引如下：

	农户数目			
	1888—1891年		1896—1900年	
	总数（单位百万）	百分数	总数（单位百万）	百分数
无馬者…………………	2.8	27.3	3.2	29.2
有1匹馬者…………	2.9	28.5	3.4	30.3
有2匹馬者…………	2.2	22.2	2.5	22.0
有3匹馬者…………	1.1	10.6	1.0	9.4
有4匹馬以上者……	1.1	11.4	1.0	9.1
总共	10.1	100.0	11.1	100.0

我在前面已經順便指出，这些材料証明了农民遭到愈来愈厉害的剝夺。增加的100万个农戶全部是两类下等戶。在这期間，馬匹的总数由1 691万匹减少到1 687万匹，就是說全体农民的馬匹减少了一些。甚至上等戶的馬匹也有所减少，在1888—1891年，每戶平均有5.5匹馬，在1896—1900年，每戶平均只有5.4匹了。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17—118頁。——編者注

从这些数字中很容易得出农民并沒有发生“分化”的結論，因为最穷的一类农户增加得最多，最富的一类农户减少得最多（就农户数目来說）。这不是分化，而是貧困的平均化！在文献中經常可以看到用类似方法所得出的这种結論。但是，如果我們問一下：农民內部各类农户之間的相互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呢？那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1888—1891年期間，占农户总数一半的下等户拥有的馬匹占馬匹总数的18.7%，在1896—1900年期間，下等户还是保持着这个百分比。占农户1/5的富裕户拥有的馬匹在第一个时期占馬匹总数的52.6%，在第二个时期則占53.2%。很明显，两类农户的相互关系几乎沒有发生什么变化。农民变穷了，富裕户也变穷了，1891年的危机虽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然而农村資产阶級同日益破产的农民之間的关系并沒有因此而改变，其实，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

那些根据片断的統計材料来判断农民分化問題的人往往忽視了这种情况。譬如，有人認为关于馬匹分配的个別材料可以多少說明农民分化問題，那是可笑的。这种分配情况如果不同有关农民經济的全部材料联系起来，那就不能証明任何問題。如果我們研究了这些材料，弄清楚了各类农户在租地和出租地、改良农具和肥料、外水和購买地、雇佣工人和牲畜头数等等的分配方面的共同点，如果我們証明現象的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相互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真正揭示出无产阶級和农村資产阶級这两个对立的經济类型已經形成，如果我們弄清楚了这一切，而且只有在已經弄清楚的限度內，我們才可以使用象关于馬匹分配的个別材料来說明上面所說的一切。相反地，如果有人給我們举出富裕户在某个时期馬匹减少的某个事例，并且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对农村資产阶級

同其他各类农戶的对比关系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結論，那就荒謬透頂了。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經济部門，在市場的統治下，都沒有也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資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是跳跃式的、曲折的，就是說，它忽而迅速前进，忽而暫时降低到原有水平以下。俄国土地危机問題和当前变革問題的实質根本不在于資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或发展速度怎样，而在于这是不是資本主义的危机和变革，它是不是在农民变为农村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情况下发生的，村社內部各个农戶之間的关系是不是資产阶級的关系。換句話說，研究俄国土地問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那些說明土地关系的阶級实質的基本材料。只有在弄清楚了我們所遇到的是哪些阶級和哪种发展趋势之后，才能談到局部問題，如发展速度問題以及总趋势的某些具体表現問題等。

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改革后的农民經济的基本看法，就是認为这种經济类型是小資产阶級的类型。馬克思主义陣营的經济学家同民粹派經济学家爭論的焦点首先就是这种論断是否正确、是否适当的問題（如果打算弄清楚意見分歧的眞正实質，必然这样爭論）。不彻底弄清楚这个問題，就不能够进一步了解任何比較具体的或实际的問題。譬如說，如果不先弄清楚我国农业演进的一般方向，不先弄清楚在这一或那一事变进程中哪些阶級会得胜等等問題，要研究 19 世紀留給 20 世紀的解决土地問題的各种途径，那是毫无希望的，是研究不清楚的。

我們在上面引証的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詳細材料所說明的正是土地变革方面其他一切問題的基础，不了解这个基础就不能前进。我們从俄国各类农戶的两极詳細地研究了农戶之間的相互关系，所有这些关系正好向我們表明了村社內部的社会經济关系的

实質。这些相互关系清楚地表明了农民經济在当前历史情况下具有小資产阶級的性質。馬克思主义者曾經說过，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不管他是在份地上經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土地上經营，都是一样）在商品經济发展的条件下，必然是小資产者。这个論点曾經使很多人困惑莫解，他們說，这种說法毫无根据，是从別人那里照样搬来硬套在我国独特的条件上。但是关于各类农戶相互关系的材料、关于富裕村社农民搶租貧穷村社农民的土地的材料、关于富裕村社农民雇佣雇工的材料、关于貧穷村社农民变为雇佣工人的材料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的材料，都証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結論是正确的，是駁不倒的。关于村社在俄国經济发展趋势方面的意义問題，这些材料已經彻底解决了，因为这些材料所表明的恰好是眞正的（而不是虛构的）村社的眞正趋势。不管份地的分配怎样平均，不管进行什么样的重新分配，事实表明，村社农民眞正的經济发展趋势就是形成农村資产阶級以及大批貧苦的业主被挤入无产阶級的行列。下面我們将会看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也好，劳动派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也好，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虽然从社会发展的速度、生产力的增长和最大限度地照顧群众利益等角度来看，这两种"解决"土地問題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我們还应該考察一下俄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問題。前面的叙述已經包含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前提，即改革后整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商业和交换的发展。我們覚得，完全沒有必要再引用統計材料来証实这一点了。但是必須說明两点：第一、目前的农民經济在多大程度上已經依附市場；第二、随着农业的依附市場，农业将具有哪些特殊形式。

关于第一个問題，沃龙涅什省地方自治局的收支統計有极其

精确的材料。这里我們可以从农民家庭的收支总額（这在前面已經引用过了）中抽出貨币收支額来看一看。下表說明了市場的作用：

	农民的貨币收支額占收支总額的百分比	
	支 出	收 入
无 馬 者……………………	57.1	54.6
有1匹馬者…………………	46.5	41.4
有2匹馬者…………………	43.6	45.7
有3匹馬者…………………	41.5	42.3
有4匹馬者…………………	46.9	40.8
有5匹馬以上者……………	60.2	59.2
平 均	49.1	47.9

这样看来，連中等农民的經济都在极大程度上依附市場，更不用說富裕农民和貧苦农民（半无产者）了。因此，任何有关农民經济的議論，如果忽視了市場、交換和商品的生产日益增长的、占优势的作用，那都是根本錯誤的。19世紀末俄国农民一心想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个措施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強市場的权力，因为阻碍商业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是工役制和盘剝制。

关于第二个問題必須指出，資本滲入农业是一个独特的过程，要正确地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够只看全国性的一般的材料。农业在不同經济和国家的不同地区，幷不是一下子同样地变成商业性农业的。相反，市場通常在一个地区使复杂的农业的一个方面依附自己，在另一个地区又使它的另一方面依附自己，但其他方面幷沒有消失，而是适应于“主要的”即貨币的方面。譬如在某一个地区主要形成了商业性谷物业，为出卖而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谷物。在这种經济中，畜牧业起着从屬作用，再进一步，如果耕作业片面

发展到极点时，畜牧业几乎会消灭。例如，美国西部的“小麦工厂”有时一个夏季在几乎沒有牲畜的情况下就建立起来了。在其他地区主要形成商业性畜牧业，为出卖而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肉品或乳制品。純农业則适应于畜牧业。显然，經营的規模和經营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相同的。不能根据耕地的多少来判断城市近郊的牛奶业。不能用衡量大农戶和小农戶的同一尺度去衡量草原耕作者、菜园主、植烟主、“牛奶場主”(如果用英国說法)等等。

交换和商业滲入农业，引起了农业的专业化，而且这种专业化在日益发展。同样一些經营指标(如馬匹数目)在商业性农业的不同区域里具有不同的意义。譬如在首都近郊的无馬农民中就有一些大业主，他們有奶牛，做大笔生意，使用雇佣工人。当然，在全部无馬农民和有1匹馬的农民中，这样的农民是极少数。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使用包括全国的总的材料，那我們就无法估計特殊形式的农业資本主义。

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特别注意。忽視这一点就不能对农业資本主义的发展得出正确的認識，而容易犯簡单化的錯誤。只有估計到农业的实际特点，才能把握住这个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有人說，农业由于有它的特点，因此不受資本主义发展規律的支配。这是完全錯誤的。农业的特点阻碍农业依附市場，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国家，商业性农业增长的过程都在不可遏止地进行着。不过形成商业性农业的形式确实是特殊的，因此就要用特别的方法去研究。

为了說明上面所說的，我們从俄国商业性农业的不同区域里举出几个明显的例子。在商业性谷物业区域(新俄罗斯和伏尔加河东岸)，我們看到，谷物收获量的增长异常迅速；在1864—1866

年，这些省份还落在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后面，每口人平均的純收获量只有2.1俄石；到1883—1887年，这些省份超过了中部，每口人平均的純收获量达到了3.4俄石。耕地面积扩大是这个区域在改革后时期的最大特点。在这里，土地的耕作往往是最原始的，人們只注意尽量多种土地。在19世紀后半期，这里出現了美国那样的“小麦工厂”。根据耕地面积（上等戶每戶的耕地平均达271俄亩），完全可以判断出經营的規模和类型。在另一个区域，即在工业区域，特别是在首都近郊，就談不上扩大耕地的問題。这里的特点不是商业性谷物业，而是商业性畜牧业。因此根据耕地的亩数或耕馬的匹数，已不可能正确了解这里的經济。这里更适当的尺度是奶牛的头数（牛奶业）。这里大經济的进步的标志不是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是輪作制的改变和牧草的种植。这里馬匹很多的农戶比較少；甚至馬匹的减少反而意味着經营的进步。但是这里农民的奶牛却比俄国其他地区多。布拉戈維申斯基先生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統計总結，算出每戶平均有1.2头奶牛；在彼得堡、莫斯科、特維尔和斯摩棱斯克4省18个县中，每戶平均有1.6头，拿彼得堡省一个省来說，每戶平均有1.8头[51]。无論是商业資本或投入生产的資本，在这里都主要用于畜产品。收入的多少主要决定于奶牛的多少。于是“牛奶場”不断出現。富裕农民雇佣农业工人愈来愈多。我們已經指出，人們从貧困的中部紛紛跑到工业省份去干农活。总之，由于农作技术条件跟純粹农业不同，同样一些社会經济关系，在这里表現为完全不同的形式。

如果拿特种作物（如烟草业）来看，或者拿农业同农产品加工业（如釀酒业、甜菜制糖业、榨油业、馬鈴薯淀粉制造业及其他生产）的結合来看，那这种企业关系的表现形式旣不同于經营商业性

谷物业的那种形式，也不同于經营商业性畜牧业的那种形式。这里可以作为衡量尺度的或者是特种作物的耕地面积，或者是与这种經济有关的产品加工企业的規模。

仅仅涉及土地面积或牲畜头数的总的农业統計远沒有估計到所有这些紛繁的形式，因此只是研究这种統計所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不正确的。同根据一般的总数和抽象的平均数所能想象到的相比，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要迅速得多，交换影响的扩大要广泛得多，資本对农业的改造要深刻得多。

七

現在我們把上面关于 19 世紀末俄国土地問題和土地危机的实質所說的一切作个总結。

这个危机的实質是什么呢？姆·沙宁在“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 年維尔納版）这本小册子中确認，我国的农业危机就是耕作技术的危机，这一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必須提高俄国极低的农业技术，必須过渡到更高的耕作制度，等等。

这种意見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太抽象。必須过渡到更高的技术，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第一、这种过渡从 1861 年以来在俄国事实上已經开始了。不管进步多么緩慢，但是无可爭辯的事实是，无論是地主經济，还是以少数富裕农民为代表的农民經济，都已經开始种植牧草，使用改良农具，更經常、更細致地施肥，等等。既然农业技术的这种緩慢进步是 1861 年以来的一个普遍过程，那还指出这一点来說明公認的 19 世紀末农业危机的尖銳化，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現实生活中已經出現了两种“解决”土地問題的方式，一种是斯托雷平的从上面解决的方式，其办法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

制，彻底消灭村社，讓富农来掠夺村社，另一种是农民的（劳动派的）从下面解决的方式，其办法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两种解决办法都按不同方式加速向更高的技术的过渡，都朝着耕作技术进步前进。只是前一种解决办法是通过加速从农业中排挤出貧农的过程来实現这种进步，后一种解决办法則是通过加速排除工役制（用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办法）的过程来实現这种进步。貧农"經营"自己的土地极其糟糕，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所以，如果讓一小撮富裕农民大肆掠夺貧农的土地，那耕作技术会得到提高，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无可怀疑的事实是，靠工役制和盘剝制来經营的地主土地，也耕种得极其糟糕，比份地还糟（請回想一下前面引用过的数字：份地每俄亩的产量是54普特，自营地是66普特，实行对分制耕种的土地是60普特，农民按年租种的土地是45普特）。地主經济的工役制度保存了极其落后的耕作方法，使耕作技术方面和整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未开化状态永远保存下去。所以，如果連根鏟除了全部工役制，即彻底消灭（而且不付贖金）了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那耕作技术会得到提高，这是无可怀疑的。

这样看来，土地問題和土地危机的实質不在于要鏟除提高耕作技术的障碍，而在于如何来鏟除这种障碍，由哪个阶級用哪些方法来鏟除。阻碍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絕对必須鏟除，不仅从主观上講是必須的，而且从客观上講也是必須的，就是說，鏟除障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力量都是无法防止的。

姆·沙宁的錯誤——也是很多土地問題的著作家所犯的錯誤——在于他把必須提高农业技术这一正确論点說得过于抽象，沒有考慮到俄国农业中农奴制特点同資本主义特点互相交織的各

种特殊形式。俄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基本障碍就是农奴制的残余，这首先是工役制和盘剝制，其次是农奴制的賦稅、农民的权利不平等、农民在上层等級面前所处的屈辱地位，等等。鏟除这些农奴制残余在經济上早已十分必要了。19世紀末农业危机所以极其尖銳，正是因为俄国擺脫中世紀制度的过程拖得太长，工役制和盘剝制"活得"太久。这些残余在1861年以后消亡得那样緩慢，以致新的机体竟須要用强制手段来迅速地肃清农奴制。

俄国农业的这种新的經济机体是什么呢？这在前面我們已經特別詳細地說明过了，因为自由主义民粹派营垒的經济学家們对这一点的認識特別錯誤。在我国从农奴制的躯壳中爬出来的新的經济机体就是商业性农业和資本主义。地主經营的經济，既然不是依靠工役制、依靠盘剝份地农民，那就非常清楚地表現出資本主义的特征。只要我們能够深入村社內部去看一下，在現实生活中发生了哪些同官方規定的份地平均使用制不符合的事情，那我們就会看到，农民經营的經济也处处表現出純資本主义的特征。在俄国尽管存在着种种障碍，但是商业性农业还是不断地发展，而且不可避免地轉化为資本主义农业，虽然这种轉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各个地区是各不相同的。

为了新的經济机体进一步自由发展，必須用强制手段消灭中世紀的躯壳，但是应当消灭什么呢？应当消灭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到目前为止，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紀的，連相当一部分农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紀的。我們看到，新的經济条件正在冲破这些中世紀土地占有制的框子和壁障，迫使貧困农民出租自己历来耕种的份地，使富裕农民用各种地块（份地、購买地以及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組織起規模較大的經济。地主的土地

分为用工役制耕种的土地、农民按年租种的土地和自营地，这一情况就說明，新的經营制度正在旧的中世紀土地占有制的框子以外建立起来。

坚决抛开过去的东西，就能够一下子消灭这种土地占有制。这种办法就是全体农民代表在1905—1907年間比較坚持的土地国有化。消灭土地私有制絲毫也不改变商业性的和資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的資产阶級基础。認为土地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或者甚至同土地的平均使用制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再錯誤也沒有了。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經济。而国有化只是把土地变为国家所有，这絲毫也不触动土地的私人經营。不管富裕农民是否把土地“永远地”买下，是否租种地主的土地或官地，是否“集中”沒落的貧穷农民的份地，富裕农民的資本主义經营制度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正如同这种情形一样，不管土地是否成为全国、全民的“財产”，土地的經营制度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談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而农产品和生产資料的交换同土地占有形式是毫无关系的。順便指出，我在这里講的只是国有化的經济意义，并不是替国有化綱領辯护；我在前述那篇著作①中已經辯护过了。

至于平均制，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它在份地分配方面的实际实行情况。我們看到，村社內部份地的分配是相当平均的，只是富人方面稍微占了一点便宜。但是貧农出租土地，富人集中租地，結果这种平均制便所剩无几了。只要存在着业主之間的財产上的差异，存在着加剧这种差异的交换制度，那任何土地占有平均制显然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70—302頁。——編者注

都无法消除实际使用土地方面的不平均現象。

国有化的經济意义根本不象人們通常探討的那样。它的意义不在于反对資产阶級关系（馬克思早就指出，国有化是資产阶級最彻底的措施[52]），而在于反对农奴制关系。形形色色的中世紀土地占有制阻碍了經济的发展；等級的框子妨碍了商业的周轉；旧土地占有制同新經济之間的不适应現象产生了尖銳的矛盾；地主靠大地产来拖延工役制的寿命；农民被束縛在象特許犹太居住区那样的份地上，然而現实生活处处都在破坏份地占有制的范围。国有化可以彻底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一切中世紀关系，可以消灭在土地上的一切人为的壁障，使土地变成眞正自由的土地。这是为了誰呢？为了全体公民嗎？根本不是。我們已經看到，无馬农民（共 325 万农戶）的自由在于出租份地。土地成为自由的，是对业主来說的，是对那些眞正希望而且能够按照一般的現代經济条件特别是現代世界市場的条件去耕种土地的人們来說的。国有化可以加速农奴制的死亡，可以使清除了一切中世紀废墟的土地上的純粹資产阶級农場加速发展。这就是 19 世紀末提出的俄国土地国有化的眞正历史意义。

为資本主义清除土地占有制，还有一条在客观上不是不可能的道路，正如我們看到的，这就是讓富农加速掠夺村社和巩固富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工役制和盘剝制的老根并未触动，地主的大地产依然存在。很明显，对于保証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来說，这样一种为資本主义扫清道路的办法比前一种办法差得不可比拟。旣然大地产保留下来，那受盘剝的农民、对分制、小规模按年租佃制、用农民的农具耕种“老爷”的土地等現象就必然保留下来，就是說最落后的文化和叫做宗法式农村生活的一切亚洲

式的愚昧落后状态必然保留下来。

我所指出的"解决"日益发展的資产阶級俄国的土地問題的两种办法，是同农业資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相适应的。我把这两条道路叫做普魯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前一条道路的特点是，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資本主义，因此資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普魯士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沒有为資产阶級革命所粉碎，而是得到保全，并成为"容克"經济的基础。这种經济基本上是資本主义經济，但是它必然有 Gesindeordnung①这样一些农村居民对它的某种依附关系。因此容克的社会統治和政治統治在1848年以后又維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德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比美国慢得无法相比。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資本主义农业的基础不是大地主的旧的奴隶占有制經济（国内战争已把奴隶主的大农場彻底粉碎），而是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經济。所謂自由土地，就是它一方面摆脫了中世紀的一切羈絆，摆脫了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摆脫了土地私有制的羈絆。在美国，大量的后备土地按名义价格分給了农民，現在，那里的土地私有制只是在新的、完全資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

在1861年以后，这两条資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俄国都表現得十分清楚。地主經济的进步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只要农奴制残余保留下来，这种进步的緩慢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譬如在南部就有这一切有利条件），他們的土地整个說来愈有保障，农民的分化就

① 奴仆規約。——編者注

愈厉害，农村农場企业主阶級的形成就愈迅速。国家今后发展的全部問題就是：这两条发展道路中究竟哪一条道路取得最后的胜利？与此相应的是，究竟由哪一个阶級来进行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改革？是从前的地主老爷还是自由的农民农場主？

在我国常常有人認为，土地国有化把土地排斥在商业周轉之外。大多数先进农民和农民的思想家无疑都有这种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根本錯誤的。情况恰恰相反。土地私有制却是对土地自由投資的障碍。因此，在可以向国家自由租种土地(在資产阶級社会中，土地国有化的实質就在于此)的情况下，土地被卷入商业周轉的情形要比在土地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情况下更加普遍。在自由租佃的情况下，在土地上投資的自由，农业竞爭的自由，都比在私有制的情况下多得多。土地国有化可以說是一种沒有大地主的大地主統治。而农业資本主义发展方面的大地主統治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講得非常透彻。我在前面提到的那部論述土地綱領的著作中曾經引用了他的这段話①，但是鉴于問題的重要，这里我还要引用一次。

馬克思在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論的历史条件一节（«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I. Band, 2. Teil, Stuttgart, 1905, S. 5—7②）中說道，李嘉图和安德森"都是根据在大陆上的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他們認为"妨碍在土地上自由投資的土地所有制根本不存在"。驟然看来，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人們都認为正是英国特别完整地保存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馬克思解释道，正是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50—254頁。——編者注

② "剩余价值学說史"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第5—7頁[53]。——編者注

在英国，資本“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无情地对待传統的农业制度”。就这方面来說，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关系，只要同农业中資本主义生产的条件相矛盾，或者同这些条件不相符合，那就会被无情地一扫而光：不仅改变村落的位置，而且消灭村落本身；不仅消灭农业人口的住宅和居住地，而且消灭农业人口本身；不仅消灭历来的經济中心，而且消灭这种經济本身。”馬克思繼續說道：“在德国人那里，經济制度是由村社土地(Feldmarken)的传統关系，由經济中心的位置，由某些人口聚居的地点来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历史上的农业制度是从15世紀起逐漸由資本造成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洗土地”）这个英国术語，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听不到的。«clearing of estates»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完全不顧定居的居民，把他們赶走；完全不顧原有的乡村，把这些乡村化为平地；完全不顧农业建筑物，把它們全部拆毁；完全不顧原有的农业种类，一下子把它們改变过来，比如，把耕地变成了牧場，总之，根本不采用那些传統的生产条件，而是在历史上按一定形式創造了这种条件，使之在每一場合都符合最有利地运用資本的要求。因此就这一点来說，土地私有制的确不存在，因为这种私有制使資本家（农場主）可以自由經营，只求获得貨币收入。波美侖地主”（馬克思指的是洛貝尔图斯，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把他的地租論駁得体无完肤）“在头脑里只有祖传下来的村社土地、經济中心、农业管理局等等，因此，听到李嘉图对于农业制度发展的‘非历史的’見解，可能惊訝万状”。事实上，“英国的条件是现代土地所有制，即被資本主义生产改变了的土地所有制得到最完美发展的唯一条件。在这点上，英国的理論（即李嘉图的地租理論）对于近代的即資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来說，是一种經典的理論”。

在英国，这种清洗土地是通过以暴力破坏农民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方式来进行的。这种对过时的旧东西的破坏，在俄国也絕对不可避免，但是19世紀(以及20世紀的前7年)还沒有解决哪一个阶級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我們所需要的破坏这个問題。前面我們已經說明了現今俄国土地分配的基础是什么。我們看到，1050万农戶只有7500万俄亩土地，而3万个大地产占有者就有7000万俄亩土地。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要爆发斗爭，斗爭可能有的結局之一是1000万农戶的地产約要增加1倍，3万个上等戶的地产則要消灭。我們从19世紀末俄国土地問題怎样形成这个角度出发，純粹从理論上考察了这个可能有的結局。这一变革的結果将会是怎样呢？从土地占有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很明显的：中世紀的份地占有制和中世紀的地主占有制将被更替。旧东西将一扫而光。在土地占有关系中，任何传統的东西将会一点不留。究竟什么力量决定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呢？是平均制的“原則”吧？受了民粹派思想影响的先进农民喜欢这样想。民粹派也这样想。然而这是幻想。在村社中，法律所承認的并被习惯奉为神圣的平均制“原則”，实际上使地产适应于財产上的差別。无論是俄国的材料，或者是西欧的材料，都千百次地証实了这个經济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我們肯定地說，对平均制的希望将象幻想那样成为泡影，而土地占有制的更替将成为唯一可能的結果。这种結果的意义是否重大呢？非常重大，因为任何別的办法，任何別的改革，任何別的改造都不能提供这样充分的保証，使俄国的农业技术获得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的进步，使农奴制、等級制和愚昧落后状态的一切痕迹从我国生活中消除淨尽。

或許有人要反駁我們說：技术进步呢？难道精确的材料在前面沒有証明地主經济在种植牧草、使用机器、使用肥料以及牲畜質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农民經济嗎？不，是証明了的，这个事实絲毫不容怀疑。但是，不应当忘記，經济結构、技术水平及其他方面的所有这些差别都集中表现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我們已經看到，由农民按对分制或其他方式耕种的地主土地产量低于份地。这就是人們在談論俄国地主經济和农民經济的耕作技术水平时几乎总是忘記的情况！地主經济只有按資本主义方式經营才超过农民經济。問題的全部实質也就在于，这个“只有”在19世紀末使工役制依然是我国內地占优势的經营制度。因为直到现在受盘剝的农民还在用自己祖传的农具和耕作方法来耕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是落后和停滞的主要原因。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土地占有制的变革会提高对分制土地和租地的产量（現在这些土地的产量——見前面提到的数字——是50普特和45普特，而份地的产量是54普特，地主耕地是66普特）。即使这些土地的产量只提高到份地产量的水平，那这个进步也是很大的。但是不用說，只要农民摆脫了农奴制大地产的压迫，只要份地象国家的其他一切土地那样成为——不是一切公民，而是拥有农业資本的公民——农場主同样可以得到的自由的土地，那份地的产量也会提高。

这个結論決不是从我們所引用的关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中得出来的。相反，引用这种材料只是为了清楚地說明我們根据俄国地主經济和农民經济演进的全部材料得出的結論。要推翻这个結論，就得先推翻这样一个事实，即19世紀后半期俄国农业的历史是以資产阶級生产关系代替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历史。

如果死抱着目前农戶数目的材料，那就会得出一种印象，似乎

我們現在所考察的土地变革会造成农业异常分散的后果。我的天哪，在28 000万俄亩土地上竟有1 800万农戶！难道这不是駭人听聞的分散現象嗎？我們对此回答道：要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才是极其严重的分散現象，因为現在1 800万农戶所經营的土地还不到28 000万俄亩！因此我們所关心的变革决不会使这方面的情况更糟。此外我們还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有沒有根据可以認为，实行了这种变革，农戶总数还会和过去一样呢？受了民粹派理論和农民意見影响的人通常正是这样認为的，殊不知农民梦寐以求的就是土地，他們甚至还梦想使产业工人变成小农。在19世紀末，某些俄国产业工人本身无疑也持着农民的这种观点。但是問題在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是否符合于客观經济条件和經济发展进程呢？只要明确地提出这个問題就可以看出，农民的观点是根据已經消逝的永不复返的过去得出的，而不是根据日益发展的未来得出的。农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昨天的意識形态，經济的发展实际上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农业人口。

我們所考察的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变革并不会消灭也不可能消灭农业人口比重減少的过程，凡是資本主义日益发展的国家都有这个过程。也許有人会問：这种变革既然使人人都能自由地得到土地，那怎么会使农业人口減少呢？对这个質問，我可以用波尔塔瓦省的农民代表契热夫斯基先生在杜馬的一次发言来回答。他在1906年5月24日的会議上說：“我們那里的农民，即把我們派到这里来的那些复选人，曾經算过这样一笔賬：‘如果我們再稍微富裕一点，如果我們每家每年能够花五、六个卢布去买糖吃，那每一个能够出产甜菜的县份，除了現有的制糖厂，还会再建立几个制糖厂。’很自然，如果这些制糖厂建立起来了，在集約化經营的情况

下該需要大批劳动力！制糖厂的生产一定会提高，等等。”（“速記記录”第622頁）

这是一位地方活动家的很能說明問題的老实話。如果要問一下他对土地政策的一般意义的見解，那他一定会講出民粹派的观点来。既然这不是“見解”問題，而是改革的具体后果問題，那末資本主义的眞相就立即战胜了民粹派的空想。因为农民們对自己的代表契热夫斯基先生所講的那些話，正是資本主义的眞相，資本主义現实的眞相。小农群众的生活如果能切实地得到一点改善，制糖厂的数量和产量的确会大大增加；不用說，不只是甜菜制糖业，加工工业的其他一切部門，如紡織业、制鉄业、机器制造业、一般建筑业等等，都会得到很大的推动，都会需要“大批劳动力”。这种經济上的必然性要比对平均制的一切美妙的期望和幻想更加强有力。无論怎样进行土地改革，无論怎样改变土地占有制，也无論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分配”，825万无馬农戶决不会成为“业主”。我們已經看到，这几百万农戶（以及相当一部分有1匹馬的农戶）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疲于奔命或出租自己的份地。美国式的工业发展必然会使这些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沒有出路的业主大多数离开农业，无論什么样的“土地权”也阻挡不住。1 300万小业主使用极其可怜的、簡陋的、陈旧的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和地主的土地，——这就是今天的現实。这是农业中人为的人口过剩，所謂人为的，就是那些过时的农奴制关系是靠暴力来維持的，如果不使用体刑、枪杀和討伐等手段，那这些关系連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群众生活稍微眞正改善一下，农奴制残余稍微遭到眞正的打击，都必然会破坏这种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都会大大加速居民离开农业轉入工业的过程（这个过程現在也在緩慢地进行），都会大大減少

1300 万戶这个数字，都会使我国象美国那样前进，而不是象現在这样，象中国那样爬行。

19 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向社会各阶級提出了一个任务：結束农奴制的旧时代，清洗土地占有制，为資本主义、为生产力的发展、为自由的公开的阶級斗爭扫清道路。这种阶級斗爭将决定怎样来解决这个任务。

1908 年新历 7 月 1 日

1918 年第一次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

論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

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右面，即在資产阶級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陣营內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占多数的党派在反革命猖獗时期的必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不談談“在左面”，即在小資产阶級“社会革命党人”陣营內的瓦解，那我們对瓦解情况的叙述就不全面了。

当然，“在左面”这种說法在这里只能从非常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用来說明那些要冒充左倾的人。我們在“无产者报”上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俄国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中特别明显地表現出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不坚定、不稳固和无原則性。这一点，只要把某些重大的事件回忆一下就可以明白了。1905年秋季革命高潮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同傾向于成立合法的“人民社会党”的人民社会主义者結成秘密同盟。1905年12月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成立同社会革命党一模一样的政党的“計划”，但在1906年春季和夏季革命高潮时，我們又在一些日报上，即在全民性宣传的主要講台上，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結成同盟。人民社会党人在1906年秋天公开放弃革命，在斯維阿波尔格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失敗以后，公开采取机会主义者的行动，然而在彼得堡举行的第二届杜馬选举(1907年春)又恢复了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的

“民粹主义同盟”。总而言之，革命完全地、彻底地暴露出社会革命党沒有任何比較肯定的阶級支柱，使它实际上成了小資产阶級农民民主派的附屬品、附屬物，迫使它經常在口头上的革命激情和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的外交手腕之間搖摆不定。最高綱領派在革命时期一直想同社会革命党分离，而又不能彻底分离，最高綱領派的分离只能証明民粹派的革命性沒有稳固的阶級基础。还在“无产者报”第4号“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維克”一文中，我們就曾写过，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純粹的”社会革命党人，現在只得搬用馬克思主义者的論据来抵抗社会革命党中的两个“新”流派①。社会民主党人經过革命以后，終于团結了一个特定的阶級，即无产阶級，并分清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两个流派，即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而社会革命党人經过革命以后，却沒有任何直接的基础，沒有任何明确的界限能把他們同那些与广大的小业主有联系的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以及最高綱領派这个知識分子的恐怖集团区分开来。

而現在，在最高綱領主义消失（也許是暂时的）以后，我們又看到和最高綱領主义相似的流派在新的外衣下复活了。“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机关报，“革命思想报”[54]（1908年4月第1号，6月第2号）表示不同意“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即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报”[55]，并宣布“修改我們的（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論世界观、我們社会革命党的斗爭方法和組織方法”。当然，新报紙答应要做的所有这些“修改”，所有这种“創造性的批判工作”都純粹是空話。实际上根本談不到而且也不可能談到什么修改理論，因为新报紙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卷第180頁。——編者注

根本沒有任何理論世界观，它有的只是用千百种調子重复采取恐怖手段的号召，只是愚蠢地、笨拙地、幼稚地去适应这种好象是新的，其实是陈旧的、非常陈旧的对革命、对群众运动、对一切政党的意义等等的看法罢了。只要同这些浮夸的修改、批判和創造的諾言比較一下，这种“理論”行囊就显得异常貧乏。尤其是“革命思想报”本身强調“社会革命党正式机关报領导人的看法已經有进步”——这种进步就是极力强調使用“系統的、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以“加速事变的到来”——社会革命党內的“新”“旧”两派的理論观点的十分混乱就更加明显了。这些話是从“劳动旗帜报”第8号上引来的。而且在第10—11号（1908年2—3月）上，我們看到了完全相同的論調，什么“全党竭力”采取“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什么必须为此筹措“巨款”，同时还馬上“微妙地暗示”这笔款项的可能来源：“劳动旗帜报”第7—8版上写道，“一切政党，直到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都将享受这个活动的直接成果。所以党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的斗爭中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援助”。

讀者看見，新报紙的言論中沒有任何新的东西。新报紙唯一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它提供了很有教益的材料来估計被“左的”、似乎是革命的詞句所掩盖起来的瓦解。孟什維克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号）上以政治目标的某种一致性为理由，替自己向自由派募款的行为辯护。社会革命党人在“劳动旗帜报”上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說：你們也要享受成果。两个极端趋于一致了。小資产阶級的机会主义和小資产阶級的革命性总是同样地来“看”——虽然是从不同的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的。

上述两个极端不仅在这方面趋于一致。孟什維克和“革命的”

民粹派在革命后都悲观失望了。两者都准备把党性，党的旧传統，革命的群众斗爭扔掉。“革命糊塗报”写道，“几乎所有革命政党都犯的、当前危机中极其有害的一个錯誤，就是过于相信群众性的人民起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沒有实現。”原来社会革命党人白白地“按照馬克思主义的死板公式”制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綱領”，制定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概念，把革命同經济要求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起义混为一談，虽然他們曾經根据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这一点作了修改”。不应該修改，而应該发展“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的积极行动的理論和实踐”（第1号第6—7版）。“新的”社会革命党的蒙昧主义者認为，必須极力称頌“革命者心中充满的直接感情和鼓舞着他們的理想”的意义（第2号第1版），而理論問題、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空話。“革命糊塗报”問道：“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原文就是“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有沒有武装起义的希望呢？”，它接着回答道：“大家都認为沒有这样的希望”（第2号第2版）。結論就是：俄国的“政治变革只能由少数革命者来进行”（第7版）。“近三年来革命政党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們看来，原因不仅在于客观条件，不仅在于策略錯誤，而且也在于这些政党組織的观念本身”（第10版），原来革命者給自己提出了眞正領导群众这种“不能实現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煽动社会革命党人，慫恿他們去設法組織农民，并且訓練农民进行普遍武装起义而損害了眞正的事业——恐怖斗爭（第11版）。党的极端的中央集权——“发号施令”——“专横精神”（第12版）——这就是禍害。“革命者認为强大的政党是达到既定目的的唯一手段和保証，而沒有看到在我們俄国的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沒有看到这种政党的一切阴暗

面。"(第12版)

看来已經够了！"革命思想报"的思想多么混乱，它宣传的是什么样的蒙昧主义，在事业一遇到困难以后，他們的所謂革命的綱領就建立在多么庸俗可鄙的絕望、灰心、悲观的情緒上，——关于这些用不着多費笔墨。上面的引文本身就說得清清楚楚了。

但願讀者不要以为这一类的論断不过是不知名的不足道的小集团偶然說出的胡言乱語。不对，这样看是錯誤的。这里有它自己的邏輯，就是对党对人民革命悲观失望，对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爭的能力悲观失望的邏輯。这是知識分子的激动、歇斯底里、不能坚持不懈地工作，不善于根据已經改变的情况运用理論和策略的基本原則，不善于在同我們不久前所处的条件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宣传、鼓动和組織工作的邏輯。那些脫离了群众中的阶級支柱的变化无常的人不是竭尽全力来同不仅浸透上层阶級而且浸透下层阶級的小市民的渙散現象作斗爭，不是更紧密地团結分散的党的力量来捍卫經过考驗的革命原則，而是把过去学的东西完全抛弃，并宣布要"修改"，也就是說，回到旧的垃圾堆里去，回到革命的手工业方式，回到分散的小組活动。不管这些小組和个人在恐怖斗爭中多么英勇，都不能改变下面这个事实：他們这些参加了政党的人的这种活动就是瓦解的表現。所以領会下面这个已为革命遭到失敗的各个国家的經驗所証实了的眞理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主义者的灰心和恐怖主义者的絕望都表現了同样的小資产阶級的心理和阶級特点。

"大家都認为，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沒有武装起义的希望。"想一想这句机智而刻板的話吧。显然，人們从来沒有考虑过先引起广泛的政治危机，然后在这个危机尖銳化的时候引起內战

的那些客观条件。人們把武裝起义的“口号”背得烂熟，却不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和应用这个口号的条件。所以革命一遭到失敗，他們就这样輕易地提出沒有經过周密考慮、自以为是的口号。要是这些人把馬克思主义看做20世紀唯一革命的理論，要是他們学一学俄国革命运动史，他們就会看出空話同眞正的革命口号的发展之間的区别。不論是在1901年，游行示威使得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叫嚷“冲击”的时候，还是在1902年和1903年，已故的納杰日丁罵旧“火星报”的計划是“舞文弄墨”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沒有提出起义的“口号”。起义的口号是他們在1905年1月9日以后才提出的，当时已經沒有一个人会怀疑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經爆发，在直接的群众运动当中，危机的尖銳化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几个月內，这个危机就发展成了起义。

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訓呢？教訓就是，我們現在应該密切注視正在醞釀中的新的政治危机，教育群众記取1905年的教訓，使他們知道任何尖銳的危机必然要轉变成起义，并且要巩固組織，这个組織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才提出这种口号。“最近的将来有沒有希望？”这样提問題是毫无意义的。俄国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稍微深思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敢預言的。我們所知道的和所能說的就是，如果不改造土地关系，不徹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俄国就不能生存，而俄国是要生存下去的。斗爭的焦点是，由斯托雷平按地主的办法去完成这种破坏呢，还是由农民在工人的領导下自己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破坏。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使群众認清正在增长的危机的这个經济基础，并且教育郑重的党組織，使它能够帮助人民吸取丰富的革命教訓，使它能够在日益成长的力量成熟到足以发动新的革命“运动”的时候領导他們进行斗爭。

但是，这个回答在那些不把“口号”看做是从阶級分析和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估計中得出的实际結論，而把“口号”看做是党派的永久不变的护身符的人看来，当然会是“不明确的”。这些人不懂得：不会根据完全明确的时机和还不明确的时机的不同来考虑自己的策略，是政治上沒有修养和眼光狹窄的結果。巩固組織！我国这些好唱革命“高調”的英雄們看不起这种不需要“馬上”、立即、明天就去大叫大嚷的細小的任务。說什么“在現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沒有实現”，經过了三年的革命，强大的政党的作用和意义已經得到了世界上前所未見的証实，竟然还說出这种話来！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已表明，甚至在普列韦制度[56]下也可能建立真正能够領导阶級的政党。1905年春天，我們党是地下小組的联合組織，到秋天就成了数百万无产阶級的政党。先生們，这是“一下子”就这样的呢，还是經过10年緩慢的、頑强的、无声无息的工作才准备了和保証了这样的結果的呢？如果在当前这样一个时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提到首要地位的是杀死沙皇，而不是在农民群众中建立一个政党組織，把劳动派这个流派的果子酱一般的革命性鍛炼成一种比較为巩固的、有思想的、坚定的、坚韧的东西，——那末我們要說，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正在消亡；它早已死亡，它的領袖們在第一次人民革命运动期間就模糊地感到自己的“破产”，而不成其为民粹派了。

我們沒有指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領导的或者甚至起独立的作用，第一次运动失敗了，我們并不灰心丧气，第一次运动表明，在农民当中，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虽然十分模糊混乱，但是非常普遍。我們会再一次象革命前那样坚韧頑强地工作，使党的传統不致遭到破坏，使党能巩固下来，能够在第二次运动的时候不是領导二

三百万的无产者，而是領导比这多五倍、十倍的人。你們对这个任务沒有信心？你們覚得这个任务枯燥？最可尊敬的先生們，去你的吧：你們不是革命者，你們不过是空談家！

你們的正式机关报也是这样神經質地提出参加第三届杜馬的問題①。在"劳动旗帜报"第10—11号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政客嘲笑我們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馬中的代表的錯誤，并且对他們的声明大声喊叫道："誰知道这些声明，这些投票和弃权？"（第11版）

关于这一点，我們說，是的，我們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馬中的代表犯了許多錯誤。但正是社会革命党人需要的这个例子，表明工人政党和知識分子集团对問題的不同态度。工人政党懂得，在政治上沉寂和瓦解的时期，这种瓦解現象必然也会在杜馬党团中出現，我們的杜馬党团在第三届杜馬中还不如在第二届杜馬中那样能够集中最大的政党的力量。因此，工人政党批評和糾正自己代表的錯誤；每一个組織討論了每一次发言后得出結論說，某个声明或演說是錯誤的，这就为群众采取政治行动提供了材料。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你們尽可放心：我們党团在政治危机尖銳化的时刻和我們杜馬党团的成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克尽自己的責任。我們是公开地，当着群众批評他們的錯誤。代表、阶級、党都会从

① 对社会革命党的抵制主义的詳細分析，見"无产者报"第18号关于"变相的議会迷"一文。早在1907年秋天，社会革命党人就好象是在号召保持眞正革命的抵制主义传統，而实际上是把这个传統庸俗化了，使这个传統化为烏有，用可怜的軟弱无力的"拒絕参加"来偸換革命的抵制—进攻……他們当时就硬要輕信的公众相信，什么"不理睬"反动的杜馬就会使政府遭到"精神上的重大"失敗，就是"在改变整个政局方面邁出了重大的第一步"。

当时我們就已經揭穿了"那些为了进行幼稚的党的宣传而不惜引起群众思想混乱的先生們的……动听的革命空談"的眞正性質。

这个批評中得到益处，党經历过不少困难时期，它知道，要光荣地摆脫困境，只有靠所有的組織坚持不懈地工作，歇斯底里是无济于事的。“无产者报”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紙，它認識到自己从远方提意見必須小心謹愼，但是它也公开提出了改善党团工作的办法。我們党进行的公开的批評，补充了党团工作的不足，使群众能認識到在杜馬里的声明和党对这些声明提出的修正意見的性質。在党的組織和党的刊物正在大瓦解的时候，不善于重視在杜馬里講話，那就表現出知識分子的无比的輕率。

社会革命党先生們不理解如果他們的公开的社会主义的言論在他們的党机关报刊上受到率直的批判和糾正会有什么意义。社会革命党先生們宁肯閉口不談自己的活动家的錯誤：“劳动旗帜报”第10—11号罵我們发表了一个关于格尔舒尼傾向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声明，这又使我們想起了这一点。我們早就对这个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①，所以在受尽沙皇劊子手折磨的那个忠于革命組織因而应該深受尊敬的人死后不久的今天，我們不一定要重复这个問題。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党人願意提起这个問題，那我們就給予答复。先生們，你們除了謾罵以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回答我們，你們不能直接公开地說出，你們当中誰贊成和誰不贊成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二月（1907年）代表大会上的立場。你們不能从实質上回答問題，不能揭露出你們領袖的錯誤和他們的支持者有多少人等等，因为你們沒有党，不重視通过对个人、对声明、对派别的公开批判来教育群众。

工人阶級会教育和鍛炼自己的組織，公开批評自己的代表。虽

① “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137—145頁。——編者注

然不是立刻，不是沒有摩擦，不是沒有斗爭，不是沒有困难，但我們一定能解决事变的艰难的轉折給我們提出的困难任务：把公开的杜馬活动同党的秘密活动結合起来。解决了这个任务，就將表明經历了第一次革命运动的党已經成熟，——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保証无产阶級在第二次运动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更巧妙地、更团結一致地进行斗爭，取得更为决定性的胜利提供一个保証。

載于1908年7月2日（15日）
"无产者报"第32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社会民主党在
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57]

原作者的摘要

为了滿足波兰同志的請求，我想在这里簡单地把我那本同名的著作叙述一下，那本書是在1907年11月間写的，但是由于某些不取决于我的原因，至今尙未出版①。

在該書第一章中，我研究了“俄国土地变革的經济基础和实質”。我把俄国1905年度最新的地产統計材料加以对比，并用凑整数的办法算出欧俄50省共有土地28 000万俄亩，結果就得出了如下一幅全部土地（份地和私有土地）的分配图表：

	戶　数	土地俄亩数	平均每戶土地俄亩数
	（单位百万）		
（一）受农奴制剝削的破产农民……	10.5	75.0	7.0
（二）中农……	1.0	15.0	15.0
（三）农民資产阶級和資本主义地产	1.5	70.0	46.7
（四）农奴制大地产……	0.03	70.0	2 333.0
共　計	13.03	230.0	17.6
未按类別划分的地产……	—	50.0	—
总　共	13.03	280.0	21.4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00—409頁。——編者注

任何一个对社会統計稍微熟悉一点的人都懂得，这只能是一幅大致眞实的图画。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經济学家們往往沉溺于一些細枝末节，淹沒了事情的实質。但是在我們看来，重要的不是这些細枝末节，而是整个过程的阶級內容。我的这幅图画就揭示了这一內容，表明在俄国革命中斗爭是为了什么。3 万个地主（主要是貴族和皇室管理处）占有 7 000 万俄亩土地。这个基本事实应該同另一个事实作一番对照，即 1 050 万个农民戶和最小的私有者只占有 7 500 万俄亩土地。

后两者可能因前者土地的讓渡而把自己的土地扩大一倍：这是斗爭的客观必然趋势，不管各个阶級对这个斗爭的看法多么不同。

上面这幅图画极其淸楚地表明了土地危机的經济实質。千百万遭到破产、陷于赤貧的小农，在貧困、愚昧和农奴制残余的压迫下，不能不依附地主，过着半农奴式的生活，为了使用地主的牧場、飲馬場和一般的“土地”，为了冬季的貸款等等，他們必須用自己的农具和牲口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大地产占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不靠邻近破产农民的劳动来經营，因为这样經营旣不需要耗費資本，也不需要采用新的耕作制度。这样必然产生俄国經济文献中多次記載的那种工役制。这无非是农奴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剝削的基础不是使工人同土地分离，而是强迫破产农民固守土地，这种剝削的基础不是私有主的資本，而是他的土地，不是大地产占有者的农具，而是农民的旧式木犁，不是耕作文化的进步，而是許多年来的因循守旧，不是“自由雇佣”，而是高利貸的盘剝。

上述情况在耕作文化方面所引起的結果可以用以下数字来表

示：份地每俄亩的产量为54普特；在独立田庄内使用地主的农具、利用雇佣劳动来耕种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为66普特；同样是地主土地，但用所謂“对分制”的方法来耕种，每俄亩的产量则为60普特；最后，农民租佃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为46普特。靠农奴制和高利贷的方式（即上面提到的“对分制”和农民租佃）耕种的地主土地，其产量还不如地力枯竭、地質低劣的份地。农奴制大地产所保持的这种盘剝制是俄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上面这幅图画还說明了另一种問題，即这种发展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可以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大地产被保存下来，并逐步地成为經营土地的資本主义經济的基础，这是普魯士式的农业資本主义。主宰一切的是容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期内，容克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优势，而农民则处于受压制，受屈辱和貧困愚昧的状态。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緩慢，同1861年到1905年这段时期俄国的农业情况相仿。

或者是革命扫除地主的地产。这样，資本主义农业的基础就是由自由的农場主經营自由的土地，即清除了一切中世紀废墟的土地。这是美国式的农业資本主义，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条件中，这种条件对人民群众最有利，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也最迅速。

实际上，在俄国革命中，斗爭并不是为了实現民粹主义者的“社会化”或其他荒謬主张（这些不过是市儈思想和小資产阶級的空談，如此而已），而是要决定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走什么道路：走“普魯士的”道路，还是走“美国的”道路。不弄清革命的这一經济基础，就根本不能了解土地綱領問題（馬斯洛夫就是这样，他只是研究抽象的願望中的东西而不說明經济上的必然的东西）。

限于篇幅，第一章的其他內容就不能叙述了；我只能概括地講一下：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都竭力掩飾土地变革的实質，而普罗柯波維奇先生之流則为他們帮忙。立宪民主党人混淆（“調和”）了俄国革命中土地綱領的两条基本路綫，即地主路綫和农民路綫。其次，也可以簡单地这样說：在1861—1905年这段时期，在俄国已經出現了資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形式：普魯士式（地主經济逐步地向資本主义发展）和美国式（在土地辽闊的、最自由的南部，农民发生分化，生产力迅速发展）。最后，我在这一章中还研究了垦殖問題，但是在这里不能詳談了。我只是提出一点，就是使俄国几亿俄亩土地无法加以利用的主要障碍是俄国內地的农奴制大地产。打倒这些地主将有力地推动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使扩大耕地面积的速度比1861年以后快10倍。請看几个数字：俄国的全部土地为196 500万俄亩，其中81 900万俄亩土地沒有任何材料可查。这样一来，可以研究的土地只剩下114 600万俄亩，这中間已經在利用的有46 900万俄亩，其中有30 000万俄亩是森林地。如果俄国能消灭地主的大地产，那現在沒有任何用处的大量土地不久都会成为有用的土地①。

我那本書的第二章闡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土地綱領在革命中所受到的检驗。过去所有土地綱領的基本錯誤，就是沒有很具体地設想到俄国資本主义的农业演进可能是哪一种形式。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并給党提出了一个地方

①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經济学家認为：由于內地土地不够，由于西伯利亚、中亚細亚等地不宜于垦殖，补分土地是必要的。这就是說，如果土地够用，那地主的大地产暂时还可以容許存在。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应当完全不同：只要地主的大地产不消灭，无論是內地的或垦殖地（俄国边区）的生产力都无法迅速发展。

公有化綱領的孟什維克，也犯了这个錯誤。問題的經济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斯德哥尔摩恰恰沒有得到任何研究，談的主要是"政治"理由和政治手腕，而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分析。下面一点可以部分地說明这种情況，这就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开会期間大家只注意对1905年十二月事件和1906年第一屆杜馬进行評价。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使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綱領得到通过的普列汉諾夫，根本沒有去考慮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农民土地革命"（"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記录"第42頁，普列汉諾夫的发言）的經济內容。或者这是講空話，是用蠱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騙手段（《Bauernfang》）去干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干的"籠絡"农民的行为，或者是在农民胜利的条件下的确存在着資本主义获得最迅速发展的經济可能性，在这种情況下就必須清楚地設想到这种胜利，設想到同"农民土地革命"的这种胜利相适应的农业資本主义道路以及土地占有关系。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最有影响的"地方公有派"所持的主要論据，就是說农民对份地国有化抱有敌視的态度。地方公有派的报告人約翰[58]大声疾呼道："那时就不仅会有一个万第暴动[59]，而会发生农民的总暴动"（多可怕！）"反对国家干涉农民私有份地，反对私有土地'国有化'的做法"（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記录第40頁）。柯斯特罗夫[60]叫嚣說："带着这种主张（国有化）到农民中去，就等于把农民推开。农民运动将会不要我們或反对我們，我們将会被革命所拋弃。国有化会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使它同农民隔絕，因而也就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第88頁）

看来这是很清楚了。农民对国有化抱着敌視的态度，这就是孟什維克的主要論据。如果眞是这样，那末违反农民意志而进

行……“农民土地革命”是可笑的，这还不明显嗎？

然而真的是这样嗎？彼·馬斯洛夫在1905年写道：“目前在俄国不能認为土地国有化是解决土地問題的手段，首先”(請注意“首先”两字)“是因为这是一种无謂的空想”……“但是农民会自願……嗎？”(彼·馬斯洛夫“土地綱領批評”1905年版第20頁)

可是到了*1907*年*3*月又写道：“一切民粹主义集团(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主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教育”杂志[61] 1907年第3期第100頁)这是誰写的呢？是同一位彼·馬斯洛夫写的！

看，这就是新的万第暴动！这就是农民反对国有化的暴动！馬斯洛夫不是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不去从經济上研究一下，为什么农民不得不主张土地国有化，却效法健忘的伊万，情願忘記自己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一切言論。

不仅如此。馬斯洛夫为了消灭“不愉快事件”的痕迹，竟造謠中伤劳动派，硬說他們主张国有化是出于市儈的考虑，“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政权上”(ibid.①)。說这是造謠，下面的对比可以証明。劳动派提交給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馬的土地草案第16条写道：“全民土地的主管权应該賦予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記名的投票选出的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在法定范围內独立进行活动。”

孟什維克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綱領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4)沒收私有土地(小地产除外)，并将土地交給按民主原則选出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包括第3項所規定

① ibidem——同上。——編者注

的市区和乡区的机关）支配”。

这两个綱領的本質差别并不在于“主管”和“支配”①这两个詞有什么不同，而在于贖买問題（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同唐恩之流相反，投票否决了这一主张，然而在代表大会之后孟什維克又竭力想通过这一主张），在于农民土地問題。孟什維克要把农民土地除外，劳动派却不想把这些土地除外。劳动派向地方公有派証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毫无疑問，劳动派提交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馬的綱領是农民群众的綱領。无論是农民代表写的文献，或者是他們在草案上的签名以及各省都有这种代表的事实，都令人信服地証明了这一点。在1905年，馬斯洛夫曾經写道：“特别”（上述小册子第20頁）是个体农民不会同意土地国有化。看来这是“特別”荒謬的胡說。譬如，波多尔斯克省的农民差不多都是个体农民，可是签名拥护“104人”土地草案（即上面引証的劳动派的草案）的波多尔斯克省的代表，在第一届杜馬中有18人，在第二届杜馬中有10人！

为什么农民拥护国有化呢？因为他們本能地了解到必須彻底消灭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而且比那些目光短浅的假馬克思主义者了解得更透彻。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必須消灭，以便为农业資本主义扫清道路，資本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消灭了旧的中世紀土地占有制，使它服从市場的需要，并根据商业性农业的条件加以改造。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就已經指出，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遇到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不适合資本主义的（如氏族土地占有制，村社土地占有制，封建土地占有制，宗

① 孟什維克在斯德哥尔摩否决了把“支配”一詞改为“所有”的修正案（見記录第152頁）。

法土地占有制，等等)，它便根据新的經济要求加以改造[62]。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①一書的“李嘉图地租理論的历史条件”这一节中，馬克思极其清楚地发揮了这一思想。他在那里說道：“从亨利七世起，資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象在英国这样无情地对待传統的农业制度，都沒有为自己創立这样完善的(十分相宜的)条件，都沒有使这种条件对自己服从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方面来說，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clearing of estates»(直譯是清洗領地或清洗土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完全不顧定居的居民，把他們赶走；完全不顧原有的乡村，把这些乡村化为平地；完全不顧农业建筑物，把它們全部拆毁；完全不顧原有的农业种类，一下子把它們改变过来，比如，把耕地变成了牧場，总之，根本不采用那些传統的生产条件，而是在历史上按一定形式創造了这种条件，使之在每一場合都符合最有利地运用資本的要求。因此就这一点来說，土地私有制的确不存在，因为这种私有制使資本家(农場主)可以自由經营，只求获得貨币收入。”(第6—7頁)[63]

最快地消灭中世紀的形式和最自由地发展資本主义的条件就是这样：消灭整个旧的土地占有制，消灭妨害資本的障碍——土地私有制。对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实行这种革命的“清洗”，在我們俄国也避免不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問題的中心和斗爭的焦点完全在于这种“清洗”将由地主来进行呢，还是由农民来进行？由地主来“清洗”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这就是1861年对农民的掠夺，这就是1906年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根据根本法第

①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I. Band, 2. Teil, Stuttgart, 1905. (“剩余价值学說史”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册。——編者注)

87条所頒布的法令)。由农民为資本主义"清洗"土地，这就是土地国有化。

在工人和农民进行的資产阶級革命中，土地国有化的这一經济实質，馬斯洛夫和普列汉諾夫之流根本不懂得。他們制定土地綱領不是为了同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这一最重要的农奴制关系的残余进行斗爭，不是为了給資本主义彻底扫清道路，而是为了实現小市民可怜的企图：把新旧事物"和諧地"結合起来，把分配份地所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同革命沒收来的农奴制大地产結合起来。

最后，为了充分表明地方公有化主张的市儈反动性，我再引用一些关于租佃的材料(关于租佃問題的意义，我在1906年同馬斯洛夫爭論时已經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①这本小册子中指出过了)。这是关于薩拉托夫省卡梅申县的材料②：

分配份地后产生的农戶的平均土地数量

(单位俄亩)

农戶类别	可耕份地	租地	出租地	播种面积
沒有耕畜的……………	5.4	0.3	3.0	1.1
有1头耕畜……………	6.5	1.6	1.3	5.0
有2头耕畜……………	8.5	3.5	0.9	8.8
有3头耕畜……………	10.1	5.6	0.8	12.1
有4头耕畜……………	12.5	7.4	0.7	15.8
有5头以上耕畜………	16.1	16.6	0.9	27.6
平　均	9.3	5.4	1.5	10.8

請看一下聪明的馬斯洛夫和普列汉諾夫主张仍然归农民所有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139—167頁。——編者注

② "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俄文第2版第51、54、82頁。(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71、74、105頁。——編者注)

的份地同收归“地方公有”的非份地(租地)之間实际的經济对比关系。无馬戶(在1896—1900年間,这样的农戶在俄国1 110万农戶中共有325万戶)出租的土地比租进的多9倍。他們的播种面积比他們的“份地”少4/5。有1匹馬的农戶(全国共有330余万戶)租进的土地比出租的稍微多一点,而他們的播种面积則少于“份地”。在全部上等戶中即在少数农戶中,租进的土地比出租的多好几倍;至于播种面积,农戶愈富裕,超过“份地”的数量就愈大。

在整个俄国占統治地位的就是这种关系。資本主义破坏了农业村社,把农民从“份地”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縮小了份地在农村两极的作用,而孟什維克这些深謀远虑的思想家却叫喊:“农民会举行暴动反对份地国有化”。

在俄国,不只是地主所有制是中世紀的所有制,而且农民的份地所有制也是中世紀的所有制,孟什維克“忽略了”这一点。巩固絲毫不能适应新的資本主义关系的份地所有制,是一种反动的措施,而地方公有化正是要巩固份地所有制,仅仅規定非份地“应收归地方公有”。份地占有制以上千种的中世紀的界限和中世紀的納稅“村社”把农民分成許多种类别,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村社”和这种份地占有制必然要被資本主义消灭。斯托雷平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用黑帮手段加以破坏,农民也感覺到了这一点,他們想用农民的手段或者說革命民主主义的手段加以破坏。而孟什維克却叫喊:“份地是动不得的。”

土地国有化消灭作为中世紀残余的“村社”和中世紀的份地所有制,这就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在最大限度地照顧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来消灭这些制度。在“农民問題材料”(全俄农民联合会代表大会記录〔1905年11月6—10日〕1905年彼得堡版)中写道:“有

名的‘村社’問題，根本沒有人提出过，并且被大家默然否决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議都規定，土地应該交給个人和协作社使用。”(第12頁)至于份地实行国有化，农民自己是否会吃亏的問題，代表們的回答是：“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領到土地。”(第20頁)农民私有主(和他們的思想家彼舍霍諾夫先生)十分清楚地懂得，“在分配土地时反正可以領到土地”，农奴制大地产很快就会消灭。他們所以需要大規模地“分配土地”，即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是为了擺脫中世紀的覊絆，是为了“清洗”土地，使土地的使用符合新的經济条件。穆愼科先生在第二届杜馬代表社会革命党人的发言出色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以自己那种天眞态度講道：“只有废除地界，只有取消根据土地私有制原則所树立的地界，才能有农业人口的正常的分布”(第二届杜馬記录第1172頁)。把这种說法同前面引証的馬克思的那段話对比一下，你們就会知道，在“社会化”和“平均化”这类市儈空談的后面，隐藏着十分現实的內容，这就是用資产阶級革命的手段来清洗旧的中世紀土地所有制。

土地地方公有化在資产阶級革命中是一种反动的措施，因为它阻碍消灭中世紀土地所有制这一經济上必然的过程，阻碍为一切业主(不管他們的状况、他們的过去、他們在1861年得到的份地等情况如何)在土地方面建立同一經济条件的过程。把土地分归私有，在目前也是反动的，因为这样会把現有的、过了时的、残存的份地所有制保存下来；但是在用国有化的办法把土地彻底清洗之后，土地分配作为新的自由农場主的口号可能会提出来①。

① 姆·沙宁在他的“土地地方公有还是分归私有”(1907年維尔納版)这本小册子中强调了有关耕作技术方面的問題，但是他不懂得两条发展道路，也不懂得消灭現有土地占有制的意义。

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帮助激进資产阶級(即农民)尽量徹底地清除旧废墟，使資本主义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决不是帮助市儈去达到安居乐业和迁就过去的要求。

第三章講的是"国有化和地方公有化的理論基础"。

当然我不准备向波兰同志們重复每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事情，譬如，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化就是要消灭絕对地租，而不是消灭級差地租，等等。当时考虑到俄国的讀者，我不得不在这方面談得很詳細，因为彼得·馬斯洛夫断言，馬克思的絕对地租理論是"矛盾的"，"其原因只能(!!)是第3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那里編进了作者的草稿"("土地問題"①)。

彼得·馬斯洛夫修改馬克思草稿的狂妄行为对我来說并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1901年时我就在"曙光"杂志[64]上指出，馬斯洛夫在"生活"杂志[65]上歪曲了馬克思的地租理論②。但是在这以后不久，当馬克思极其清楚地闡明絕对地租理論的"剩余价值学說史"出版之后，馬斯洛夫在1906年(該書第3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06年4月26日)还重复这种信口雌黃的徹头徹尾的讕言。这真是无与倫比！我在那本書中詳細地分析了彼得·馬斯洛夫对馬克思的"修正"，这里不可能再来重复，我只是指出，这些修正无非是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陈旧的論据。彼得·馬斯洛夫居然拿"烧砖业"(第111頁)来否定馬克思的絕对地租理論，而且宣揚"土地肥力递减規律"，断言"沒有这个規律，'海外'竞爭就不能得到解释"(第107頁)，最后，他甚至說，不推翻馬克思就不能推翻民粹主义观点，"如果連續投入同一土地面积的劳动的生产率不断降低的事

① "土地問題"第3版第108頁注释。

②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05頁。——編者注

实不存在，那也許还能实現民粹派的……田园生活”（馬斯洛夫語，見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第128頁）。总而言之，在馬斯洛夫的經济理論中，在絕对地租問題，土地肥力遞減的“事实”問題，“民粹主义”的基本錯誤問題，提高耕作文化和提高技术之間的差别等問題上，他沒有一句話是符合实际的。馬斯洛夫用那些被資本的官方辯护士弄得庸俗不堪的純粹資产阶級的論据駁斥了絕对地租理論，这样就必然要滾到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的行列。彼得·馬斯洛夫歪曲了馬克思主义，但他还是十分机灵：他在自己的“土地問題”一書的德譯本中，把他对馬克思草稿的所有修正都删掉了。馬斯洛夫在欧洲人面前把自己的理論藏进了口袋！說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我在第3章中曾經写到）一个故事：有一位不認識的人初次參加古代哲学的座談会，自始至終一言不发。有一位哲学家对这人說：“如果你很聪明，那你做得很愚蠢；如果你很愚蠢，那你做得很聪明。”

不言而喻，誰否認絕对地租理論，誰就使自己根本不可能了解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因为国有化能够消灭的只是絕对地租而不是級差地租。誰否認絕对地租，誰就是否認阻碍資本主义发展的土地私有制的任何經济意义。正因为如此，馬斯洛夫之流必然会把国有化或地方公有化的問題归結为政治問題（“把土地交給誰？”），而忽視問題的經济实質。把份地（即掌握在較差的业主手中的坏地）的私有制同其余一半土地（优等地）的公有制結合起来，这在稍微比較发达、比較自由的資本主义国家里是一种荒謬的做法。这恰恰是土地方面的复本位制。

由于孟什維克的这种錯誤，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把对土地私有制的批判任务交給了社会革命党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为这种

批判作出了光輝的榜样①。而我們的社会民主党人却根本沒有从发展資本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这种批判，因此群众所知道的只是民粹派的批判，即对土地私有制所做的市儈式的歪曲的批判。

我还要提到一个細节：在俄国的書刊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反对国有化的論据，說什么在小农所有制的情况下国有化会产生“貨币地租”。这种說法是不对的。“貨币地租”（見“資本論”第3卷）[67] 是地主的具有現代形式的利息。在现代农民租佃的情况下，租金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貨币地租。消灭农奴制大地产将加速农民的分化，加强正在建立資本主义租佃的农民資产阶級（請回想一下前面引証的关于上等戶租佃的材料）。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馬克思主义者中間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認为土地国有化只有在資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才能实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到那时，提上日程的已經不是資产阶級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了。土地国有化是最彻底的資产阶級措施。馬克思从“哲学的貧困”[68] 起，就多次地肯定过这一点。他在“剩余价值学說史”（II. Band, I. Teil, S. 208）中写道：“激进的資产者在理論上能否定土地私有制…… 然而在实际上他們却缺乏勇气，因为对某一种私有制形式的冲击，对某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冲击，对于其他的私有制形式也是很危险的。况且資产者自己也有了土地。”[69] 在俄国，資产阶級革命是在激进的資产者（农民）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激进的資产者“有勇气”为千百万群众提出国有化的綱領，因为他們“自己”还沒有“土地”，就是說他們受中世紀土地所有制的害处比从資产阶級土地

① 見«Das Kapital». III. 2. T., S. 346—347 論土地价格是資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同上，第344—345頁、第341頁和第342頁。[66]

所有制那里得到的好处和"利潤"更多。除非动搖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之間的"激进資产者"用群众性的发动来支持无产阶級革命斗爭，否則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除非建立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否則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第四章談的是在土地綱領問題方面"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那里一开头就談到了普列汉諾夫的"著名"論据，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声喊道："我的主要的看法就是認为复辟有可能。"（記录第113頁）但是这是陈腐不堪的看法，是在"防止复辟的保障"这个幌子下同反动派勾結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看法。普列汉諾夫的論据是一种最可怜的詭辯，他自己肯定防止复辟的保障是沒有的，但又要臆造这种保障。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发言中說："它（土地地方公有化）决不把土地交給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第45頁）什么叫做复辟呢？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代表手中。能不能有防止复辟的保障呢？这样的保障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記录第44頁，普列汉諾夫的发言）。于是……就臆造出一种保障，就是"土地地方公有化不交出土地"。

在土地地方公有的情况下，份地和地主土地在經济方面的差別依然存在，这就是說，实行地方公有化将便于 de jure① 复辟或恢复这种差别。地方公有化在政治方面是一項改变地主土地占有权的法律。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統治阶級的意志的表現。一旦发生复辟，原来那些阶級将重新成为統治阶級。普列汉諾夫同志，难道法律能把他們束縛住嗎？如果你把这一点想一想，你就会懂得，任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統治阶級意志的表現。而国有化却

① 在法律上。——編者注

能在經济方面給复辟造成困难，因为它消灭了一切地界和整个中世紀土地所有制，并使它适应新的、統一的資本主义生产条件。

普列汉諾夫的詭辯承袭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即不是把无产阶級引向彻底胜利，而是要它同旧政权勾結。事实上，只有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防止复辟”唯一的絕对的“保障”，至于相对的保障，那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彻底地消灭旧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制（共和制），在經济上为資本主义扫清道路。

普列汉諾夫的另一个論据是：“土地地方公有化能使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这将是一种很强大的支柱。”（記录第45頁）不对。在資本主义时代，地方自治机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資本主义必然要使国家政权趋于集中，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任何地方自治机关都絕对会被制服。普列汉諾夫是在宣揚机会主义，他不是讓人們去注意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可以建立的唯一能够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实現“中央政权民主化”或者說建立共和国，而是要人們去注意那种永远都无力完成重大历史任务的、細小的、不独立的、分散的地方自治机关。“农民土地革命”不击败中央政权，就不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普列汉諾夫却向所有孟什維克灌輸孟什維克諾沃謝德斯基在斯德哥尔摩所发表的观点：“有了眞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綱領甚至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沒有达到最高限度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現（請听！）。至于在所謂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土地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記录第138頁）

这是再清楚不过了。我們要教育人民迁就君主制，也許“他們”不会“注意”我們的区域活动，而会“讓我們生活”，正如讓謝德

林笔下的鮈魚生活一样。第三届杜馬清楚地說明了在孟什維克所說的中央政权“相对的”民主化的情况下实行地方公有化和地方民主化有几分可能。

其次，土地地方公有化会加强联省自治和省区的分散状态。无怪乎右派哥薩克卡拉烏洛夫在第二届杜馬中同普列汉諾夫一样地申斥国有化(記录第1366頁)，主张按省区实行土地地方公有化。俄国哥薩克的土地已經是地方公有化的土地。国家分散为一个个的省区，这正是我国历时三年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失敗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論据是：土地国有化会加强資产阶級国家的中央政权！第一，提出这个論据的目的是要煽起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不信任。彼·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4頁)上写道：“某些地方的农民也許会同意交出自己的土地，但只要有某一个大区(例如波兰)的农民拒絕交出自己的土地，那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就会成为无稽之談了。”好一个論据！眞是沒什么可說了！旣然“只要某个大区的农民表示拒絕”，就会如何如何，那我們不是也应当放弃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嗎？这不是論据，而是蠱惑人心。我們的政治綱領主张排斥任何暴力和非正义手段，要求各省有广泛的自治权(見党綱第3条)。这就是說，問題不在于重新臆造一些在資产阶級社会中做不到的“保障”，而在于无产阶級的政党要用自己的宣传鼓动号召大家联合起来，而不要四分五裂，要解决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崇高的任务，而不要去保持穷乡僻壤的粗野和民族狹隘性。俄国內地一定会解决土地問題，至于边区，那只能用示范来影响它們①。这一点，每个民主主义者都看得很清楚，更不用

① 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土地私有制和国有化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其中有一个一定要占上风。工人政党的任务就是維护較高的制度。

說社会民主主义者了。問題只是在于，无产阶級是应当提高农民，使他們認識到更高的目标呢，还是应当讓农民降低到小市民的水平。

第二，他們断言，土地国有化会使中央政权更可以恣意妄为，会加强官僚制度，等等。談到官僚制度，那应当指出，即使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土地仍然由地方自治机关来管理。这說明上面这个論据是虛假的。中央政权只規定一些总的条件，譬如禁止以任何形式出讓土地等等。难道我們現行的即孟什維克的綱領沒有規定把"供移民用的土地"和"有关国計民生的森林和水流"交归"民主国家支配"嗎？要知道掩耳盜鈴是很不明智的；即使这样也可能产生极端严重的恣意妄为，因为中央国家政权将自己决定哪些算是有关国計民生的森林和水流。孟什維克寻找"保障"寻找得不是地方：只有中央政权完全民主化，只有共和国才能使中央政权同各省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限度。

孟什維克喊道："資产阶級的国家将被加强。"他們暗地在支持資产阶級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在大庭广众却拍着自己的胸膛說，連支持資产阶級共和派都沒有想到过。客观社会历史的发展向我們提出的眞正的历史問題，是普魯士式的农业演进，还是美国式的农业演进？是假立宪主义的遮羞布掩蓋起来的地主君主制，还是农民的（农場主的）共和国？閉上眼睛不看客观历史对問題的这种提法，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象市儈那样躲避尖銳的阶級斗爭，躲避历史对民主革命問題的这种尖銳、簡单和彻底的提法。

"資产阶級的国家"我們是避免不了的。只有市儈才会在这問題上想入非非。我国革命所以是資产阶級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之間的斗爭，而是資本主义的两种

形式之間、資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之間、資产阶級民主制度的两种形式之間的斗爭。十月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的君主制就是孟什維克諾沃謝德斯基所認为的“相对的”資产阶級“民主制”。而无产阶級-农民共和国也是資产阶級的民主制。在我国革命中，我們采取的任何一个步驟只能是（我們已經采取的步驟也的确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資产阶級的这一或那一阶层去反对旧制度。

有人对我們說：土地国有化就是把錢用在軍队方面，土地地方公有化則是把錢用在医疗和国民教育方面，这完全是庸人的詭辯。馬斯洛夫就是这样談論的，而且字句也差不多，他說：“……土地国有化就是(sic!①)把地租用于陆海軍；土地地方公有化則是把地租用于居民的需要”（“教育”杂志1907年第3期第108頁）。这是市儈的社会主义，或者說这是把蒼蝇捉住以后將药粉撒在蒼蝇屁股上来消灭蒼蝇！善良的馬斯洛夫沒有考慮到，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和西方的市政局用于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費用所以比国家多，完全是因为資产阶級国家从收入最多的財源中已經抵偿了自己最重要的开支（巩固資产阶級的阶級統治），而把次要的財源留給地方自治机关去滿足所謂“居民的需要”。把几十万巨款用于軍队，而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无产阶級的需要，这就是資产阶級国家在支出方面的实际对比关系。只有馬斯洛夫才会認为，只要把地租交給市政局“支配”，資产阶級国家就会被孟什維克这些精明的“政治家”蒙騙过去！有了这种“精明的政策”，資产阶級国家难道就会把几十万巨款交給无产阶級，而把小小的零头用于陆海軍嗎？

实际上，孟什維克执行的是市儈的政策，他們躲在偏僻省份的

① 原文如此。——編者注

地方自治机关中逃避历史提出的迫切問題：在我国应当建立农場主的中央集权的資产阶級共和国呢，还是应当建立容克的中央集权的資产阶級君主国？先生們，逃避是逃避不了的！你們必然要参与解决这个迫切問題，任何省区自治，任何玩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花招都不能使你們迴避这一点。你們轉彎抹角的手法实际上只是說明了一个問題，就是你們不了解共和制趋势的意义，而在暗中支持立宪民主党的趋势。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記录清楚地証明：孟什維克主张土地地方公有化，也就是向欧洲費边社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献媚。柯斯特罗夫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說：“有些同志好象是第一次听到地方公有制的說法。我可以告訴他們，西欧有整整一个流派”（正是！！柯斯特罗夫无意之中道出了眞情！）“叫做‘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英国）”（記录第88頁）。然而这个“流派”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流派，这一点无論是柯斯特罗夫或者是拉林①都沒有想过。社会革命党人可以把市儈的改良主义同資产阶級革命的任务混在一起，但是先生們，社会民主党人这样作就不适当了！西方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英国的費边社分子，德国的伯恩施坦派，法国的布魯斯派）显然把問題的重心从国家結构問題移到了地方自治問題。但是我們面臨的正是关于国家結构及其农业基础問題，因此在我国主张“地方公有社会主义”就是玩弄农业社会主义。讓那些市儈們在未来民主俄国的安靜的市政局里赶快“为自己筑一个安乐窝”吧。而无产阶級的任务是組織群众，但这不是为了上述目的，而是为了

① “农民問題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对孟什維克綱領的非常含糊的解释，見第66頁，但是这位地方公有化的倒霉的捍卫者在第103頁上却指出：国有化是最好的結局！

进行革命斗争，爭取在今天实現完全的民主化，到明天实行社会主义的变革。

有人时常責备我們布尔什維克，說我們的革命观点是空想，是幻想。在国有化問題上，这种責难听得特別多。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問題上，他們最沒有根据。誰把国有化看做空想，誰就是沒有想到，政治变革規模同土地变革規模必須相适应。在庸碌的市儈看来，国有化的"空想"成分并不少于建立共和国，而这两者的空想成分又不少于"农民"土地革命的胜利，即資本主义国家中农民起义的胜利。就日常的、平靜的发展来說，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同样"困难的"。叫嚣只有国有化是空想，这首先証明这种人不了解經济变革同政治变革有必然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消灭地主的（以及十月党人的，即不完全是地主的）专制制度，就不可能沒收地主的土地（这是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公認的綱領性的要求）。而沒有千百万覚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沒有群众洶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沒有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現时所說的那种"翻天复地"[70]的决心和本領，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反过来說，不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这种洶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是不可思議的，因为几世紀来农民一直受农奴制的压迫，其中包括整个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納稅"村社"的种种束縛，以及使人想起就可恨的政府"賞賜"的小恩小惠，等等，等等。

由于篇幅不够（就是現在这样，我也已經超过了"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71]編輯部規定的篇幅），該書第五章的内容（"各阶級、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馬討論土地問題时的表現"）就从略了。

农民在杜馬中的发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发言反映出普通农民想摆脫地主压迫的渴望，对中世紀制度和官僚制度

的强烈憎恨，反映出他們自发的、直觉的、往往是幼稚的、不十分明确的、然而是十分旺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比长篇大論更能証明，在农民群众中蘊藏着一种对貴族、地主和罗曼諾夫王朝具有毁灭性的潜在力。覚悟的无产阶級的任务就是要无情地闡明、揭露和消除不胜枚举的市儈欺騙、貌似社会主义的言詞以及农民对土地变革天真幼稚的期望。但是消除这一切不是为了安撫农民（人民自由的叛徒立宪民主党人先生在两届杜馬中就是这样做的），而是要喚起农民群众鋼鉄般的、不屈不挠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沒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沒有他們頑强无情的斗爭，那沒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記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沒有希望实現的“空想”。所以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明确地提出問題：俄国已經极其明显地呈現出經济发展的两种趋势即資本主义的两条道路。願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能好好地考虑一下。在第一次革命运动期間，即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这两种趋势在我們看来还不是理論上的概括，也不是根据1861年以后演进的某些特点所作出的結論。不是的，現在这两种趋势在我們看来是由敌对阶級决定的。地主和資本家（十月党人）心中十分清楚，除了資本主义的趋势，别无其他的趋势，不用强制手段加速破坏“村社”他們就无法走这条道路，然而这种破坏等于是……讓高利貸者公开掠夺，讓警察“任意洗劫”或者是讓“討伐”队进行屠杀。这是一种非常容易使自己掉脑袋的“战斗动作”！而农民群众在这三年期間同样明确地了解到，对“沙皇爸爸”的任何期望以及走和平道路的任何打算都是无法实現的，必須进行革命斗爭，消灭整个中世紀制度，尤其是消灭整个中世紀的土地占有制度。

社会民主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基础，应当是讓群众認識到这些結果，訓練群众利用这些經驗，以便在第二次革命运动中能够尽量有組織地、坚决地、頑强地进行攻击。

普列汉諾夫在斯德哥尔摩說无产阶級和农民夺取政权就是复活“民意主义”，这种言論是非常反动的。普列汉諾夫自己使自己陷入了謬誤：照他这样說来就是“农民土地革命”可以不要无产阶級夺取政权，不要农民夺取政权！考茨基則不然，他在布尔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刚分裂的时候明显地同情孟什維克，然而現在他在思想上却轉到了布尔什維克这边来了，他認为，只有“无产阶級同农民結成联盟”，革命才能胜利。

不彻底消灭整个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不实行彻底“清洗”土地，即不实行土地国有化，这样的革命是不可思議的。无产阶級政党的任务就是要宣传最彻底最激进的资产阶級土地变革的这一口号。等我們做到了这一点，我們再来看一看，以后的前途如何：这样的变革仅仅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获得美国式的迅速发展的基础呢，还是会成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

1908年7月18日

附言：我起草的土地綱領草案已經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提出过，并且在社会民主党的書刊中也多次地刊載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談几点想法。既然資本主义农业演进有两种趋势，那末綱領中就必須使用“如果”（这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专用語）这种說法，就是說綱領必須估計到两种可能性。換句話說，在目前这种情况沒有改变以前，我們还是要求使用土地的自由，要求建立法庭降低地租，要求消灭等級制等等。

但是同时我們也要同当前的趋势作斗爭，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以便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广泛地、自由地开展阶級斗爭。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反对中世紀制度的革命斗爭，同时指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关系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是消灭农奴制度的最好形式）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只有实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消灭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实行彻底的土地变革，才能沒收地主土地，实現土地国有化。

这就是我起草的土地綱領草案的內容。其中說明当前整个土地改革的資产阶級特点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純粹无产阶級观点的那一部分，已經被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并載入了現在的綱領。

1908年8月載于
«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
雜志第6期

署名：尼·列宁

按波兰文杂志譯成俄文刊印

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

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級的国际斗爭已經走上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在波斯，发生了把俄国驅散第一届杜馬同1905年底鎮压起义的行动按独特的方式結合起来的反革命。可耻地被日本人击潰了的俄国沙皇軍队在捞回本錢，他們热心地替反革命效劳。哥薩克在俄国建立了枪杀、討伐、毆打和掠夺等功勛以后，接着就在波斯建立鎮压革命的功勛。尼古拉·罗曼諾夫站在黑帮地主和被罢工与內战吓破了胆的資本家的前列，疯狂地反对波斯的革命者，这是可以理解的。虔誠地信仰基督教的俄国軍人也不是第一次充当国际劊子手的角色了。英国一面假装清白，一面对波斯的反动派和专制制度拥护者采取明显的友好的中立态度，这是稍有不同的現象。英国的自由資产者被自己家里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激怒了，被印度革命斗爭的高涨吓坏了，他們愈来愈經常、愈来愈露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对立宪主义頗有研究的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資本、同資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爭的时候，竟变成了什么样的野兽。波斯的革命者在国內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不多已經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頑强的斗爭、似

乎已經被击潰的革命者屡次获得的軍事上的胜利，都表明暴虐的波斯王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72]軍队和英国的外交家的援助，也遭到了下面的极其有力的反抗。革命运动有本領在軍事上反击复辟的企图，迫使有这种企图的英雄們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不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憤怒的开端。

在土耳其，革命运动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領导下在軍队中获得了胜利。的确，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臭名昭著的土耳其宪法的諾言暫时敷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半个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仓猝的讓步，必然会使內战发生更坚決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轉折。而內战的学校人民并沒有白进。这个学校是很艰苦的，它的全部課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鎮压等等。但是，只有十分愚蠢的書呆子和沒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級进行內战，教他們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現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閉塞的、迟鈍的、无知无識的奴隶的心中，奴隶們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可耻的奴隶地位，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們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勛。

在印度，替"文明的"英国資本家当奴隶的当地人正巧也在最近使得他們的"老爷們"感到惶惶不安。被称为英国对印度的管理制度的暴力和掠夺是沒有止境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俄国当然例外——群众都沒有这样貧困，居民也沒有这样經常地挨餓。自由不列顛的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最激进的活动家，象

約翰·摩里（Morley）这种在俄国各地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間很有威信的、“进步的”（实际上是在資本面前卑躬屈节的）政論界的明星，都当了印度的統治者，变成了眞正的成吉思汗，他們竟能批准“安撫”他們治下的居民的一切措施，直到杀戮政治抗議者为止！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日报《Justice》（“正义报”）在印度竟被摩里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恶棍所禁止。当英国的国会議員、“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領袖凱尔-哈第勇敢地来到印度，向当地人談論民主的最起碼的要求的时候，所有的英国資产阶級报刊都向这个“反叛者”狂吠起来。現在，最有势力的英国报紙都在咬牙切齿地談論扰乱印度的“煽动者”，欢迎对印度的民主派政論家采取純粹俄国式的、普列韦式的法庭判决和行政鎮压手段。但是，印度的群众开始起来卫护自己的作家和政治領袖了。英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Tilak）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長期流放，而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質詢却表明，印籍陪审員認为提拉克是无罪的，而英籍陪审員則判定他有罪！），錢包的奴才向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阶級也已經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覚的群众性的政治斗爭了，——旣然情况是这样，那末，英国和俄国的秩序在印度的美妙时光就已經过去了！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鍛炼出一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証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伟大軍事胜利。毫无疑問，英国人对印度的长期的掠夺，目前这些“先进的”欧洲人对波斯和印度的民主派的迫害，将在亚洲鍛炼出几百万、几千万无产者，把他們鍛炼得也能象日本那样取得反压迫者斗爭的胜利。欧洲的覚悟的工人已經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人数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

在中国，反对中世紀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表現得非常强烈。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計，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爭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騷动必然会轉变为自覺的民主运动。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一回已經感到惶惶不安，这可以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們竟帮助中国的“历史政权”鎮压革命者！他們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屬地担心。

但是，使法国資产阶級感到不安的不单是亚洲的屬地。在巴黎附近的凡勒內夫-圣乔治修筑街垒，开枪射击修筑街垒的罢工者（7月30日〔17日〕星期四），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欧洲阶級斗爭的尖銳化。代表資本家統治法国的激进派克列孟梭在拚命地破坏无产阶級头脑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資产阶級共和国的幻想。軍队奉“激进派”政府的命令枪杀工人，这类事件在克列孟梭时代恐怕比过去更多了。克列孟梭已經因此从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血紅的人”的外号，现在，当他的暗探、宪兵和將軍們又在使工人流血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想起了这个最进步的資产阶級共和派分子有一次向工人代表說过的一句名言：“我們和你們是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是的，法国无产阶級和最极端的資产阶級共和派現在已經完全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了。法国工人阶級为了爭取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流过很多鮮血，而現在，在共和制度已經完全巩固的基础上，財产私有者和劳动者之間的决斗已經一天比一天临近了。《L'Humanité》[73]就7月30日的事件写道：“这不是簡单的屠杀，这是战役的一个片断。”將軍們和警察們总想向工人挑衅，

想把和平的、沒有任何武装的游行示威变成大血战。但是，当軍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罢工者和示威者，向手无寸鉄的人們进攻的时候，他們遭到了反击，街垒迅速地修筑起来了，終于造成了轟动整个法国的事件。該报写道，这些用木板筑成的街垒坏得令人发笑。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重要的是第三共和国消除了修筑街垒的习慣。現在“克列孟梭又恢复了这个习慣”，——而且他明目张胆地談論这一点，就象“1848 年 6 月的劊子手、1871 年的加利非”明目张胆地談論內战一样。

不只是社会主义报刊在評論 7 月 30 日的事件时追溯了历史上的这些伟大的日子。許多資产阶級报紙穷凶极恶地攻击工人，責备他們，說他們的所作所为是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报紙中的一家叙述了說明双方在出事地点的情緒的一个小小的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插曲。当工人們抬着一个受伤的同志从指揮攻击罢工者的維尔威尔将軍旁边走过的时候，示威的群众中发出了喊声：«Saluez!»（“敬礼”），于是資产阶級共和国的将軍就向受伤的敌人敬了礼。

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斗爭尖銳化的現象在一切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工人运动的形式不同，同一的趋势有不同的表現。在美国和英国，在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級缺乏任何革命传統和社会主义传統或者至少是缺乏比較眞实的革命传統和社会主义传統的条件下，阶級斗爭的尖銳化表現为反对托拉斯的运动的加强、社会主义本身及有产阶級对它的注意力的空前增长，表現为工人組織（有时純粹是經济組織）进而采取有計划的和独立的无产阶級的政治斗爭。在奧地利和德国（斯堪的那維亚国家的情况也部分相同），阶

級斗爭的尖銳化表現在选举斗爭上面，表現在一些政党的关系上面，表現为各种色彩的一切資产者彼此接近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級，表現为法庭和警察加紧进行迫害。两个敌对陣营都在緩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組織，彼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歧愈来愈尖銳，好象都在一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准备进行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在拉丁語系的国家，如意大利，特别是在法国，阶級斗爭的尖銳化表現为特別猛烈的、急剧的、往往簡直是革命的爆发，当无产阶級埋藏在心底的对压迫者的仇恨突然爆发出来的时候，"和平的"議会斗爭局面就要被真正的內战場面所代替。

无产阶級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里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发展。只有在各个国家的工人所进行的总的阶級斗爭中，才能充分地和全面地利用一切活动場所中的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創的特点带进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論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說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級百万大軍已經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結起来，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决定性的斗爭已經愈来愈近。拿工人阶級方面来說，这次斗爭将比巴黎公社即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的时期要准备得更好，要好許多倍。

除了亚洲的革命民主斗爭的尖銳化以外，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也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殊困难的条件。俄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軍，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不仅有国內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

敌人。以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級斗爭为对象的反动活动，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反动活动还把世界各国的資产阶級政府团結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反对亚洲的、特別是欧洲的一切革命。我們党內的机会主义者正象大多数俄国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样，到現在还在幻想俄国的資产阶級革命“不至于推开”資产阶級，不至于吓倒他們，不会产生“过分的”反动，不会造成革命阶級夺取政权的局面。这眞是一个必然落空的希望，眞是庸人的空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引火物这样迅速地增多，烈火这样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眠不醒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去，这样，国际資产阶級反动活动的日益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日益尖銳化就是絕对不可避免的。

俄国的反革命沒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我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俄国資产阶級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傾向于国际反无产阶級和反民主的潮流。俄国无产阶級不应当指望自由派同盟者。它应当从农民群众自己必然要用暴力来解决俄国土地問題这一点出发，帮助他們推翻黑帮地主和黑帮专制政府的統治，給自己提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級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任务，記住无产阶級的斗爭和它的胜利同国际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就这样独立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向革命的完全胜利迈进。对反革命的（俄国的和全世界的）資产阶級自由派少抱幻想，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級的成长多加注意！

載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无产者报”第33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編輯部的話[74]

这篇对馬斯洛夫同志在理論方面的不幸遭遇所做的概述，是从尼·列宁系統分析我国农业发展趋势的一部著作中摘来的。当然，揭露馬斯洛夫那个滲透着毫不新奇的修正主义精神的“独創的”农业理論，必然会引起对党綱某些条文的批評。我們認为就这个問題在党的报刊上进行爭論是完全适时的。

至于馬斯洛夫同志在理論上的“发現”，我們要特地向普列汉諾夫同志，向保护我們土地問題上的修正主义者的天使說几句話。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6—7号上，你一方面討論极其重要的理論問題，同时却发表了一些很不体面的、轉弯抹角、模棱两可的議論。你曾經打定主意要在报刊上声明，我們党的某些党員不是你的同志，可是你却沒有勇气坦率而明确地說明，是你打算退出我們的組織，还是想設法把这些党員开除出去？你这样旣是儒怯，又是粗暴。

意志坚定的勇士，請这样考慮一下你那位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功績吧。根据你的文章来判斷，你恰好就是这个小小独立王国里出名的凶恶的杜姆巴澤。你对馬斯洛夫同志修正主义的捏造批判了什么呢？你对卡尔·馬克思的經济理論捍卫了什么呢？尽力支持馬斯洛夫，附和馬斯洛夫的不是你又是誰呢？

我們党的法穆索夫①們并不反对扮演維护馬克思主义的鉄面无情的战士的角色，但是为了迎合派别的亲密关系，他們也不反对把严重违背馬克思主义的行为遮掩起来！

載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无产者报"第33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① 法穆索夫是格利波也多夫的喜剧"聪明誤"中的人物。——譯者注

好战的軍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軍国主义的策略

一

外交家們激动不安。“通牒”、“报告”、“声明”如雪片飞来；在举着香檳酒杯“巩固和平”的戴王冠的傀儡身后，大臣們在窃窃私語。可是“臣民們”知道得很清楚，烏鴉群集，必有腐臭的尸体。保守派克罗美尔勛爵向英国議院声称：“我們正处在民族（？）利益的紧要关头，不管执政者有怎样和平的（！）願望，但是怒火在燃燒，因此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和可能。”

最近引火物已經积得相当多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波斯的革命使欧洲列强在波斯安置的一切壁障——“势力范围”有移动的可能。土耳其的立宪运动也可能夺走欧洲資本主义猛兽爪中的这块肥肉；接着，那些旧有的、而現在已趋尖銳化的危险的“問題”——馬其頓問題、中亚問題、远东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也发生了。

同时，目前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約、协議等等非常之多，只要稍微触动一下某个“强国”，“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熊熊之焰”。

各国政府愈是刀枪鏗鳴地相互威胁，它們就愈加无情地鎮压本国的反軍国主义运动。对反軍国主义者的迫害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强。克列孟梭-布利安的“激进社会党”內閣的暴虐，并不亚于毕洛夫的容克保守党內閣。禁止20岁以下青年参加政治会議的那

項新的集会結社法頒布以后，全德的"青年組織"都被解散了，这样一来，就給德国的反軍国主义的鼓动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75]以后趋于沉寂的关于社会党人反对軍国主义的策略問題的爭論，在党的刊物上又热烈起来了。

乍看起来，会覚得很奇怪，这个問題的重要性是这样明显，軍国主义对无产阶級的害处是这样清楚、这样突出，然而关于反軍国主义的策略的爭論，在西方社会党人中間引起的动搖和分歧，却比其他問題引起的更严重。

正确解决这个問題的原則性的前提，早就十分巩固地确定下来，并沒有什么意見分歧。現代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結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資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現"：一种是資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軍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說的«Militarismus nach aussen»），一种是統治阶級用来鎭压无产阶級各种（經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Militarismus nach innen»）。許多次国际代表大会（1889 年的巴黎代表大会、1891 年的布魯塞尔代表大会、1893 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及 1907 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决議中对这种观点都作了完整的闡述。对軍国主义同資本主义之間的这种联系說得最詳細的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議，虽然根据議程（"关于国际冲突問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討論得更多的是德国人称为«Militarismus nach aussen»（"对外的"）的那种軍国主义形式。下面就是决議中談到这个問題的地方："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战爭通常都是由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竞爭所引起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仅力图保証自己有銷售地，而且力图夺取新的銷售地；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奴役。其次，这些战爭是由軍国主义不断加紧軍备引起的，軍国主义是資

产阶級实行阶級統治和在政治上压制工人阶級的主要工具。

民族主义的偏見也助长了战爭，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統治阶級的利益，經常在培养这种偏見，其目的是誘使无产阶級群众离开他們本身的阶級任务，迫使他們忘記国际的阶級团結的責任。

由此可見，战爭导源于資本主义的本質，只有在資本主义制度不再存在的时候，或者在軍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人力和財力的巨大損失以及軍备所引起的民憤使这种制度趋于消灭的时候，战爭才会停止。

士兵主要来自工人阶級，受到物質損失的主要也是工人阶級，工人阶級是战爭的最天然的敌人，因为战爭违反他們所追求的目的，他們追求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原則为基础的、真正实現各民族团結的經济制度……”

二

可見，社会党人已經肯定地認为，軍国主义同資本主义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党人对这一点沒有意見分歧。但是，承認这种联系并不等于具体規定了社会党人的反軍国主义的策略，并沒有解决怎样反对軍国主义的重負、怎样阻止战爭这些实际問題。而在这些問題的答案上，社会党人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这些意見分歧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可以异常明显地看出来。

福尔馬尔这一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极端。他們說，既然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产兒，既然战爭是資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旅伴，那就用不着进行什么专門的反軍国主义的活动。福尔馬尔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說的。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宣战的时候应該采取什么行动的問題，以倍倍尔和福尔馬尔为首的大

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反对敌人的侵犯，他們必須参加“防御性的”战爭。福尔馬尔由于抱有这种見解，竟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声称：“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們做个很好的德国人”；而社会民主党議員諾斯克在国会揚言說：一旦发生反对德国的战爭，“社会民主党决不会落在資产阶級政党后面，他們也会背起枪来的”；諾斯克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声明：“我們希望德国尽量加紧軍备”。

人数不多的爱尔威的那一派人則是另一个极端。爱尔威派說，无产阶級沒有祖国。因此所有战爭都是合乎資本家利益的，因此无产阶級应該反对每一个战爭。无产阶級应当用罢战和起义来对付每一次宣战。反軍国主义的宣传主要应当集中在这方面。因此，爱尔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的决議草案：“……代表大会建議用罢战和起义来对付任何的宣战，不管战爭是哪方面宣布的。”

这就是西欧社会党人队伍中在这个問題上的两种“极端”的立場。“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种立場也反映出現在还妨碍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級活动的两种毛病，即机会主义的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談。

現在先就爱国主义談几点意見。“无产者沒有祖国”，——“共产党宣言”上的确是这样說的。說福尔馬尔和諾斯克这伙人的主张“侮辱”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論点，——这样說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能証明爱尔威和爱尔威派的論断是正确的，他們說，无产阶級生活在哪一个祖国都无所謂，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或共和制的法国，或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級阶級斗爭中最强有力的因素；福尔馬

尔給无产阶級規定什么"眞正德国人"对"祖国"的态度，这固然不对，但是爱尔威对无产阶級解放斗爭的这种重要的因素采取不可原諒的、毫无批判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級不能对自己为之进行斗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条件采取无所謂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他們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謂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級之所以关心国家的命运，仅仅是因为这关系到他們的阶級斗爭，而并不是由于資产阶級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应該談的)"爱国主义"。

另外一个問題，即对軍国主义和对战爭的态度問題，就比較复杂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爱尔威不可原諒地混淆了这两个問題，忘記了战爭同資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級如果采用爱尔威的策略，就一定会使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一方面把一切战斗准备(要知道，这里說的是起义)都用来同結果(战爭)作斗爭，另一方面却讓原因(資本主义)繼續存在。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里已經暴露无遗了。盲目相信一切 action directe① 的神奇力量，把这种"直接行动"从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中抽了出来，对这种局势又不加任何分析；总而言之，显然是"任意机械地了解社会現象"(卡·李卜克內西的話)。

爱尔威的計划"很簡单"：在宣战那一天，社会党士兵都开小差，后备兵则宣布罢战，坐在家里不出来。然而"后备兵罢战，并不是消极的反抗；工人阶級很快就会轉入公开的反抗，即举行起义；由于作战的軍队駐在国境上，起义胜利的机会就更大了"(G. Hervé.《Leur patrie》②)。

① 直接行动。——編者注

② 古·爱尔威："他們的祖国"。——編者注

这就是他們的“眞正的、直接的、实际的計划”；爱尔威深信这个計划能够成功，就建議用罢战和起义来对付每次宣战。

因此很明显，这里的問題并不在于无产阶級是否能够（如果它認为这是适当的）用罢战和起义来对付宣战。爭論点在于，要不要作出用起义对付每一种战爭的规定来束縛住无产阶級。如果一定要这样，那就是剝夺无产阶級选择决战时机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交給敌人；那就是說，在无产阶級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很高、組織性很强、机会很好等等的条件下，也不是由无产阶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斗爭的时机；不是的，資产阶級政府甚至能在条件不利于无产阶級的情况下激怒无产阶級举行起义，例如，政府可以宣布进行一場特别能够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感情、从而使起义的无产阶級陷于孤立的战爭。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就是各国的資产阶級，从君主制德国的到共和制法国的和民主制瑞士的資产阶級在和平时期也經常这样残酷地鎮压反軍国主义的活动，在战爭时期，在施行軍事法律、軍事戒严和战地法庭等等的时期，对任何罢战的企图也一定会进行同样疯狂的迫害。

考茨基談到爱尔威的思想的时候，說得很对：“罢战思想是由‘良好的’动机产生的，是高尙的和充滿英勇精神的思想，但是这是英勇的愚蠢。”

无产阶級如果認为适当和恰当，他們可以用罢战来对付宣战；他們为了使社会革命成功，除了采用其他手段以外，也可以采用罢战方法。但是，如果用这种“策略药方”束縛住自己，那就不符合无产阶級的利益了。

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就是这样来回答这个爭論問題的。

三

愛尔威派的观点是“英勇的愚蠢”，而福尔馬尔、諾斯克和他們的“右翼”同道者的主张則是机会主义的怯懦。他們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議論，說什么既然軍国主义是資本的产兒，而且将和它同归于尽，那也就用不着专門进行反軍国主义的宣传了，因为沒有必要。有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反駁他們說：但是，彻底解决工人問題和妇女問題，在資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在为工人立法而斗爭，为扩大妇女的公民权等等而斗爭。现在，軍队干涉劳資斗爭的事件日益增多，軍国主义在无产阶級的目前的斗爭中以及在将来——在社会革命时候——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所以专門的反軍国主义的宣传现在更应該大力进行。

专門的反軍国主义的宣传工作不仅在原則上証明是必需的，而且也有了重要的历史經驗。比利时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好。比利时的工人政党除进行反軍国主义思想的一般宣传外，还組織了称做“青年近卫軍”(«Jeunes Gardes»)的社会主义青年的小組。同一个州的各小組組成州联合会；各州联合会又联合成由“总委員会”領导的全国联合会。“青年近卫軍”的机关报(«La jeunesse — c'est l'avenir»；«De Caserne»，«De Loteling»①等等)竟銷售好几万份！在这些联合会当中，最强的是瓦倫联合会，有62个地方小組，1万个会員；“青年近卫軍”现在总共有121个地方小組。

---

① “青年就是未来”、“軍营”、“新兵”。——編者注

他們除进行文字宣传外，还加紧进行口头宣传：在1月和9月（入伍月）在比利时各主要城市举行民众大会和游行；社会党的講演者在市管理局門前，在广場上向新兵說明軍国主义的意义。在“青年近卫軍”的“总委員会”下面設有“控訴委員会”，負責搜集軍营中各种不公平現象的材料。党的中央机关报《Le peuple》①上的“軍中消息”栏，每天公布这些材料。反軍国主义的宣传不仅仅在軍营外面进行，社会党人士兵們还組織了一些小組在軍队中进行宣传。現在这样的小組（“士兵联合会”）約有15个。

現在法国②、瑞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都在仿效比利时，以不同的深度和不同的組織形式进行反軍国主义的宣传。

总之，专門的反軍国主义活动不但有专門进行的必要，而且实际上是适当的、有效的。因此，如果福尔馬尔反对进行这种活动，認为德国的警察条件不允許进行这种活动，認为这样做会使党組織有被破坏的危险，那这就是对某个国家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問題了；这是事实問題，而不是原則問題。在这一点上饒勒斯說得很对：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青年时代，在施行反社会主义者特別法的艰苦的岁月，經受住了俾斯麦伯爵的鉄腕，那末現在，在它已經空前地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时候，就可以不怕現时执政者的迫害了。然而福尔馬尔还是非常錯誤地竭力依靠一种論据，說专門的反軍国主义的宣传在原則上是不适当的。

福尔馬尔和他的同道者肯定社会民主党人必須参加防御性的

① “人民报”。——編者注

② 法国人的所謂“士兵小捐”的組織特別有趣：工人每星期交一个苏給自己的工会書記，这样湊成一笔錢拿去送給士兵，“提醒他們：他們虽然穿着軍装，也还是被剝削阶級中的人，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忘記这一点”。

战爭，这种看法也是机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出色的批評彻底粉碎了这些观点。考茨基指出，要弄清某次战爭是由防御的目的还是由进攻的目的引起的，有些时候，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极其高涨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考茨基举了一个例子：在日俄战爭开始时，日本究竟是进攻还是防御?)。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打算根据这个标志来确定自己对战爭的态度，他們就要陷入外交談判的罗网。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会处在必須要求进攻战爭的地位。1848年(爱尔威派也不妨記住这一点)馬克思和恩格斯認为德国必須进行反对俄国的战爭。后来，他們曾經想影响英国輿論，促使英国同俄国作战。考茨基也作了一个假設，他說："假定革命运动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影响又使法国的政权轉入无产阶級手中；另一方面，假定欧洲各国的君主組織联盟来反对新的俄国，这时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去帮助俄国，国际社会民主党是否会表示反对呢?"(卡·考茨基："我們对爱国主义和战爭的看法")

很明显，在这个問題上(也象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一样)，唯有从无产阶級阶級斗爭的利益出发，或者說得更清楚些，唯有从国际无产阶級运动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战爭的防御性質和进攻性質出发，才能观察和解决社会民主党对国际关系上的某种現象抱什么态度的問題。

饒勒斯不久以前講的話，表明机会主义在这些問題上会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一个自由資产阶級的德文小报上发表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法英两国同俄国結成联盟进行辯护，反对責难該联盟的反和平的意图，認为該联盟是"和平的保障"，对于"我們竟盼到了英俄这两个有世仇的国家結成联盟"这件事表示祝賀。

罗·卢森堡在最近一期《Neue Zeit》①上发表了一封給饒勒斯的"公开信"，信中对他这种观点作了出色的評論和激烈的駁斥。

首先，罗·卢森堡指出：談論"俄国"和"英国"的联盟，这是"用資产阶級政治家的語言說話"，因为在对外政策上，資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无产阶級的利益是对立的，在对外关系上决不能講什么利益的协調。如果軍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产兒，那末战爭就不会因执政者和外交家們的阴謀而消灭；所以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在这一点上引起幻想，恰恰相反，是不懈地揭穿外交上的"和平步驟"的虛伪和无力。

但是这封"信"的中心內容是評价饒勒斯大肆贊揚的英法两国同俄国的联盟。欧洲資产阶級使沙皇政府有可能击退革命的进攻。"現在，专制制度企图把对革命的暫时的胜利变成最終的胜利，首先就采用一切动搖中的专制政府所試驗过的方法，即謀取对外政策上的胜利。"現在俄国同其他国家的一切联盟都是"西欧資产阶級同俄国的反革命、同俄国和波兰自由战士的絞杀者和劊子手結成了神圣同盟；这些联盟說明，最血腥的反动势力不仅在俄国国內，而且在国际关系上也已經得到巩固"。"因此世界各国社会党人和无产者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竭力阻止同反革命的俄国結成联盟。"

罗·卢森堡問饒勒斯："您在法国議会上发表过反对借款給俄国的出色的演說，在数星期以前您在您的《Humanité》②上曾热烈号召輿論来反对俄屬波兰軍事法庭的血腥行为，而現在您又要'极热心地'尽力把摧残俄国革命和波斯起义的血腥劊子手的政府变

① "新时代"。——編者注

② "人道报"。——編者注

成影响欧洲政治的因素，把俄国的絞架变成国际和平的栋梁，这怎么解释呢？不久以前，法国社会党議会党团和社会党全国委員会的管理委員会反对法勒埃尔到俄国去，您在那个用热烈的言詞維护俄国革命的利益的抗議書上签了名，而現在您又提出一个以法俄联盟和英俄联盟为基础的和平計划，这两者之間怎么能协調呢？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統想援引您关于国际形势的意見，他对您的抗議書就会这样說：誰要是贊成目的，他就应当贊成手段；誰要是認为同沙俄的联盟是国际和平的协调，他就应当拥护巩固这个联盟和达到友好的一切措施。

"如果在德国、俄国和英国曾經有一些社会党人和革命家，'为了和平'而建議同复辟政府或梯也尔政府和尤利·法弗尔政府結成联盟，并用自己的道义上的威信来掩护这种联盟，那您将怎样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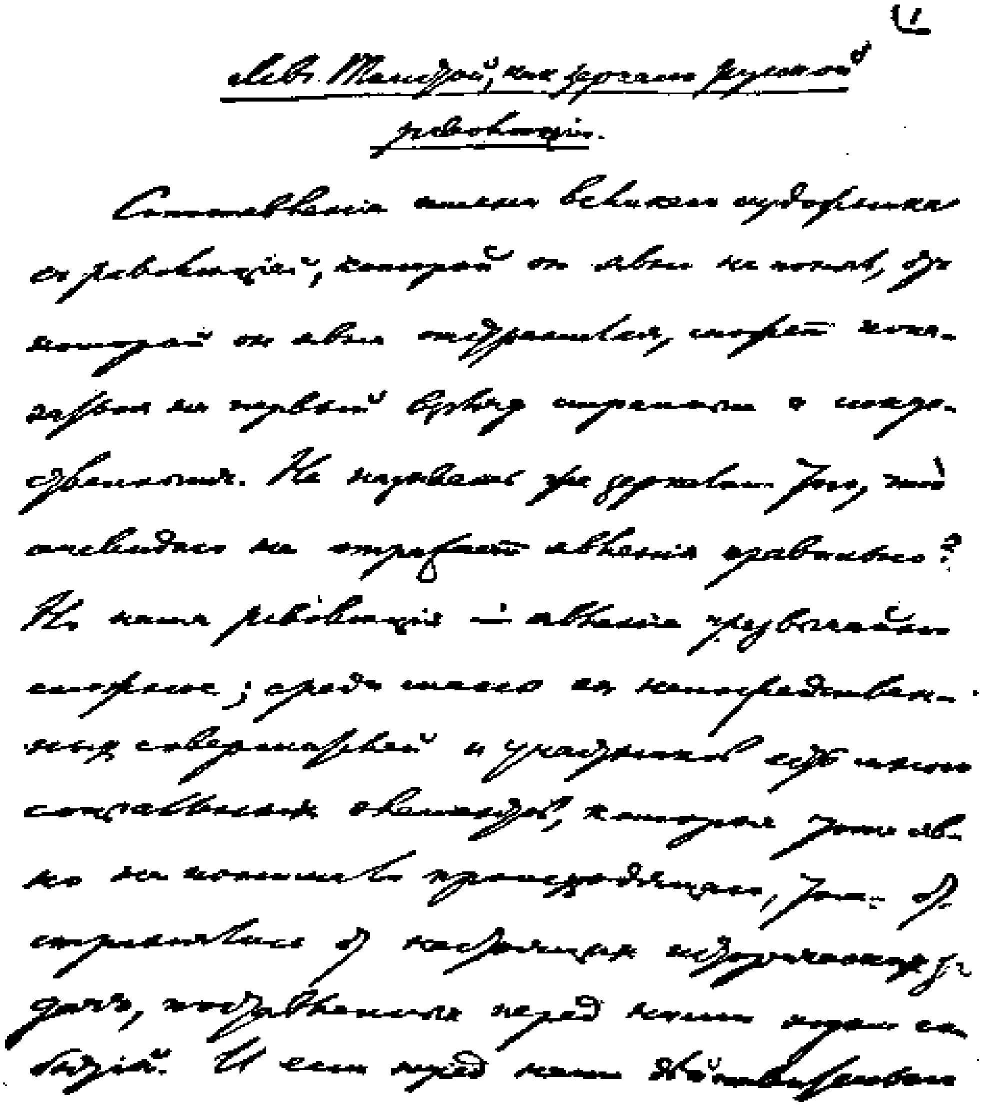
这封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罗·卢森堡同志的这个抗議，对她在国际无产阶級面前維护俄国革命这一点，只能表示欢迎。

载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无产者报"第33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列甯·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覺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現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鏡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現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許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沒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們提出的眞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眞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滿版都是祝賀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書信和短文，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滿着伪善，簡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們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們欺騙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則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請听“言論报”上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吹鼓手吧，他們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的那篇預先



Левъ Толстой, какъ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іи.

Сопоставленіе имени великаго художника съ революціей, которой онъ явно не понялъ, отъ которой онъ явно отстранился, можетъ показаться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ъ страннымъ 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мъ. Не называть же зеркаломъ того, что очевидно не отражаетъ явленія правильно? Но наша революція — явлені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ое; среди массы е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хъ совершителей и участниковъ есть много соціальныхъ элементовъ, которые тоже явно не понимали происходящаго, тоже отстранялись отъ настоящихъ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ъ задачъ,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ъ передъ ними ходомъ событій. И если передъ нами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1908年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一文手稿第1頁

（按原稿縮小）

謀划好的装腔作势的言論和那些冠冕堂皇的空談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贊成托尔斯泰对現行制度的批判。他們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領袖的角色。他們用声嘶力竭的叫嚣淹沒了人們要求对下列問題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現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說、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創作了无与倫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篤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非常有力地、直觉地、眞誠地反对社会的撒謊和虚伪；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謂俄国的知識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說："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現在只吃米粉糰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資本主义的剝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間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現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討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讓有道德信念的僧侶代替有官职的僧侶，这就是說，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侶主义。眞可以說：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貧穷又富饒，
你又强大又軟弱！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絕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絕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說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19世紀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状况。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簡直在遭受資本和国庫的洗劫。农民經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許多世紀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該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評价（这样評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該从反对新兴的資本主义，反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人这样反对）的角度去評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說中的糟粕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資产阶級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創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說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資产阶級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鏡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和拚命战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鏟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級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紅綫貫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驟。毫无疑問，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內容，与其說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們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說更

符合于农民的这种願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問題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爭才能給自己爭得自由，在这个斗爭中他們会有什么样的領导者，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須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們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沒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斗爭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組織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經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談和梦想，写請願書和派“請願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維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問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級走，大多数农民则变成了无原則的、卑躬屈节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俘虏；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識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討价还价，講和妥协，答应和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鏡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軟弱和“善于經营的农夫”迟鈍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說吧。我們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介于农民和无产阶級之間；无产阶級只占少数。因此軍队中的运动，絲毫沒有表現出象在一揮手之間就变成了社

会民主主义者的无产阶級所表現的那种全俄团結一致的精神和对党的認識。另一方面，認为士兵起义失敗的原因是缺乏軍官的領导，这种見解是再錯誤沒有了。相反地，从民意党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現在：拿起武器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活动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軍官們丧魂落魄的“愚昧的畜生”。士兵們对农民的事情充滿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們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軍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們几乎沒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們动搖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們杀了某个可恨的軍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軍官释放了，同官宪进行談判，然后站着給人枪毙，躺下来給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鎖，——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維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經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脫过去的願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修养的缺乏和革命意志的軟弱。历史經济条件旣說明爆发群众革命斗爭的必然性，也說明他們缺乏进行斗爭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敗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打了敗仗的軍队会好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級比作軍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百万农民由于仇恨农奴制地主和他們的政府而团結起来了，推动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爭的条件，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加强。就在农民中間，交换的增长、市場統治和貨币权力的加强，正在日益排除宗法式的古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爭的失敗，毫无疑問得到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軟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

击。分界綫更加清楚了。各阶級、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的教訓影响之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之下，不仅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級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現出鍛炼得愈来愈好、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錯誤愈来愈少的战士！

載于1908年9月11日(24日)
"无产者报"第35号

按手稿刊印
并根据"无产者报"原文作过校訂

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76]

大家知道，英国和德国的資产阶級报刊，特别是街头传单，早就在进行沙文主义的宣传活动，唆使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了。英国和德国的資本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竞爭愈来愈剧烈。英国原先在世界市場上占第一把交椅和独霸一切的时代已經成为过去。德国已經成为一个发展特别快的資本主义国家，它的工业产品愈来愈多地推銷于国外。爭夺殖民地的斗爭、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在資本主义社会已經成为战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无怪乎两国的資本家都認为英德两国的战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两国的軍閥則干脆希望战爭爆发。英国的沙文主义者想破坏危险的竞爭者的力量，趁德国的海軍实力还比英国弱得多的时候就把它消灭掉。德国以暴君威廉二世为首的容克和将軍們迫不及待地想同英国打仗，希望能利用一下陆軍的优势，幻想用庆祝軍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盖德国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滿和阶級斗爭的尖銳化。

英国和德国的工人決定公开出来制止日益增长的战爭威胁。两国的工人报紙早就在同沙文主义和軍国主义进行堅持不懈的斗爭。但是現在需要一种能比报刊更有力地表达工人阶級意志的声明。英国工人決定派遣代表团去柏林，以便通过庄严的示威显示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級团結一致、以战反战的決心。

示威于 9 月 20 日（7 日）星期日在柏林举行。这次英国工人

代表向柏林无产阶級講話沒有受到阻碍。两年前，讓·饒勒斯曾經决定代表法国工人阶級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說，抗議資产阶級沙文主义者，当时德国政府禁止他向德国工人說話。这次德国政府却不敢赶走英国无产阶級的代表。

規模浩大的工人集会是在柏林一个非常大的会議厅举行的，但是不到5 000人就把大厅挤满了，还有好几千人只好留在院子里和街上。維持秩序的是挑选出来的、带紅臂章的工人。德国工会（所謂“自由工会”，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著名領袖列金同志代表德国有政治組織和工会組織的全体工人阶級欢迎英国代表团。他說，在50年以前，法国和英国工人就已經为和平而举行过示威。当时进步的社会主义者还沒有組織起来的群众作后盾。而现在英国和德国的工会一共有430多万会員。现在英国的代表和柏林的集会，代表这支大軍声明，战争与和平問題的决定权掌握在工人阶級手里。

英国工人代表馬迪逊在答詞中痛斥了資产阶級沙文主义的迫害，并且轉交了有3 000名工人签名的“英国工人致德国工人的信”。他指出，在签名者中間，有英国工人运动两个派别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立場极不彻底的“独立工党”的拥护者)。信中指出，战争是为有产阶級的利益服务的。工人群众会肩負战争的全部重担，而有产阶級則利用人民的灾难从中取利。讓工人們团結起来反对軍閥、保卫和平吧！

在英国的其他代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理查·費舍講話后，会議最后一致通过了一項决議，痛斥“統治阶級和剝削阶級自私的和沒有远見的政策”，并且表示决心要依照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議行动，即用一切力量千方百計地防止战争。会議在工

人馬賽曲的歌声中結束。会后沒有举行街头游行示威。柏林的警察和地方軍事当局白等了。德国的慣例是，連工人和平的示威游行也少不了警察和軍队的示威。柏林卫戍部队动員起来了。軍队按照严格計划分布在市內各个地区——主要是为了使人不容易发覺士兵隐藏在哪里，有多少。警察巡邏队在离会場不远的街道和广場上、特别是在通往王宮的馬路上来回巡邏。王宮已經被便衣警察和藏在院內的軍队团团围住。警察的布哨很复杂：各街道口都有一群警察把守，各个"險要的"地方都派有警官，警察自行車队担負偵察任务，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軍事当局，运河的桥梁和渡口的守卫加倍地森严。对于威廉二世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切措施，"前进报"[77]諷刺道："保卫了受威胁的君主国。"

我們再补充一句：这是举行了一次演习。威廉二世和德国資产阶級举行了一次同起义的无产阶級作战的軍事演习。这样的演习无論如何对工人群众和士兵都是絕对有益的。正如法国工人歌曲中所說的，Ça ira（我們一定会成功）。一次再次的演习也許在目前还是十分緩慢地、然而是十分隐妥地导致伟大的历史結局。

写于1908年10月3日
（16日）以前

1933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25卷

按手稿刊印

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

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已經宣布罢課。其他許多高等学校都紛紛响应。运动已經蔓延到莫斯科和哈尔科夫。根据外国的和俄国的报紙以及从俄国来的私人信件中的一切資料来判断，我們正面临着相当广泛的学院运动这个事实。

倒退到旧时代！倒退到革命前的俄国，上述事变首先証明的就是这一点。执政的反动派依旧紧紧地控制着大学。在专制俄国长期以来的对学生团体的压制采取了黑帮大臣什瓦尔茨（他是得到"首相"斯托雷平的完全同意才行动起来的）的进軍形式，把矛头針对着1905年秋天答应給予大学生的自治权（那时，专制政府在革命工人阶級的猛烈攻击下什么都"答应"給俄国公民！），大学生在专制政府"顧不上大学生"的时候曾經享有过这种自治权，可是只要专制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它就不能不开始剝夺这种自治权。

自由派的报刊依旧在哀号和埋怨——这一次是和某些十月党人一起哀号和埋怨的，教授先生們在哀号和啜泣，他們一方面恳求政府不要走上反动的道路，而要利用极好的机会在"苦于动蕩的国家"內"用改良来保証和平与秩序"，同时又恳求大学生不要采取违法的、只能为反动派效劳的手段，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老而又老的唱俗了的調子，它們把大約20年前，即上一世紀80年代末期的情景又十分生动地重現在我們眼前！如果孤立地考察目前的形

势而不把它同三年革命的經历联系起来，那末那个时期和現在相似的地方就会显得特别惊人。因为杜馬（初看起来）仅仅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現了和革命前完全相同的力量对比：野蛮的地主的統治，——他們宁願通过自己的官僚兄弟来联系宮廷和影响宮廷而不要任何代議机关；商人（十月党人）对这些官僚的拥护，——他們不敢和父亲般的恩人断絕关系；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反对派立場”，——他們最关心的是証明自己的忠誠，并且把規劝当权者的行动叫做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杜馬中的工人代表很少令人想起不久以前无产阶級的公开的群众斗爭曾經起过怎样的作用。

試問，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能不能認为大学生的原始学院斗爭的旧形式是有意义的？如果自由派已經墮落到80年代的“政策”（当然在这里只能是在嘲弄的意义下談論政策），那末，要是社会民主党認为必須采取某种方式支持学院的斗爭，它是否算是降低了它的任务呢？

这个問題大概是由某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党員提出来的。至少本报編輯部已經收到了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組的一封信，信中順便談到：

“彼得堡大学9月13日的学生大会以什瓦尔茨采取了进攻策略为理由，决定号召学生参加全国的大学生罢課；罢課的行动綱領是学院式的，大会甚至欢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教授会議在爭取自治权的斗爭方面所走的‘第一步’。我們对彼得堡大会所提出的学院式的行动綱領感到不可理解，并且認为它在目前条件下是不能容許的，而且也不能团結大学生去进行积极的、广泛的斗爭。我們認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决不可以孤立地进行。能够团結大学生的因素目前还沒有具备。所以我們反对学院式的发动。”

写这封信的人所犯的錯誤的政治意义，比人們初看起来所能

想到的大得多，因为他們的議論在实質上所触及的題目要比参加当前的罢課的問題广泛得多，重要得多。

“我們認为大学生的发动只能配合总的政治发动。所以我們反对学院式的发动。”

这种議論是根本錯誤的。在这里，大学生的政治发动必須竭力同无产阶級相配合等等的革命口号，正在从指导日益广泛、日益全面的战斗性宣传工作的活的指南变为机械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运动方式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死教条。翻来复去地講革命教訓中“最大的教訓”，仅仅宣布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那是不够的。为了进行政治发动，必須善于进行宣传，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条件，首先是最大量地利用某些先进分子同专制制度的任何群众性的冲突来进行宣传。当然，問題并不在于必須預先把任何学生运动都分为一些必經的“阶段”，必須注視每一阶段的精确的进程，害怕“不适时地”轉向政治等等。这种观点是最有害的学究气，而且只能导致机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由于錯誤地把口号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願理会当前群众运动中事实上已經形成的情况和条件，这种相反的錯誤同样是有害的：这样运用口号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空談。

学院运动可能会降低政治运动，分散政治运动或者使人們离开政治运动，在出現这种情况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大学生小組当然必須集中宣传来反对这种运动。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当前的客观政治条件是另外一种：学院运动标志着多少已經习惯于狹隘自治权的新的“一代”青年学生的运动的开始，而且这个运动是在目前沒有其他群众斗爭形式的情况下，即在广大群众繼續默不作声地、聚精会神地、慢慢地消化三年革命經驗的沉寂时期开

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如果“反对学院式的发动”，那就大錯特錯了。不，屬于我們党的大学生小組应当尽一切努力去支持、利用和扩大这个运动。正如社会民主党对原始的运动形式的每一种支持一样，现在的支持也应当首先并且主要是从思想上和組織上去影响那些被冲突所激动并且在这种形式的冲突中往往感到是在經历第一次政治冲突的更广大的阶层。因为最近两年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几乎是完全过着脫离政治的生活，受着狹隘的学院式的自治主义精神的熏陶，不仅受着官方教授和政府报刊的教育，而且受着自由派教授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教育。对这些青年来說，广泛的罢課运动（如果这些青年能够造成广泛的罢課运动的話！我們应当尽一切力量在这方面帮助他們，但是保証这种或那种資产阶級运动成功当然不是我們社会党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冲突的开始，而不管参加斗爭的人是否意識到这一点。我們的任务是对“学院式的”抗議者群众說明这一冲突的客观意义，竭力使这一冲突成为自觉的政治运动，十倍地加强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組的宣传活动，并且把这种活动全部集中于使人們領会从三年历史中得出的革命結論，使人們懂得新的革命斗爭的不可避免，使我們的仍然完全合乎潮流的老口号，即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議的口号，重新成为討論的对象，成为在政治上集中民主派新生一代的試金石。

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党員在任何条件下都沒有权利拒絕这件工作，不管这件工作在目前是多么困难，不管某些宣传員在某个大学里、在某个同乡会里、在某个集会上……遭到多么大的挫折，我們还是要說：要推动工作，要开口說話！政治宣传工作是决不会白做

的。它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以我們能不能馬上获得多数或者能不能使人們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来衡量的。也許我們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們是有組織的无产阶級政党，决不要对暂时的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頑强地、勇往直前地、坚韌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我們在下面发表了圣彼得堡大学生联合委員会的宣言，这个宣言表明，就連最积极的大学生也頑强地抱着純粹的学院主义不放，暂时还附和着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調子。而且这样的事情正是发生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报刊以最卑鄙的态度对待罢課、在斗爭最激烈时出来論証罢課是有害的、犯罪的等等的时候。我們党的彼得堡委員会認为必須給联合委員会以反击，这是我們不能不欢迎的(参看"党的生活"栏[78])。

显然，为了把現今的大学生从"学院派"变为"政治家"，什瓦尔茨的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須有日益增多的黑帮司务长的蝎子，才能使新的干部受到充分的革命教育。对于这些受过斯托雷平的全部政策的訓練、受过反革命的每一个步驟的訓練的干部，我們社会民主党也应当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因为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資产阶級民主主义和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新的冲突的客观必然性，而专制制度又是和黑帮及十月党人的杜馬勾結在一起的。

是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因为拉着俄国向后轉的黑帮反革命不仅鍛炼着革命无产阶級队伍中的新战士，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新的非无产阶級的(即資产阶級的)民主运动(这当然不应当了解为一切反对派都参加斗爭，而应当了解为眞正的民主派即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中能够进行斗爭的分子广泛地参加斗爭)。1908年俄国大学生的群众斗爭的开始是一个政治上的征兆，是反革命

所造成的整个目前形势的征兆。青年学生同中下层資产阶級、小官吏、某些农民集团及僧侶集团等等有千絲万縷的联系。既然在1908年的春天有人企图恢复"解放社"，比立宪民主党人的、半地主的、彼得·司徒卢威所代表的旧的"解放社"要左一些的"解放社"①，既然在秋天俄国最接近于民主派資产阶級的青年群众开始鬧起风潮，既然卖身求荣的文人比过去凶狠十倍地重新向着学校里的革命狂吠，既然卑鄙齷齪的自由派教授和立宪民主党領袖因不合时宜的、危险的、毁灭性的、对可爱的十月党人不利的、能够"推开"十月党人、"推开"握有統治权的十月党人的罢課而呻吟和哭泣，这就是說，火药桶里正在增加新的火药！这就是說，对反动的反动已經不只是在大学生中間开始了。

尽管这个开始还很微弱还在萌芽，但工人阶級的政党必須利用它而且也正在利用它。我們有本領在革命前工作几年、几十年，把革命口号首先在小組內提出，然后在工人群众中，然后在街头，然后在街垒上提出。我們现在也应当有本領把那些是当前任务的事情首先安排妥当，否则关于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的議論就会变成空話。这些事情就是：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級組織，为自己的革命口号普遍地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我們的各个大学小組也应当在自己的大学生中間着手建立这种組織，应当在当前运动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这种宣传。

无产阶級是不会坐着等待的。他們往往在聚餐会上、在合法的团体中、在大学里面、在代議机关的講坛上把发言的优先权讓給資产阶級民主派。但是它从来沒有而且永远不会在严肃的、伟大

① 見本卷第45—49頁。——編者注

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讓出优先权。促使这个斗爭爆发的全部条件是不会象我們当中的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和那样容易地成熟起来的，但是这些条件正在成熟，而且一定会成熟起来。小型的学院式的冲突的小开始也就是大开始，因为紧随着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而来的将是大規模的繼續。

载于1908年10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36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

最近一个时候，关于巴尔干事变的消息和議論不仅充滿了俄国的政治报刊，而且充滿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报刊。欧洲爆发战爭的危险曾一度迫在眉睫，現在也还远沒有消除，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仅仅叫嚣和空喊一番，而不至于眞的爆发战爭。

我們来粗略地看一下危机的性質和危机給俄国工人政党带来的任务。

日俄战爭和俄国革命特别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覚醒。但是这种覚醒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十分緩慢，以至俄国反革命在波斯起了并且还繼續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土耳其革命一下子就碰上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們的反革命联盟。的确，后一論断初看起来是同欧洲报刊和各种外交声明的总的腔調相矛盾的：听听这些声明，翻翻半官方刊物上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所有的声明和文章都充滿了对已經复兴的土耳其的“同情”，都只希望在土耳其巩固和发展宪制，都大大称贊資产阶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

但是所有这些言論都不过是現代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現代欧洲反动資产阶級卑鄙无耻的資产阶級伪善行为的典型。事实上，无論哪一个自称民主的欧洲国家，无論哪一个标榜民主、进步、自由、激进等等的欧洲資产阶級政党，都絲毫不能証明自己眞正願意

帮助土耳其革命，眞正希望这个革命得到胜利和巩固。相反地，它們全都害怕土耳其革命的成功，因为这个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必然是爭取独立自主、爭取眞正民主的願望在巴尔干各国人民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必然是波斯革命的胜利、亚洲民主运动的新的推进、印度爭取独立的斗爭的加强，是在漫长的俄国国境綫上建立起自由制度，从而为阻难黑帮沙皇政府的政策和促进俄国的革命高涨創造新的条件，如此等等。

目前在巴尔干、土耳其、波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質就是欧洲列强結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我們的各国政府的一切努力、欧洲各“大”报的一切宣传，都不过是为了掩飾这个事实，混淆社会輿論，用伪善的言詞和外交家的手法来掩盖欧洲的所謂文明国家为对付文明程度最低却最渴望民主的亚洲国家而組成的反革命联盟。无产阶級在这个关头所采取的政策，全部实質就在于，揭下資产阶級伪君子的假面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們国內的无产阶級的斗爭而对亚洲革命扮演着或帮助扮演宪兵的角色。

欧洲各国对土耳其和巴尔干的一切事变都裹上了密密层层的阴謀的罗网，普通的老百姓都上了外交家的当，这些外交家力图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枝节問題、局部問題上面，轉移到正在发生的事变的个別方面，力图模糊整个过程的意义。然而，我們的任务，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向人民說明事变的总的联系，說明正在发生的整个事变的基本趋势和背景。

企图“捞一把”，希望扩大自己的領地和殖民地的資本主义列强之間的竞爭以及对附屬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

运动的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人們称贊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与愼重，也就是称贊土耳其革命的軟弱无力，称贊这个革命不去喚醒下层人民，沒有使群众获得眞正的独立，称贊这个革命敌視正在奥托曼帝国展开的无产阶級斗争，与此同时，人們还是照旧地掠夺土耳其。人們所称贊的是可以繼續照旧掠夺土耳其領地。一面称贊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繼續推行显然是瓜分土耳其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萊比錫人民报”（社会民主党地方机关报）极其正确而又中肯地写道：

“1791年5月，眞正关心祖国福利的有远見的国家活动家在波兰实行了政治改革。普魯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称贊5月3日的宪法，欢迎这个宪法，把它看作‘造福于邻邦’的事情。全世界都大大贊揚波兰的改革者，說他們和巴黎的可怕的雅各宾派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地‘温和’…… 1793年1月23日，普魯士、奥地利和俄国签訂了瓜分波兰的条約！

1908年8月，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政治改革，而且进行得异常平稳。全世界都称贊他們，說他們和俄国的可怕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做起事情来是彬彬有礼地‘温和’…… 1908年10月，爆发了一系列导致瓜分土耳其的事变。”

事实上，如果有誰想相信外交家的言論，而不考虑他們的行动，不考虑列强集体反对革命的土耳其的举动，那简直是幼稚。只要把某些国家的外长、首脑的会晤和談判的事实同以后发生的事变对照一下，对外交家的声明的天眞的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了。在8月和9月間，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发生以后和奥地利与保加利亚发表宣言之前，伊兹沃尔斯基在卡尔斯巴德和馬利延巴德同英王爱德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克列孟梭会晤，奥地利外交大臣馮·艾倫达尔同意大利外长齐托尼在薩尔茨堡会晤，然后是伊兹沃尔斯基同艾倫达尔于9月15日在布赫洛耶会晤，保加利亚

大公斐迪南同弗兰茨-約瑟夫在布达佩斯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同德国外长馮·雪恩、然后同齐托尼和意大利国王会晤。

这些事实是不說自明的。在奧地利和保加利亚出动以前，一切重大問題都已經在俄、奧、德、意、法、英等六国之間，在国王和大臣們的私人会晤中以最秘密的和直接的方式談妥了。后来报紙上展开的关于艾倫达尔說意、德、俄已同意奧地利兼并（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一事是否属实的对駡，完全是一場滑稽剧，完全是为了轉移視綫，只有自由派庸人才会上这个当。掌握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巨头，伊兹沃尔斯基、艾倫达尔和一伙戴王冠的强盗及其大臣們，故意把骨头扔給新聞界：先生們，請咬架吧！究竟誰欺騙了誰，誰得罪了誰，是奧地利欺騙了俄国呢，还是保加利亚欺騙了奧地利，如此等等，誰“第一个”撕毁柏林条約[79]，誰又是怎样对待大国会議計划，如此等等。請吧，請讓輿論去注意这些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啊！太重要了！）問題吧！我們需要的正是掩盖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即在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进一步采取瓜分土耳其的步驟、利用某种借口来重新审查达达尼尔海峽問題、允許俄国黑帮沙皇扼杀波斯的革命这些根本問題上已經事先达成的协議。这就是問題的全部实質，这就是我們这些全欧洲的反动資产阶級的領袖眞正需要的和正在干的事情。讓自由派的傻瓜們在报刊上，在議会里去空談事情是如何开头的，誰講了什么話，殖民掠夺和鎮压民主运动的政策是在什么伪装之下最后形成、签署并公布于世的。

欧洲各大国的自由派报刊（目前吃得最“飽”的奧地利除外）現在都在責难本国政府維护本民族利益不够。每个国家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描写成最无能的，最不会“利用”时机的，受

别人欺騙的，等等。我們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他們早就說过奧地利的胜利使他們感到“羡慕”(米留可夫先生的原話)。自由資产者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我們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完全是最丑恶的伪善行为，是对真正的进步和自由的最卑鄙的叛卖。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故意不談反动政府的阴謀，模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識；第二、它推动每个国家走上所謂积极外交政策的道路，即贊同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干涉巴尔干半島事务(这种干涉从来就是反动的)的做法；第三、这个政策直接为反动派效劳，因为它使人民只去关心：“我們”能得到多少，“我們”在分賍的时候能分得多少，“我們”能占多少便宜。目前，各国反动政府最需要的，正是引用“社会輿論”来替自己的掠夺行为或取得“賠偿”等等的要求做后盾。它們說，你們看，我国的报刊都在責备我过于大公无私，对本民族利益捍卫得不够，說我太容易讓步，并且用战争来威胁我，可見，我的要求是最“低的和最公平的”，是完全应当得到滿足的！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欧洲自由資产者的政策一样，就是討好反动政府，維护殖民侵略、掠夺以及对他国事务的干涉。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种政策是打着“反对派”的幌子推行的，这就能迷惑許許多多的人，使那些不信賴俄国政府的人信賴政府，使群众的意識模糊起来。所以，我們的杜馬代表和我們的一切党組織必須注意，不通过杜馬講坛、传单和会議来說明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虛伪的反对派立場之間的种种联系，就不可能在社会民主党人就巴尔干事变进行的教育、宣传工作方面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說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策的同一种实質，就不可能向人民說明沙皇

政策的全部危害性和反动性。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高談闊論、矫揉造作、吞吞吐吐、轉弯抹角的伎俩，就不可能揭露对外政策中的沙文主义和黑帮路綫。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說明对自由資产阶級观点的迁就使社会党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麦克斯·席佩耳在机会主义者的著名机关刊物《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社会主义——??? ——月刊”）上就巴尔干的危机写道：“几乎一切有头脑的党員都認为，如果不久以前在我們的柏林中央机关报上（即在《Vorwärts》① 上）重复过的意見，即認为德国无論从現在的或是将来的巴尔干政变中都将一无所得的那种意見占了优势，那将是一个錯誤。当然，我們不应該去爭夺領土…… 但是，各大国在这个介于欧洲、整个亚洲和部分非洲之間的重要的关鍵地区大規模地重新配置力量，无疑是会最直接地損害我們的国际地位的…… 俄国这个反动的庞然大物現在根本不能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无論如何，不管怎样，我們都沒有理由把俄国看做敌人，象 60 年代的民主派把它看作敌人那样。”（第 1319 頁）

这个給自己戴上社会主义者假面具的愚蠢的自由派，竟察觉不出俄国“关心”“斯拉夫兄弟”的反动阴謀！他說“我們”（代表德国資产阶級），“我們的”地位如何如何，却旣沒有看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的打击，也沒有看出俄国反对波斯革命的步驟！

上面所引的这段話刊載于 10 月 22 日出版的那一期杂志上。10 月 18 日（5 日）“新时报”80 刊登了一篇轟动一时的文章，說什么“大不里士的混乱已經达到难于置信的程度”，什么这个城市“已被

① “前进报”。——編者注

半野蛮的革命者毁坏和劫空了一半”。你們可以看出，革命一战胜波斯王在大不里士的軍队，俄国半官方报刊立刻就暴怒若狂。波斯革命軍队的領袖薩塔尔汉在这篇文章中被說成“阿德尔拜疆的普加乔夫”(阿德尔拜疆或阿捷尔拜疆是波斯北部的一个省；該省的首府是大不里士，根据萊克留的統計，該省居民几乎占全部波斯居民的 $^1/_5$)。“新时报”写道：“所有这些很不象話的事情使得我国在波斯边界上数以百万計的貿易遭到破坏，試問，俄国能够无止境地容忍下去嗎？…… 不应当忘記，南高加索的整个东部和阿德尔拜疆从人种学上看是一个整体…… 住在南高加索的韃靼半知識分子忘記了自己是俄国臣民，竟热烈地参加大不里士的騷乱，派遣志願軍到那里去……对我們来說，重要得多的是使邻近我国的阿德尔拜疆平靜下来。虽然俄国极不願意进行任何干涉，但是情况可能迫使俄国担負起这个責任，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10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报”收到彼得堡的电訊，說占領阿德尔拜疆是俄国打算取得“賠償”。10月24日(11日)該报刊登了来自大不里士的电訊：“配有相当数量的騎兵和炮兵的6个俄国步兵营已于前日越过波斯国境，今日已在大不里士听命待发。”

麦·席佩耳象奴才一样重复着自由派报刊和警察报刊的保証和叫嚣，对德国工人說，俄国作为反动的庞然大物的意义已經成为过去，把俄国看成敌人无論如何是錯誤的！就在这一天，俄国軍队越过了波斯国境。

暴君尼古拉的軍队对波斯革命者的一場新的屠杀就要来临了。随着非正式的利亚霍夫的干涉而来的是正式占領阿德尔拜疆，并在亚洲重演1849年俄国在欧洲所干的勾当。当时，尼古拉一世派遣軍队鎮压匈牙利的革命。当时，在欧洲資产阶級政党中还有

真正的民主派，它能够为自由斗爭，而不象現在的一切資产阶級民主派那样，只会伪善地空談自由。当时俄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至少是鎮压了某几个欧洲国家。而現在，欧洲所有的大国，“血紅的”克列孟梭的“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对国內民主力量的任何一点有利于无产阶級的发展都害怕得要命，都帮助俄国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

毫无疑問，俄、奥、德、意、法、英六国的九月反动密約，包括了俄国有反对波斯革命的“行动自由”。至于这一点是不是写在什么秘密文件上，經过許多年以后将收入历史資料汇編出版；或者只是伊茲沃尔斯基向他的最亲切的会談者談过这一点；或者是这些会談者自己“暗示过”：我們从“占領”轉为“兼并”，而你們也許可以从利亚霍夫的干涉轉为“占領”；或者是采用了其他某种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不管大国之間的九月反革命密約的形式多么不完备，这个密約却是事实，它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是反对无产阶級和反对民主的密約。这是为了直接鎮压亚洲革命或間接打击这个革命的密約。这是为了今天在巴尔干、明天在波斯、后天或許在小亚細亚、在埃及等地繼續进行殖民掠夺和領土侵占的密約。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級革命才能推翻这种戴王冠的强盜和国际資本的联合势力。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揭穿各国外交家的把戏，清楚明白地摆出一切事实，表明一切盟国所起的卑鄙的作用，不管这个盟国是直接起宪兵的作用，还是充当宪兵的帮凶、伙伴或資助者。

在杜馬中即将听取伊茲沃尔斯基的报告和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的質詢，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杜馬代表，現在肩負着一項

非常艰巨但又非常崇高、伟大的責任。他們所在的机构在掩飾主要的反动国家、主要的反革命阴謀者的政策，因而他們应当有本領，有勇气說出全部眞相。在现在这种时候，黑帮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有許多有利条件，但是也有許多事情要他們去做。除了他們，杜馬中再沒有别人能够不从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发出反对沙皇制度的呼声。而立宪民主党人在同样的时間和同样的情况下所表示的“抗議”，比什么东西都更坏，因为这只能是同一群資本主义豺狼为了替同一种豺狼政策辯护而发出的抗議。

願我們在杜馬中的党組織以及其他一切党組織都开始做起来吧。现在向群众进行宣传，其意义要比平常大一百倍。在我們党的整个宣传工作中，有三件事情应該提到首要地位。第一、同一切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报刊(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都包括在內)相反，社会民主党要揭露各种会議、大国协定、与英国結成的反奥同盟或与奥地利結成的反德同盟或其他任何的外交把戏。我們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列强的反动密約这一事实，这个密約已經成立，各国政府都极力想用比較公开的談判这种滑稽剧来掩飾这个密約。反对外交家的滑稽剧，向人民說明事情的眞相，揭露反无产阶級的国际反动派！第二、我們必須闡明这个密約所造成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結果，即打击土耳其革命，促使俄国扼杀波斯革命，干涉他国事务，破坏民主和民族自决权这个基本原則。我們的綱領同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一样，是要捍卫这种权利的。奥地利人和俄国黑帮分子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籍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阴謀。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残某些巴尔干国家的眞正的民主。大国对巴尔干国家的唯一眞誠的“关怀”可能是并且

只能是一种关怀，这就是讓它們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以外国干涉去破坏它們的生活，不去阻挠土耳其革命。但是，工人阶級当然不能坐等資产阶級采取这种政策！

一切資产阶級政党——直到名称上最主张自由的和最"民主"的政党，包括我們的立宪民主党在内——都拥护資本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的第三件事情。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实質上都贊成資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賽，只是强調这种竞賽要采取不同于黑帮所采取的形式，只是要求訂立不同于政府現在所依靠的那种国际协定。自由派这样反对資产阶級对外政策的一种形式而主张同一政策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样責备政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掠夺和干涉方面！），这就对群众起着特别能把他們引入歧途的影响。我們要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資本主义爭夺他国領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場、海峽等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不贊成那种認为資本主义可以"和平地和正义地"发展的荒謬的市儈的空想。社会民主党反对整个資本主义社会，它懂得，除了国际无产阶級革命，世界上再沒有别的和平和自由的保护者了。

附言：这篇文章付印以后，报上发表了彼得堡通訊社的一則电訊，否認俄国軍队越过波斯国境的消息。这則电訊登在10月24日的"法兰克福报"早刊第二版上面。在第三版上登了君士坦丁堡10月24日晚10点50分发出的电訊，說10月24日晚在君士坦丁堡获悉，俄国軍队已越过波斯国境。国外的报刊，除社会党的报刊以外，目前都对俄国軍队侵入波斯一事保持緘默。

总之，暂时我們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全部眞相。但是，无論如何圣彼得堡通訊社发出的沙皇政府的"辟謠"是不足信的。俄国得到

大国的同意，正在用一切办法——从阴謀活动到派遣軍队——来反对波斯的革命，这是事实。俄国执行着目的在于占領阿捷尔拜疆的政策，这也是毫无疑問的。即使軍队还沒有越过国境，那也一定在这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无火决不会生烟。

载于1908年10月16日（29日）
"无产者报"第37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并根据手稿作过校訂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81]会議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于新历10月11日(星期日)在布魯塞尔举行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議。各国社会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正是举行社会党新聞工作者代表会議和社会党議員代表会議的好时机。前一个代表会議是在执行局会議前一天举行的，第二个代表会議是在执行局会議后一天举行的，同时还必須指出，参加这两个代表会議的人几乎都是执行局的成員；执行局的委員大多数既是新聞工作者又是議員。只有几名比利时社会党代表仅仅参加了10月12日(星期一)的代表会議。

新聞工作者代表会議是星期六下午三时举行的。会上討論了改进和加强各国社会党的定期报刊的联系問題。比利时的代表提出了該党的党員通訊員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願意（主要）就某方面的問題向其他党的刊物提供材料。会上大家希望其他党也能够提出这样的名单，并且指出，必須注明通訊員精通哪一种語言。社会革命党的国外公报(法文版的“俄国論坛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国外公报（德文版[82]）被認为是对我們的外国同志特别有益的出版物。同时还指出，凡是有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有一个党內的不同派别存在的国家，都必須在名单上注明通訊員属于哪一个党派等等。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該利用这个国际代表会議来更正确地安排向外国的社会党报刊提供通訊报道的工作。

代表会議决定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同那些还沒有社会党日报的国家商量出版定期公报的問題(用"国际"的三种正式語言法語、德語、英語中的一种出版，或者用所有这三种語言出版)。然后，执行局又詢問各国社会党日报編輯部，在按期收到这些公报时他們同意付多少款。

我們党的中央委員会国外局[83]应当特别重視这項决議。向我們的外国同志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件工作做得远远不能令人滿意，应該立即認眞地討論关于改进这件工作的問題，在国外用三种語言出版党的公报的問題，并且尽一切可能来切实地实現这个計划。

其次，討論了执行局書記卡·胡斯曼的一項建議，即拥有70种党的日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开始在柏林、維也納、巴黎、布魯塞尔等地的社会党报紙編輯部之間建立国际电訊联絡局。德国代表們認为，立即实現这个計划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指出，德国最近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情报局，等将来这件事情完全就緒以后，就可以考慮把它改为国际情报局。代表会議对这个諾言表示滿意；会議决定今后仍将同时召开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議和各国社会党新聞工作者代表会議，接着就宣布閉幕。

当天晚上在《Maison du Peuple》①举行了国际群众大会，奥地利、德国、英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在大会上講了話，主要是講国际冲突和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級为保卫和平而斗爭的問題。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內容如下的决議："10月10日(新历)在'民众文化館'举行的国际群众大会再一次証明，全世界无产阶級

① "民众文化館"。——編者注

有极大的决心来捍卫各国之間的和平，全力反对毁灭和压迫各国人民的資本主义軍国主义。大会相信，工人'国际'的各国支部将充分运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就这个問題通过的决議。"大会在"国际歌"的歌声中結束。

第二天，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会議开了一整天。議程上的第一个問題，接受英国"工党"(Labour Party)加入的問題占去了一整个上午。問題在于：根据"国际"的章程，只有第一、承認阶級斗爭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第二、主张进行阶級斗爭的工人組織(即工会)，才能够成为"国际"的成員，而最近在英国下院成立的"工党"沒有公开地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也沒有坚定而明确地承認阶級斗爭的原則(附带提一下，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是要求它承認这一点的)。但是，显然过去整个"国际"，特别是斯图加特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是允許这个"工党"参加的，因为这个党实質上是介乎"国际"章程第1第2两項規定的两种类型之間的組織，是英国工联的政治代表机关。尽管如此，接受这个党加入的問題还是提出来了，而且是这个党自己通过所謂"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英国人称之为 I. L. P.)提出来的。"独立工党"是"国际"英国支部的两个分支之一，另一个分支是"社会民主党人联盟"。

"独立工党"要求直接承認"工党"是"国际"的一个成員。这个党的代表布魯斯·格萊济尔(Bruce Glazier)坚持說，几十万有組織的、愈来愈明确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議会里的这个代表机关是有重大作用的。他非常輕視原則、公式和基本信念。考茨基回答了他的意見，表示不同意这种輕視社会主义的原則和最終目标的看法，但是他完全贊成接受实际上在进行阶級斗爭的"工党"加入。考茨基提出了一个决議案，内容如下：

"鉴于从前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議准許一切主张进行无产阶級阶級斗爭并承認政治斗爭的組織加入国际，国际执行局宣布准許英国的'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因为該党虽然沒有直接(ausdrücklich)承認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但是实际上在进行这种斗爭并且正在阶級斗爭的基础上成为不依賴于資产阶級政党的自己的組織。"贊成考茨基的有奥地利的代表，有法国的瓦尔扬，另外，由表决的情形看出，大多数小国的代表也贊成他。首先反对他的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代表海德門，他要求在"工党"直接承認阶級斗爭和社会主义的原則以前，一切暂时保持原状，接着反对他的有魯賽尔(盖得派，过去是法国的第二个女代表)、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魯巴諾維奇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革命派的代表阿夫拉莫夫。

我发言贊成考茨基决議案的第一部分。既然以前的代表大会已經讓所有的工联、甚至那些把自己的代表权讓給資产阶級議員的工联参加，现在就不能拒絕"工党"即工联的議会代表机关参加。但是，考茨基决議案的第二部分，我說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工党"并不是眞正不依賴于自由派，也不是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級政策。因此我建議修改一下，即在决議案的末尾，从"因为"二字以后写道：

"因为它("工党")是英国眞正的无产阶級組織走向自觉的阶級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我向执行局提出了这个修正案。考茨基沒有采用我的修正案，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声称，国际执行局不能根据"期望"来作决議。但是，主要的斗爭是在整个考茨基决議案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間进行的。在表决时，阿德勒提議把决議分成两部分表决，結果两部分都被国际执行局通过了，

第一部分有3票反对，1票弃权，第二部分有4票反对，1票弃权。于是考茨基的决議案就成了执行局的决議。魯巴諾維奇在两次投票中都弃权。我还要指出一点，即在我发言以后和考茨基第二次发言以前，維克多·阿德勒曾这样反駁过我：(我引用最詳細、最确切地报道了会議情况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Le Peuple》①的报道)“列宁的建議是迷人的(séduisante，阿德勒說的是：verlockend，誘人的)，但是它不能使我們忘記一个事实：‘工党’是在資产阶級政党之外建立起来的。至于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不是我們要判断的事情。我們要承認进步的事实。”

国际执行局在这个問題上的辯論情况就是这样。現在我要更詳細地談談这些辯論，以便向“无产者报”的讀者說明我所采取的立場。維·阿德勒和卡·考茨基的理由并沒有使我信服，我仍然認为他們是錯誤的。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議案中說“工党”“沒有直接承認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这无疑就是在“工党”目前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和它应当采取什么政策这个問題上說出了某种“期望”、某种“判断”。不过考茨基是間接地說出这一点，而且在說出这一点时得出的論断，第一、实質上是錯誤的，第二、給別人以曲解考茨基的意思的借口。至于說英国“工党”在議会中(不是在选举中！不是在自己的整个政策上！不是在自己的宣传和鼓动上！)离开了資产阶級政党，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級群众組織的阶級政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是无可爭辯的。这不是“期望”，而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使我們不得不接受“工党”加入“国际”，何况我們已經接受了工联。最后，这种措詞会使几十万十分尊重“国际”的决議、但是还

① “人民报”。——編者注

沒有完全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人再一次地考虑一下，为什么認为他們只是走了第一步，以后在这条路上的步驟該是怎样的。在我的措詞中，絲毫沒有妄想由“国际”来解决該国工人运动的具体的、細节的問題，来确定进一步的步驟必須在什么时候采取和怎样采取。进一步的步驟无論如何是需要的，这对于还沒有直接地明确地接受阶級斗爭原則的政党来說是不能不承認的。这一点考茨基在自己的决議案中是間接承認的，不是直接承認。这样一来，似乎“国际”担保“工党”实际上在进行徹底的阶級斗爭，似乎只要工人的組織在議会中形成单独的工人团体，就可以在一切行动上不依賴資产阶級了！

当然，海德門、魯賽尔、魯巴諾維奇和阿夫拉莫夫在这个問題上采取的立場就更錯誤了（魯巴諾維奇在表决决議案的两个部分时都弃权，这不但沒有糾正自己立場，反而造成立場混乱）。阿夫拉莫夫說接受“工党”就等于鼓励机会主义。这是异常錯誤的意見，只要重溫一下恩格斯給左尔格的信就明白了。恩格斯在許多年当中始終認为，以海德門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犯了錯誤，他們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行动，不善于附和工联的不自覚的、但是强有力的阶級本能，他們把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可是馬克思主义应当是“行动的指南”84。当客观条件妨碍无产阶級群众的政治自覚性和阶級独立性的发展时，就应当善于耐心地、坚定地同他們一起工作，在自己的原則上毫不讓步，但是不放弃在无产阶級群众当中的活动。后来事件的发展証实了恩格斯的这些教訓，閉关自守的、貴族味十足的、市儈利己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英国工联，出現了許多公开出卖工人阶級的叛徒，他們为了謀得大臣席位而卖身給資产阶級（如坏蛋約翰·白恩士之流），但是英国工

联却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尽管它們走得不敏捷、不彻底、不直接，但毕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現在，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級当中迅速传播，社会主义在英国又在成为群众运动，大不列顛的社会革命日益迫近，这一点只有瞎子才看不到。

如果"国际"不直接地坚决地充分支持英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这一巨大的进步，不鼓励在資本主义搖籃中开始发生的伟大轉变，那是根本錯誤的。但是，絕不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現在就可以承認"工党"是实际上不依賴于資产阶級的、在进行阶級斗爭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应当糾正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一个明显的錯誤，但是絲毫也不应当鼓励領导所謂"独立工党"的英国机会主义者的另一些明显的、同样重大的錯誤。这些領导人是机会主义者，这是无庸爭辯的。"独立工党"(I. L. P.)的領袖拉·麦克唐納甚至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議对"国际"章程第2条作如下的修改：只要工会有誠意(bona fides)就可以加入"国际"，不必承認阶級斗爭。考茨基自己立刻就听出了布魯斯·格萊济尔話中的机会主义調子，并且在执行局的发言中进行了駁斥，可惜的是沒有在自己的決議案里进行駁斥。在执行局的发言是講給十几个人听的，而決議則是写給千百万人看的。

我面前放着英国两个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紙，上面都有关于国际执行局会議的評論。"独立(哼！哼！)工党"的机关报《Labour Leader》①得意洋洋地公然向英国的几万工人說，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不但承認了"工党"(这是事实，必須要这样做)，而且"还承認了'独立工党'的政策"(1908年10月16日《Labour Leader》第

① "工人領袖报"。——編者注

665頁)。这不是事实。执行局沒有承認这一点。这是对考茨基決議案中有小毛病的地方所作的不正当的机会主义的解释。小毛病开始带来了相当大的后果。而譯文糟糕更加重了这种后果，难怪意大利人說，翻譯家是出卖者(traduttori—tradittori)。执行局决議的三种正式文字的正式譯本还沒有出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考茨基本来的說法是，“工党”“在阶級斗爭的基础上”(決議末尾；原文是：sich… auf seinen, d. h. des Klassenkampfs, Boden stellt)，而在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譯文中变成了：“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英国的机会主义者(“独立工党”)的譯文中变成了：“采取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場”(同上)。現在就請在向英国工人作宣传时改正这种錯誤吧！

我決沒有指責布魯斯·格萊济尔歪曲決議的意思。我相信他不会故意这样做。而且这一点也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考茨基決議案第二部分的精神被运用在实际群众工作中了。在“工人領袖报”的同一版上，还有一位“独立工党”的党員在談到自己对执行局会議和布魯塞尔大会的印象时，埋怨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强調社会主义的理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他說这一方面在他們“独立工党”的大会上一直是强調的)，而“代替这一方面”(in its stead)的主要是一些“沒有生气和沒有灵感的(barren and uninspiring)关于阶級战爭的教条”。

考茨基在草拟关于英国人的決議案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英国的“独立工党分子”，而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Justice》登載了海德門的伤心話，埋怨执行局的大多数“为了反复无常的人的方便而抛弃了原則”。海德門写道：“我一点也不怀疑，如果执行局向‘工党’提出直

接的最后通牒，'工党'就会立即服从，立即决定适应国际社会主义的方向。"該报同一号上的另一篇文章列举一些事实来証明"独立工党"实际上已經打着又是"自由主义，又是'独立工党'"(liberal-labour alliance)的混乱的旗帜，使自己的一部分党員进了議院，証明某些"独立工党分子"已經受到自由派大臣約翰·白恩士的支持(《Justice》，17 Oct. 1908, p. 4 et 7①)。

不过，如果海德門要实現他所講的那个計划：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10年)上重新提出这个問题，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定要力求修正考茨基的决議。

第2項議程是关于各国无产阶級和社会党人共同起来防止資产阶級政府的政策可能造成的国际冲突和殖民冲突的問題。瓦尔揚提出一項决議案，这項决議案只作了很小的修改就通过了。在辯論中，奥地利的代表指出，他們党的各个代表团都正式反对弗兰茨-約瑟夫的政策并且認为社会主义者必須承認各民族有自决权。但是，奥地利的代表說，在反对弗兰茨-約瑟夫的政策的同时，我們也反对阿卜杜勒-汉米德或爱德华七世的政策。我們的任务就是要使政府对它的行为的后果負責。英国代表希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更明确地声明自己反对本国政府，但是奥地利代表并沒有超出上面所講的范围。保加利亚社会党人("狭隘派"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保加利亚另外还有"宽广派"即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阿夫拉莫夫，堅持应該提到巴尔干各国本身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但相应的修正案沒有被通过。阿夫拉莫夫声明，在

---

① "正义报"，1908年10月17日第4頁和第7頁。——編者注

宣布保加利亚独立的問題上，保加利亚社会党人坚決反对資产阶級政党，認为从工人阶級的观点看来，宣布独立是一种有害的冒险行为。布魯斯·格萊济尔提議在决議中还应当指出組織国际性示威的必要性，但是会議决定由执行局把这个願望轉告各国的党。万-科尔（荷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提議把抗議列强破坏柏林条約这一点加进去，但是在表决前他收回了这个提案，因为会上指出，特意維护資产阶級国家的条約，这不是社会党人的事情。国际执行局通过的决議全文如下：

"首先肯定，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举行爭取和平的示威游行，法国社会党人宣传反对远征摩洛哥，丹麦社会党人建議裁軍，这些都是符合'国际'决議的行动，

其次，鉴于：

战爭的危险仍然存在；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还繼續在英国和德国进行阴謀活动；远征摩洛哥和冒险还在进行；沙皇政府首先要获取新的借款，竭力制造混乱局面，以便巩固自己在反对俄国革命的斗爭中的地位；在巴尔干半島上，外国列强的干涉和私欲点燃了空前猛烈的民族和宗教的怒火；最近，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特别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納的幷入奧地利，增加了战爭的危险，使得这种危险更加逼近；最后，各国政府在到处制造阴謀，加紧武装，穷兵黷武，进行資本主义竞爭，掠夺殖民地，这些都使和平受到威胁，——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再一次指明，社会主义政党和有組織的无产阶級是唯一能够保卫国际和平的力量，它們認为自己有責任保卫国际和平。

执行局号召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根据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議，提高警惕，加强活动，尽一切力量来执行上述方針，同时建議各国党的中央委員会和执行委員会、各国党的議会党团和参加国际执行局的代表，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書記处一起寻找某国的或国际的、同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最有助于防止战爭和保卫和平的手段和实际措施。"

第3項議程是英国支部关于每年定期召开两次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議的提案。会議在这个問題上沒有通过必須这样做的决議。只是表示希望这样做。显然，絕大多数的代表并不認为有必要每年开会一次以上(过去是这样的)，——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例外。

第4項議程是执行局关于改变各国党向执行局提供經費的数額的提案。执行局过去每年在名义上的收入是14 950法郎(約合6 000卢布)；建議把这个数目增加到26 800法郎，即除去通常欠繳的数目，增加到2万法郎这样一个整数(8 000卢布)。这样，各国党就应当为該党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每年繳100法郎。俄国有20个代表，因此应繳2 000法郎，其中700法郎由社会革命党負担，1 000法郎由社会民主党負担，300法郎由工会負担。过去俄国每年繳1 500法郎，其中我們繳900法郎(根据同社会革命党的协議)。会議对这个問題也沒有通过硬性規定。会議委托执行局同各国的党洽商，并且表示希望能为每个代表每年繳100法郎。

第5項是关于改变代表名額的問題，瑞典代表增加到12名，匈牙利代表一般地暂时不增加，克罗地亚代表增加两名。另外准許在土耳其支部未成立以前先成立土耳其支部的阿尔明尼亚分支(据說在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社会党人不願“等待”土耳其人)，同时給了这个分支4个代表名額。最好是請我們的熟悉土耳其情况的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同志們对这个問題发表意見。

第6項議程是关于接受智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的問題。这个党是在智利民主党分裂以后成立的。智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沒有經过什么爭論就被接受了。

第7项議程是关于俄国的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85]的問題。大家知道，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前，他們曾建議我們党的中央委員会接受他們参加“国际”俄国支部的社会民主党分支。我們的中央委員会拒絕了，同时通过決議来說明我們根据什么理由反对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算做社会民主党人，尽管他們自称为“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的一位代表曾到过斯图加特，在那里我們分支也拒絕接受他，而社会革命党人却放弃了投票权。因为根据章程，“国际”接受新成員时必須得到該国支部的同意（在本国的两个分支意見不一致时，由国际执行局最后决定），所以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按規定是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于是他們到执行局去申訴，执行局当时竟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准許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派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現在必須澄清已經造成的混乱：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是不是“国际”的成員？維·阿德勒同在斯图加特一样，坚决反对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拒絕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在电报中以不能出席为理由而希望延期討論的請求。維·阿德勒說道：有时候不出席是最好的防御手段。我在发言中再一次提到我們的中央委員会的決議，并且指出，违反俄国两个分支的意志而接受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这是严重地破坏“国际”章程的行为。魯巴諾維奇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86]”（它在斯图加特被社会革命党人接受加入自己的分支）的代表日特洛夫斯基作了激烈的发言，反对不接受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但是，魯巴諾維奇除了說社会革命党在这个問題上弃权以外，不能提出該党的另外的決議，而日特洛夫斯基看到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免不了要被取消資格，便公然替自己辯护，他用可笑的激烈口吻証明說，如果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是地域主义者，那他們“犹太社会主

义工人党"也是地域主义者了。显然，从这里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应当接受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而只是：在"国际"中，除了社会革命党人以外，恐怕再也沒有什么人会同意接受"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了。我在第二次发言中坚决抗議魯巴諾維奇的手法：强迫别人的分支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可是又不提出自己的分支維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决議。結果执行局一致通过（魯巴諾維奇和瓦尔揚两人弃权）阿德勒的决議案，全文如下：

"执行局确認，执行局过去准許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有发言权）参加的仅仅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会議，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屬于国际执行局，随后便轉入下一項議程的討論。"

第8項，也是最后的一項議程，是批准国际执行局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团的特殊构成，这一項几乎沒有爭論。盖得被指派为法国的代表之一，法国在执行局中应有的另一代表由瓦尔揚和饒勒斯两位代表共同担任。

执行局会議結束时，一致通过比利时代表德·勃魯克尔提出的关于支持土耳其革命的决議案：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欢庆阿卜杜勒-汉米德靠列强帮助在土耳其长期維持的腐败制度的垮台，欢庆土耳其帝国各族人民面前展开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祝賀他們建立一个政治自由的制度，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級能够同全世界无产阶級紧密团結起来进行自己的阶級斗爭。"

10月12日（星期一）举行了各国議員的代表会議。議程共有3項：（1）最近一次的議会会議；（2）殖民地的改革（由万-科尔作报告）；（3）关于社会党人爭取各国議会同盟內部和平的活动（由比利时代表利亚方登作报告），——其次还有4个問題：(一)建

筑工人的工資条件（在企业主破产的情况下）；（二）用書信进行表决；（三）議会党团的成員和書記的新名单；（四）文件的寄送。

关于第1項議程，只是根据别涅斯托費尔的建議肯定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如下决議：請各国議会党团的書記向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提供該党团的書面报告。会議就上列“問題”中的最后两个問題簡单交換意見之后，也作了同样的提示。关于前两个“問題”，会議簡单地指出了某些社会党代表具有的这方面的材料和建議。根据利亚方登本人的建議，他的报告暫时不做。奥地利和德国的代表在这个問題上表示，他們反对社会党人参加維护和平的各国資产阶級議員代表会議。瑞典代表布兰亭举出了一些特殊条件，似乎可以說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这些代表会議的原因。根据他的提議，在下一次和执行局会議同时举行的各国議員代表会議的議程中，列入了工人的国家保险問題。

只有一項議程有一个簡短的报告，而且值得討論，那就是关于殖民地改革的問題。由于在斯图加特就殖民地問題提出一个机会主义决議案而出名的荷兰代表万-科尔，在这次的报告里，企图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把他那个关于“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殖民地綱領的心爱思想搬了出来。万-科尔根本不談社会民主党反对殖民政策的斗爭，不談在群众中进行反对殖民地掠夺的宣传和喚起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反击和抵抗的精神，却只注意列举現行制度下殖民地生活的可能的“改革”。他象一个好心的官員一样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問題，从土地所有制起，到学校、监狱和鼓励办工业等等，同时还强调必須实际一些，比如說，要考虑到普选制在野蛮人当中并不永远适用，有时候不能不承認在殖民地用强制劳动来代替监獄是必要的，如此等等。充滿整个报告的不是无产阶

級的阶級斗爭精神，而是十足的小資产阶級的、甚至更坏些，簡直是官僚的改良主义的精神。最后，他提議由占有殖民地的5个最主要的国家选出一个委員会来制定社会民主党关于殖民地的綱領。

德国代表莫尔肯布尔和一些比利时代表本来也想走万-科尔的道路，他們同万-科尔爭論了一些細节問題，如需不需要統一的共同綱領，这是不是一种公式化作法等等。这样提問題只会对万-科尔有利，因为他正想把一切事情都归結为"实际"，証明"在实际上"意見分歧并不象大家在斯图加特所感觉的那样大。但是考茨基和累德堡从原則上提出了問題，抨击了万-科尔整个立場的基本謬誤。考茨基說道：虽然万-科尔認为普选制只是在个别場合不适用，但不管怎样他也是容忍了殖民地的专制制度，因为他沒有提出而且也提不出任何别的选举制。累德堡說道：万-科尔認为可以采用强制劳动，这无异是給利用无数借口来維持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資产阶級政策大开方便之門。万-科尔非常固执地、非常拙劣地替自己进行了辯护，例如他証明說，有时候非实行劳役制不可，"他在爪哇亲眼見过这种情形"，巴布亚人不知道投票是怎么回事，他們的选举有时簡直是由迷信或者干脆用喝糖酒来决定的，等等。考茨基和累德堡嘲笑了这种論据，認为我們的总的民主綱領对殖民地也是絕对适用的，把同資本主义的斗爭提到首要地位在殖民地也是必要的。累德堡問道：我們那些"有教养的"天主教徒的迷信是不是比野蛮人的迷信好一些？考茨基說道：議会制度和代議制度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可是，民主主义始終是适用的，反对任何背离民主主义的行为的斗爭始終是必要的。經过这些辯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綫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路綫就

十分清楚了，万-科尔看到他的提案显然要被"按头等葬仪埋葬"，就自动把它撤回了。

载于1908年10月16日(29日)
"无产者报"第37号

署名：尼·列宁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并根据手稿作过校訂

彼·馬斯洛夫的歇斯底里发作了

彼·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号合刊上发表了一封“致編輯部的信”，这封信除了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的。作者不仅侮辱我，把我的笔調同修士司祭伊廖多尔的笔調相提并論，而且还把14年前的談話搬了出来，老实說，这不是歇斯底里发作又是什么呢？讀者会以为这是說笑話吧，不，这是事实。彼·馬斯洛夫写道：“在‘資本論’第3卷出版以前，列宁就看过我的一份手稿，在这份手稿里，我在解决利潤分配問題上同第3卷是一致的。但是列宁說，他認为斯克沃尔佐夫[87]教授对这个問題的极荒謬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請想一想，这是在第3卷出版以前，也就是在1894年以前的事！作者自以为对仿佛是14年前的談話和自己沒有发表的手稿記得分毫不差，这要不是由于幼稚无知(我的这位最可尊敬的論敌不是这种人)，就是歇斯底里发作。最好把这份手稿发表出来吧，馬斯洛夫同志，你看如何？証明馬斯洛夫而且只有馬斯洛夫在第3卷出版以前就解决了恩格斯向全世界提出的問題，这岂不是很有利嗎？不錯，現在証明似乎是晚了一点…… 但是，晚做总比不做强。事实上，决不能認为馬斯洛夫只是想援引一段个人回忆来自我吹嘘一番。

原来，馬斯洛夫不等他投稿的那家报紙的編輯部出来贊揚他对馬克思理論的修正，就决定自我吹嘘起来，吹嘘他在14年前所

做的(暗地里)事情…… 原来,我(如果相信馬斯洛夫同志有惊人的記忆力)在14年前,在"資本論"第3卷出版以前就犯了錯誤,不过沒有把这些错誤发表出来;而馬斯洛夫在"資本論"第3卷出版了7年和14年以后才犯錯誤,而且把这些錯誤发表出来了。不过,馬斯洛夫发作歇斯底里可能不完全是无意的。正好在5年以前,馬尔托夫曾經对普列汉諾夫发过一通歇斯底里,結果促使普列汉諾夫从布尔什維克轉到孟什維克方面去了。彼·馬斯洛夫是不是指望普列汉諾夫在自己及其同伙編的报紙上看到他的哀鳴以后,会放弃馬克思的地租論,而贊成馬斯洛夫的地租論嗎?这太有趣了。現在趁这种事情还沒有发生,我們来看一下,馬斯洛夫責备我的文章"滿篇都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馬斯洛夫同志,眞的"滿篇"都是如此嗎?

好吧,我們就把你所有的論据都来分析一下吧。

"列宁写道:'說馬克思認为絕对地租是由于农业資本构成低下而产生的,这是不正确的。絕对地租是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这种私有制造成一种特殊的壟断。'①"

在这里,馬斯洛夫割断了我的話,这句話不是到"壟断"这两个字就完了,而是在末尾还引証了第4卷("剩余价值学說史")并且注明了頁碼。这不是馬斯洛夫断章取义,不是的!这不过是"修改"别人的話……

彼·馬斯洛夫繼續写道:"列宁就是这样写的。可是馬克思却写道:'如果农业資本的平均构成同社会平均資本的构成相同,或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78頁。——編者注

者比后者高，那末就这里所研究的意义上来說的絕对地租就会消失，就是說，既不同于級差地租、又不同于以眞正的壟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的那种地租就会消失。'（"資本論"第3卷，俄譯本第631頁[88]）請讀者判断一下吧，究竟誰把馬克思的理論解释得更正确。"（接着，彼·馬斯洛夫說，他肯定地記得我在14年前同他个別談話时在利潤規律問題上犯的錯誤，并且指出了这个錯誤）

我也請讀者判断一下，"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謊"的到底是誰？最可尊敬的馬斯洛夫删掉了我句子里引証馬克思的一段話，而另外給我加了一段引文！这算什么論据呢？是不是馬斯洛夫又一次揭露了馬克思的"草稿"当中的矛盾呢（我提醒讀者一下，甚至在"剩余价值学說史"已經出版以后的1906年，馬斯洛夫还竟敢說，馬克思的理論之所以存在着他所发現的錯誤，是因为"資本論"第3卷是一部"草稿"）？这岂不是証明，馬克思一会兒說絕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一会兒又說产生于农业資本构成的低下，是不能自圓其說嗎？

不是的，这只是証明馬斯洛夫又糊塗透頂了。从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几十段話，說絕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制，也可以找到几十段話，說絕对地租产生于农业資本构成的低下。道理很簡单，因为馬克思在自己有关的論述中提出的这两种条件，同我解释馬克思理論时提出的两种条件完全一样。在我那篇文章中，就在馬斯洛夫引的那一段里，我也談到了农业資本构成低下的問題！（見"无产者报"第38号第3版第2—3栏①）馬斯洛夫为了反駁我，援引了第3卷第45章，也就是关于絕对地租的一章。馬斯洛夫援引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78—279頁。——編者注

了原著第298頁。但是馬克思在第287頁，也就是在前面，指出土地私有制不“产生”級差地租（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即使沒有土地私有制，也必然会存在級差地租），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是絕对地租。馬克思写道：“土地私有制本身就会产生地租”（第3卷第2册第287頁），并且打上了着重号。

請問，第287頁的引文和第298頁的引文是矛盾的嗎？一点也不。馬克思在闡明了土地私有制产生地租（只是絕对地租）以后，又进而說明这种地租或者不过是垄断，仅仅是垄断，純粹是垄断，或者是垄断妨碍构成低的資本（农业）和构成較高的資本（工业）的利潤平均化的結果。

可見，馬斯洛夫在普列汉諾夫及其同伙編的报紙上，无非是再一次地对馬克思主义作了不可容忍的歪曲。可見，馬斯洛夫在这里还是認定（只是沒有直說出来）絕对地租不可能存在，馬克思的理論是錯誤的，而否定絕对地租的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理論才是眞理。

为什么不把在“土地問題”中講过的和我引述过的論点直說出来呢？难道这不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謊”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土地問題”中說馬克思是錯誤的，說絕对地租不可能存在，在普列汉諾夫及其同伙編的报上却对此只字不提，而只談誰把馬克思的理論解释得更正确！！！这样一来，我們同馬斯洛夫爭論的不过是“誰把馬克思的理論解释得更正确”的問題了，我指出馬斯洛夫抛掉絕对地租就是“修改”馬克思的“草稿”也是在撒謊了！？馬斯洛夫同志，眞可耻呵！

“接着，列宁写道：‘彼得·馬斯洛夫也不了解馬克思的級差地租……　当租佃者在他經营的土地上新投入的資本提供新的利潤

和新的地租（着重号是列宁加的）时，取得这种地租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租佃者。'①列宁趁这个机会自然把'不学无术的'馬斯洛夫适当地教訓了一頓。我們翻一下'土地問題'第1卷，在第112頁上可以看到：'如果集約化經营由于新投入500卢布而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那租佃者得到的利潤将不是25%，而是100%，因为第一次投資时他就繳了333卢布的地租…… 如果他在投入第一批資本时滿足于平均利潤……，那末縮減租地面积，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資，这样对他更有利，因为这种投資可以提供超額利潤，使租佃者也能获得地租。'但是，列宁为了駡我就不得不撒謊。"

我們来看一下，到底誰在撒謊。为了弄清这一点，应当注意我所抄录的馬斯洛夫引文中的删节号。因为我把馬斯洛夫关于这一問題所說的話全部引在这里了。删节号就是省略。馬斯洛夫在引述他的第1卷第112頁时，恰恰省略了他用来反駁馬克思理論的一段話，省略了在第112頁上打上着重号的一段話！这是不可思議的，但这是事实。我发表在"无产者报"上的文章，曾經引証过"土地問題"第1卷第112頁的一段話，作为馬斯洛夫用来反对馬克思理論的第2个論据：即"洛貝尔图斯所說的从'最后一次'投入的資本所取得的地租，以及馬克思所說的絕对地租，一定会消失，因为租佃者总是能够把'最后一次的'資本变为最后第二次的資本，如果資本除了通常的利潤之外还能提供别的东西。"（着重号是馬斯洛夫加的）②

这是馬斯洛夫用来反駁馬克思理論的一个論据。我曾經駁斥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80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279頁。——編者注

过这个論据，現在我仍然認为，这个論据完全是欺騙和胡說八道。馬斯洛夫在反駁我的时候，引証了第112頁这一頁，却略去了攻击馬克思理論的話！攻击改成了删节号，删节号之前引証了这一頁的开头，删节号之后引証了这一頁的結尾，于是对馬克思理論的攻击都不見了。难道这不是断章取义，不是公然撒謊嗎？

无論过去和現在，我从未断言过长达400頁的“土地問題”一書中沒有正确的地方。我只是肯定，馬斯洛夫用来反对馬克思理論的論据是一些难以形容的胡說，是聞所未聞的糊塗思想。如果馬斯洛夫在他打算出版的第4版中把这些論据删掉，譬如說，保持他曾經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引述过的第112頁的样子，那末，我和大家都会說：馬斯洛夫从第4版起就不再修改馬克思的理論了。但是目前他还沒有这样做，凡是讀第1卷的人都会在第112頁中看到馬斯洛夫用来反对馬克思理論的論据，讀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删去的那个論据。而且人人都会看到，我对这个論据的批評是正确的，就是說，拿这个論据来否定絕对地租是謊謬的，因为租佃者在租佃契約期內可以从新的投資中得到全部新地租，即既有絕对地租也有級差地租。

馬斯洛夫的另一个“例子”我就不談了，因为它同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所删掉的論据是相同的。当然，如果馬斯洛夫收回这个論据，那我的批評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他沒有这样做，而只是删节自己的引文，那末我要請問讀者：“滿篇都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謊”的到底是誰？

最后，馬斯洛夫从我的文章中引述的最后一段引文是：

“‘什么是集約化呢？’列宁这样发問并随即答道：‘这就是繼續投入劳动和資本。根据伟大的馬斯洛夫的发現，采用收割机不是

(着重号是列宁加的)投入資本。采用条播机也不是投入資本。'①列宁对土地問題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不了解，因而給集約化下了錯誤的定义，他不仅分明在胡說八道，而且是在睜眼說瞎話。在'土地問題'第62頁上写道：'无論粗放經营也好，集約經营也好，脫谷机都会減少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消耗。'(耕作的集約化不論土地面积如何，只取决于这种消耗，而不是一般的消耗。——彼·馬·)收割机的作用也相同。"

最可尊敬的馬斯洛夫，請注意听着，对此我要告訴你：撒謊也得有个分寸！…… 难道爭論的是关于集約化取决于单位面积的投資抑或同面积无关的問題嗎？要知道，这才眞正是断章取义和公然撒謊哩！爭論的根本不是这一点。在馬斯洛夫目前所引的我的文章第*2*部分，我反对的根本不是"土地問題"，而是馬斯洛夫发表在*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上的文章。

忽而把那些用来反对馬克思而遭到批評的論据从自己的著作中删掉，忽而把自己整篇整篇的文章都删掉，而把一些文不对题的东西塞給讀者，这样的人請你去同他爭論吧！

我的文章的第2部分的标题是："要推翻民粹主义就必須推翻馬克思嗎？"这一部分批評的只是馬斯洛夫发表在1907年"教育"杂志第2期上的文章。

馬斯洛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只字不提他的这篇文章，却捧出了他的"土地問題"！这簡直是可笑的捉迷藏！我从来沒有講过，馬斯洛夫在"土地問題"一書中写道，要推翻民粹主义必須推翻馬克思。

---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86頁。——編者注

但是，馬斯洛夫在“教育”杂志上是这样說的。我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而决不是反对談論集約化取决于怎样的投資。馬斯洛夫說道：“如果連續投入同一土地面积的劳动的生产率不断降低的事实不存在，那也許还能实現社会革命党人所憧憬的田园生活。”馬斯洛夫，現在你是否还堅持你的这个論断呢？

最可尊敬的，你在捉迷藏嗎？这就等于承認自己打敗了。

你現在是否仍然断定是你“第一个特别强調耕作文化和技术进步对于經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对于大生产同小生产的斗爭尤其有不同的作用”的呢？你在“教育”杂志上是这样說的。我在“无产者报”上也是这样引的。你在“教育”杂志上而不是在“土地問題”中提出的关于收割机的論断，同这个問題而且仅仅同这个問題有关。馬斯洛夫不維护他在“教育”杂志上的論断，就是放弃陣地！

总之，馬斯洛夫所做的其实就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躲躲閃閃。他又在胡說八道，似乎馬克思不是从土地私有制中引伸出絕对地租来的，但是他又不敢公开替自己对馬克思理論的修正做辯护；他从自己的引文中把反对馬克思理論的論据删掉了；他閉口不談自己在“教育”杂志上提出的論断。我們再說一遍：馬斯洛夫在“土地問題”中对馬克思絕对地租的消灭以及他在“教育”杂志上的論断，是登峰造极的糊塗观念，是登峰造极地把資产阶級观点摻入了理論。

关于馬斯洛夫的著作的德文版，我曾經嘲笑該譯本竟把对馬克思理論的修正統統隐藏起来了。馬斯洛夫辯解說：出版人沒有把我的著作第1部分全部印出来！馬斯洛夫的这一更正应当怎样解释呢？我說是馬斯洛夫删掉的。馬斯洛夫說，是出版人删掉的。

而出版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狄茨。

如果狄茨删掉馬斯洛夫的“理論”，删掉他对馬克思理論的“修改”是得到馬斯洛夫同意的，那我的結論絲毫不变。如果狄茨这样做没有得到馬斯洛夫的同意，那我的結論只要改变一下形式：狄茨把馬斯洛夫書中的蠢話一概删掉是明智的。

最可尊敬的馬斯洛夫是要想得到这种更正嗎？

馬斯洛夫說我“开始寻找敌人的謬誤”，同时“又想掩飾”自己朋友的謬誤。这是造謠。我認为我的朋友有謬誤，我就同样坚决地加以反对，就象反对你一样。我在刚刚出版的“紀念馬克思”的文集中做的一个注释①就証明了这一点。早在*1901*年的“曙光”杂志上，也就是在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前两年，在馬斯洛夫提出第一个地方公有化綱領的前两年，我就“开始寻找”馬斯洛夫的謬誤了②。在1901年，馬斯洛夫仅仅在修改馬克思理論这个問題上，是我在党內的“敌人”。

附言：这篇短評写好后，接到“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发行部的一张特别通知单，上面写道：

“由于印刷錯誤，‘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号合刊印漏了編輯部对馬斯洛夫同志来信的按語。这个錯誤将立即糾正，編輯部的按語已送給訂閱者和零購者。”

我們还沒有接到这个更正。我認为我有責任把这种印刷上的錯誤告訴讀者。但是就在我所轉載的这张通知单里是不是还有印刷上的錯誤呢？是不是应当改称馬斯洛夫同志为馬斯洛夫先生呢？要知道，普列汉諾夫曾經在刊物上声明过，凡是离开馬克思的

① 見本卷第16頁。——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05頁。——編者注

人，在他看来都不是同志而是先生！莫非这种説法不适用于鼓吹离开馬克思主义的孟什維克嗎？

载于1908年10月16日(29日)
"无产者报"第37号
署名：尼·列宁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并根据手稿作过校訂

对彼·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見[89]

我的論敌責备我采用了歪曲爭論实質的論战手法。为了澄清这种責难，我把彼·馬斯洛夫的“答复”逐条地分析一下。

馬斯洛夫的第一个例子。列宁說，不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革命高潮是不可想象的，“似乎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土地地方公有化綱領，就是想保存农奴制残余，把土地仍然留在地主手中”。

每个讀者都会看到，馬斯洛夫迴避了問題的实質，因为我一向指出，农奴制残余不仅包括地主所有制，也包括現在的份地所有制。爭論的焦点就在这里。馬斯洛夫在他的整篇答复中迴避了这个問題，只字不提份地土地所有制中是否有某种中世紀残余，肃清这种中世紀制度对資本主义是否有利，而是轉移了讀者的注意力。不回答論敌的原則性的論据，硬給論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爭論，而是謾駡。

第二个例子。馬斯洛夫認为我指出土地变革同政治变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不尊重讀者。地方公有化也并沒有割断这种联系。怎么，这也算是答复嗎？在这里，馬斯洛夫沒有說到两件事实：（1）我曾經确切地引述过孟什維克諾沃謝德斯基的一段引文，这个諾沃謝德斯基分明是把地方公有化同不彻底的政治变革

联系在一起的。(2)我提出过一个論据，認为地方公有化既不会触动中世紀村社，也不会触动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就是說，它毫无疑問地、必然地会使土地变革，而且仅仅使土地变革变得很不彻底。

馬斯洛夫的第三个論据："列宁把农民仇恨地主和官吏这一点作为論据，来論証自己的綱領，反对已經通过的綱領。"这是撒謊。每个讀者都会看到，馬斯洛夫暗中把"仇恨中世紀制度"(在稍前几行，馬斯洛夫自己也承認我指的正是这种仇恨心理)这句話，改成了"仇恨地主"。他所以要这样偸换，是为了避开我的关于份地所有制带有中世紀性質的論据。

說我把自己的綱領叫做布尔什維克的綱領，这是撒謊。說在斯德哥尔摩似乎表决过国有化問題，这也是撒謊。馬斯洛夫同志，你不应該歪曲事实！

"任何地租理論，都絲毫不能說明国有化綱領好还是地方公有化綱領好，因为不管怎样，从被沒收的土地所得的收入总是归国家或自治机关的。"

这倒是个涉及实質的論据。这个論据很妙，因为它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馬斯洛夫多么惊人地歪曲了馬克思主义。只有否認已經被馬斯洛夫"推翻的"馬克思的绝对地租論，才会忘記粮价下降和保証資本滲入农业的事实，而把問題完全归結为"收入"！馬斯洛夫提出这样的論据，就証明他对問題的经济实質一竅不通。万分敬爱的馬斯洛夫，問題不在收入，而在于消灭绝对地租会使农产品产量比例增长。馬斯洛夫既然否定了馬克思学說中的絕对地租，也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国有化的經济意义。在俄国資产阶級革命中，千百万小私有者为什么可能而且不得不要求国有化呢？在

馬斯洛夫看来，这个經济問題是不存在的。馬斯洛夫的不幸就在这里！

說我在1905—1908年写文章反对过割地綱領，这是事实。但是象馬斯洛夫那样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那就是蒙蔽讀者，而不是闡明爭論的問題。要知道，馬斯洛夫也并沒有把自己1903年的全部綱領都保留下来！馬斯洛夫为什么向讀者隐瞞这一点，而只是提出往事的一个方面呢？馬斯洛夫引証了我說过的而且直到現在也不想否認的話，即"在警察国家里"实行土地国有化是有害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爭論还是謾罵？

波兰讀者不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爭論土地問題的詳細情況，因此我要說明一下：在1903年，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馬斯洛夫在刊物上提出的并不是他在1906年提出的那个綱領。把过去的爭論翻出来，我認为是不应該的，我在上一篇文章里也沒有涉及这些爭論。但是現在馬斯洛夫自己又旧事重提。他想卖弄机智，推翻我已經放弃的1903年的綱領。也許他提起过去的爭論是打算轉移人們对他新观点中的弱点的注意吧？事实終归是事实。馬斯洛夫提起了过去的爭論，却沒有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談到，他自己就更改了自己的1903年的綱領。他抓住論敌对自己过去的綱領所作的公开的、早已完成的修改而横加責难，却隐諱了他对自己的綱領的更改。在1903年，彼得·馬斯洛夫不仅不主张无論如何必須把份地留在份地所有者手里，相反地，他在自己的綱領中甚至提出只要有可能份地也要收归公有，但是他隐諱了这一点。

这岂不是妙得很嗎？重提旧事究竟使誰难堪？是公开承認旧观点的錯誤根源的人呢，还是隐諱改变了自己观点的人？为什么

在1903年，彼·馬斯洛夫認为份地收归公有是可能的，而到了1906—1908年，却大发雷霆地反对接受这种观点呢？

关于这种“論战”手法，或者确切些說，这种抹掉自己足迹的方法，还是請讀者自己去判断吧。馬斯洛夫学会了屠格涅夫笔下的老坏蛋的处世之道：对于自己行为中見不得人的丑事，駡得愈响愈好。别人更改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自己指出了这一点。你就来大叫大駡，以便于掩盖自己观点的更改！即便拿不出論据，也要蒙骗一番。

馬斯洛夫不喜欢我那个关于欧俄地产分配的图表。我曾經拿“卡尔梅克式的”所有制同俄国西南地区的“集約化經营”相比較，馬斯洛夫对此大为憤慨。凡是熟悉土地問題著作的讀者，当然都会知道，无論馬斯洛夫本人，或者其他的著作家，都拿某个穷乡僻壤的、拥有4俄亩土地的、无馬的破产农民，同大城市市郊的、集約經营蔬菜业的、拥有同量土地的富裕农場主作过比較（虽然只是拿个别地区作比較）。馬斯洛夫同志本想吹嘘一下他的“詳細分析”，但是吹的不是地方，完全不是地方！这純粹是吹牛，决不是科学的論証，因为要想弄清斗爭的結果，除了我所采取的方法，别无他法可循，何况馬斯洛夫自己也明白，要在“社会民主党評論”上作“詳細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我說过，劳动派也贊成国有化，这就向孟什維克証明我是对的。馬斯洛夫不来直接分析我的这一論据，而力图提出两个論点来間接地削弱它，他說：（1）国有化已經被“打了折扣”；（2）在第一届杜馬中許多人所以附和自治派，“正是因为他們的选民不希望土地国有化”。

这不是想避开問題嗎？国有化同这种“打折扣”有什么相干

呢？馬斯洛夫在1905年所說的以及所有孟什維克在斯德哥尔摩所說的是，农民絕对不贊成国有化，农民会用万第暴动来回答国有化，試問，自治派同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呢？馬斯洛夫迴避了一个使他不愉快的事实，即劳动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接受了国有化綱領，推翻了孟什維克的論据。写一篇始終迴避問題本質的"答复"是不难的，但也沒有多大价值。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马常常使工人代表陷入愚蠢的境地，这是事实，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比农民自己对国有化"折扣"打得更大。社会民主党人感到自己原来成了胆小庸俗的知識分子，一味劝导农民对旧的、中世紀的、份地所有制要謹慎从事，要更加努力地去巩固这种所有制，要更緩慢地使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去适应資本主义！馬斯洛夫同志，問題并不在于劳动派对国有化打了折扣，而在于社会民主党人，馬克思主义者，对国有化打了更大的折扣，因为地方公有化正是被打折扣打成面目全非的国有化。不幸的不是自治派有时反对①国有化，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沒有能了解俄国农民斗爭的性質。馬斯洛夫的蠱惑行为，并不在于他証实某些自治派不贊成国有化，而在于他不談許多自治派不贊成地方公有化的事实，在于他提出一些市儈分立主义的論据来唆使自治派反对国有化！

自治派反对国有化。請讀者想一下，这个論据对誰有利呢？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早在1903年，在我反駁馬斯洛夫当时的綱領时，曾經把地方公有化叫做打了折扣的国有化。我想提醒一下，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我同馬斯洛夫在辯論时就指出过，把民族自治問題同土地国有化問題混淆在一起是不正确

① 完全不对，一点也不对，决不是这样！馬斯洛夫应当想一想事实，譬如，烏克兰自治派契热夫斯基就贊成过国有化。

的①。我們綱領的基本原則保証了自治，因而也就保証了自治单位可以支配国有化的土地！这点起碼的常識馬斯洛夫却想不通！国有化就是消灭絕对地租，把土地所有权轉交給国家，禁止土地的一切轉讓，就是說，消灭土地經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国家）之間的一切中介人。在这个范围以內，各个地方和民族完全可以在支配土地、規定移民条件和分地的条例等方面实行自治，这种自治同国有化絲毫不矛盾，而且是我們政治綱領所包括的要求。因此很明显，只有象整个“自治派”那样的小市民，才会拿害怕丧失自治权作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怯懦心理，掩盖自己不願意为統一的、集中的土地革命而积极斗爭到底的心理。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問題的提法正好相反：在无产阶級看来，这是一个既在政治方面又在土地方面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問題。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須实行劳动派即政治上已經覚悟的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土地国有化。馬克思主义者認为，这一步驟的經济标准已經上升到首要地位；这个經济标准表明：根据馬克思的学說，实現資产阶級土地国有化，就可以保証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力。因此，土地領域中的堅决的資产阶級革命的步驟，同政治領域中的堅决的資产阶級民主变革，即同建立唯一能够保証眞正自治的共和国，是密切相关的。自治同土地变革之間的眞正的关系就是这样，而馬斯洛夫却对此一无所知！

馬斯洛夫說我引用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史”是使用“脫身之計”，因为馬克思幷沒有說过“农民想要自己剝夺自己”。得了吧，馬斯洛夫同志！难道你眞的不懂馬克思說得很明确的話嗎？馬克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153—156頁。——編者注

思有沒有說过彻底消灭中世紀土地所有制对資本主义是有利的？1905—1907年俄国农民所要求的和劳动派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化，是不是要消灭中世紀所有制？我的可爱的論敌，問題正好就在这里，把資产阶級农民的土地国有化可笑地叫做"剝夺"农民，絲毫不能动搖我的問題提法的正确性……　馬斯洛夫繼續說道："同样，在工业中，資本主义也破坏了小私有制，但是难道由此能得出結論說，社会民主党应当担負剝夺手工业者的任务嗎？……"

这简直是荒謬絕倫！农民反对土地所有制方面的中世紀障碍的斗爭，爭取土地国有化（馬克思証明，这种国有化最有利于資本主义发展）的斗爭，竟被叫做"剝夺"农民，而且同資本剝夺手工业者相提并論。馬斯洛夫同志！別昧着良心說話，为整个神圣的事业你应該想一想，为什么我們要支持农民去反对地主，而認为支持手工业反对工厂却象是反犹太主义者的勾当。

馬斯洛夫不懂得，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該支持手工业，即工业中的小私有制，因为这种行动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是絕对反动的。但是支持农业中的小私有制，可能是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只要小的資产阶級經济在經济上比大的封建經济更先进，那永远都应当給以支持。馬克思从来沒有支持过小工业去反对大工业，但是馬克思支持过40年代美国的小农业和1848年德国的小农业去反对封建大地产。在1848年，馬克思建議分割德国封建田庄。馬克思支持过美国的小业主爭取土地自由和消灭土地私有制、反对大农奴主田庄的运动[90]。

馬克思的土地政策的方針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敬爱的馬斯洛夫同志，你本着資产阶級經济学的精神"修改"了絕对地租理論，但是沒有来得及"修改"馬克思的其他理論。土地領域中的

資产阶級革命，只有在它用暴力彻底消灭了整个封建所有制，扫除了旧日的全部土地所有制，为新的、自由的、适应資本而不是适应地主的資产阶級土地所有制打下基础时，才能成为彻底的革命，才能取得眞正的胜利。土地国有化同这种变革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惟有土地国有化这項措施才能使上述变革达到資本主义社会中一般說来能够达到的最彻底的程度。再沒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彻底这样无害于农民地把他們从份地所有制的“特許犹太居住区”中解放出来了。再也沒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不通过警察、官僚和高利貸的方法来消灭旧的、腐朽透頂的村社了。

如果客观地来看一下，在俄国資产阶級革命中，問題的提法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由斯托雷平（也就是地主和专制制度）使旧的土地所有制去适应資本主义呢，还是由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地主和沙皇的政权，来做到这一点。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改良的办法求得适应，就是說，这种适应是不彻底的，过程极其漫长，生产力的增长非常緩慢，民主主义的发展非常有限，注定俄国要长期受容克的統治。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革命的办法求得适应，就是說，用暴力扫除地主田庄，保証生产力得到最迅速的发展。在保持旧的农民份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能不能想象以革命方式消灭地主所有制呢？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两届杜馬中的农民代表都証明这是办不到的。他們的証明就是他們創造了全俄农民在資产阶級革命时期的政治典型，即要求土地国有化的劳动派的典型。

馬斯洛夫大喊大叫国有化带有社会革命党的性質，用的还是孟什維克的老办法：他們一面討好立宪民主党，一面給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加上接近社会革命党的罪名。这些人自己向自由派-保

皇派地主和商人卖弄风情，可是当他們看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資产阶級革命中同革命的資产阶級农民一起行动时，就表示憤慨。不仅如此，馬斯洛夫大喊大叫地指責国有化带有社会革命党的性質，还暴露了自己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观点和俄国农民幻想的分析。馬斯洛夫不懂得，俄国社会民主党早就指出了关于重分土地（平分土地）等等的社会主义理論，或者說quasi①社会主义理論和幻想是带有反动性的，但是也指出这一理想在現代半农奴制俄国具有資产阶級的进步性。馬斯洛夫不善于透过社会革命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市儈空話，发現資产阶級的現实性，即清除一切陈旧的中世紀废物的革命斗爭。社会革命党談論土地平均使用制，談論土地社会化等等，这些从經济学观点看来，都是胡說八道，表明他們在經济学和关于資本主义发展的理論方面是无知的。但是在这些空話和幻想的后面，包藏了极其生动、极其現实的內容，不过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純粹資产阶級的东西，也就是为了替資本主义扫清地盘，消灭土地上的一切中世紀的和等級制的障碍，为資本主义建立自由的租佃制。这一点我們这位可怜的馬斯洛夫怎么也弄不懂，这同以下这件事实有直接的关系，即馬斯洛夫无法理解馬克思关于絕对地租的学說，因为絕对地租和級差地租相反，它可能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被消灭，并且消灭了它就会推动資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馬斯洛夫不善于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爭，竟把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使自己必然会跟着固守自己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屁股"后面轉，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希望把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份地土地所

① 冒牌。——編者注

有制一起扫除的农民的民主主义和革命資产阶級性。

馬斯洛夫不善于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爭，就只好讓他們这些市儈社会主义者去批判土地私有制了。馬克思曾經从資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批判过这种所有制，馬克思主义者也都应当这样来批判。馬斯洛夫否認了絕对地租，也就給自己切断了这条道路，而向社会革命党人屈膝投降，承認他們的理論正确，而实际上正确的是馬克思！馬斯洛夫向社会革命党人屈膝投降，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土地私有制的批評是市儈式的，不是从資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而完全是从阻碍資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出发。馬斯洛夫不懂得，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綱領上的錯誤，是从放弃国有化以后开始的，就是說，是从他們改提“社会化”和“平均制”以致否認小农內部阶級斗爭的时候开始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懂得国有化的資产阶級性質，——这就是他們的主要錯誤。請每一个研究过“資本論”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来評一評，否認了絕对地租还能不能理解国有化的資产阶級性？

其次，馬斯洛夫說，我把整个欧洲的所有的小农所有制都看成是中世紀所有制了。根本不对。欧洲并沒有“份地”土地所有制，也沒有等級制的壁障，那里存在的已經是自由的、資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欧洲不存在社会民主党所支持的、农民反对地主的运动。彼·馬斯洛夫把这些都忘記了！

再来談談政治上的論据。我認为，孟什維克的地方公有化是同向君主制度妥协的思想有关的，馬斯洛夫把我的这一論据叫做“誹謗”和“有意撒謊”。但是，馬斯洛夫同志，我从孟什維克諾沃謝德斯基的講話中逐字逐句引来的那段話，又是怎样說的呢？究竟是誰在撒謊呢？問題不正是在于，你想用一些聳人听聞的字眼来

冲淡你所不喜欢的諾沃謝德斯基的招供嗎？

馬斯洛夫硬說，把土地交給地方自治机关，就使它們有更大的把握去对付复辟。而我則認为，只有加强共和制的中央政权，才可以眞正阻碍反动活动，把人力和物力分散到各个省区，只会便于反动派活动。我們应当尽力把革命阶級，首先是国內各个地区的无产阶級，联合成为一支統一的大軍，决不能作无希望的、在經济上做不到的和毫无意义的联邦制空想，空想把从被沒收的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划归各省。馬斯洛夫說："波兰同志，請你們說一句，波兰从被沒收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应該归波兰議会呢，还是应当交給彼得堡的莫斯卡里①？"

多妙的論据啊！連一点点恶意宣传也沒有！根本沒有把土地問題同波兰自治問題混为一談！

但是我要說，俄国不自由，波兰就无法得到自由。而波兰和俄国的工人如果不支持俄国农民爭取土地国有化的斗爭，不帮助俄国农民把这一斗爭进行到在政治領域和土地关系領域中取得完全胜利，俄国就不会有自由。在估計地方公有化和国有化时，应当从俄国中部的經济发展情况和整个国家的政治命运着眼，而不应当从某一民族自治区域的个别特点着眼。沒有俄国无产阶級和革命农民的胜利，談論什么波兰的眞正自治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等等，那是可笑的。这是在講空話。俄国农民正因为是革命的，正因为他們不允許同資产阶級和十月党人妥协，而在同工人和民主派一起进行斗爭，所以他們无可辯駁地証明自己是同情土地国有化的。只有当农民不再革命，就是說，不再同情国有化而离开資产阶

① 在革命前烏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称呼俄罗斯人的用語。——譯者注

級民主革命的时候，馬斯洛夫关于保存旧的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才会受到农民的欢迎，不过，到了那个时候，馬斯洛夫的地方公有化也就十分可笑了。只要农民革命民主斗爭还在繼續，馬克思主义者在資产阶級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还有意义，我們就有責任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包括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馬斯洛夫决不能从俄国革命史中把俄国农民的这項要求一筆勾銷，可以有把握地說，当社会运动的高潮、农民爭取土地的斗爭的高潮重新到来的时候，“地方公有化”的全部反动性就会暴露无遺。

载于1908年10—11月
«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
杂志第8—9期
署名：尼·列宁
按波兰文杂志譯成俄文刊印

对目前时局的估計

即将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議的議程上提出了一个問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我們党的各地組織已經开始(在这方面莫斯科和彼得堡走在其他各个城市的前面)系統地討論这个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問題。

在目前解放运动沉寂、反动势力猖獗、民主陣营內出現叛变和消沉的現象、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发生危机和一部分已經瓦解的时期，特别有必要首先估計一下我国革命第一个战役的基本教訓。这里不談狹义的、策略方面的教訓，而先来談談革命的一般教訓，因此，我們的第一个問題就是：从1904年到1908年俄国国內的阶級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哪些客观变化？我們認为，主要的变化可以归結为以下五点：(1)在农民問題上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在原則上大大地改变了，先前是支持和巩固旧的村社，現在則实行用警察手段加速破坏和掠夺村社的政策。(2)黑帮貴族和大資产阶級的代議机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前只有貴族和商人的地方选举委員会，只是在分散地和不經常地試图成立他們的全俄代議机关，現在有了統一的代議机关，即这两个阶級占絕对优势的国家杜馬。自由职业者(农民和无产阶級更不用說了)的代表在这个以巩固专制制度为使命的所謂"立宪"机关中只起附屬品或小砝碼的作用。(3)在这个时期的公开的政治斗爭中俄国各阶級的界限

第一次划清了，它們的立場第一次明确了。現在，公开的和秘密的政党（說得确切些是半秘密的，因为完全“秘密的”政党在革命后的俄国是沒有的），都空前明确地表現了阶級的利益和观点，而各阶級三年来也比过去半个世紀要成熟一百倍。黑帮貴族、民族“自由”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劳动派及其人数不多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无产阶級社会民主派在这个时期都結束了自己“在腹內”发育的时期，提前許多年确定了自己的性質，不是通过言論，而是通过事实和群众的行动确定了自己的性質。（4）革命前叫做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社会人士”，或者籠統地叫做“民族”的“开明”部分和代表人物的那些人，即大批富裕的、貴族出身的、似乎是清一色的、成分很单純的、把持着地方自治机关、大学和一切“正派”报刊等等的知識分子“反对派”，在革命中全都表現为資产阶級的思想代表和支持者，在对待社会主义无产阶級和民主农民的群众斗爭的态度上全都采取了現在已經是人所共見的反革命立場。反革命的自由資产阶級已經誕生，而且正在成长。这个事实并不因为“进步的”合法报刊加以否認或者因为我們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維克閉口不談和不能理解而不成其为事实。（5）千百万群众在形式极为多样化的眞正群众性的和直接的革命斗爭（直到举行“总罢工”，驅逐地主，焚燒地主的庄园，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中获得了实际的經驗。革命前就已經是革命者或觉悟工人的人不是馬上就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事实的巨大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根本改变了以前对政治危机发展的进程、对危机发展的速度、对群众实际創造的历史的辯証法的种种看法。群众吸取这个經驗的过程是一个不显著的、艰苦的、緩慢的过程，它的意义比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許多現象重要得多，后者也只能誘惑那些

不仅政治上幼稚而且有时年龄也“不很大”的娃娃们而已。无产阶级群众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和一切斗争场合(按时间顺序,开始是游行示威,接着是起义,最后是“议会”活动)的领导作用,在这一整个时期中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使十月以前的俄国和当前的俄国截然不同的一些客观变化。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极其丰富的三年的总结,——这个总结当然是概括性的,因为它只是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最主要和最本质的东西表达出来。现在就来看看从这个总结必然得出的策略方面的结论。

专制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改变对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改变不是偶然的,不是内阁方针的动摇,也不是官僚的臆造。不,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动”,其内容是实行农业的拿破仑主义,在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实行自由主义的(就这个词在经济方面的意思而言,——资产阶级的)政策。拿破仑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尽笑脸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讲交情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下去。拿破仑主义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君主制客观上必然的进化,这种进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根据现代欧洲历史中的种种事实彻底探讨过了。同时,如果不是俄国的村社本身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如果不是村社内部经常在产生这样一些成分,使得专制政府可以向他们讨好,可以对他们说:“发财吧!”,“只要支持我,就掠夺村社去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黑帮地主和十月党资产阶级完全自觉地和坚定不移地加以支持的斯托雷平的农业拿破仑主义不要说不能维持两

年之久，甚至连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估计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到它的拿破仑主义的手段和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实质，那末无论下什么断语都是绝对错误的。

例如，我们的自由派也模糊地意识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拿破仑主义，他们攻击这个政策的警察性质，攻击它采取愚蠢的官僚手段干涉农民生活等等。但是，立宪民主党人抱怨我国农村生活的“自古以来的”基础遭到暴力破坏，这仅仅说明他们是反动的牢骚派。不用暴力，不用革命手段摧毁俄国旧农村的基础，俄国就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斗争在进行着（虽然参加斗争的人中有许许多多没有意识到），斗争的中心仅仅是争取这个暴力成为地主君主制施加于农民的暴力还是成为农民共和制施加于地主的暴力。在俄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其他任何性质的土地革命，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是缓慢的、痛苦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迅速的、广阔的、自由的。工人政党争取走第二条道路，这一点在我们的土地纲领中已经得到说明和肯定(不是在提出莫名其妙的“地方公有化”的那部分纲领中，而是在讲到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那部分纲领中）在有了这三年的经验以后，只有在孟什维克中间才会有人看不见争取没收地主土地和争取共和制之间的联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如果真能维持很久很久，如果真能按照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彻底调整一切农村土地关系，那我们就不能不放弃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纲领(到现在为止，甚至孟什维克，甚至孟什维克中的切列万宁们都还不敢不要我们的土地纲领)。但是斯托雷平的政策一点也不能使我们考虑现在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既然纲领载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那末只有娃娃们才能看不到由此产生的革命的（就这个词的

本义而言)策略。而且，說斯托雷平的政策“破产”就是高潮临近，而高潮临近就是斯托雷平的政策“破产”，这样提問題也是不正确的。拿破仑主义的手段破产还不是帮助富农掠夺村社的政策破产。刚刚相反，现在和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在农村中的“成功”，实际上将燃起农民內部的斗爭，而不是熄灭这种斗爭，因为不經过漫长的道路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就是說，无法使纯粹資产阶級的农民經济最终地和充分地巩固起来。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如果“成功”，結果就很可能产生一个自觉反革命的、十月党的农民阶层，但是，正是这种少数富裕者变成一个有政治自觉的团結力量的現象必然会大大推动民主派群众的政治自觉性的发展，推动他們团結起来反对这少数人。在我們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土豪們”和“社会人士”之間的自发的、分散的和盲目的斗爭变成十月党人和劳动派之間的自觉的和公开的斗爭，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

现在来談談杜馬問題。毫无疑問，这个黑帮“立宪”机构同样是君主专制在拿破仑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发展。目前的选举法、黑帮加十月党人的伪造的多数、模仿欧洲的把戏、对外債的貪求(外債的开支仿佛还由“人民代表”监督)、专制政府的实际政策根本不理会杜馬中的一切討論和决議，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地表現出我們上面曾經指出的拿破仑主义的各种特点。实际上統治一切的黑帮专制政府和裝飾門面的資产阶級“宪制”的外表之間的矛盾愈来愈明显，使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不断增加。专制政府原想用杜馬来遮掩、打扮、粉飾自己；实际上黑帮十月党杜馬的存在却每天都在揭示、揭露、暴露我国政权的眞正的性質、它的眞正的阶級支柱和它的拿破仑主义。說到这里，不能不想起恩格斯就君主专制轉变为君主立宪的意义所說的一段极为深刻的話(在1888年8月27日致

伯恩施坦的信[91]中)。一般自由派，特别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都把这种轉变看作声名狼籍的“和平”进步的表現和这种进步的保証，恩格斯却指出君主立宪的历史作用是：它是便于封建主和資产阶級进行决战的国家形式。恩格斯写道：“正象封建制度和資产阶級的斗爭不能在旧的君主专制条件下而只有在君主立宪条件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斗爭也只有在共和制条件下才能进行到底。”順便說說，恩格斯在这里把1816年的法国也叫做君主立宪的国家，当时著名的 Chambre introuvable 即黑帮式的、反革命的議会在支持反革命白色恐怖方面的疯狂和猖獗，恐怕并不亚于我国的第三届杜馬。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恩格斯認为那种支持专制制度对革命作斗爭的、地主和資本家的代表們的反动議会也是真正立宪的机构嗎？不是的。这是說，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情况，伪造宪法的机构可以煽起爭取真正宪法的斗爭，并且成为新的革命危机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战役中，大多数的居民都还相信真正的宪法可以同专制制度調和起来；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就是从一貫支持人民的这种信念出发的，劳动派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有一半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現在，专制制度正在用它的第三届杜馬向人民实地表明它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調和”，从而促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更广泛更坚决的斗爭日益临近。

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把我們的“打倒专制制度”的旧口号换成“打倒第三届杜馬”的口号，是完全錯誤的。“打倒杜馬”这种口号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們是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銳而且已經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杜馬是个自由派的、改良派的和妥协性的杜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打倒杜馬”的

口号，即打倒同沙皇的談判、打倒騙人的“和平”机构的口号，号召进行直接的冲击。相反地，假定我国的杜馬是根据过时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頂的杜馬，而国內又沒有尖銳的革命危机，这时“打倒杜馬”的口号就可以成为爭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現在无論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第三届杜馬不是妥协性的杜馬，而干脆是反革命的杜馬；它不是掩盖专制制度，而是在揭露专制制度；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起独立的作用，因此无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人期待它作出进步性的改良，沒有人認为这个死硬派議会是沙皇制度的眞正权力和力量的所在。人們一致認为沙皇制度并不依靠它，而是在利用它，所以沙皇政府无論是延期召开它（象 1878 年土耳其“延期”召开議会那样[92]）或者是用“国民代表会議”之类的东西来代替它，都可以照样实行它現在实行的一切政策。“打倒杜馬”的口号就是把主要的斗爭恰恰集中在非独立的、非决定性的、不起主要作用的机构上面。这样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我們应当保持“打倒专制制度”和“立宪会議万岁”的旧口号，因为只有专制制度才仍旧是实际的政权，是反动势力的实际的支柱和堡垒。专制制度的崩潰必然就是作为沙皇制度的机构之一的第三届杜馬的垮台（而且是被革命搞垮的），而第三届杜馬崩潰这件事本身只能促使专制制度采取新的冒险行动，或者作一些欺騙性的仅仅是表面上的改良的尝試①。

現在来談另一个問題。我們看到，在第一次革命运动的三年中，各政党的阶級性都已經非常强烈非常突出地明确起来了。由

① 在下一号中我們将考察“杜馬”策略問題的另一个方面并分析刊登在“工人旗帜报”第 5 号上的一个召回派同志的信。（見本卷第 262—278 頁。——編者注）

此可知，凡是談論目前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談論这种对比关系的变化趋向等等，都必須从这些历史經驗的具体材料出发，而不应当从抽象的"泛泛之談"出发。欧洲各国的全部历史都証明：正是在直接革命斗爭的时期中，才会形成各阶級和各大政党据以划分的深固的基础，而以后在漫长的停頓时期中这种基础也沒有什么变动。个别的政党可能藏入地下，不露声色，从政治舞台的前台消失，但是只要情况稍有起色，基本的政治力量必然重新出头，它們在形式上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只要遭到某种失敗的革命所担負的客观任务还沒有解决，它們的活动的性質和方向一定和以前一样。因此，举例来說，如果以为，旣然劳动派在各地都沒有組織，而第三屆杜馬中的劳动团又特别惊惶失措，一籌莫展，所以民主农民群众已經完全瓦解，它們在新的革命危机的酝釀过程中不起重大作用，那末这就是极端近視的看法。只有正在一天天地墮落为最卑鄙的"議会迷"的孟什維克才有这种看法（只要看看他們对秘密党組織所进行的眞正可耻的叛卖性攻击就够了）。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不仅在我国的黑帮杜馬中，而且就是在最理想的資产阶級議会中，代表資格的規定也总是要在各阶級的实际力量和这种力量在代議机关中的反映之間人为地制造出不相称的情况的。例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由派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議会里的力量都显得比实有力量强过百倍（在我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也是根据表面現象估計立宪民主党人的）；而另一方面，广大小資产阶級民主阶层（在1848年資产阶級革命时期是城市小資产阶級，在我国是农村小資产阶級）在公开的群众斗爭中常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而从它們在議会里的代表权看来却是根本无足輕重的。

我国农民参加革命的自覺性比自由資产者、比社会主义无产阶級都差得多。所以它从革命中感到的失望最大，但是也最有益，得到的教訓最慘痛，但是也最有用。他們消化这些教訓特別困难，特別緩慢，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識分子中的許多“激进派”和社会民主党中某些一听見提到农民民主派就作出表示鄙夷的鬼脸、但是一看見“开明的”自由派就羡慕得要死的庸人們，都将失去耐性，对一切都不再抱什么希望，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覺悟的无产阶級是不会那么輕易地忘記他們在1905年秋季和冬季亲眼看到和亲身参加过的一切的。而且，我們在估計我国革命中的力量对比时，应当認識到：在現今的俄国，社会高潮真正广泛展开、革命危机真正日益临近的不可缺少的标志必然是农民运动。

我国自由資产阶級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只有勇敢的切列万宁們和怯懦地宣布同自己的同道者和战友断絕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編輯們才能否認这一点。但是，如果根据資产阶級自由派的这种反革命性作出結論，說他們的反对派立場和不滿情緒、他們同黑帮地主的冲突或資产阶級各派之間的竞爭和斗爭在新高潮的醞釀过程中都不可能有什么意义，那便是极大的錯誤，是反面的真正的孟什維主义。俄国革命的經驗也象其他国家的經驗一样，无可辯駁地証明，当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存在的时候，最微小的、离开真正的革命策源地似乎最遙远的冲突都可能具有最严重的意义，都可能成为导火綫，成为增加一滴就使水漫出杯外的那一滴，成为情緒大轉变的开端等等。可以回想一下，1904年自由派的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請願曾是1月9日这个独特的純粹无产阶級的“請願”的前奏。关于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当

时布尔什維克并不是反对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无产阶級的游行示威，而是反对有人（我們的孟什維克）想把这种示威限制在地方自治会議的大厅里，反对把对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捧为高級形式的示威，反对制訂示威計划要从尽量不吓倒自由派出发。另一个例子是学生运动。在处于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时代的国家中，在引火物不断积累的条件下，这种运动很容易成为一系列事变的开端，使事变远远超过因国家的一个管理部門办事不公而引起的微小的局部冲突的范围。当然，社会民主党实行无产阶級独立的阶級政策，永远不会去迁就学生的斗爭，不会去迁就重新召开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的要求，更不会去迁就互相爭吵的資产阶級派別对問題的提法，永远不会認为这种家庭爭吵本身有什么独立意义等等。但是，社会民主党是整个解放斗爭中的領导阶級的党，它无条件地必須利用所有各种冲突，使冲突扩大，使冲突具有更大的意义，把自己的革命口号的宣传同这些冲突联系起来，向广大群众传播有关这些冲突的消息，鼓励他們独立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等等。在法国，反革命的自由派資产阶級在1793年以后就已經誕生并且不断地成长起来，但是它的各个派別之間的冲突和斗爭在此后一百年間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成为新的革命的导火綫，而无产阶級在这些革命中一直是主要的动力，并且把这些革命一直进行到爭得了共和国。

现在来看看我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这个先进的領导阶級即无产阶級举行进攻的条件問題。莫斯科的同志們在討論这个問題的时候强調了工业危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們搜集了极可注意的有关工业危机的材料，衡量了莫斯科同洛兹的斗爭的意义，把某些在此以前占統治地位的看法作了許多修正。

只是希望这些材料不要压在莫斯科委員会或莫斯科区域委員会的各个专門委員会里，而要把它們整理出来发表，供全党討論。从我們这方面来說，只能就問題的提法表示一些意見。发生爭論的是危机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問題(我国工业在短时期的稍微复苏之后，又被近似危机的严重的蕭条所籠罩，这是大家公認的)。有的說，工人在經济方面的进攻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可能有革命高潮。有的說，經济斗爭的不可能进行会推动政治斗爭，因此革命高潮最近必然出現。

我們認为，两种推論都基于一种錯誤，就是把复杂的問題簡单化了。毫无疑問，仔細研究工业危机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同样毫无疑問，任何有关危机的材料，即使是确切得分毫不差的材料，实質上都不能解决革命高潮最近是否到来的問題，因为这个高潮的到来还取决于上千种事前估計不到的因素。沒有国家的农业危机和工业蕭条这种一般性的条件，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政治危机，这是无可爭論的。但是，即使一般性的条件已經具备，也不能据此得出結論，說蕭条会把工人的群众性斗爭推迟一个时期，或者說同样的蕭条在事变的一定阶段上会推动更多的群众和新的力量去参加政治斗爭。解决这个問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密切注意国内整个政治生活的脉搏，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級群众的动态和情緒。例如，近来党的工作人員从俄国各地、从各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传来的消息都証明群众情緒无可怀疑地在活跃起来，新的力量在参加进来，对宣传的兴趣已經增加等等。把这些現象同群众性学生运动的开始和复活地方自治派代表大会的尝試对照一下，我們就可以肯定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变，出現了某种打破最近一年半以来完全停滞的局面的現象。至于这个轉变有多大力

量，它能不能成为公开斗争的新时期的前奏等等，就有待于事实来說明了。我們現在能够做到的，我們无論如何都应当做到的，就是集中力量巩固秘密的党組織，十倍地加强无产阶級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只有进行宣传，才能广泛地表明群众的真实的情緒；只有进行宣传，才能在党和整个工人阶級之間建立紧密的联系；只有把每一次罢工、工人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或每一个大問題、統治阶級內部或者統治阶級中某个派别和专制制度的一切冲突、社会民主党在杜馬中的每一次发言、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的每一个新表現等等都利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才能够把革命无产阶級的队伍重新团結起来，才能够掌握确凿的材料去判断下一次更具有决定性的战役的条件成熟的快慢。

現在总結一下。对革命結局和当前情况的考察明显地表明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沒有解决。专制政府改变政策后所实行的拿破仑主义和土地政策以及它在杜馬中和借助于杜馬实行的总政策，只能使黑帮专制政府及"野蛮地主"統治同全国的經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剧，日益扩大。用警察手段帮助富农进攻农村群众的办法正在使农村群众內部的斗爭加剧，使这个斗爭具有政治自觉性，使反对专制制度的斗爭愈来愈和每一个村庄的日常的切身問題联系起来。在这个时候，在土地問題上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对社会民主党来說是特别需要的。黑帮十月党的杜馬正在用实例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可以同什么样的"宪制""調和"，它即使在滿足国家經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极狹小范围內也一个問題都解决不了，这样就使"爭取宪制"的斗爭日益变为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爭；資产阶級各派别彼此之間以及它們和政府之間的局部性冲突，在目前情况下恰好会使这

种斗爭日益临近。农村貧穷化，工业蕭条，全国普遍認識到当前政局沒有出路，認識到声名狼籍的“和平宪制”的道路走不通，这一切都在不断地产生革命危机的新因素。我們現在的任务不是編造什么新口号（如以“打倒杜馬！”的口号代替“打倒专制制度！”），而是要巩固秘密的党組織（不管正在埋葬秘密組織的孟什維克怎样反动地号叫），广泛开展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通过这种宣传把党和无产阶級群众团結在一起，把无产阶級群众动員起来。

載于1908年11月1日（14日）
“无产者报”第38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普列汉諾夫这伙人
怎样維护修正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編輯部即普列汉諾夫一伙人对我們在“无产者报”第37号上分析过的馬斯洛夫同志的信① 所作的說明，已經印成單頁，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8—9期的“增刊”出版。

这个字数約等于“无产者报”半栏的“說明”是值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的，因为它表明普列汉諾夫一伙人怎样因計較微小的派別利益竟用极不体面的詭辯方法維护理論上的修正主义。請看事实。

“对于在西欧資产阶級思想家的反动影响下进行的、力图推翻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社会学和經济学基本原理的修改（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行为来說，我們是最坚决的和不可調和的敌人。”說明中的第一句話就这样說。“最坚决的和不可調和的敌人”，恐怕很难說得更干脆了吧？在普列汉諾夫一伙人的諾言中很难找到比这說得更好听的了。

但是……問題的关鍵在于我們那些修正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在对待馬斯洛夫的态度上（而普列汉諾夫一伙人的說明正是

---

① 見本卷第221—230頁。——編者注

为馬斯洛夫的論文、就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問題写的）在自己的笔下出現了一个精彩的“但是”。

普列汉諾夫一伙人宣称，“但是，我們从来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宗派主义者，我們清楚地了解，在某个問題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分歧，也可以不仅不违背他們的观点，不否定他們的方法，而且还十分忠实于他們的观点和方法”。接着就是例子：社会民主党人庫諾夫在“母权制起源”的問題上“同恩格斯有局部的分歧”，但是“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想到要根据这一点宣布他是修正主义者”。

“对于馬斯洛夫同志在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上的观点，我們的态度就象上面所說的那样。我們不同意他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按：“馬尔丁諾夫同志在‘呼声报’第1号上曾特别作了保留，說他不同意馬斯洛夫同志对絕对地租論所作的修改”），但是我們并不把他的观点看作修正主义……”

現在讀者可以看到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是怎样議論的了。我們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但是，“我們并不把他的观点（馬斯洛夫在絕对地租理論上的观点）看作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要推翻馬克思学說的基本原理，而馬斯洛夫是在局部問題上同馬克思有分歧。这就是普列汉諾夫这伙人的辯护詞，最后还以亨·庫諾夫为例加以說明。

請問讀者，哪怕只是稍微有点头脑和稍微公正一些的讀者，这难道不是詭辯嗎？馬克思的絕对地租理論竟被說成是“局部問題”！关于地租理論的分歧竟和庫諾夫在母权制起源問題上同恩格斯“有局部的分歧”的事实相提并論！！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显然是把他們經常用这种說明加以教育的孟什維克看做小孩子。只有极端不尊重自己和自己的讀者的人才能在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上使用这种馬戏团小丑的手法。普列汉諾夫本人（和他的一伙人）的說

明确实一开头就用庄严的詞句說，修正主义就是想推翻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的基本原理。結果怎样呢？普列汉諾夫这伙人对馬斯洛夫的态度是否违背了这个論点呢？是，还是不是？或者是普列汉諾夫这伙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思想才来写这个說明？

馬斯洛夫在一系列的論文和他的“土地問題”的一系列版本中都声称：（1）馬克思的絕对地租理論是不正确的；（2）这个理論的出現是因为第3卷是一部“草稿”；（3）“土地肥力递减”是事实；（4）假如絕对地租理論正确而“土地肥力递减律”不正确，那末俄国的民粹派和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都可以說是正确的了。

“无产者报”上的那篇文章正是指出这四点来駁斥馬斯洛夫的，关于这个問題的論战也就从这篇文章开始了。請看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是怎样行事的。第一、他們小心翼翼地只談地租問題，就是說，根本不談其余的問題。这不是維护修正主义嗎？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是不是想否認，修改馬克思的学說，即修改那認为土地肥力递减的規律和“事实”全屬无稽的学說，是“在西欧資产阶級思想家的反动影响下进行的”呢？第二、把关于絕对地租的学說拿来和局部問題、和母权制起源問題上的（“局部的”）分歧同等看待！

这是耍花招，先生們！你們是用这种花招来掩盖自己公开維护修正主义的行为，因为你們不敢直截了当地說，承認絕对地租和否認土地肥力递减的規律（或“事实”）不是馬克思的經济学說在土地問題方面的“基本原理”。你們为了維护“自己人”，就使馬克思去迁就馬斯洛夫，为了馬斯洛夫而把馬克思学說的基本原理宣布为“局部的分歧”。你們就这样証实了“无产者报”第33号①

① 見本卷第163—164頁。——編者注

上关于法穆索夫式孟什維克理論家們所說的話，这班理論家为了奖賞自己的家奴，就同意把馬克思的經济理論划为“局部問題”，把它和母权制起源問題相提并論。

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但是，如果你是孟什維克，那就不用害怕这些吓人的字眼！請到“呼声报”編輯部去一趟就会知道，不可調和性对孟什維克是非常可以調和的，已經調和到編輯部同意把“对理論的破坏”拿来和“母权制起源問題上的分歧”相提并論。赦罪符卖得不貴，廉价拍卖已經开始，請光顧吧，最可敬的公众們！

現在再往下談。普列汉諾夫这伙人声称：我們不同意馬斯洛夫在地租問題上的观点。馬尔丁諾夫对此已經声明保留。被“无产者报”編輯部称之为馬斯洛夫的护身天使的“那个人”（即普列汉諾夫）“不止一次地（請听！）跟馬斯洛夫同志在报刊上爭論过（着重号是“呼声报”加的）与我們的土地綱領有密切关系的問題”。

一字不差，普列汉諾夫这伙人的“說明”中的原話就是这样！

孟什維克同志們，向你們的編輯部学写辯駁文章吧！你們有了一个經典性的范例了。談的是修正主义，爭論的起因是普列汉諾夫是出于理論上的不可調和性还是仅仅出于微小的派别私怨而在党的机关报上称他的許多論敌为先生，可是在“辯駁文章”里竟說，普列汉諾夫跟馬斯洛夫“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爭論过”的，不是地租問題，也不是馬斯洛夫背弃馬克思理論的問題。

能找到比較客气的話来形容这种手法嗎？普列汉諾夫这个喜欢在理論上爭論并且往往很善于把爭論变成运动的人，竟一次也沒有跟馬斯洛夫爭論过构成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的問題，即关于

他否認絕对地租、認为这个“理論是草稿”以及維护土地肥力遞減的“事实”的問題；一次也沒有爭論过馬斯洛夫要是駁不倒馬克思，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算不算正确的問題。普列汉諾夫一次也沒有爭論过这个問題，他所爭論的完全是另外的問題，即所謂局部問題，而信奉孟什維主义的伪君子們又为这种局部問題蒙上一种极为曖昧的、意在迷惑讀者的含混的外交辞令：“与我們的土地綱領有密切关系的問題”！！

眞是妙不可言！对于用这种方式开始維护修正主义的普列汉諾夫一伙人，怎能不表示祝賀。同时又怎能不想起克列孟梭那样的政客来。克列孟梭是反动派的“不可調和的”敌人，他跟反动派“不止一次地爭論过”，但是現在反动派干起来了，而克列孟梭則声明保留并且……唯命是听。普列汉諾夫是修正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普列汉諾夫跟馬斯洛夫“不止一次地爭論过”（什么都爭論过，就是沒有爭論过馬斯洛夫的修正主义）。現在，馬斯洛夫写文章反对馬克思，馬斯洛夫在“呼声报”上重复他的反对馬克思理論的論据，而普列汉諾夫这伙人仅仅声明保留！

作家先生們，买一张赦罪符吧，請登記加入孟什維克吧。你們明天就可以在“呼声报”上駁斥馬克思的价值理論，只不过在按語中有一个保留：編輯部“不同意……”

普列汉諾夫这伙人在这个說明里質問我們：“‘无产者报’是不是企图‘寻找論据’，証明馬斯洛夫关于絕对地租的議論同否定国有化的綱領有联系呢？”好的，好的，最可爱的“不可調和的人”。下面就提出一个簡短的論据給你們做引子：

“如果不懂得馬克思的絕对地租理論，能够懂得資本主义社会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私有制的意义嗎？”

“不可調和的”普列汉諾夫一伙人，請跟馬斯洛夫商量商量，然后就請回答这一个为你們提供了所需要的論据的問題！

载于1908年11月13日(26日)
“无产者报”第39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关于两封来信

我們在这一号“无产者报”上刊登了两封来信，一封是一个召回派[93]工人写的，曾刊登在第5号“工人旗帜报”上，該报为这封信加了按語，表示編輯部不同意这些看法，認为这封信是辯論性的文章；另一封是彼得堡工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写的，本报刚才收到。这两封信，我們都全文发表。我們清楚地知道，可能有些恶意的批評家会从这两封来信中抓住个别地方或詞句，任意加以歪曲，由此作出与这两位在极不利的秘密条件下匆忙执笔的作者的原意相去甚远的結論。不过这样的批評家是值不得理睬的。凡是認真注意目前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現状的人，一定都同意我們的看法，認为这两封信十分明显地說明了我国觉悟工人中的两种派别。这两种派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組織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出头露面。同时因为第三种派别，即公开露骨地或者暗中偸偸地埋葬党的孟什維主义派，在地方組織內部几乎完全沒有地位，所以上述两种派别的斗爭就成为我們党的迫切問題。因此，对“两封来信”必須仔細分析一下。

两位作者都承認，我們党不仅在組織上，而且在思想政治上，都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隐瞞这种事实是愚蠢的。应当弄清楚产生危机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方法。

現在，先談談彼得堡工人的来信。从他的整个来信中可以清

楚地看出，他認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缺少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党領导人，在知識分子几乎全部脫党以后，許多地方的組織就陷于瓦解，在严酷的迫害和群众的冷漠和疲倦的影响下人数大减的队伍无法整頓和团結起来。另一方面，作者認为，我們的宣传鼓动工作过去把“目前形势”講得太过分了，就是說，把力量集中在迫切的革命策略問題上，而不是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工人成了革命者，民主主义者，但是并沒有成为社会主义者”，所以在一般民主运动即資产阶級民主运动浪潮低落的时候，他們中間有很大一批人就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位彼得堡工人在談到这个看法的时候，尖銳地批評了“凭空”“发明”口号的做法，要求更严肅地进行宣传工作。

我們認为，虽然作者在反对一个极端的时候，有时走上另一个极端，但是整个說来，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不能說，利用目前形势的問題来“发动許多运动”是个“过失”。这是夸大的說法。这就是只看到目前的条件而忘記了过去的条件，作者实际上自己糾正了这一点，因为他也承認“无产阶級直接发动的时机当然是特別重要的問題”。现在，我們試以两次尽可能性質不同和时間相隔极长的公开发动，即1905年秋抵制布里根杜馬和1907年初第二届杜馬的选举为例来談一談。在这样的时期內，一个有点朝气和生命力的无产阶級政党是否可以不把注意力和鼓动工作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口号上呢？在这两个时期，領导无产阶級群众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不把党內斗爭集中在决定群众的刻不容緩的行动的口号上呢？是參加布里根杜馬还是搞垮这个杜馬？在选举第二届杜馬的时候，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把問題明确提出来，并且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的情況，

就不难得出答案。当时为这个或那个口号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并不是由于党的“过失”，而是由于一方面客观上必須迅速而一致地作出决定，另一方面沒有一个早先成熟了的党，党內存在两种策略，两种思想派別，一种是小資产阶級机会主义派，一种是无产阶級革命派。

同样的，也不应当把情况說成这样，好象宣传社会主义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馬克思主义的工作当时做得很不够。这不是事实。就在1905年到1907年这个时期，在俄国流传了大量的重要理論書籍（主要是翻譯过来的），这些書籍还有待于开花結果。我們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使得群众也象自己一样沒有耐心。在这么短的时期內，向絲毫不知道社会主义書籍、几乎沒有接触过这种書籍的群众散播了这样多的理論書籍，一下子是消化不了的。社会民主党的書籍沒有白費。它播下了种子，正在成长。它会开花結果，不过可能不是在明天，也不是在后天，而要更晚一些，因为我們不能改变新危机成熟的客观条件，不过它一定会开花結果。

尽管如此，作者的基本思想却含有一个深刻的眞理。这个眞理就是：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級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傾向同小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无論是机会主义民主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成分和傾向之間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种錯綜結合的情况。在資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农民”国家，沒有无产阶級某些阶层和小資产阶級某些阶层的客观融合，就不可能出現資产阶級革命的第一个回合。我們現在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时必然会区分、划清、再一次划分出眞正无产阶級社会主义分子，清除他們中間那些仅仅由于口号“鮮明”或者由于要和立宪民主党共同爭取“全权杜馬”而“跟着运动走的人”（用德文說，就是 *Mitläufer*〔同路

人])。

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区分的过程。无論孟什維克或布尔什維克的人数都减少了，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我們不要害怕承認这个事实。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問的：党的左翼已經避免了党的右翼发生的土崩瓦解和意志消沉的局面。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在原則上毫不坚定，就不能不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事件最后必将实际証明，哪一派会保持而且是怎样保持更大的組織上的团結、无产阶級的忠誠和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这个問題只能由生活来解决，而不能由空話、諾言、誓言等来解决。混乱和动搖的情况显然存在，这种情况需要澄清。要澄清这种情况，就必須再来一次区分。

現在举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用“监獄居民”（按法院监察官的說法）的成分，換句話說，用那些因政治案件入獄、流放、罰做苦役和流亡国外的人的成分，来說明我們的看法。这个成分可以正确地反映昨日的实际情况。有些住在遙远的和不怎么远的地方的“政治家”，現在的特点就是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緒五花八門，面目不清，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嗎？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許多不相干的人、許多“威武一时的騎士”和許多新手浮現出来，因此其中有許許多多的人根本沒有什么完整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現象。在几个月的狂热中是建立不起这种世界观的，所以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平均“寿命”恐怕不过是几个月。因此，在被革命卷来的新阶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間再一次发生分化，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分化現在正在进行。例如，許多孟什維克所干的埋葬社会民主党的勾当，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可敬的先生在埋葬自己社会

民主党人的称号。我們完全用不着害怕这种区分。我們应当欢迎、促进这种区分。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爭！又是內哄！又是論战！就讓他們乱发怨言吧。我們的回答是：不經过一次又一次的斗爭，真正无产阶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形成的。在我們俄国，这样的党甚至在当前艰苦的关头也在逐漸形成，而且一定会最后形成。能达到这点的保証就是俄国整个資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国际社会主义对我們的影响，1905—1907 年的第一个战役的革命趋势等。

为了促进这种新的区分，必須加强理論工作。俄国的"目前形势"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工作以及这个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不决定于某些人的情緒，不决定于个别集团的热心，甚至不完全决定于那种使許多人不得不远离"实际"的外部警察条件，而决定于国內的整个客观情况。当群众在領会直接革命斗爭的无比丰富的新經驗的时候，为革命世界观即为革命馬克思主义而进行理論斗爭就成了迫切的口号。因此，这位彼得堡工人强調必須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須研究新的問題，必須用一切办法鼓励和发展学习小組，从参加小組的工人中間培养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領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党支部（一提起这个字眼，唐恩之流就要大发羊癎疯）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識分子所深恶痛絕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作。

但是，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完全正确的意見，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却走上另一个极端。例如，他錯誤地从"重要問題"中勾銷了考虑三年来的革命經驗、研究群众直接斗爭的实际教訓、总結革命的政治鼓动工作等等問題。也許这不

过是作者阐述问题时的疏漏，或是因为工作匆忙而产生的个别错误。在尽量广泛的工人面前研究这些问题，总结这些问题，要比官僚和自由派所津津乐道的“地方法庭”、“地方自治”等等斯托雷平俄国的“改革”问题重要得多。在黑帮杜马和黑帮专制制度条件下，这些“改革”必然是一场滑稽剧。

不过，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坚决反对“发明口号”，特别是反对“打倒杜马”或“打倒党团”的口号，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他针对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提出了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来巩固社会民主党，巩固为机会主义深恶痛绝的这个党的传统，保持工作的继承性，扩大并巩固这个党和先前的党（就让机会主义者“呼声报”的编辑们大发雷霆吧！）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斯科同志的来信，批判一下这封来信的中心思想即臭名昭著的“召回主义”。自从少数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关于召回主义的著名决议（见第31号“无产者报”）起，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就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召回主义。现在我们看到，有人也代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少数来初次试图系统地论证召回主义。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论证吧。

这位召回派同志所根据的前提是正确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并没有解决，“革命并没有消灭”。但是，他从这个正确的前提却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问道：“我们党应当去适应什么情况呢？去适应停滞年代还是去适应新的社会高潮？”错误就是从这里来的。从革命并没有消灭这个说法中只能得出结论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从这个说法中既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高潮将使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完全照老样组合起来

(重新組合的时間可能需要很长，会超出我們和我們論敌的乐观估計)；也不能得出結論說，譬如經过一年的停滞之后，不可能有社会高潮(应該說"革命高潮")。停滞时期已經一年多了，現在我們还是处在停滞时期。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認："很难断定，甚

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向是在不同的时机把不同的当前口号提到首位，这始終是个事实。这位召回派同志的錯誤就在于，他忘記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經驗。

其次，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談到杜馬党团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前提："杜馬党团是党的自然頂峰，是党的外交代表。"这是不对的。作者夸大了党团的意义和作用。作者象孟什維克那样，过分吹嘘了党团的作用，难怪人們說，两极相通！孟什維克根据党团是党的"頂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結論是，必須使党适应于党团；召回派根据党团是党的"頂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結論是，这种糟糕的"頂峰"对党有致命的危險。孟什維克和召回派的前提都是錯誤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在最"理想的"資产阶級民主共和国条件下，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議会党团看做党的"自然頂峰"，看做党的"外交代表"。这个观点是根本錯誤的。我們派代表参加資产阶級的和資产阶級黑帮的代議机关不是为了办外交，而是为了进行一种特殊的党的輔助工作，为了从特殊的講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人党的議会党团甚至在最"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也总是带着若干一般資产阶級选举的烙印，例如，它和党的整体比較起来，总是带有更多的"知識分子味"，因此我們永远也不把党团看做党的"頂峰"。党团不是总参謀部（如果除了作者用的"外交"方面的比喻之外，也可以容許用"軍事"方面的比喻的話），它在有的場合更象一队号兵，在有的場合更象一队偵察兵，或者說是輔助的"兵种"之一。

这位召回派同志把党团从輔助的党組織变成了党的"頂峰"，是为了夸大党团的意义，使得我們派到資产阶級黑帮杜馬中去的这支队伍的活动具有根本錯誤的性質。

但是，可能作者已經开始不坚持这种关于“頂峰”的論点了。他在自己文章的另一个地方說得很正确：“促使党参加选举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杜馬講坛能起宣传鼓动作用。”这是对的，但是作者的与这个正确論点背道而馳的說法就显得特别不对头了，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表明，第三屆杜馬中的鼓动毫无用处，第一，因为党团本身的成分有問題，第二，因为群众对于塔夫利达宮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

現在，我們从这个錯誤非常多的論点的末尾分析起。鼓动毫无用处，因为群众对于杜馬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这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理解？这样一来，按照这种奇怪的邏輯，必須“召回”的就不是党团，而是“漠不关心”的“群众”！我們大家知道，在杜馬中实行的是专制制度的政策，是黑帮地主和大資本家十月党人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是愛說漂亮話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对沙皇制度卑躬屈膝的政策。对“塔夫利达宮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也就是对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的全部內外政策漠不关心！作者又发表了一种改头换面的孟什維主义的議論。“如果群众漠不关心，社会民主党也应当漠不关心。”但是，我們是引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党，而不是每逢群众情緒轉变或情緒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群众抱冷漠态度，或者陷于某种錯誤，热中于某种时髦思想（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布朗热主义[94]等等），但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从来也不受任何群众情緒轉变的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屆杜馬中实行了錯誤的政策，那可以而且应当批評他們的錯誤政策，但是，如果說鼓动毫无用处，是因为群众根本漠不关心，那就不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立場上发表議論了。

“群众根本漠不关心”也許并不等于对沙皇政府的政策一概漠不关心吧？就是說，对于杜馬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的群众，譬如对于上街示威、新的罢工、起义、一般的革命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內生活等問題的討論并不是漠不关心吧？作者的不幸就在于，看来他正是这样想的，可是无法直截了当地說出这种十分明显的毫无意义的話。如果作者确实能說明和証明，群众目前对一般的政治絲毫沒有抱不关心的态度，相反的，对更积极而有效的政治形式倒是非常关心，那末問題当然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們度过的一年不是沉寂、消沉和所有社会民主党組織及工人組織瓦解的一年，而是群众显然很关心直接革命斗爭形式的一年，那末我們会首先承認是自己錯了。因为只有那些假装看不見馬克思、拉薩尔、李卜克內西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工作經驗的孟什維主义“議会迷”，才会不顧革命时期的条件，始終主张参加一切代議机关。关于是参加还是抵制第三屆杜馬的問題，象任何政治問題一样，馬克思主义者必須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对待，在处理这个問題的时候，要估計到整个革命形勢，而不是只凭一个极为簡单的想法：“既然有代議机关，就应該当代表。”如果群众对政治非常关心，就意味着危机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已經存在，就意味着一定的高潮已經出現，在这个高潮的力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群众的情緒必然会表現为群众性的行动。

关于这个問題，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認說：“它的（党团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現在我們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 为什么这位召回派同志認为，我們現在不仅无力改变政治制度，而且甚至无力影响政治制度呢？显然，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所注意的完全是无产阶級

群众的行动，認为采取这种行动现在沒有可能，談論这种行动是无聊的。但是，請看一看他同时怎样"諉过于人"，把不利于召回主义的論据用来反对我們吧。

他写道："要冲破把代表与群众隔开的警察障碍，要使党团的发言更尖銳和更鮮明，总之，把党团的工作同无产阶級的生活有机地結合起来，只有这样，也許工人才会承認党团有积极的方面；但是，由于它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現在我們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所以必須抛弃关于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的任何幻想！"……

既然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取决于"冲破警察障碍"，为什么結論又說，"抛弃关于改进党团工作的幻想"，而不說，抛弃关于冲破警察障碍的幻想呢？？作者的話显然不合邏輯，它的論断应当改成这样：必須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改进党的整个活动和党与群众的各种联系，这样一来，必然会冲破一切警察障碍，特别是会加强党和党团的来往，加强党对党团的影响。作者好象是要求我們反召回派"冲破警察障碍"，这样，他可能就同意抛弃召回主义。但是，他这样做，也就是把各种政治現象的实际联系和相互依附关系的本末倒置了，这不是显而易見的嗎？如果群众"現在"不仅能够"影响政治制度"（每一次成功的政治性的游行示威都能影响政治制度），而且能够冲破障碍，換句話說，如果群众現在就能冲破第三屆杜馬的"障碍"，那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一支队伍到这个杜馬里去可能就沒有意义了，如果是这样，召回派同志，可能（我們假定說）你是正确的。可能是这样。但是你自己說，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你自己同意說，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更严肃更頑强地进行准备工作，来把这种可能变成現实。

你說，“党团的成分有問題”。如果这个意見是主张改变党团的成分，这个理由也可以考虑，看看在本届党团退出以后，在改选的时候党团的成分能不能改善。但是，作者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他不仅要召回杜馬党团，而且要取消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馬中的任何代表团，宣布参加杜馬是錯誤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党团成分有問題”来論証召回主义，就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說，是一种不可饒恕的意志薄弱和信心动搖的表現。我們党贏得了一个成果，就是我們使黑帮分子不得不从工人复选人中选举了我們党的候选人即社会民主党人。难道我們应当承認不能指望这些党員工人在杜馬講坛上通俗易懂地論述社会主义嗎？难道我們应当在同資产阶級“內行人”[95]（請看一看这一号报紙上发表的关于党团問題的来信吧，这封信出色地写出了这些人所带来的恶果）进行了几个月的斗爭以后，承認无力应付困难嗎？难道我們应当承認，我們党在暫时沉寂和停滯的时期，沒有能力派出善于当众論述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員嗎？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經失常。当然，在这方面，我們的杜馬党团本身首先要負責任，因为正是和完全是它犯了这些严重的錯誤，才使得对杜馬党团的不滿情緒变成了召回主义。但是，我們決不能讓正当的不滿把我們推向采取錯誤政策的道路。決不能这样。我們应当而且一定会坚決而頑强地努力使党和党团接近，努力改善党团。我們不会忘記，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經历中有些事例表明，当时党团和党的斗爭比我們第三届杜馬时期长久得多，尖銳得多。我們来回顧一下德国的情况吧。在德国实行特别法时期，党团竟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极难容忍的反党的机会主义步驟（如投票贊成补助輪船运輸业等等）。德国党当时在国外有一个每周出版一次的中央机关刊物，按期送到德国境內。

虽然警察迫害非常厉害，虽然革命形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如現时的俄国，但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組織却比目前的我国党組織要广泛得多，巩固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党团进行了长期的斗爭，最后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那些只知乱喊乱叫而不去努力改善党团的盲目拥护“青年派”的人，下場是很糟糕的。而党的胜利的表現，就是党团馴服了。

在我国，党为了糾正党团的錯誤而同它进行的斗爭不过刚刚开始。我們还沒有一次党代表会議坚定明确地告訴过党团必須糾正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策略。我們还沒有一个按期出版的中央机关报能够代表全党监督党团的每一个步驟，指导党团的工作。我們的地方組織在这方面的工作（就社会民主党在杜馬中的每一次发言向群众进行鼓动，同时說明这次或那次发言中的各种錯誤），做得还很少很少。可是，竟有人劝我們撒手不管，承認斗爭沒有希望，在象1908年这样的时期不要利用杜馬講坛。再說一遍，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經失常。

你們說，沒有鮮明的言論。至于談到这些“鮮明的言論”，应当分清两个問題，第一，党的消息很不灵通；第二，关于鮮明言論問題的一般提法本身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錯誤。

关于第一个問題应当說，在以往，凡是想实事求是地批評党团的人都指出了一系列确实严重的錯誤（如宣言；投票贊成拨几百万巨款給什瓦尔茨；同国家民主党人进行协商；認为宗教对党来說是私人的事情；对1908年10月15日的質詢沒有发表言論；沒有明确地批評立宪民主党人，等等）。象孟什維克那样（他們認为，除了契利金的一次发言以外，一切都非常好），故意不談这些錯误，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我們不应該故意不談这些錯誤，而应

該在我們的地方机关和非地方机关，在每一次集会上，在向群众散发的关于每一次发言的鼓动传单上，公开說明这些錯誤。在对党团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評方面，在向无产阶級群众介紹这些批評方面，我們做的工作还太少。我們应当随时随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要我們动手做这項工作，我們就会看到，党团有許多的发言，特别是許多根据中央委員会代表的指示并經中央代表認可的下一項議程的決議草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綱作了正确的論述，刊登在杜馬記录和“俄国报”[96]附刊上，这些材料在群众鼓动中連百分之一都沒有用上。毫无疑問，应当批評党团，故意不談它的錯誤是不老实的行为。但是，我們大家也应当巩固各地的組織，利用党团的每一次发言开展鼓动工作。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結合起来，才确实称得起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只有这种結合才能帮助我們胜利度过“腐敗时刻”，加速新高潮的到来。

其次，作者在强調“沒有鮮明的发言”的时候說：“有人認为（誰認为？是几个絲毫不懂馬克思主义的 *Mitläufer*〔同路人〕嗎？），社会民主党迁就了现状，想进行和平的文化工作；党团的存在好象就是証明：革命不是在口头上……就是在实际上已被埋葬。虽然这个意見并不正确，但是我們要駁倒它，就不能只用論据，而是要用事实。”而作者为了說明“改造”在向群众“强調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杜馬的态度这方面的整个策略而提出的唯一“事实”就是召回党团！結果，召回党团倒被看做駁斥“革命被埋葬”这种說法的“事实”，被看做强調指出新策略的“鮮明言論”！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应当說，作者沒有正确了解到“鮮明言論”和“鮮明”口号的一般含义。我們布尔什維克1905年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馬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鮮明”，

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当时存在着日益高涨的高潮，而沙皇制度企图用召开法案諮議杜馬的諾言来打消这个高潮。我們在1906年夏提出了“成立支持起义的左派执行委員会，不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內閣的要求”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鮮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当时的事件証明：立宪民主党人阻碍了斗爭，他們在1906年6月同特列波夫进行的秘密談判說明了政府的把戏，眞正的搏斗在杜馬被解散以后就在而且也必定在另一个基础即武装斗爭的基础上(斯維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工人和农民暴动的終結)进行。我們在1907年提出了不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要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鮮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圣彼得堡的选举和第二届杜馬的各次表决(和辯論)都証明，“黑帮危險”是无稽之談，实际上是既反对了立宪民主党人，又反对了反动派，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反对了反动派。

毫无疑問，在革命时期有些人投靠我們，并不是因为他們懂得用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和策略的正确性，而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口号和策略“鮮明”。在目前低潮时期，我們队伍里今后剩下的都是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情况我們并不感到可怕，反而感到高兴。請这位召回派同志仔細考虑一下自己的論断吧：要駁倒革命被埋葬这种說法，不应当用言論，而应当用事实，因此我們就要召回党团！这个論断是根本不对的。靠召回党团来強調指出革命沒有被埋葬也就等于埋葬那些能够实行这种政策的“革命者”。因为这种“革命性”就是表明，在“目前”客观条件下不能逃避或推諉的艰巨、困难而緩慢的工作中，他們已

經手足无措，无能为力。

最后，我們要指出，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自己的信的末尾提出了最近工作的五点計划，正确地說明了当前的任务，推翻了他的不正确的策略。再說一遍，这位召回派同志的实践胜于他的理論。他說必須有巩固的秘密組織，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恐怕不会坚持由中央委員会“任命”委員会委員这种极不实际的做法。我們不要忘記，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的职业革命家正在代替，确切些說，正在帮助知識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不管孟什維克对此表示多么憤恨，但这是事实），所以新的秘密組織与过去的組織不会完全相同，也不应当完全相同。另外，我們認为，第一点計划的最后一句話“使党支部彼此隔离”是偶然的失言，对此不必苛求。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組織不会使現在分散的支部隔离，而会使它們接近。这位召回派同志强調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实行鼓动工作的“調查制度”特别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群众同党的生动联系”，“吸引群众来討論鼓动口号”，这确实是迫切的問題。承認这是迫切問題，也就批駁了各种“发明的”（按托姆斯基的精辟說法）口号，也就比任何空論都更好地表明，情况的发展向我們大家，无論是反召回派或是召回派，提出一个迫切的实际任务，一个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在思想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組織方面，巩固秘密的、拥有工人出身的領导人的工人政党，在群众中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全面鼓动工作。这項工作只要我們能够愈来愈同心协力地做下去，就会使我們大家团結一致；这項工作比光是提几十个最后通牒更能促使我們的杜馬党团来改进工作，加强紀律，糾正錯誤；它会使工作活跃起来，重新造成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教会我們正确地測量高潮增长的程度和判斷高潮的迹象，把一切僵死的、臆造

的、"发明的"召回主义口号一扫而光！

载于1908年11月13日(26日)
"无产者报"第39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第三届杜馬
关于土地問題的討論

第三届杜馬在土地問題上将近一个月的討論，为研究土地問題的現状、研究革命总結和无产阶級的任务，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材料。我們打算根据这些材料，作出一些基本的結論。发言的人自然而然地分成四派：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农民，社会民主党人。狭义的“右派”和十月党人之間的差别已經完全消失。农民在土地問題上无疑是以一个政治派别的姿态出現的，右派农民和劳动派之間的差别只不过是一个派别内部色彩上的差别。下面我們来分析一下每派采取的立場（括号里的数字是“俄国报”附刊上的速記記录的頁碼）。

果然不出所料，黑帮“議員”——右派和十月党人大談其 1906 年 11 月 9 日的法令同农民总則第 12 条（該条規定，农民繳納贖金后，有权要求分得一块土地）以及贖买条例第 165 条等等的相互关系，竭力用法律上的詭辯和档案庫的废紙来掩盖自己土地政策的实質。施德洛夫斯基为了把自己装扮成“自由主义者”，他証明，德·托尔斯泰伯爵关于禁止出讓份地等的法律与1861年的“精神”相抵觸，而 1906 年 11 月 9 日的法令是符合这种精神的。这全都是装腔作势，目的是要轉移农民的視綫，抹杀問題的实質。下面我們就会看到，立宪民主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黑帮的圈套，而

对我們社会党人来說，只要簡单指出，把施德洛夫斯基、雷科申先生之流以及沙皇黑帮其他一些奴仆的发言的厚厚一层官腔的尘垢去掉，就可看出他們土地政策的实际內容。那个自称是和平革新党人、其实是玩弄司徒卢威先生那套手法的彻头彻尾的黑帮分子李沃夫，比誰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个內容。这个地主的奴仆講道："在农民群众中間形成了两极：无权的个人和专横的群众（右面和中間鼓掌）…… 群众这种状况对法制的"（应讀作：地主的）"国家是一种威胁（右面和中間鼓掌）……""土地应当屬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土地就象空气和水一样需要；我們就是为了获得土地和自由才到这里来的。"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声音。这种声音直接出自蘊藏在农民群众中的迷信和偏见，这种声音表明对政权的一种迷信，覚得政权可以夺取一部分人的东西，而交給另一部分人…… 接着，李沃夫先生在追溯前两屆杜馬时說道："我們来回忆一下，在这里講了一些什么，我一想起这些，就很沉重，但我还是要說，我不能不說，大家在土地委員会說了一些什么。請設想一下，当时甚至提出菜园和果园不能侵犯这样的問題，都遭到极其强烈的反駁和反对，只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当提出一切土地交易都要停止，不仅向貴族銀行抵押土地和向农民銀行出卖土地要禁止，連土地的买卖，甚至贈送和继承都要禁止的問題的时候，显然使人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覚，先生們，这并不是为地主的利益而感到可怕，而是为国家的状况和命运而感到可怕（中間和右面鼓掌。有人喊："說得好"）。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建立起資本主义的現代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第 298 頁）

地主国家已經为自己的生存感到"可怕"，已經对农民群众的"呼声"（和运动）感到"可怕"了。除了建立在保存地主即农奴主土

地占有制基础上的資本主义，其他的資本主义，这些先生們簡直是不能想象的！彻底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以后，資本主义会得到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这是“有教养的”李沃夫先生們連听說都沒有听說过的！

为了向群众进行鼓动，介紹一下施德洛夫斯基、鮑勃凌斯基、李沃夫、戈里岑、卡普斯亭之流的几段发言，是完全必要的。到目前为止，我們看到，专制制度几乎完全是发布命令，很少发表烏格留姆-布尔切也夫[97]式的声明。现在，我們看到，統治阶級有組織的代議机关为地主的君主制度和黑帮的“宪制”公开进行辯护，这种辯护为喚醒政治上沒有觉悟的或漠不关心的人民，提供了非常宝貴的材料。我們只提出两个特別重要的情况来簡单談一談。第一个情况是，右派叙述自己的政治綱領的时候，总是把他們所反对的活的敌人提到听众面前。这个敌人就是革命。愚蠢的李沃夫明显地流露出他感到革命“可怕”的心理，所有一想起不久前的情况总是咬牙切齿深恶痛絕的人也流露出了这种心理。这样从反革命的立場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問題，使一切考虑服从于一个主要的根本的考虑，即同革命进行斗爭，——这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眞理，使右派的发言比动搖不定的畏首畏尾的自由派的发言珍貴得多（无論是对現状进行科学分析，还是对鼓动工作都是如此）。右派对革命、对1905年底的运动、对起义、对头两届杜馬进行攻击时的那种不可抑制的狂怒，比任何长篇大論都更清楚地証明：专制制度的卫士們面临着一个活的敌人，他們并不認为同革命的斗爭已經結束，革命的再起时时刻刻都是他們的最現实最直接的威胁。同已死的敌人是不会这样斗爭的。对已死的东西是不会这样仇恨的。头脑簡单的巴拉克列也夫先生天眞地反映了一切右派言論的

这种共同的精神。他說，11 月 9 日的法令当然不能推翻，因为它反映了皇上的意志，同时又說："諸位国家杜馬代表先生！我們生活在革命的时代，而革命，我深信还远远沒有結束。"（第 864 頁）巴拉克列也夫先生害怕 11 月 9 日法令的"革命起源"，担心它会燃起新的斗爭。他說："我們正經历着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会怎样結束，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到一幅极其阴暗的图画，我們的职責就是不支持人民中的騷动和糾紛。"

第二个特別重要的情况是右派的經济綱領，主要是土地綱領。他們維护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立場象一根紅綫一样，貫穿着他們的所有发言，一直到大主教米特罗范努什卡①（米特罗范主教）的发言。这位主教在报告人講完之后立即起来发言，他看来是想吓唬一下农村那些民主的然而是受压制的"神父"，于是他就摆出一副可笑的姿态，竭力抑制喜欢装疯卖傻、爱用教会語言（什么"村社，自古有之"）的习惯，"講出了"这样的話："生活愈来愈朝着个人的个性方面发展"；"应当承認，按照西欧农場主的样子为我国农民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第 69 頁）。

試問，为什么地主阶級和資本家阶級在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馬中这样坚决地捍卫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呢？难道只是由于这是"政府最近作出的决定"嗎？当然不是！这个决定是在貴族联合会[98]的指使和授意下作出的。地主和資本家非常清楚他們要与之斗爭的敌人，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革命把地主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把农民利益的胜利同整个土地私有制

① 米特罗范努什卡是俄国剧作家馮維辛的喜剧"紈袴少年"的主人公米特罗范的卑称；他是愚蠢自負、不学无术的典型，和这里的米特罗范主教同姓，列宁引来加以諷刺。——譯者注

(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消灭联系在一起的。把份地私有制同被剝夺的地主土地公有制結合起来，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維克很不高明的臆想。事实上，目前斗爭的焦点就是新俄国是由地主建立(这就不能不保存各种土地私有制)，还是由农民群众来建立(这在不破坏地主土地私有制和份地私有制的半农奴制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現在，我們来談談立宪民主党人。他們的发言既不同于右派，也不同于左派，而是竭力調和不能調和的东西，脚踏两只船。米留可夫先生的发言，只有他作为*历史家*、而不是作为*立宪民主党人*講的那一部分，对貴族联合会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把这些材料綜合一下，是每个*民主主义者*的荣誉。然而整个說来，盛加略夫、别列佐夫斯基、米留可夫、博比楊斯基、罗迪切夫等人都陷入了黑帮分子施德洛夫斯基先生的圈套，用法律上的詭辯把听众弄得暈头轉向，空談罗馬法認定的“正确性”(“为了装装样子”①，罗迪切夫还用了一个拉丁詞：aequitas②！“我們”在大学里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堕落到对人阿諛奉迎的地步(盛加略夫先生承認对斯托雷平的走狗雷科申是“尊敬”的，并証明，在“神圣地保存着私有制”的国家，也有强迫出讓的现象)。从“謹愼的”角度出发来反对11月9日的法令，这象一根紅綫一样貫穿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所有发言。有人却責备我們布尔什維克把立宪民主党人叫做自由派地主，玷污了他們。事实上，他們还要坏。他們是自由派官吏。不能設想，还有什么比所謂“民主主义者”的政党在国家杜馬作削弱斗爭的发言，宣揚官吏的“謹愼态度”，卑鄙地贊揚所謂

① 这是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札罗夫的話。——譯者注

② 正确性。——譯者注

1861年的“大改革”那种农奴主对农民的掠夺和盘剥，更能败坏群众的民主意識了！

攻击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不够謹愼”，就等于出卖自己，建議由这样一种人来执行同样的政策，这些人能够“謹愼地”完成同样的工作，就是說，打着“立宪民主主义”的假招牌推行实質上是地主的政策，不只是用强迫的办法，而且用欺騙农民的办法来推行。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发表的許多論調中間的一个；这些論調正是暴露了他們发言的上述用意。博得立宪民主党的領袖米留可夫先生特别称贊、并称之为“精彩”发言的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发言談道：

“我深信，这个草案”（立宪民主党的土地草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不仅对农民），“先生們，我所以这样說，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从建立文明的农业的角度来看，人民自由党的草案无疑要比現行制度更有益处。不应当光是抽出强迫出讓这一事实，为这一事实感到气憤，說这是暴力，而应当研究和考虑一下，我們的草案建議实行的办法是以什么形式表現出来的，这种强迫出讓的办法是怎样实現的”（眞是金玉之言！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你沒有成为布尔什維克嗎？）。“拿第一屆杜馬的42位代表的草案来說。这个草案就只”（一点不錯！）“認为，必須首先出讓占有者自己沒有經营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各地成立委員会，这种委員会应該在一定时期內，弄清楚哪些土地应当出讓，哪些不該出讓，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滿足。这些委員会的成員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請你講下去，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不要害羞！要知道，事实是掩蓋不住的：由于委員会的“中立”主席一定要由地主的政府任命，地主在委

員会中可以稳占多数。参看立宪民主党的“土地問題”文集第2卷庫特列尔的草案。)“各地进行了这項一般的具体的工作以后，当然会弄清楚可以出讓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农民自己也会相信，他們的正义要求可以满足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一切再提交給国家杜馬以及国家参議院”(一点不錯!)，“經它們修改以后”(就是說，“改革”經过地主和官吏的多数再次削减以后!)，“才由最高机关批准”(請回忆一下1861年份地額經过同样的最高机关几次三番縮小后的情形)。“进行了这种有計划的工作以后，居民的眞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眞正滿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願意破坏的。”(第143頁)

布尔什維克在1906年夏关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草案所說的一切，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1908年10月都承認了!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屆杜馬中当众强調了他們的改革的民主外貌，而在同特列波夫及其走狗的秘密会議上，又証明这种改革的地主性質。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屆杜馬中当众强調了他們的改革的地主性質，而在避开警察同几个还相信老太婆講的故事的怪人举行的秘密座談中，又証明这种改革的民主性。两副面孔的雅努斯①随风轉換自己的“面孔”，时而摆出这一面，时而又摆出另一面。“民主主义者”居然墮落到这步田地，竟向黑帮死硬派竭力証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行为和綱領不会对他們不利!

我們来把农民的发言和这些发言对照一下。这里有一个典型右派农民斯托尔查克的发言。他的发言，首先把尼古拉二世的話

① 雅努斯是古罗馬的門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們总以它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譯者注

照样重复了一下，什么“神圣的私有权”不容“侵犯”等等。接着，談道：“上帝保佑陛下健康。他为全体人民說得很好……”（第295頁）。最后，他說：“既然陛下說要有眞理和秩序，那末我有3俄亩土地，而我的邻居竟有3万俄亩，这当然就不能算是秩序和眞理”（第296頁）！！請把这个保皇派和另一个保皇派别列佐夫斯基对比一下。前者是愚昧的农夫，后者却是个受过教育的准欧洲人。前者极端幼稚，政治上极不开展。他不知道，君主制同“秩序”，即同保护3万俄亩土地的占有者的秩序、无眞理之間的联系。后者懂得政治，熟悉維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之流的全部內幕，研究过欧洲各国的宪法的細节。前者是毕生在3俄亩土地上受煎熬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經济現实促使他們投入群众性的革命斗爭，去反对3万俄亩土地的占有者。后者是几十个、最多不过是几十万个地主中間的一个，給农夫开空头支票，想“平安无事地”保住自己的“文明田庄”。前者可以在俄国完成資产阶級革命，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建立农民共和国（不管这个詞現在他听起来感到多么可怕），这难道还不清楚嗎？后者則不能不阻碍群众的斗爭（沒有这种斗爭，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这难道还不清楚嗎？

希望那些到現在还无論如何都不能了解“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什么意思的人，能够好好考虑一下这一点！

斯托尔查克的土地綱領就是我們在“无产者报”第22号上写过文章加以論述①的第三屆杜馬42个农民代表的土地法案。这个草案表面上很簡单，事实上比立宪民主党人的草案要左些，这是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認的。这个草案要求由普选出来的地方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36頁。——編者注

委員会来討論分給农民土地的改革，因此，它事实上是革命的草案，因为由各地眞正民主选举出来的机关来討論土地改革，是同保存当前俄国的沙皇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根本不相容的。在反动势力极端猖狂和白色恐怖籠罩一切的情况下，在根据貴族联合会授意下为了对地主有利經过专門伪造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黑帮杜馬中，有 42 个农民签署了这样一个草案，——这个情况比任何言論都更有力地証明了当前俄国农民群众的革命性。讓机会主义者去証明无产阶級在資产阶級革命中必須同立宪民主党人結成联盟、必須同資产阶級接近等等，覚悟的工人了解了第三届杜馬中的爭論之后，只会更加确信，沒有工农群众不管資产阶級的动摇和背叛而实行的总攻击，俄国的資产阶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如果說，斯托尔査克和基本上站在同样立場上的司祭提多夫、安德列伊丘克、波波夫第四和尼基提尤克等代表是不自覚地自发地反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他們自己不但不敢講到底，而且不敢想到底：从他們的发言和建議会得出什么結論，那末，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馬中就直接地公开地反映了农民的群众斗爭精神。劳动派农民最宝貴的发言，就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异常确切地有声有色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緒和願望，虽然在綱領方面有些混乱（有的贊同 42 个农民的草案，有的贊同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但这样更有力地反映了比任何綱領都更深刻的东西。

再看看維亚得卡省的代表克罗波托夫的发言。“我的选民对我說，11 月 9 日的法令是地主的法令…… 我的选民提出了这样的問題：为什么要用强力这样做？……为什么我們的土地要交給地方官去管理？…… 选民吩咐我說：你到国家杜馬去說，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它（11 月 9 日的法令）刚在我們那里实行，

新地主的住宅就着了火（象我們那里农民說的那样）……”（第71頁）。“全部問題在于，要給地主报酬…… 为什么国家大法要求剝夺貧苦农民的最后一块土地，而象我說的那样，把这些土地交給根据政府制定的法令得以保留土地的人呢？国家大法不要求强迫耕种閑置的土地——地主的、官方的、皇族的、寺院的土地嗎？……现在，农民每俄亩土地要繳11卢布50个戈比的税，先生們，假如为了公平合理，要所有的人都繳同样多的这种税款，土地就真会屬于农民，而不用强迫出讓了。为了公平合理，应当实行单一的土地税，那时，土地就会屬于劳动群众，誰都不会羡慕誰不願劳动誰就不納税的情况”（第78頁）……

这个天真的发言包含着多少还沒有經过斗爭考驗的力量，多少渴望斗爭的願望！克罗波托夫虽然希望避免“强迫出讓”，但他提出的措施事实上等于沒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至于这位乔治[99]学說的信徒所說的“单一税”就等于全部土地国有化，这一点克罗波特夫是不懂的，但他表达了千百万人的眞正願望，这是絲毫不容怀疑的。

下面是罗日柯夫代表的发言。首先，他說：“先生們，我一个庄稼汉站在这个講坛上講話有些不习慣……”（第77頁）“农民期待于国家杜馬的不是11月9日的法令，不是要把我們沒有的土地分給我們的法令，而是可以首先保証扩大后备土地、然后再进行分配的法令。这种法令的基本条例已由47个农民于2月20日联名提出了，但至今毫无进展…… 現在，土地的主人是地方官……而土地的眞正的主人日益受到警察的监督…… 关于購买土地来經营的問題，我国还沒有一项特定的法令……規定：不准你購买經营用的土地…… 于是，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土地規划委員会就于

1907 年 9 月 16 日决定，只有有耕畜和农具的人可以購买土地。先生們，在这里，在这座大厦里，几乎有一半地主还扣留着根据土地規划委員会的决定，沒有权利購买土地的人。先生們，我們知道，这些人劳累一年只能拿到 60—70 卢布…… 这些可怜的劳动者終身要为地主做工，終身要为别人弯腰曲背，而主人在他們背后，却自認为是文明人。"

托米洛夫的发言："我認为……唯一的出路是現在就在俄国所有村社，象过去进行人口登記那样，重新分配土地；这种登記应当确定截至 1905 年 11 月 3 日为止的男性居民人数。

我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获得土地和自由，但是我們听說，只要現政府执政，土地所有制就是不可侵犯的（中間有人喊："是私有制"）。是私有制，貴族私有制（中間有人喊："还有你們的私有制"）。如果說我們，我們是同意把份地交出来的"；（这就是聪明的普列汉諾夫之流在斯德哥尔摩討論全部土地国有化时用来吓唬我們的农民万策暴动！）"比如有个村的农民就同意把自己的份地对等地交出去，然后平均分配。政府代表的声明总括起来就是說，政权一天不轉到农民和全体人民手里，农民就既不能得到土地，也不能得到政治自由。謝謝这样坦率，尽管这些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第 149 頁）

而在 1905 年，当农民在覚悟分子的領导下团結一致（右面喧声和笑声），說了一些威胁性的話的时候……貴族們就馬上說："你們本来已經有了土地，已經給了你們份地。你們就分分那块骨头吧……"

彼得罗夫第三的发言："先生們，請回忆一下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維奇統治的时代和农民群众在拉辛領导的运动中所表現出来

的激憤情緒(右面有人喊:"什么!")……　人民的要求特别强烈地反映在1905年。本来当时也是貧困促使人民走上街头,講出可畏的話,声明自己需要什么"(第187頁)……"全部土地应当交給全体人民平均使用……　我当然反对土地私有制"(普列汉諾夫預言的万第暴动真的开始扩大了!),"因此,我說,只有全部土地交給劳动人民,他們才会輕松(第204頁)……　我坚信,你們一定会重新看到汹涌澎湃的人民群众的海洋。那时就应驗了福音書中的一句名言: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右面笑声)。劳动派党团既沒有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沒有改变自己的願望……　我們……說:全部土地归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居民!"(第206頁)

美尔兹列亚科夫的发言:"土地应归耕者所有……这不过是为了使我們俄国絕对沒有土地投机买卖,使土地屬于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它的人。"(第207頁)如此等等。

由于篇幅有限,我們就不再引下去了。我們只把沒有那么清楚有力地反映了同样思想的发言人的名字提一下,这些人就是:康德拉提也夫、司祭波波夫第二、布拉特、沃尔柯夫第二、久宾斯基、利亚赫尼茨基(后面两人代表劳动团发表了正式声明)。

試問,从农民代表的这种立場,对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綱領得出什么結論来呢?誰都承認,农民总是使反对农奴制大地产、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爭具有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的空想。布尔什維克拟定的、孟什維克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我們土地綱領的最后一部分,就反映了这一点("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記录")。

但是,問題不仅限于这一点。不論是土地分配,还是地方公有,还是国有,都是資产阶級的民主改革,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主张哪种改革呢?实行地方公有,——以普列汉諾夫为首的孟什

維克这样回答，因此，就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了这个綱領。实行农民土地国有会引起万第暴动，——他們在斯德哥尔摩公开这样宣称。

从那时起，在三届杜馬中，俄国各地的农民代表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見。“地方公有”沒有迷惑住任何一个农民代表小組，虽然这个主张正是为了“不要触动”农民的土地而臆想出来的。三届杜馬中的所有劳动派农民都主张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他們这种要求有时是用直接重述劳动派的綱領，有时是用“单一税”的特别变换的說法，再不就是多次声明“土地归耕者所有”、“我們同意交出份地”等等反映出来的。

現实生活嘲笑了“地方公有”以及什么“万第暴动”的叫喊。

一切覺悟的农民坚持土地国有的經济基础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就要回忆一下别洛烏索夫同志在杜馬中引用的統計数字的对比[100]：

“在欧俄，3 万个地主共有 7 600 万俄亩土地，1 000 万农戶則一共只有 7 300 万俄亩，每戶平均有份地 1—15 俄亩…… 唯一的結論是：总农戶中，有 $^4/_5$ 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第 209 頁）尽管这些数字，其中某些有人还会提出异議（我們認为，这些数字是毫无疑义的），但不管这些数字怎样改变，問題的实質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实質就是，农民在竭力把自己的土地增加一倍的同时，不能不力求使份地和非份地完全合并、混合。一方面，保持份地的私有制，即目前的农戶和村社所有制，另一方面，被剝夺的非份地实行公有制（“地方公有”），这在經济上是荒謬的。这是一种荒謬透頂的土地复本位制，这只可以用来拼凑知識分子所臆想的那些綱領的篇幅。經济的发展要求一切土地合并、混合。經济的发展已經在把一块块的份地同一块块的地主土地（租地）合并，不消灭

“地方公有”在土地占有制上人为加深的差别和界限，就不可能摧毁农奴制。經济的发展要求建立新的自由的土地占有制；这种占有制是同資本主义适应的，同村长和官員分配和划定的旧“份地”不相适应的。农民发言主张实行土地国有，也就是反映了經济发展的这种要求，不过他們沒有意識到这种发展的資本主义性質。份地占有制和非份地占有制之間的旧差别不符合資本主义的要求，因此不管孟什維克这些地方公有派怎样枉費心机地加深这种差别，它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而消灭这种界限，把各种土地联合、混合、合并，来发展农場主的新經济（农民錯誤地以为，土地将由每个公民耕种，不是的，它将由每个有耕种土地的手段的业主耕种），这就要求不仅消灭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而且要消灭所有的土地私有制。

斯托雷平想要消灭过去一切土地占有制的一切界限。这种願望从經济上講是正确的。資本主义必然会实現这种願望。問題只是在于：是靠牺牲千百万农戶的利益实現（根据11月9日法令进行掠夺），还是靠牺牲3万最大地主的利益实現。后一个办法，沒有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的土地国有化，是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在三届杜馬中，一切覺悟农民都主张国有化。

最后，我們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馬中的发言。在限制发言时間以前，我們党团只有两个发言人发了言，这就是格格奇柯利和别洛烏索夫。其余发言人拒絕发言，对限制发言时間这种“暴行”表示抗議。上面这两个同志正确地尽到了自己的責任。他們指出了政府政策的“貴族官僚精神”，指出“1861年的条例是徹头徹尾农奴制的条例”，指出“对政府的仇恨”充塞于农民的心头，他們要求“土地和自由”，他們在1905年証明了自己的“团結一

致”和能够进行“革命发动”。我党的发言人对我們社会民主党爭取“沒收大地产交給人民”的斗爭作了正确的解释：这个斗爭不是小市民的“平均制”和“社会化”的空想，而是国家从沒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制压迫下解脫出来的手段。格格奇柯利和别洛烏索夫的問題提法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提法。别洛烏索夫同志在发言的最后說道：“力量創造权力，要夺取权力，就应当聚集力量，組織力量。”第三届杜馬社会民主党两个发言人的发言，应当成为每个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党員的必讀材料。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的轉入下列議程的議案只是漏掉了把土地无偿交給农民的要求。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是严重违背我們党綱的行为。但，格格奇柯利同志宣讀这个議案以后，在自己的发言中，曾經两次提到必須实行“无偿出讓”，因此恐怕不能認为是故意的。

載于1908年12月1日（14日）
“无产者报”第40号

署名：尼·列·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101]

（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

1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議草案

目前的政治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旧的农奴制专制制度正在发展，轉变为以假的立宪形式来掩飾专制制度的資产阶級君主制。由于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馬的成立，沙皇政府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商业資产阶級的同盟公开地固定下来了，得到承認了。专制制度迫不得已終于走上了俄国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同时它又力图把那条能够保留农奴制地主的政权和收入的道路保持下来，所以在这个阶級和資本的代表人物之間看风使舵。沙皇政府利用这两个阶級的細小爭执来維持专制制度，而且同它們一起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斗爭，来对付在不久前的群众斗爭中显示出自己力量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級和民主农民。

（二）目前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有这种資产阶級拿破仑主义的性質。沙皇政府已經完全不相信农民群众会天真地效忠于君主制了。它設法同富裕农民結成同盟，讓他們去掠夺农村。专制政

府拚命想尽快破坏一切村社份地土地占有制，巩固单一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政策使农村中資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百倍地尖銳起来，使农村更快地分化为极少数的反动派和革命的无产阶級、半无产阶級群众。

(三)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自由資产阶級一看到群众在革命中进行大規模的发动，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現在还在走这条路，更加接近十月党人，并且鼓吹沙皇民族主义(这說明資产阶級这个阶級的自觉性在提高)，实际上是替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地主效劳。

(四)农民群众虽然有种种的动搖，但是，就連他們在第三届杜馬里的那些受压抑的、变了样子的代表团也表明他們还是繼續拥护(尽管农村的民主分子受到种种迫害)革命民主的土地变革，拥护完全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从而保証資本主义的俄国最迅速、最广泛、最自由地发展生产力。11 月 9 日的法令只能使农民群众更快地分化为政治上觉悟了的、势不两立的敌对力量。

(五)无产阶級过去和现在受到专制制度和迅速联合起来展开进攻的資本的打击最多。尽管如此，无产阶級同其他阶級相比，还是最团結，对本阶級的政党最忠誠。革命已經把无产阶級同它的政党結合在一起了。无产阶級正在繼續为自己的阶級利益奋斗，正在加深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阶級觉悟，它仍然是唯一能够彻底領导新的革命斗爭的阶級。

(六)整个說来，俄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无疑还是沒有解决。延續的經济危机、失业和飢荒表明，专制政府最近的政策不能保証俄国資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种政策必然会加深民主群众同統治阶級的冲突，增加又一些居民阶层的不满，使各个阶級之間的政治斗爭更加尖銳更加深刻。在这样的經济和政治的状况

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会成熟起来。

（七）世界市場普遍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欧工业状况起了变化，发生了危机，这次危机在1908年已变为萧条状态，一是东方掀起了革命运动，标志着資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紧张状态加强了竞爭，使国际冲突日益頻繁，因而使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之間的阶級矛盾尖銳起来，使总的国际局势日益革命化。

根据这种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議認为目前党的基本任务是：

（1）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专制政府最近的政策的目的和意义，解释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作用就是在执行独立的阶級政策的同时，应当在目前的政治生活和即将到来的革命斗爭中領导民主农民。

（2）应当全面地研究和广泛地宣传1905—1907年的群众斗爭的經驗，这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来說，是不可缺少的一課。

（3）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它在革命时代的面目；維护它旣同专制制度和各个反动阶級，也同資产阶級自由主义进行不調和斗爭的传統；反对党內某些受到瓦解影响的分子所暴露出来的脫离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傾向、縮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口号的行动以及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組織的企图。

同时必須注意，只有促进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把党的职能轉到工人社会民主党員自己手里的过程，只有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組織，才能把党引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4）根据倫敦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議，从各方面促进工人阶級的經济斗爭。

（5）利用杜馬和杜馬講坛进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和

鼓动。

(6)应当首先把对觉悟的无产阶級群众进行长期的教育、組織和团結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其次，根据这項任务，必須把組織工作扩展到农民和軍队中去，特别是要利用文字的宣传鼓动方式，而且主要应当注意对农民和軍队中的无产阶級分子和半无产阶級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写于1908年12月底—
1909年1月初

1929年第一次載于"列宁全集"
第2版和第3版第14卷

按胶印版副本刊印

2
給組織問題委員会的指示

有关組織問題的决議草案和討論，明显地暴露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当前整个組織政策的根本方針問題上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有鉴于此——

代表会議責成組織問題委員会根据下列方針进行工作：为了进行現在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的群众工作，应当把重心轉移到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組織上面来，只有这种組織不断起作用，整个的群众工作，对杜馬党团的各种影响，党在杜馬党团周围的各种活动，对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組織的种种利用，才能正确地进行，而絲毫不会降低社会民主党的阶級任务。

写于1908年12月24日
（1909年1月6日）

1909年载于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关于最近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議的公报”

按“公报”原文刊印

3

关于預算表决問題給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具体指示

第一种方案

投票贊成整个預算在原則上是不容許的。代表会議認为：在預算个別項目的表决問題上，党团必須着重指出我們綱領中的一条原則，根据这条原則，社会民主党人必須坚决反对同警察-官吏监护劳动阶級有关的改革。因此，投票反对預算中的个別項目，应当是一般的原則，因为执行这些項目往往不但同监护有关，而且同黑帮分子的直接影响有关。在劳动者的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那也最好是弃权，同时必須声明社会主义的立場。最后，在党团認为必須投"贊成"票的特殊情况下，最好同中央的代表，尽可能也同首都党組織的代表商討后再投票。

第二种方案

关于預算問題，代表会議認为：投票贊成整个預算在原則上是不容許的。

投票贊成阶級国家預算中的个別項目，使那些用于压迫群众的工具(軍队等等)的支出合法化，也是不能容許的。

在投票贊成改革或贊成用于文化需要的支出項目时，应当强調我們綱領中的一条原則，根据这条原則，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反对

同警察-官吏监护劳动阶級有关的改革。

因此，投票反对第三屆杜馬通过的所謂改革和所謂用于文化需要的支出項目，应当成为一般的原則。

不管一般条件如何，在劳动者的状况有可能得到改善的特殊情况下，那也最好是弃权，并且要特别声明弃权的原因。

最后，在肯定对工人直接有利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投票“贊成”，但最好先同中央、党組織和工会組織的代表商討。

写于1908年12月25—26日
(1909年1月7—8日)

1909年載于巴黎出版的小册子“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全党代表会議的报告”

第一种方案按小册子原文刊印，第二种方案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小册子原文作过校訂

4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决議的补充

……同时指出，党团发生偏差，不应当仅仅由党团負責，因为它是在黑帮杜馬这种特别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由党的各級組織和党的中央委員会負責，因为它們还远沒有作到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来正确安排党在杜馬中的工作……

写于1908年12月25—26日
(1909年1月7—8日)

1909年載于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关于最近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議的公报"

按手稿刊印

5

布尔什維克的声明[102]

事实的声明

鉴于唐恩发表关于布尔什維克內部达成小組协議的声明，我們指出，我們是在护党的、在党內活动的、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言論的人們之間訂立协議，而孟什維克无論在自己的决議中或是在自己的一切行动中，都是要护党的人同時中反对党、取消党、奉行欧洲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也沒有过的机会主义的那些反党分子达成协議。

写于1908年12月26日
(1909年1月8日)

1933年第一次刊載于
"列宁文集"第25卷

按手稿刊印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結革命，革命又怎样給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結

去年（1908年）我們曾不止一次地談到当前的形势和俄国資产阶級民主派的各种派别。我們指出了想在劳动派的参加下恢复"解放社"的企图（"无产者报"第32号）①，我們說明了农民和农民代表在土地問題和其他問題上的民主主义的性質（"无产者报"第21号和第40号）②，我們根据"革命思想报"描述了自称是特別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派别的惊人的輕率（"无产者报"第32号）。为了作一个完整的叙述，现在必須研究一下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文献。1908年出了4号"劳动旗帜报"（第9—13号，第10、11号是合刊）③和1份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关于第一次党代表会議和8月在国外举行的党的总委員会第四次会議的特別"公报"。現在我們就来談談这些材料。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在"公报"中說："党目前需要总結現在已經結束的伟大的俄国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往往几乎是唯

① 見本卷第122—131頁。——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17—423頁和本卷第279—293頁。——編者注

③ 很遺憾，"无产者报"編輯部沒有得到第12号。

一的角色，就是城市无产阶級。”这一点說得非常好。社会革命党人能說出这样的真話实在难得。但是再往下看五行，那里写着：“反革命的胜利只是清楚地証明了我們一开始就沒有怀疑过的那个真理：俄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須成为城市无产阶級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强大联盟的事业，否則就不能成功。这个联盟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体現在俄国現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革命党的綱領里，它只是刚开始体現于实际生活。它在将来的新的体現……”

看吧，社会革命党的誠实能不能保持很久！只要偶然听到过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綱領的人，都知道这两个綱領有根本的区别：（1）社会民主党人宣布俄国革命是資产阶級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却否定这一点；（2）社会民主党人肯定无产阶級和农民是資本主义（或者半农奴制、半資本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阶級；肯定农民是小业主阶級，它能够在資产阶級革命中同无产者站“在街垒的一边”，“一起打”地主和专制制度，能够在这次革命中，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同无产者結成“联盟”，但它仍然是資本主义社会的、和无产者完全不同的阶級。社会革命党人却否定这一点。他們綱領的基本思想根本不是認为需要无产阶級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認两者之間的阶級差别，認为不需要在他們之間划一条阶級界綫，說社会民主党人認为农民同无产阶級不同，农民有小資产阶級性，是根本錯誤的。

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同社会革命党的綱領的这两种根本差别，現在竟被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的圓滑詞句抹杀了！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是这样来总結革命的，就好象旣沒有发生过革命，也沒有过社会革命党的綱領。最可敬的先生們，社会革命党的綱領是有过

的，它同社会民主党的綱領在基本的即理論的部分上的全部差別，就是否認农民的小資产阶級性、否認农民同无产阶級之間的阶級界限。最可敬的先生們，革命是发生过的，这次革命的根本教訓就是：农民自己的、公开的、群众性的发动，暴露了自己跟无产阶級不同的阶級本性，表明了自己的小資产阶級性。

你們不是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沒有覚察到这一点嗎？你們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竭力逃避革命暴露出来的不愉快的现实。你們不仅同劳动派“联合”行动，而是同他們合而为一、密不可分，而且是在1905年秋天和1906年夏天，公开的革命达到了最高潮这种最重要的关头这样做的。当时公开的报刊是屬于社会革命党-劳动派的。甚至在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分离出去以后，在第二屆杜馬选举时和在第二屆杜馬中，你們同他們也不是联合，而是結成集团，就是說，几乎合并在一起。你們自己的綱領跟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綱領不同，在农民代表的一切公开的和眞正群众性的发动中遭到了失败。无論在第一屆或第二屆杜馬中，絕大多数农民代表都接受了劳动派的土地綱領，而沒有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綱領。从1906年底开始，社会革命党人自己在純粹是社会革命党的出版物上，也不得不承認劳动派这个政治派別的小資产阶級性，承認这个派別骨子里是表现出小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見維赫利亚也夫先生和其他社会革命党人攻击人民社会党人的一些文章)。

請問，社会革命党人在“总結”革命的时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結論隐藏起来，到底是想騙誰呢？

为什么农民在革命时期会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劳动派的政党(或集团)呢？为什么在革命时期成为农民群众的政党的是劳动

派，而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呢？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認为这是偶然的，那就談不上什么总結、什么綱領了，因为不管什么总結，什么綱領都会被一团紊乱所代替。如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現代社会基本經济关系的結果，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綱領的主要点和根本点便得到了*历史的証实*。我們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論上給农民和无产阶級一向划的阶級界綫，現在由革命在实际中划出来了。革命完全表明了，一个政党，想要在俄国成为群众的党、阶級的党，那*或者*应当是社会民主党，*或者*应当是劳动派的政党，因为群众自己在最重要最紧张的关头，用自己公开的发动十分清楚地划出了这两个派别，而且也只有这两个派别。至于中間派別，正如1905—1907年的事变所表明的，它們从来沒有在任何方面同群众結合起来。这一点也証明了我国革命的資产阶級性質。現在沒有一个历史家，沒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能够否認俄国的政治力量从根本上分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农民。

“城市无产阶級和劳动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这是糊塗透頂的謊話。无产阶級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不是“存在于思想之中”，也不“只是刚开始体现于实际生活”，而是俄国革命整个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1905—1907年所有重大事件的特点。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起义同各地农民的起义和陆海軍士兵的起义，就是无产阶級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自发的，沒有定形的，往往是不自覺的。这些力量沒有好好地組織起来，是分散的，缺乏实际的集中的領导，等等。但是，无产阶級和农民这两种打开旧专制制度缺口的主要力量的“联盟”，则是不容爭辯的事实。不懂得这个事实，就根本无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总結”。社会革命党人的結論騙人的地方就在于：他

們不說劳动派农民，而說劳动农民。这个小小的、細微的、似乎很难看出的差别，实际上，正好造成了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幻想同革命最終証实的现实之間的鴻沟。

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講劳动农民如何如何。革命确定了現代俄国农民的政治面貌就是劳动派。看来，社会革命党人岂不是正确的嗎？但是历史就是在这种地方作弄人：历史正好用社会民主党人預見的內容充实了实际上同社会革命党人所用的这个名詞相符合的东西，而把这个名詞保存下来，使之永垂不朽。革命的历史在劳动农民的小資产阶級性这个爭論的問題上，把我們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历史把名詞給了社会革命党人，而把事情的实質給了我們。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歌頌的劳动农民，在革命中原来是他們不得不弃絕的劳动派！而我們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可以而且应該不只是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103]，不只是引証“爱尔福特綱領”[104]，不只是用民粹派的經济調查資料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統計資料，而且要用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行动，特别是有关劳动派的成分和活动的事实，来証明农民的小資产阶級性。

不。历史把我們同社会革命党人分开了，我們沒什么可埋怨的。

“劳动旗帜报”第18号第3頁上写道：“如果召回派能使社会民主党回到它的极端富有战斗性的立場上来，我們就会失去一些很好的論战材料，但是会得到一个执行彻底的战斗的策略的伙伴。”在这几行以前写道：“爭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只有当左派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占了上风，才能胜利。”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說得很好！你們想恭維我們的“召回派”和“左派”。讓我們也用恭維来回敬吧。讓我們也来利用一下“很好的論战材料”吧。

“讓各式各样的政党，以至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去参加紙板做的、演戏似的杜馬，去維持虛假的立宪制度吧！”（“劳动旗帜报”，同上）

这么說来，第三屆杜馬是紙板做的杜馬了。这一句話就足以暴露出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无知到了极点。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的最可敬的領导者先生們，第三屆杜馬同第一、第二屆杜馬比起来，并不那么象是紙板做的！你們不了解这个簡单的道理，那不过是再一次地証实了我們在“无产者报”的“改头换面的議会迷”一文中对你們所下的評語。你們完全是在重复庸俗的資产阶級民主派通常的成見：要使自己和別人相信坏的反动的杜馬是紙板做的，而好的进步的杜馬就不是紙板做的。

实际上，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馬是想用革命来吓唬专制制度的自由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手中的紙板做的剑。第三屆杜馬却不是紙板做的，而是专制制度和反革命手中的一把眞正的利剑。第一屆和第二屆杜馬是紙板做的杜馬，因为它們的决議同社会阶級斗爭中物質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不相符合，只是說些空話而已。这两屆杜馬的意义在于：在前面一排耍立宪把戏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眞正在革命的、在公开的群众斗爭中打击了敌人但还沒有把敌人打垮的民主农民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眞正的代表。第三屆杜馬不是紙板做的杜馬，因为它的决議是同反革命暫时胜利的形势下物質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相符合的，因此就不是說空話，而是在付諸实行。这一屆杜馬的意义在于：它給人民中

政治上不开展的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課，使他們看到了代議机关同实际掌握国家政权之間的关系。代議机关，哪怕是最“进步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級还沒有掌握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必然是紙板做的。代議机关，哪怕是最反动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級掌握着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不会是紙板做的。

把第三届杜馬叫做紙板做的、演戏似的杜馬，就是早已成为社会革命党人的特征和主要特性的那种极端輕率和濫用空洞的革命詞句的例子。

再往下談。說第三届杜馬是“虛假的立宪制度”对不对呢？不，这不对。在領导机关中，只有那些不懂得拉薩尔差不多在半世紀以前就講授过的基本知識的人，才能說出这种話来。名叫社会革命党的低級宣传小組的最可爱的組員們，宪法的实質是什么呢？是不是实行宪法比不实行宪法要自由一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只有庸俗的民主派才会这样想。宪法的实質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議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議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現了阶級斗爭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当法律同現实脫节的时候，宪法是虛假的；当它們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虛假的。俄国第三届杜馬时期的宪法，并不象俄国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馬时期那样虛假。“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如果这个結論使你們惱怒，那是因为你們旣不懂得宪法的实質，也不懂得宪法的虛假性同宪法的阶級性之間的区别。宪法可能是黑帮的、地主的和反动的宪法，但是并不象某些“自由派的”宪法那样虛假。

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幸就在于旣不懂得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懂得馬克思的辯証法，完全当了庸俗的資产阶級民主思想

的俘虏。在他們看来，宪法不是阶級斗爭的新場所、新形式，而是一种象自由派教授們所說的“法制”、“法律秩序”、“共同福利”之类的抽象的福利。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君主立宪也好，共和制也好，都不过是阶級斗爭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辯証法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經过它的阶級內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身)絲毫也不消灭从前的剝削阶級的統治，不过形式是改变了。例如，实行貴族杜馬和貴族政治的17世紀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政治、官吏等級制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制度”时期的18世紀的专制制度，而19世紀的专制制度又与这两者大不相同，它不得不“从上面”来解放农民，使农民破产，給資本主义开辟道路，开始建立資产阶級地方代議机关。到20世紀的时候，半封建、半宗法制的专制制度这一最后的形式也过时了。在資本主义的发展、資产阶級力量的增长等等的影响下，就非轉到全国范围的代議机关不可了。1905年的革命斗爭之所以尖銳，是因为斗爭的焦点在于：究竟由誰来召集和怎样召集第一次全俄代議机关。十二月的失敗解决了这个問題，旧君主制胜利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黑帮-十月党人的宪法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宪法。

在新的环境中，在拿破仑式的君主制的机关中，在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斗爭的起点仍然是消灭原来的敌人，消灭黑帮专制制度。社会主义政党能不能在这个斗爭中拒絕利用新的代議机关呢？社会革命党人連这个問題都不会提，而是用一些空話，仅仅用一些空話来敷衍搪塞。請繼續听下去：

“現在我們沒有議会斗爭的手段，而只有議会外的斗爭手段。应該使这种信念处处深入人心，必須同所有妨碍这种深入的东西展开不調和的斗爭。

我們要把精力集中在議会外的斗爭手段上面！”

社会革命党人的議論是以社会学中著名的主观方法为依据的。只要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就万事大吉了。关于現在是否存在某种斗爭手段的信念，应該用客观材料来检驗，这一点主观主义者是不管的。但是我們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会議的“公报”和决議，就会讀到“……当前艰苦时期的，或者确切些說，黑暗日子的阴暗的沉寂”（第 4 頁）“……反动社会势力的糾合”“……人民群众的精力冻結的事实”“……知識分子是人民当中最敏感的部分，現在显然疲劳过度了，思想涣散了，参加革命的力量象退潮一样地离开革命斗爭了”（第 6 頁）如此等等。“有鉴于此，社会革命党应当……（二）根据策略上的考虑，对局部的群众发动的計划抱否定的态度，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发动可能白白消耗人民的精力。”（第 7 頁）

“我們”“只有議会外的斗爭手段”，这个“我們”是誰呢？显然是恐怖集团，因为上面摘录的那几段話都沒有指出“我們的”群众的斗爭。“人民群众的精力冻結的事实”和“把精力集中在議会外的斗爭手段上面”，——这个簡单的对照再一次地向我們表明，把社会革命党人叫做革命冒险主义者是多么符合历史的眞实啊！①为了把話說得尖銳有力，他們竟然揚言要把精力集中在他們自己認为現在群众沒有能力使用的那些斗爭手段上面，这难道不是冒险主义嗎？这难道不是知識分子陈旧不堪的悲观失望的心理嗎？

“把精力集中在議会外的斗爭手段上面”，——这个口号在俄国革命最光輝的时期之一 1905 年的秋天是正确的。而社会革命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 卷第161—182頁。——編者注

党人現在不加批判地重复这个口号，就象民間故事里的人物一样，在那里热心地叫喊……可是全不对头。亲爱的，你們不懂得为什么抵制的口号在1905年秋天是正确的，而現在你們不加批判地、毫无目的地背誦这个口号，那就不是什么革命主义，而是最平庸的糊塗主义了。

1905年秋天，沒有一个人說过“人民群众的精力冻結的事实”。相反地，当时所有的政党都認为群众的精力异常旺盛。在这样的关头，旧政权提出一个法案諮議的議会，分明是想分散和暫时緩和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时候，“把精力集中在議会外的斗爭手段上面”这个口号不是少数几个爱叫喊的人的空談，而是真正站在群众前面、站在千百万工农战士前面的人們的号召。千百万人拥护这个号召，就表明这个口号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它不仅表达了少数革命家的“信念”，而且表达了群众的真正的状况、情緒和主动精神。只有滑稽可笑的政客，才会在承認“人民群众的精力冻結的事实”的同时，再来重复这个口号。

旣然我們談到了滑稽可笑的事情，就不能不引用一下“劳动旗帜报”下面一段妙論：“我們讓它（政府）留在杜馬里同‘黑帮分子’和唯政府之命是从的政党在一起，請你相信，如果有一天这些蜘蛛会互相咬起来，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一声“請你相信”，实在是再好听不过了，簡直是解除了敌人的武装。讀者，“請你相信”“劳动旗帜报”的社論是一位确实可爱的社会革命党的女学生写的，她真誠地相信，反对派一退出第三届杜馬，“蜘蛛們”就会“互相咬起来”。

倫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級政党态度的决議，

受到了孟什維克的攻击，受攻击最厉害的是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那一部分。关于民粹派政党和劳动派政党这一部分，他們的攻击稍微輕一点。孟什維克竭力証明，我們在姑息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是对馬克思主义者早已肯定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某些过錯保持沉默，等等。孟什維克所以这样使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俄国革命的估計，有根本的原則性的分歧。孟什維克硬要无产阶級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进行革命，而不要同劳动派农民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另一方面，孟什維克不懂得，群众和各阶級在革命中的公开发动改变了有些政党过去的情况，往往也改变了它們原来的性質。在革命以前，社会革命党人只不过是一个信仰民粹主义的知識分子的团体。这种論断在革命后甚至在1906年以后是否正确呢？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在革命中沒有学到任何东西的人，才会維护原来这样表述的观点。

革命証明，这个民粹主义的知識分子的团体，是反映农民在俄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利益和观点的那个非常广泛和无疑是群众性的民粹派或劳动派的极左翼。农民的起义、农民联合会、三届杜馬中的劳动团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派的自由报刊，都証明了这个事实。孟什維克就是弄不明白这个事实。他們是教条主义地看待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說，他們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只看到別人的学說的錯誤，而看不到这种学說反映了或掩盖了推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眞正的群众的哪些实际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說是有害的、錯誤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資产阶級的，——孟什維克叫嚷着——如此而已，再沒有什么可說的了；除此以外，都是鬼話。

我們向孟什維克說，你們的錯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錯，社

会革命党人的学說是有害的、錯誤的、反动的、冒险主义的、小資产阶級的。但是这样的性質并不妨碍这种 quasi① 社会主义的学說成为俄国眞正革命的而不是妥协的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思想外衣。因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說不过是汇入劳动派即农民民主派巨流的一条小溪。只要公开的群众斗爭和阶級斗爭一开始，事变馬上就会迫使我們所有的人——不管是布尔什維克或是孟什維克——承認这一点，允許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工人代表苏維埃，同农民、士兵、邮电和鉄路工人等等代表的苏維埃接近，在参加选举的时候，同他們結成联盟，反对自由派，在杜馬中同他們一起投票反对自由派，等等。革命不是推翻了，而是証实了我們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估計。但是革命在証实这一估計的时候，不是把問題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把它提到比原来高得多的基础上：从前只是拿一些学說和思想作比較，談論各个集团的政策；現在要比較的是贊成某种思想或者同某种思想相近的阶級和群众的历史活动。从前只是問：社会革命党人說的話对不对，这个思想組織的策略是不是正确？現在的問題是：自称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致或者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基本思想（"劳动原則"等等）相近的那些人民阶层的实际行动怎样？孟什維克的錯誤就是不懂得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不但有上述这种意义，它还清楚地表明了各阶級和各政党的对比关系，因而显得非常重要。我国革命的教訓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級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轉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爭迫使政党更紧密

① 冒牌。——編者注

地联系群众，因为沒有这种联系，政党就算不了什么。社会革命党人在形式上并不依賴劳动派。实际上在革命中，他們害怕在政治舞台上完全消逝，不得不同劳动派一起走。而且可以担保，下一次革命高潮来到时，社会革命党人又会不得不（不管他們現在怎样叫喊自己是完全独立的）同劳动派或跟劳动派相似的群众組織一起走。社会生活和阶級斗爭的客观条件比善良的願望和紙上的綱領更有力量。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目前劳动派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分歧只是說明小資产阶級运动的瓦解，只是說明小資产者的不坚定，不善于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团結而“各自徘徊”。在我們面前的，一方面是劳动派，他們是无組織的、不坚定的、动搖的，在第三屆杜馬中沒有任何坚定的政治方針，但是他們无疑来自群众，同群众有联系，表現了群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一小撮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他們同群众沒有任何联系，由于絕望而惊惶失措，对群众斗爭失去信心（見“革命思想报”），把精力集中在恐怖手段上面。劳动派的极端机会主义（从革命农民的立場来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純粹是口头上的、毫无意义的极端革命主义，是同一个小資产阶級思潮的两种局限性，是表現同一“病症”的“两处覷脓肿”，这种病就是小資产阶級的不坚定，不能不断地、頑强地、坚持不懈地、同心协力地进行群众斗爭。

这种情况使得目前革命政党对杜馬的策略問題，尤其是召回主义問題更加清楚了。好說大話的知識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叫喊：“我們沒有議会斗爭的手段。”先生們，“我們”是指誰呢？沒有群众的知識分子从来沒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議会斗爭手段和議会外的重要斗爭手段。昨天在革命时期同你們一起走的或者在你們旁边走的是些什么群众呢？是劳动派农民。他們真的“沒有議会斗爭

手段"嗎？不是的。只要看一看第三屆杜馬对土地問題的討論，你們就会看到，劳动派在这問題上无疑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可見，社会革命党人那句尖銳有力的話不过是庸俗的空談而已。1908年，农民群众在杜馬講坛上表明了自己的要求，并沒有进行"議会外的"斗爭。这是事实，无論用"左的"尖叫声，无論叫喊什么社会革命党人－召回派的詞句，都是迴避不了的。

这个事实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認为議会外的手段比較好的"信念"減弱了？完全不是。原因是客观条件在这个时期还沒有引起群众的普遍的风潮和直接的发动。既然是这样，而且无疑是这样，那末，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也应該利用間接的方法。社会革命党人不会利用这些方法，結果如何呢？結果只是劳动派把自己的事情搞得非常之糟，犯的錯誤比在政党的影响下可能多几千倍，他們动搖不定，常常跌倒。而社会革命党人脫离了自己的阶級，脫离了自己的群众，只能"集中精力"講空話，因为实际上他們在1908年，在采用"議会外的斗爭手段"方面，什么事也沒有做。这样一脫离自己的社会根源，社会革命党人的原罪就加重了：更加沒有分寸、更加肆无忌憚地吹牛夸口来掩飾自己的軟弱无力。"公报"第1頁写道："我們的党可以庆賀自己……""实际存在的"（瞧，我們怎么样！）"地方党組織"选举了代表会議代表……"已經在一切問題上达到了人心的一致……""这也就是达到了完全一致"（同上）等等。

先生們，这是撒謊。你們在用这种喧嚷来掩飾在"革命思想报"（1908年春天）和"劳动旗帜报"第18号（1908年11月）上充分流露出来的分歧。这种喧嚷就是虛弱的表示。无論是劳动派的非党的机会主义或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的"吹牛、不落实和空談，都

是一个銅錢的两面，是单一的小資产阶級阶层瓦解的两个极端。怪不得在革命时期，斗爭揭露了各种色彩的派别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始終在掩飾，但又掩飾不了自己在人民社会党人和最高綱領派之間的动搖。

車子陷在沟里。馬已經卸下来了。赶車的跨在座台上，把帽子歪戴在一边，"庆賀"自己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幅图画。这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回主义的总結，它召回少数知識分子放弃艰巨的、頑强的，然而是唯一严肃和有成效的教育和組織群众的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叫喊。

载于1909年1月7日(20日)
"无产者报"第41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走上軌道

过去的一年，是渙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党陷入泥潭之中的一年。所有党組織的党員人数都減少了，有些組織，即无产者人数最少的組織，甚至瓦解了。在革命中建立的半公开的党机关，相繼垮台了。甚至党內有些在瓦解的影响下灰心丧气的人竟然产生了这样的問題：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繼續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轉入地下和怎样轉法。极右派对于这个問題的回答是：无論如何要进行合法活动，为此甚至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这就是所謂的取消派）。无疑的，当时的危机，不仅是組織上的危机，而且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危机。

不久以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議，把我們的党引上了軌道，这次代表会議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轉折点。我們党中央出版的特别"公报"刊載了这次代表会議的决議；这些决議已經中央批准，所以在召开下次代表大会以前，是全党必須遵循的决議。这些决議，对危机的根源和意义問題，以及擺脫危机的方法問題，都給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們的党組織只要本着代表会議决議的精神进行工作，尽力使党的一切工作人員清楚地全面地了解党的当前任务，就能够巩固和团結自己的力量，来协調一致地和生动活泼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ПАРИЖЪ, Среда 28/10 Февраля 1909 г. № 2.

РОССІЙСКАЯ СОЦ.-ДЕМОКРАТИЧ. РАБОЧАЯ ПАРТІЯ. ПРОЛЕТАРІИ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ОРГАН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СОЦІАЛЬ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ІИ

СОЦІАЛЬДЕМОКРАТЪ

LE SOCIAL-DÉMOCRATE

Organe Central du Parti Social Démocrate Ouvrier en Russie

На дорогу.

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第1版，该号刊载了

列宁的“走上軌道”一文

（按原版缩小）

組織問題决議的引言，指出了党內危机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于从工人政党中清洗了那些动搖的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阶級分子，那些參加工人运动主要是因为希望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很快成功，而在反动时期不能坚持下去的人。这种不堅定性无論在理論方面（“背弃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如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議），在策略方面（“縮小口号”），在党的組織政策方面，都表現出来了。有觉悟的工人打击了这种不坚定性，坚决反对了取消派，开始把党組織的工作和对組織的領导抓到自己手里来。如果說党內这个根本核心未能立刻克服渙散和危机的因素，那末这不仅是因为在反革命胜利之下任务很艰巨，很困难，而且是因为那些具有革命情緒的、但是社会主义觉悟不够高的工人对党有些冷淡。所以代表会議的决議，即社会民主党关于消除渙散和动搖的办法的意見，首先是提供給俄国觉悟工人的。

以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各阶級的相互关系和沙皇制度的新政策；指出我党現在仍然向自己提出的最近斗爭目标；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这个問題上估計革命的教訓；弄清党內危机的根源和指出党內无产阶級分子在消除这种危机中的作用；解决关于秘密組織和合法組織的相互关系問題；承認利用杜馬講坛的必要性，制定正确的指示发給我們的杜馬党团，同时直接批評它的錯誤；——这就是代表会議决議的主要內容。这些决議，对工人阶級政党在目前艰苦时期如何选择坚定的道路問題，作了完滿的答复。現在，我們来更仔細地研究一下这个答复。

現在各阶級在政治派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仍旧和过去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爭的时期一样。大多数农民不能不致力于土地变革，而要进行这种变革，就得消灭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要实現

这种变革，就非推倒沙皇政权不可。反动势力的胜利，使得那些不能牢固地組織起来的农民中的民主分子遭受了特别沉重的压迫，但是，尽管有这种压迫，尽管有黑帮“杜馬”，尽管劳动派极不坚定，农民群众的革命性甚至在“第三届杜馬”的辯論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无产阶級对于俄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任务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并沒有改变，仍然是要領导农民的民主分子，使农民摆脫自由資产者即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在接近十月党人，虽然他們之間有小小的个别爭吵，并且在最近还企图創立民族自由主义，通过沙文主义的宣传来拥护沙皇制度和反动势力。决議說，现在进行的斗爭仍旧是为了彻底消灭君主制度并由无产阶級和革命农民夺取政权。

专制制度仍旧是无产阶級和整个民主派的主要敌人。但是，如果認为专制制度还和以前一样，那是錯誤的。斯托雷平的“宪制”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旧式半宗法的、半农奴制的沙皇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資产阶級君主制轉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高加索的代表不是想完全背弃这种对于时局的估計，就是想用“財閥的”一詞来代替“資产阶級的”一詞，因此，他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老早已經成为財閥的专制制度了，但是它成为資产阶級的专制制度（按其土地政策和在全国范围內与某些資产阶級阶层結成的公开的有組織的联盟来講），却只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受了革命的种种打击以后。专制制度很久以来就在扶植資产阶級，資产阶級很久以来就用金錢打通了进入“上层”的門径，影响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取得了同显赫貴族并起并坐的地位；但是，目前时局的特点在于：专制制度不得不为資产阶級的某些阶层建立代議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与农奴主之

間进行斡旋，在杜馬中組織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使村社破产的富人中找寻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

专制制度虽然用所謂的立宪机关来装飾門面，但是沙皇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实行联合，而且仅仅同他們实行联合，因此事实上专制制度的阶級实質空前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专制制度企图亲自解决資产阶級革命客观上必須完成的任务：建立眞正管理資产阶級社会事务的人民代議机关，清除农村的中世紀的、紛乱的、陈腐的土地关系；但是，专制制度的新步驟的实际效果至今还等于零，这不过是更明显地說明，必須用别的力量和别的办法来解决历史任务。政治上沒有經驗的千百万群众一向認为，专制制度是同任何人民代議机关相对立的；現在的斗爭目标縮小了，斗爭任务更具体了，就是为爭取能够决定代議机关本身的性質和作用的国家政权而奋斗。因此，第三届杜馬在旧的沙皇制度的解体过程中，在它的冒险行为加强的过程中，在旧的革命任务加深的过程中，在为这些任务而斗爭的范圍（以及参加斗爭的人数）扩大的过程中，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这个阶段一定会消逝；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爭形式；利用杜馬的講坛是絕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組織无产阶級群众的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秘密組織同合法組織的結合向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任务；普及和解释被自由派和取消派知識分子弄得声誉扫地的革命的經驗，无論是为了理論的目的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必要的。但是，党所制定的必須善于在斗爭手段和斗爭方法方面估計到新条件的策略路綫，現在仍旧沒有改变。代表会議的一个决議說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已由1905—1907

年的群众斗爭的經驗証明了。革命在第一次战役中最后遭到失敗，并不是表明，任务提得不正确，最近目的是“空想”，方式和方法是錯誤的，而是表明，力量沒有充分准备好，革命危机沒有充分的深度和广度——不过，斯托雷平及其同流人物正在以非常值得贊揚的热情来加深和扩大革命的危机哩！就讓自由派和惊慌失措的知識分子在爭取自由的真正群众性的第一次战斗之后灰心丧气，讓他們怯懦地說我們在那里已經挨过打了，不要到那里去吧，不要再走这条倒霉的道路吧。觉悟的无产阶級将回答他們說，历史上的伟大战爭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来解决的：先进阶級不止一次两次地进行冲击，取得失敗的經驗以后才得到了胜利。打了敗仗的軍队会好好地学习。俄国的革命阶級虽然在第一次战役中遭到失敗，但是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重新成熟——有时比我們希望的迟緩得多。我們应当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使更广大的群众去迎接革命危机，并且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时应当更加認真，估計到更高的和更具体的任务；这种工作做得愈好，在新的斗爭中，胜利就愈有把握。俄国无产阶級可以引以自豪的，就是1905年在它領导之下，奴隶的民族第一次变成了进攻沙皇制度的千百万人的軍队，变成了革命的队伍。俄国无产阶級現在又能够坚定地、頑强地、耐心地进行教育和准备工作，以培养更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新干部。

我們已經指出过，利用杜馬講坛，就是这种教育和准备工作的一个必要的組成部分。代表会議关于杜馬党团的決議給我們党指出了一条(如果在历史上找个例子的話)最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特别法时期的經驗的道路。秘密的党应当善于利用，应当学会利用合法的杜馬党团，应当把这个党团培养成为能够胜任自己

任务的党組織。如果提出召回党团的問題（在代表会議上有两个“召回派”参加，他們沒有直接提出这个問題），或者不直接地公开地批評杜馬党团的錯誤，不把这些錯誤列在决議上（在代表会議上，有些代表曾經力图这样做），那是最錯誤的策略，是逃避在当前条件下必須堅定進行的无产阶級工作的最可悲的行为。决議完全承認，杜馬党团有一些錯誤不能完全由党团負責，它們完全象我們一切党組織的一些錯誤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另一种錯誤，这就是离开了党的政治路綫。既然产生了离开政治路綫的現象，既然代表全党公开发表意見的組織犯了这样的錯誤，那末，党就应該明确地說，这是离开党的路綫的行为。在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有过議会党团对党抱着不正常态度的事例；在拉丁語系各国，直到現在，党团对党的态度往往还是不正常的，党团的党性还不够純。我們应当立即用另外的办法来处理在俄国制定社会民主党議会政策的問題，应当立即在这方面和諧一致地進行工作，以便使一切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都确实感觉到，党在支持他們，为他們犯的錯誤而痛心，設法糾正他們的道路，使每个党的工作人員都来参加党的整个杜馬工作，学习根据馬克思主义观点来实事求是地批評杜馬工作的步驟，感到有責任来帮助進行这个工作，尽力使党团的带有特殊性的工作服从于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

这次代表会議，是第一次有威信的、有党內各个最大的党組織的代表参加的会議，会上討論了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在整个杜馬会議期間的活动。代表会議的决議明显指出，我們党将如何進行杜馬的工作，它在这方面向自己和党团提出了什么严格的要求，它打算如何始終不渝地堅定不移地制定眞正社会民主党的議会政策。

关于对杜馬党团的态度問題，有策略的方面和組織的方面。在組織方面，关于杜馬党团的决議不过是代表会議关于組織問題指示的决議所規定的組織政策的一般原則再一次在个别場合下的运用。代表会議确認，在这个問題上，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有两个基本派别：一个派别是把重心移到秘密党組織中，另一个派别（它多多少少同取消派相近）却把重心移到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組織中。正如我們所指出的，問題在于目前有些党的工作人員，特别是知識分子出身的，也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工作人員脫离了党。取消派提出一个問題：离开党而选择合法組織作为活动場所的是最好的最积极的分子呢，还是脫离党的是“动搖的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阶級分子”？不消說，代表会議坚决地駁斥了取消派，并且答复他們說，离开党的是后一种人。党內最純洁的无产阶級分子，最坚持原則和最有社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識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脫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脫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脫“同路人”（Mitläufer），这些人都是从小資产阶級或者从“失了阶級性的”人們，即越出某一阶級的軌道的人們中間来的，他們始終是暫时投靠无产阶級的。

从这种对党的組織原則的看法中，自然就会得出代表会議通过的組織政策的路綫。巩固秘密党組織，在一切工作部門建立党的支部，首先“在每个工业企业建立純粹党的、哪怕是人数不多的工人委員会”，把領导职能集中在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运动領导人的手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显然，这些支部和委員会的任务应当是利用一切半合法的組織，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的組織，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进行工作时注意使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的一切要求都有反应。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員会，都应当

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組織工作的据点”，就是說，一定要到群众去的地方，要处处努力促使群众的意識向社会主义发展，把每个局部的問题与无产阶級的一般任务联系起来，把每次組織方面的創举变为加强阶級团結的事情，要靠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用自己的头衔和官位）来爭取在一切无产阶級的合法組織中起領导作用。虽然这些支部和委員会有时会人数不多，可是在它們之間却将有党的传統的联系和党的組織的联系，将有明确的阶級綱領；这样一来，即使有两三个社会民主党員，也不会在沒有定形的合法組織中随波逐流，而会在一切条件下，在任何局势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实行自己的党的路綫，本着全党精神去影响环境，而不讓环境淹沒自己。

在反革命統治之下，尽管可以解散某种群众組織，可以摧残合法的工会，可以通过警察的刁难来破坏工人的一切公开的創举，但是世界上沒有一种力量能够消除資本主义国家（俄国已成为这样的国家）工人大批聚集的现象。工人阶級合法地或半合法地、或明或暗地，反正总会找到某些团結的据点，——无論何时何地，覚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将走在群众的前列，无論何时何地，他們都将彼此团結起来，以党的精神去影响群众。社会民主党过去在公开的革命中已經証明，它是阶級的政党，能够领导几百万群众举行罢工，举行1905年的起义，参加1906—1907年的选举，而現在，它仍旧能够做阶級的政党，群众的政党，仍旧是一支先鋒队，能够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脱离整个大軍，能够帮助这支大軍度过这些困难时期，重新团結全軍的队伍，培养一批一批的新战士。

讓黑帮死硬派在杜馬內和杜馬外，在首都和偏僻地方，欢跃和嗥叫吧，讓反动派肆意横行吧，可是，聪明絕頂的斯托雷平的每一

步驟，都不能不使隨机应变的专制制度更接近崩潰，使政治上荒謬无稽的行动更加乱成一团，使新生力量补充到无产阶級队伍和农民群众革命分子队伍中去。善于在联系群众中巩固队伍坚持工作的党，善于組織先进阶級先鋒队的先进阶級的党，努力以社会民主党精神去影响无产阶級所有生活表現的先进阶級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載于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关于"論迫切問題"一文

这篇好文章轉載自"工人旗帜报"(中部工业区的机关报)第7号，它是为回答一个召回派分子在該报第5号上的一篇文章而写的。召回派分子的文章作为辯論性的文章发表时，"工人旗帜报"編輯部作了保留，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意見。該报第7号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編輯部沒有作任何保留，可見，这篇文章也表达了編輯部的意見。

我們早已在"无产者报"上表示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旣然召回主义正在由一种普通的情緒变为一种派别，一套政策，所以它就愈来愈离开革命馬克思主义的道路，愈来愈在原则上同布尔什維主义决裂。但是，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机关报发表这篇文章以后，我們应当承認，关于召回主义的問題我們过去一直提得还不够尖銳，对于想把这种召回主义同布尔什維主义結合起来的人們威胁我們布尔什維克派的原則坚定性的危险估計过低了。我們肯定地說，写上面轉載的这篇文章的莫斯科的同志就象我們在同召回派发生个别爭論时那样，把問題提得很尖銳、很明确、很有原則；我們的莫斯科机关报天天接触召回主义的活生生的代表，在当地看到他們的召回主义的实际宣传有愈来愈脫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把問題提得这样尖銳、这样有原則、这样不可調和，它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或者是革命

的馬克思主义，即俄国的布尔什維主义，或者是召回主义，即放弃布尔什維主义，莫斯科的同志就是这样提問題的。这就是說，他完全同意我們在全党代表会議之前預先同召回派同志們进行爭論时对問題的提法。

我們知道，有一些工人布尔什維克現在是贊成召回主义的，但是他們的"召回主义"多半只是由于我們的杜馬党团犯了严重錯誤而引起的一种暫时的情緒。文章的作者和我們在上面所談的一切当然不是針对他們說的。但是召回主义既然被推崇为一种理論，既然成为一套完整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称是"眞正"革命性的代表的小集团制定的），那就必須进行一場不可調和的思想战爭！我們所轉載的文章的作者說得十分正确：召回派分子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的那些議論（这篇文章我們曾轉載于"无产者报"第39号）以及作为一种派別的整个召回主义等于是宣传"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改头換面的孟什維主义。下面这点他說得尤其正确：某些召回派用来为自己的派別作辯护的那些原则性的論据（不管他們自己的政治認識怎样），客观上有使他們变成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或者純粹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

莫斯科的同志的問題提法清楚地表明，有些布尔什維克不願意承認召回主义有根本性的危险，認为这里只有"实践上的分歧"，只看到召回主义的"健全核心"，而看不出它的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在政治上是多么近視（尽管他們的意图都是好的）。莫斯科的同志的文章应当使他們看到，他們在思想上掩飾召回派或者即使是在思想上对他們保持友好的中立，都是在助长召回派的声势，变成召回派的战俘，危害布尔什維主义。

召回主义不是布尔什維主义，而是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极端

拙劣的政治上的諷刺画，这是只有布尔什維主义的最恶毒的政敌才想得出来的。这一点必須完全弄清楚。我們認为必須使所有的布尔什維克以至每个小組都認清召回主义的真实作用，都徹底弄明白并且給自己提出一个問題：这是不是打着"革命"和"左派"的旗幟公开放弃在革命以前的时期和革命烈火中形成的老布尔什維主义的光荣传統。

为了这个目的，我們在"无产者报"上就这些問題展开了討論。我們登載了所有的来稿，轉載了国內布尔什維克所写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文章。直到現在，我們还沒有拒絕过任何一篇討論性的文章，今后也将这样做。遺憾的是，召回派和贊成他們的同志們直到現在还很少給本报寄材料来，他們宁願"在私下"議論，也不願意在报刊上公开和徹底地闡明自己的根本的信念。現在我們請所有的同志，不管是召回派或是正統的布尔什維克都到"无产者报"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需要的話，我們也可以把送来的材料印成专門的小册子。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明确、坚定，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期更是如此。

讓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去掩飾自己的意見分歧，庆賀自己的"一致"吧！可是人們說得对：在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从人民社会党人的自由主义到带着炸弹的自由主义，样样俱全。

讓孟什維克同切列万宁一伙在思想上和睦相处吧。讓他們去要那一套两面派的手法（他們在德国人面前表示同切列万宁决裂，而在俄国的报刊上又表現出难舍难分）吧，讓他們同那些在思想上取消革命馬克思主义基本原則的取消派和睦相处吧，讓他們干脆用貼住分歧的巧妙办法（見"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0—11号），即用紙一貼就"消除"孟什維克同普列汉諾夫的分歧的办法[105]来

掩盖自己的意見分歧吧。

既然內部的思想斗爭是必要的，我們这个派别就不应当害怕这种斗爭。它会在斗爭中更加巩固。因为我們这个派别实际上开始逐渐地成为我們的整个的党，所以我們更应当弄清自己的分歧。我們号召布尔什維克同志們在思想上要明确，要清除一切流言蜚語，不管它們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些最重大、最基本的問題上，喜欢象孟什維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用无謂的爭吵來代替思想斗爭的人，現在还很多。在布尔什維克当中不应当有这种人立脚的地方。工人布尔什維克应当坚决抨击这种企图，并且要求作到一点：有明确的思想、明确的观点和原則性的路綫。只有在思想上十分明确，全体布尔什維克才能在組織方面象我們这个派别在整个过去的时期那样团結一致地行动。

載于1909年2月12日（25日）
"无产者报"第42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无产阶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爭目标

馬尔托夫同志在上面发表的文章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确切些說，涉及許多有关无产阶級和社会民主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爭目标的問題。他涉及了我們党內討論这些問題的历史、这些問題同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各个派别就这个問題发表的看法，总之他涉及了問題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論哪一方面都沒有說清楚。为了从实質上回答問題，必須对問題的各个方面作个系統的概述。

一

我們先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內討論这个問題的历史談起。这个問題是在1905年初由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提出的。布尔什維克解决这个問題的“公式”是：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参看1905年4月12日“前进报”[106]第14号）①。孟什維克坚决反对这样来确定胜利的資产阶級革命的阶級內容。1905年5月在倫敦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和同时在日內瓦召开的孟什維克代表会議，都正式說明了党內两部分人的观点。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263—273頁。——編者注

但是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是，党內两部分人的决議都沒有提出关于斗爭目标和胜利的革命的一般阶級內容这个理論性的、一般性的問題，而提出了一个比較狹隘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問題。布尔什維克的决議說："……在俄国只有經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現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預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們有利，我們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无情地打击一切反革命的企图，捍卫工人阶級的独立利益。"孟什維克的决議說："……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終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由此可見，在純粹的布尔什維克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自己并沒有把任何象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这类的"公式"写进正式的决議中去，他們只是談到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和无产阶級"应当""起領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議）。"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布尔什維克的报刊上談到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在"两种策略"① 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闡述；誰也沒有想到責备布尔什維克的言論同自己的决議不符。誰也沒有想到要求从事政治斗爭的群众性政党的决議必須同馬克思主义关于胜利的革命的阶級內容的定义一字不差。

从我党历史材料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結論：1905 年春天，党內两部分人都把爭論問題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級和一般革命阶級夺取政权这一点上，根本沒有談到夺取政权的这些阶級在这

---

①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9 卷第 1—125 頁。——編者注

一时期彼此之間的关系可能和应当是怎样的問題。我們知道，孟什維克既反对夺取政权，也反对分掌政权。布尔什維克則主张"无产阶級在革命中起領导作用"(关于武裝起义的决議)，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始終不渝地保持社会民主党这个爭取徹底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的独立性"（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議），"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肃清农民运动的种种反革命杂質，純洁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內容"，"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覚性，徹底实行农民的民主要求"（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議）。任何其他的关于无产阶級和农民的关系的"公式"，在1905年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的决議里都沒有提出。

現在来看一看一年以后两个派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制定的决議草案。在一般报刊上，特别是在我們党內，这些草案常常被人忘記或者忽視，这是非常遺憾的，因为它們在社会民主党策略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决議草案表明，党內两部分人从1905年十月和十二月斗爭的經驗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教訓。

布尔什維克在关于无产阶級的阶級任务的决議草案中写道："……只有无产阶級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須有一个条件，即作为現代社会中唯一徹底革命的阶級的无产阶級要能把农民群众領导起来，要使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自发斗爭具有政治自覚性。"（在向倫敦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議草案中又談到了这一論点。見1907年3月4日"无产者报"第14号①）

总之，布尔什維克在这里給自己选择的"公式"是說明：无产阶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128—129頁。——編者注

級领导农民。在布尔什維克的决議里，沒有任何别的体現无产阶級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的公式。这个事实必須十分强調地指出，因为馬尔托夫同志企图在忘記或迴避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完全歪曲1908年12月代表会議决議的意义的。

孟什維克在自己的决議草案(摘自“党内消息”[107]上列宁的“报告”第68—70頁)中規定无产阶級的任务是“做資产阶級革命的推动者”——請注意，不是布尔什維克的决議所說的“領袖”和“領导者”，而是推动者！——并且指出无产阶級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群众压力来支持資产阶級民主派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违背我們綱領中的要求，而能有助于这些要求的实現，成为繼續推进革命的起点”。

可見，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这两个派别自己就使分歧走到了对立：是做“領导”农民的革命“領袖”和“領导者”呢，还是做“支持”資产阶級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动者”。我們再补充一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孟什維克，竟不顧布尔什維克的抗議和坚持，自行撤銷了这个决議。为什么孟什維克要这样做呢？讀者只要讀一讀孟什維克这个决議草案中的如下一段話，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一段話是这样說的：“无产阶級要想很好地完成資产阶級革命推动者的任务，就只有經过这样的途徑，即自己先組織起来，通过自己的斗爭吸引愈来愈多的城市資产阶級分子和农民参加革命斗爭，使他們的要求民主化，促使他們組織起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創造条件。”

这是向布尔什維克所作的一个显然是含糊的讓步，因为这里不仅把无产阶級描繪成为推动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它描繪成为領导者，因为它应当“吸引”和“推动”农民和更多的城市資产

阶級分子。

其次，关于临时政府問題，孟什維克决議草案說道：“在国内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处促进工人代表苏維埃的建立，喚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來建立这种机关，协助所有这些机关联合为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爭組織，向它們提出在无产阶級看来可能而且应当在目前通过革命来解决的全国革命任务。”(同上第91頁)

孟什維克的这个被人遺忘了的决議草案清楚地表明，在1905年十月—十二月的經驗的影响下，孟什維克已經完全糊塗了，向布尔什維克交出了陣地。这个草案里还有如下一点：“在当前的資产阶級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提出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第92頁)，难道上一段中引用的那些話和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嗎？后一个論点是非常原則性的論点，完全是重复(“分得政权”的說法例外)1905年的决議。但是这个論点同1905年十月—十二月的經驗是根本冲突的，因为孟什維克自己就把这次經驗归結为联合无产阶級所有机关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組成“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爭組織”！既然工人代表苏維埃同革命民主派的这种机关“联合”为非党的人民革命斗爭組織，那末很明显，无产阶級也就应当提出“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参加夺取政权的事业。决議本身就說明，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家政权从反动政府的手中夺过来”。孟什維克一方面不敢明說，忌諱“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这句話，极力迴避这种吓人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1905年以后又不得不承認，工人代表苏維埃同革命民主派的其他“这种”机关实行“联合”，是势所必然的，这种联合会产生“共同的、非党的”(这种說法不确切，应当說成：非党

的或各党的）“人民革命斗爭組織”。这种共同的組織就是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維克不敢明确地直接发表主张，只是泛泛而論。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从旧政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人民革命斗爭机关”，也就是所說的临时革命政府。

孟什維克是迫不得已才考虑到1905年十月—十二月的經驗的，所以思想混乱，語无倫次，而布尔什維克則是直接明确地做出了自己的結論。布尔什維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議草案說：“……在这場公开的斗爭中”（1905年底），“能够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居民（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先进阶层），最后都認为必需建立这种实际上成了新式革命政权萌芽的組織，这种組織就是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維埃，海参崴、克拉斯諾雅尔斯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士兵代表苏維埃，西伯利亚和南部地区的鉄路員工委員会，薩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員会，諾沃罗西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市革命委員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的經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第92頁）。草案接着指出，当时这些机关由于分散和不成熟而遭到失败，而現在临时革命政府肯定是“胜利起义的机关”。决議繼續說道：“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目前无产阶級必須解决一个迫切的任务，即同革命民主派一道促进起义的联合，建立起义的联合中心——临时革命政府。”往下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905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議。

上面引用的两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提出的决議草案中的一些話，使我們能够从具体的历史根据出发来研究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問題。每一个希望直截了当地明确回答这个問題的人，都应当考虑1905年年底的經驗。不想直接研究这个經驗，这就不仅意味着忽視对于俄国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最宝貴

的材料，而且也意味着自己不可避免地要“挑剔刁难地”解释公式，“掩飾”和“遮盖”（按馬尔托夫同志的中肯說法）原則性分歧的实質，必然要在“专政”的理論和实踐問題上丧失原則（“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公式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說明）。

1905年末的經驗无可爭辯地証明，由于“国內革命的普遍高涨”，正在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民革命斗爭組織”（这是孟什維克的說法；布尔什維克的說法是：“新式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同样无可爭辯的是，在俄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历史中，創立这些机关的首先是无产阶級，其次是“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而且，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俄国的，特别是大俄罗斯的居民成分，就会看到，在这些其他分子中絕大多数是农民。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无可爭辯的，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或地方組織实行联合的历史倾向是存在的。从这些无可爭辯的事实中必然得出一个結論：現代俄国的胜利革命不能是別的，只能是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要迴避这个不可避免的結論，就只有“挑剔刁难”和“遮盖”分歧！如果不是只抓住問題的某些方面，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把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把一个地区同另一地区割裂开来；不是拿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問題来頂替阶級专政問題，总之，如果能真正全面地分析問題，无論誰根据1905年的經驗的具体例子也不能說明，胜利革命可能不是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

現在我們先把党內提出上述“公式”的历史这个問題結束一下，然后再往下談。我們已經看到，1905年和1906年两派观点的确切說明究竟是怎样的。在1907年，也就是在倫敦代表大会前夕，孟什維克起初提出了一个关于对資产阶級政党的态度的决議草案（1907年3月24日“人民杜馬报”[108]第12号），后来他們在代表大

会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草案。第一个草案指出，应当把无产阶級的行动同其他阶級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二个草案指出，应当“利用”其他阶級的运动来“达到”无产阶級的“目的”，无产阶級应当“支持”其他阶級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和革命措施”，社会民主党在“个别的特定条件下”可以同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阶級达成“协議”。

布尔什維克的草案也象倫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議一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迫使它們(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它們“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广大城乡小資产阶級群众的利益和观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由此而产生的联合行动”应当“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的”。代表大会的决議和布尔什維克的草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根据一位波兰代表的提議加进了如下一句話：“爭取把革命进行到底”。在这里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因为这种专政也就是这些“曾經或者正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級的“共同行动”！

二

只要总地回顧一下党提出有关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問題的意見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馬尔托夫同志大談其挑剔刁难和无目的的运动，对他自己是非常不利的。其实，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第一个結論就是：布尔什維克本身无論在自己的决議草案中或者在自己的决議中，一次也沒有提出过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这种説法或者“公式”。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沒有一个人想否認1905—1907年間的布尔什維克的全部草案和决議完全是以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的思想为基础的。否認这一点是很可笑的。否認这一点，也就

是挑剔刁难，就是用无謂地扣字眼的办法来掩盖問題的本質。列宁在“两种策略”（“十二年来”文集中第445頁）① 中的說法是：无产阶級应当“爭取”农民群众；1906年布尔什維克的决議草案的說法是：无产阶級应当“領导”农民群众；倫敦代表大会的决議的說法是：无产阶級和农民“共同行动”，“爭取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所有这些說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嗎？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現了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嗎？无产阶級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的范圍以內嗎？

馬尔托夫同志拚命要把农民反駁掉。于是他在“和”字上大发議論。馬尔托夫同志揚声說道：不要“和”字，带“和”字的公式已經被抛弃了，現在不許在中央机关报上的沒有署名的文章中添写这个“和”字！晚了，晚了，亲爱的馬尔托夫同志，你本来应当向整个革命时代的所有布尔什維克机关刊物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所有这些机关刊物当时一直談的是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而談这个专政时所根据的决議并沒有提到这个“和”字。馬尔托夫同志在他为了“和”字而掀起的原則性战役中失敗了，他所以失敗，不仅是因为时效期間已經过了，而且因为根据伟大邏輯，无論是“爭取”、是“領导”、是“共同行动”、是“依靠”、是“在……帮助下”（最后这个說法是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議中提出的[109]）等，都坏在这个倒霉的“和”字上。

馬尔托夫同志繼續自己的原則性爭論时說：但是布尔什維克反对过“依靠”这个說法。不錯，是反对过，但并不是为了否定无产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85頁。——編者注

阶級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因为这个“公式”在俄文表达上不很恰当。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强者。在布尔什維克看来，原封不动地重复“无产阶級在农民帮助下”这一波兰代表大会提出的公式，是完全可以容許的，当然，如果說成“无产阶級領导”，也許更好些。可以就所有这些公式进行爭論，但是把这种爭論当作“原則性的爭論”，这簡直是个笑話。象馬尔托夫同志那样試图否認共同行动的概念包含“依靠”，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挑剔刁难行为。象馬尔托夫同志那样引用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謝苗諾夫等同志的話說，“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級”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級单独”夺取政权，那是使讀者感到可笑的。如果我們說，依靠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維奇之流的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取消了无产阶級在革命中的領导权这一思想，又說取消这种思想的只是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两个人，同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維奇之流沒有关系，这話能讓人相信嗎？

同志們，不应当把中央机关报上的爭論看成挑剔刁难。不能用这种手法逃避对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主要事实的承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絕大多数成員，包括波兰同志和布尔什維克在內，都坚决主张：（1）承認无产阶級在革命中的領导作用，領袖作用；（2）承認斗爭的目的是无产阶級在其他革命阶級的帮助下夺取政权；（3）在这些“帮助者”中間，农民阶級占居首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誰希望就問題的本質进行爭論，他就应当談上述三个論点，即使是談其中一个也好。馬尔托夫同志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也沒有从本質上分析过。馬尔托夫同志忘記告訴讀者說，在上述三个論点的每一点上，孟什維克都是采取党所摈弃的观点，党所摈弃的錯誤观点正是而且仅仅是孟什維主义！孟什維克在革命中

的政策就是无目的的运动，也就是以立宪民主党的动摇为轉移的运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孟什維克不知道，无产阶級应不应当爭取起領袖作用？应不应当尽力夺取政权？应不应当同时也考虑某一阶級的帮助？不知道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陷于徬徨、产生錯誤、毫无原則，任听自由派摆布。

代表会議沒有埋葬“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也沒有保証要把它从党的日常活动中取消，相反的，党肯定了它，进一步更徹底地承認了它。倫敦代表大会承認：（1）无产阶級的作用是“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当領袖”；（2）无产阶級和农民“共同行动”“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再承認当前革命斗爭的目的是由无产阶級和农民夺取政权就够了。这一点代表会議做到了，因为它提出的公式中說：“无产阶級依靠农民夺取政权。”

我們这样說，决不是否認和掩盖布尔什維克和波兰同志之間的分歧。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无論在他們的某些俄文出版物中，或是在布尔什維克的报紙上，在中央机关报上，都有充分的可能来說明这种分歧。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已經开始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馬尔托夫同志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卷入我們的爭論中，那末，任何人都会看到，我們在一切根本点上是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孟什維克的，我們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只是在个別問題上存在着分歧。

三

馬尔托夫同志使托洛茨基不得不参加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爭論，即一切非当事人的爭論。至于談到托洛茨基，我們根本不可能

在这里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这需要写一篇很长的专門文章。馬尔托夫同志稍微談了一下托洛茨基的錯誤观点，援引了这些观点的一些片断，因而使讀者产生了一系列的誤解，因为断章取义不能澄清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混乱。托洛茨基的根本錯誤，就在于他忽視革命的資产阶級性質，对于从这种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沒有明确的看法。从这个根本錯誤中产生了一些局部性錯誤，馬尔托夫同志以同情和贊許的态度摘引了两段話，又重复了这些局部性錯誤。为了使問題摆脫馬尔托夫同志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至少我們要指明，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馬尔托夫同志贊許的論断是錯誤的。无产阶級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現存的資产阶級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論从一般理論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經驗看来，这都是錯誤的。阶級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也决不是以一般政党的存在为前提。否則就是把阶級問題和党的問題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級的"联合"根本不是以某个現存資产阶級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根本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論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組織，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資产阶級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說，只有到革命快結束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从俄国革命的經驗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級和农民曾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当时农民并沒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譬如，当工人代表苏維埃和士兵代表苏維埃，或者和鉄路罢工委員会以及和农民代表等等采取了"共同行动"的时候，就是实現了这种联合。所有这类組

織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組織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級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党形成、产生和出現了，——如1905年的"农民联合会"或1906年的"劳动团"——而且随着这个党的成長、发展和自决，阶級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議，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議。例如，在第一屆杜馬被驅散后，散发了如下三个起义号召：(1)"告陆海軍書"；(2)"告全国农民書"；(3)"告全体人民書"。在第一个号召上署名的是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和"劳动团"委員会。这一次的"共同行动"不是体現了两个阶級的联合嗎？当然是的。否認这一点，也就等于挑剔刁难或者把"阶級联合"这一广泛的科学概念变成狹隘的法律的、依我說几乎是公証人的概念。其次，能不能否認在发出工人阶級和农民的杜馬代表所簽署的共同的起义号召的同时，两个阶級的代表在个别的地方的起义中采取了共同行动呢？能不能否認共同的关于一致起义的号召和共同参加地方的和个别的起义的行动必然要求做出共同組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結論呢？如果否認这一点，那就是挑剔刁难，把"政府"这一概念完完全全归結为完成的和定形的現象，而忘記完成的和定形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形的东西。

其次，在第二个起义号召上署名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孟什維克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全俄农民联合会、全俄鉄路員工联合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但是沒有劳动团委員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三个起义号召上署名的有波兰社会党、崩得分子以及除了三个联合会而外的所有上述党派。

这就是政党和非党組織的定形的政治联合！这就是用使沙皇政府感到威胁的形式、用告全民書的形式宣布的尙未实現的"无

产阶級和农民专政”！在孟什維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10 1906年第6号上，关于这些号召有如下說法：“在上述情况下，我党同其他革命党派締結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議，我們始終認为締結这种协議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參看1906年8月21日“无产者报”第1号和1906年11月23日第8号①）現在，恐怕沒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意这种說法了吧。不能把战斗协議同政治联盟对立起来，因为后一个概念也包括了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現政治联盟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时締結起义的“战斗协議”，有时达成議会协議，“采取共同行动反对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在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专政这一思想实际上通过上千种的形式表現出来，从签名抗税和提取存款的宣言（1905年12月）或起义号召（1906年7月）起，一直到1907年和1908年的第二、三屆杜馬中的投票为止。

馬尔托夫同志所援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說法，同样是錯誤的。說“全部問題就在于：誰决定政府政策的內容，誰在政府政策上团結清一色的大多数”等等，这是錯誤的。馬尔托夫同志引証这一点作为反对无产阶級和农民专政的論据，这一点就更加錯誤了。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論断中，認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參加”“工人政府”，就是說，認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級和农民的代表組成。至于无产阶級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參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布尔什維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級专政的問題，无論如何不能归結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卷第131—146、287—300頁。——編者注

問題，不能归結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參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問題。

最后，馬尔托夫同志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見是最錯誤的，而他却認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見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并不象往常拥护資产阶級制度时那样自觉。”无产阶級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見上面（而資产阶級制度下的統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能認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的状况会保存下来。俄国革命史中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中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組織（全俄农民联合会）。在第一和第二届杜馬中，反革命勢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內，即在全俄选举中）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雛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雛形中，有許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搖的东西，这是毫无疑問的，但是，革命既然在开始时就使这种政治团体产生了，那末它在达到“結局”，确切些說，也就是达到高度发展，实現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产生。誰不是这样地看問題，他就是認为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兒童时期的一样。

不管怎样，馬尔托夫同志得出結論說，代表会議在关于无产阶級和农民在夺取政权的斗爭中的相互关系問題上，是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見解，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这是企图从論述中“捏造”一套代表会議所根本沒有討論、引述和提到过的东西。

四

馬尔托夫同志在談到考茨基的时候，又在寥寥几句話中集中了一大堆的錯誤。为了从实質上回答馬尔托夫，几乎必須把一切从头向讀者講起。

認为"許多人，也包括給考茨基論'前途'一書写序言①的列宁在內，都坚决否認我国革命的資产阶級性質"，这是根本不对的，此外，說考茨基"宣称俄国革命不是資产阶級革命"，这也是不对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普列汉諾夫曾經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許多代表人物提出一些問題，第一个問題是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質"，第二个問題是"社会民主党对于按自己的方式爭取政治自由的資产阶級民主派采取什么行动"。問題的这种提法，包含了普列汉諾夫同志的两个违反馬克思主义的錯誤。第一个錯誤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質"即它的社会經济內容同革命动力問題混为一談了。馬克思主义者不能混淆这两个問題，甚至不能不經过特別的、具体的分析就直接地从第一个問題的答案中引伸出第二个問題的答案。第二个錯誤是：把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同一般資产阶級民主派的作用混为一談了。的确，农民和民主派都可以归到"資产阶級民主派"这一科学概念里去，但是无产阶級对待这两种"資产阶級民主派"的态度，必然要有本質的差別。

考茨基立刻发现了普列汉諾夫同志的錯誤，并且用自己的答案糾正了这些錯誤。考茨基不仅沒有想否認，革命按其社会經济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卷第393—399頁。——編者注

內容来說，是資产阶級性質的，而且断然承認了这一点。下面就是考茨基在那本被馬尔托夫同志大肆歪曲了的“前途”一書中所談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話：

“当前的革命（在俄国）在农村只能导致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現富裕的农民，从而在无产阶級和农村居民中的有产者中間掘出一道鴻沟，就象西欧那样。因此，即使当前的俄国革命暫时地使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也不能設想，这个革命会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尼·列宁校訂的俄譯本第31頁）

列宁在該書序言中說（同上第6頁）：“不用說，考茨基完全贊同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質**（着重号是列宁在序言中加的）和关于小农生产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等等的基本原理。”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正是上面那段考茨基的話。

馬尔托夫同志断言，列宁坚决否認我国革命的資产阶級性質，这是根本不合事实的。列宁談的恰恰与此相反。考茨基明确地承認，我国革命按其一般性質即按其社会經济內容来說，是資产阶級革命。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認为”，对普列汉諾夫的“第一个問題，不能簡单地做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資产阶級革命时期即以資产阶級为革命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經过去了，在俄国也是如此…… 資产阶級不是俄国当前革命运动的动力，因此这一运动已不能叫做資产阶級运动”（第29頁）。讀者可以看到，考茨基的这段話十分明确地說明的是什么，指出的什么。他分明不是就革命的社会經济內容来談資产阶級革命，而是在“革命的动力是資产阶級”这个意义上来談資产阶級革命的。

其次，考茨基明确地划清了“自由主义”資产阶級民主派和农

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从而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错误。考茨基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共同性"，"没有农民，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俄国赢得胜利"(第31页)。值得指出的是(在关于马尔托夫同志在原则性争论中肆意纠缠的"和"字这个毫无意思的问题上)，考茨基在这篇文章里，也就是在1906年，有一页上不但使用了"依靠"这两个字("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什么阶级呢?")，而且使用了下述说法："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结成的联盟，首先应当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第30页)

难道马尔托夫同志不会责备卡·考茨基，说他在1906年预见到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12月代表会议，因而存心要"把读者弄糊涂"，"掩饰和遮盖"布尔什维克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歧，"挑剔刁难"……吗?

我们看到，考茨基在维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时，实质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想，完全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11]上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指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见梅林编的"马克思文集"第3卷，俄文版目前只出了两卷)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写道："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显然是拿勾结反动势力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以农民为主的民主资产阶级

加以对比。不能認为，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当时还沒有形成。1892年，也就是过了44年以后，恩格斯在“論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新时代”杂志創刊第11年第1卷；俄譯文載于“历史唯物主义”論文集中）中写道：“……所有三次資产阶級大革命”（16世紀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爭，17世紀的英国革命和18世紀的法国革命）“中的战斗大軍都是农民…… 只是由于农民”（在英国革命中是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參加，斗爭才堅决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被送上了断头台”112。

可見，俄国資产阶級革命的特点就是：20世紀的无产阶級已經不象16、17、18世紀那样作为城市平民屈居第二位，而是升到第一位了。

五

結論。馬尔托夫同志涉及的問題非常重要，值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极其認真地进行辯論。但是这个問題单是“涉及”一下是不行的，应当从本質上加以分析，分析时不仅要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还要根据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經驗。

認为社会民主党提出无产阶級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就是做民粹派的俘虏，这只能付之一笑。这样发表議論的quasi① 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責备考茨基、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民粹派的俘虏。在一切資产阶級大革命中，无产阶級（比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結成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資产阶級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如此。1905—1907年的經驗和每次巨大事变都实际証实

① 冒牌。——編者注

了这个眞理，因为一切决定性的发动，不論是“战斗”发动或者議会发动，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級和农民的“共同行动”。

我們党堅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級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級必須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級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如果抛开这个眞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搖，从事“无目的的运动”，有时甚至鼓吹无原則的妥协，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讓工人阶級听任自由保皇派的反革命的資产阶級的摆布。

載于1909年3月9日（22日）和
3月21日（4月3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

署名：尼·列宁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員会[113]

我們看了《Vorwärts》(I Beilage, d. 3. IV. 1909)① 第79号登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組織問題"一文，不得不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員会提出严重抗議。我們受中央的委托关心国外事务，因此我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請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員会密切注意业已产生的极其不正常的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頑固地无視我們关于在国外成立中央专門的代表机关的正式声明，不发表早就寄去的关于这个机构及其通訊处的消息。与此同时，"前进报"却发表了"一个同志的"报道，报道的是党的一件重大事件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議，然而在报道中沒有引用代表会議关于組織問題决議(两个决議)的原文。"前进报"发表的这封信沒有引用党的正式决議，完全歪曲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所发生的爭論和分歧；不但如此，这封信还包含着隐蔽的、反对代表会議决議的派別性論战。这种論战尤其会恶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別之間本来就不正常的关系。这种論战会激起严重的恼怒和憤恨，同时要向德国同志說明我党的眞实情况和意見分歧也更困难了。

---

① "前进报"(1909年4月3日附刊1)。——編者注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国外局請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員会研究如下問題：如何在"前进报"上說明俄国的分歧，发表有关俄国問題的文章，刊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正式的公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議原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国外局請求执行委員会就以下問題作出决定："前进报"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內生活，是否可以不引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員会的正式公报和党的决議原文。

在实質問題上，中央委員会国外局認为必須指出这篇文章对眞相的歪曲，即使从无数歪曲中指出下面这三点主要的錯誤也好，因为要把所有錯誤都列举出来，就得写一本書才行。

（1）代表会議就組織問題通过的第一个决議，肯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在組織政策的根本性問題上有两种派別。党在这个决議中譴責了被称为"取消主义的"、即实际上要取消目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派別。投票贊成这个决議的有全体布尔什維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全体代表，不但如此，崩得的三个代表中也有两个投票贊成。

（2）布尔什維克提出并經党通过的关于对目前形势的估計的决議，一开始就指出，旧的农奴专制制度正在瓦解，它在向資产阶級君主制轉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孟什維克沒有提出自己的决議草案，但是反对这个决議，他們提出的唯一的修正就是把"資产阶級"改为"財閥"。

（3）烏克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同意孟什維克，因为烏克兰的代表并沒有出席代表会議。至于提到波兰社会党同意孟什維克的問題，这个党并沒有参加而且也不可能参加代

表会議，因为它并沒有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維克提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这个党合并，这个建議遭到了代表会議的否决，代表会議未加討論就轉入下一議程。

写于1909年3月23日
（4月5日）以后

第一次刊印

按手稿刊印

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

我們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已經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作了一个总的評价①。上面所載的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議，是他們在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議代表时的綱領（遗憾的是，这个决議直到代表会議开过以后“无产者报”編輯部才收到），在談到这个决議的时候，我們不得不把在那里講过的許多話重复一下。

这个决議滿篇都是不正确的非馬克思主义的論断，几乎每一条都表明，起草人的思想还不成熟，或者他們忘記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起碼的常識。第1条写道：“……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經結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社会經济发展的阶段已經結束？大概不是。起草人指的是群众直接革命斗爭的阶段已經結束。我們应当这样理解，免得把十分荒謬的思想加在召回派身上。既然是这样，那他們也就是承認目前不具备进行群众直接革命斗爭的条件。然而，为情况所迫而不得不承認这一点的召回派却不能从这里想出結論，不能自圓其說……“俄国……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不錯！不过还只是在走向高潮，也就是說，現在沒有高潮，——根据邏輯和語法应当得出这样的結論！但是，这个还

① 見本卷第329—332頁。——編者注

沒有到来的高潮的“特点”却是“尖銳冲突”等等。結果弄得很荒謬：召回派不会說明現在的特点，而說明我們“将要到达”的未来的“特点”，以掩盖对这个現在的无知。例如，不曉得从哪里跑出来一个“貧困化的城市小資产阶級”；不經过分析就提出这个小資产阶級；为什么未来高潮的“特点”是貧困化的小市民的尖銳冲突，无論从哪方面都看不出来。为什么恰好現在要加上一个貧困化的城市小資产阶級，不得而知；其实，流氓无产阶級的特点，有时候是尖銳的冲突，有时候是异常不坚定和毫无斗爭能力。召回派的思想是极不明确的，因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議上，同两个召回派一起投票贊成加上“貧困化的城市小資产阶級”这个說法的，只有两个崩得分子，我們并不感到奇怪！我們認为，召回主义是变相的机会主义，这种看法得到了极好的証明。

同誰发生尖銳冲突呢？“同大資产阶級和农奴制地主的統治集团”。而不是同专制制度？召回派不会把在上述两个阶級之間看风使舵的专制制度同这两个阶級的直接統治区別开来，結果弄得很荒謬：对专制制度的斗爭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組織力量的秘密工作正在进行……”吸收經驗，記取新的教訓，积聚力量，这些事可以并且經常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組織力量的工作，甚至在非法活动占絕对統治地位的时期，也不可能是秘密的。在1901—1903年間，組織力量的工作是非法进行的，而不是秘密进行的。召回派是在重复而且在歪曲那些死記的片言只語。

第2条写道：“在俄国阶級矛盾发展得很尖銳的时候，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解决这种冲突……”俄国的阶級矛盾不象已經沒有同专制制度作斗爭的任务的欧洲那样尖銳。召回派沒有注意到，

他們在想加深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是怎样变成自己的反面——机会主义者。

“……革命将导致武装起义……”

关于斗爭的目的，一点也沒有說清楚，关于目前专制制度发展的局势，也根本沒有說清楚，但是，关于斗爭的手段，召回派却急于发表意見，以便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亲爱的同志們，这是幼稚的作法，因为你們再一次表明，你們死記了很好的言論的片言只語，却不了解其中的意思。在1897、1901和1905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起义問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在1897年和1901年，俄国无疑“是在走向革命高潮”，走向“尖銳的冲突”和“革命”，但是直到1905年1月9日以后，他們才把起义提到日程上来。只是死記口号是不够的，应当善于考虑什么时候提这些口号合适。在“高潮”还沒有到来，在最狹窄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还沒有成为现实以前(而召回派談的是将来的革命：“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提出一种斗爭手段的口号，就等于把自己描繪成歪曲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形象的諷刺画。代表会議的決議談到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和斗爭的目的(各革命阶級夺取政权)，而更多的东西目前是不能談，也不需要談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甚至当作“彻底改革”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是怎样来的，只有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看起来連召回派自己也不明白。

第3条写道：“因此，社会民主党作为彻底革命的政党，应当把杜馬外的斗爭提到首要地位……”

有人(“最后通牒派”)目光竟这样短浅，甚至觉得我們同召回派的意見分歧只是实际作法上的分歧，只是对实行共同的策略所

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估价不同而已！1907年夏天，关于抵制第三屆杜馬方面的意見分歧只能是实际作法上的分歧，抵制派的錯誤只能是在选择方法来实行全体布尔什維克共同的策略当中的錯誤。在1909年还这样談，那是可笑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錯誤就是在原則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請实际地想一下："因此"，也就是因为我們"正在走向"高潮，冲突"将通过革命的形式"，"因此"，应当把杜馬以外的斗爭提到首要地位！同志們，这簡直是用文字的堆砌来掩飾惊人的思想混乱！你們在自己的决議中根本还沒有提到杜馬，却造出一个結論："因此"——"杜馬以外的斗爭"！因为我們不懂得杜馬的意义和党在高潮迫近的时期的任务，所以我們宣布要进行杜馬外的斗爭，請看，召回派的論断是多么荒謬。他們片言只語地重复布尔什維克的、他們所不了解的論断，但是布尔什維克講的是杜馬外的斗爭不仅是宣布了，而且有群众在进行的时期，而他們重复这些論断却是在自己認为"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經結束"，即群众直接斗爭的条件暫时还不存在的时期。

他們死背关于杜馬活动要服从杜馬外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和方向的正确原理，而且把死背的片言只語重复得不是时候，歪曲得面目全非。

召回派不是强調除了杜馬的工作以外，現在还必須尽最大的力量在杜馬外面在群众中进行坚定的、长期的、耐心的組織工作和宣传工作，却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大唱其"杜馬以外的斗爭"、冲击等等"革命的"高調。

召回派在决議的末尾（第1条）写道："采取直接的积极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在开头却宣布要进行杜馬外的斗爭。这难道不是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

"……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而做的工作……"先談了关于斗爭手段的片断思想，然后再談关于目的的片断思想！"……和为了这个目的而把无产阶級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組織起来……"同志們，在首先的和"首要"的問題是巩固和恢复半瓦解的党組織的时候，这就是一句空話。

第4条("召回主义"的妙論之一)說："党只能利用不会模糊和削弱革命斗爭的組織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

在"講求实际的"最后通牒派看来，这就是对問題的"实际的"提法！召回派不得不在1909年寻找一些在原則上給自己表白的理由，而这样作就必然使他們陷入泥潭。"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活动形式"这句話明明是指社会民主党的杜馬工作，他們利用半合法和合法組織的活动。这样說来，有的"活动形式"能够模糊斗爭，有的活动形式不会模糊斗爭。为了使不会思考的人不必开动脑筋，我們应該列一个"活动形式"表，把那些能够"模糊"斗爭的形式划掉，——这才是眞正革命的策略吧！！

亲爱的同志們，拿合法的書刊来說吧！这种"組織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会不会"模糊"斗爭？当然，在斯托雷平制度下能够"模糊"斗爭！那就是說，应当把这种書刊取消，——召回派的結論就是如此，他們由于不会指明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各种不同的活动形式的条件，因而大发謬論。布尔什維克提出和通过的代表会議决議这样写道："党应当特别注意利用和巩固現有的組織，并且建立新的、秘密的、半合法的和尽可能地建立合法的組織，这些組織可能成为党的据点。"这个决議同召回主义有天壤之别。"只能……那些不会模糊……的形式"，这是一句空話，只不过是个"高調"，而不是革命性。建立党的秘密的"工人委員会"来利用"半合法的

和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的組織”，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他們考虑到了在当前局势下必須采用的“組織活动和宣传活动的形式”，善于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眞正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方式。

取消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書刊，这是一句空話，是做不到的，因而只是对那些明知做不到的机会主义者有利。划清願意在党的面前对自己的合法著作負責的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沒有党性的投机著作家的界限，这是一个困难的、然而是能够实現的任务，这就給願意同党一起工作的人們指出一个实际的工作方向。取消合法的杜馬党团，取消合法組織，这是只对那些很想摆脫党的监督的机会主义者有利的空話。不断进行这种监督，“利用”合法組織，糾正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錯誤和錯誤的策略，——这是党的任务，我們和一切願意执行代表会議的决議的人都要来解决这个任务。

……第4条最后写道：“坚决反对反革命資产阶級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勾結。”

哎！召回派总是不合时宜地重复布尔什維克文献中的片断思想。同志們，应当把情况弄清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馬时期，政府还在摸索勾結的道路，而立宪民主党人把这种勾結当作“斗爭”的口号来向人民宣传（这些口号甚至迷惑了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維克）。当时提出坚决反对这种勾結是眞正及时的口号，迫切的任务，能把騙局揭穿。現在，勾結的道路已經摸索到了，沙皇政府同被召回派称为“集团”的那些阶級已經勾結起来了，而且，誰也不会被第三届杜馬中实行的勾結迷惑了。現在，把“坚决反对任何勾結”当作鼓动的中心，那就是把自己描繪成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

諷刺画。

第5条写道："我国的国家杜馬，不能看作是在政治自由的范圍內和在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有一定的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議会，它不过是沙皇政府和大資产阶級之間的勾結……"这里有两个錯誤。不能說，不是議会，而是勾結，因为世界上的許許多多的議会都不过是資产阶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各式各样中世紀残余的勾結。为了不讓黑帮十月党人的議会成为俄国的第一个議会，我們当时应当斗爭，而且我們也进行了斗爭，但是，不管我們怎样努力，这已成了事实，既然历史迫使我們非經过这个阶段不可，那末，只靠感叹，只靠唱高調来逃避这个不愉快的现实，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第二个錯誤是，在决議的起草人看来，有"一定的自由"，那就是"議会"，沒有，那就是"假玩意兒"。这是庸俗的民主观点，这种观点是立宪民主党人所应該有的，而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該有的。第三届杜馬时期的自由比第二届杜馬时期要少得多，然而第三届杜馬并不是那么虛构的議会，因为它比較眞实地表现了当时各統治阶級和国家政权的实在关系。只要政权还掌握在沙皇和农奴制地主的手中，在資产阶級的俄国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議会。这个毫无虛飾的眞理，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加以抹杀，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应該这样做的。

第6条倒是例外，它是正确的。不过这个例外所証明的是相反的原则，因为……因为召回派在这一条中叙述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代表会議决議的反召回派的思想。

几点結論。(一)"……杜馬，是……勾結……和反革命的工具……"說得正确！"……只是巩固专制制度……"这个"只是"是不对的。专制制度急忙組織起这个杜馬，从而延緩了自己灭亡的日

期，它不但沒有因此而巩固，反而逐漸瓦解了。杜馬是一种“掩飾”，但是換来的却是“暴露”，因为它第一次公开地在成千的問題上表明沙皇制度是依賴反革命阶层的，第一次 en grand① 显示了罗曼諾夫同普利什凱維奇、沙皇制度同“俄罗斯人民同盟”、专制制度同杜勃洛文-伊廖多尔-波洛夫涅夫之流的內在联盟。

至于說杜馬贊成沙皇政府的罪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是一定的阶級为了一定的阶級的利益而贊成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正是要在杜馬講坛上闡明这些很有教益的阶級斗爭的眞理。

“……第三届国家杜馬 8 个月来的活动証明，社会民主党不能利用杜馬……”

这才是召回主义的中心思想，而我們的“最后通牒派”說，旣然我們花了許多力量来建立党团，就不可能輕而易举地把它召回来！这种可笑的狡辯只能掩飾召回主义的錯誤，把事情弄得糊里糊塗。

問題是明摆着的，狡辯在这里无济于事：8 个月的活动証明，究竟有沒有可能利用杜馬講坛呢？召回派的回答是不正确的。尽管党对党团进行工作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一工作无疑地証明，利用杜馬講坛是可能的。遇到困难和犯了錯誤就垂头丧气，是意志薄弱的表現，是用知識分子的“高調”来代替无产阶級的耐心的、坚定的和頑强的工作的表現。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在議会活动初期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犯的錯誤也多得多，但是它們不仅沒有抛开任务，反而克服了困难，改正了錯誤。

（二）“……我們的党团……坚持机会主义策略，过去和現在都不可能成为革命无产阶級的坚定不移的、一貫忠誠的代表……”

① 大規模地。——編者注

召回派的同志們，最伟大的眞理也可以被庸俗化，最伟大的任务也可以变为空談，而你們正是在这样做。你們把同机会主义的斗爭变成了空談，这只对机会主义者有利。我們的党团过去有錯誤，現在还有錯誤，但是党团工作的經驗証明：党团"过去能够、現在也能够"坚定地、一貫地代表无产阶級，当然得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們党要指导党团，帮助它，派最好的干部去領导，草拟指示和发言，向党团說明小市民知識分子的主张的危害性，这种知識分子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总是最容易进入各种接近議会的机关。

同志們，要有勇气承認，在切实指导党团的工作、給党团以实际帮助这方面，我們还做得远远不够。要有勇气承認，如果我們能够巩固自己的組織，团結自己的党，使党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創办一些經常影响广大的无产者阶层的党的机关报，我們就可以在这方面多做出十倍的事情。我們就是向这方面来努力，凡是願意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机会主义作斗爭的人，都应該向这方面努力。

召回派把同党团的机会主义的斗爭变成了空談，因为他們只死記住一些詞句，却不懂得无政府主义者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和社会民主党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有什么不同。拿无政府主义者来說：他們老是抓住每一个錯誤，抓住每一个社会民主党議員，老是叫嚣什么甚至倍倍尔也曾經作过几乎是爱国主义性質的发言，也曾經在土地綱領問題上采取錯誤的立場，等等。的确，甚至連倍倍尔在自己的議会生涯中也曾經犯过机会主义的錯誤。但是，由此得出什么結論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結論就是应当召回所有工人代表。无政府主义者責罵社会民主党的議員，要同他們决裂，并且一面責罵，一面反对建立无产阶級的政党、制訂无产阶級的政策和

培养无产阶級的議員。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談使他們变成了机会主义的可靠帮凶，变成了变相的机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些錯誤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結論是：如果党沒有进行長期的工作来建立一个眞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那末甚至倍倍尔也不能成其为倍倍尔了。但願人們不要对我們講："我們党团里沒有倍倍尔。"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鍛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現成的倍倍尔，不象密納发①那样是从丘必特的脑袋里跳出来的，而是党和工人阶級培养出来的。誰要說，我們这里沒有倍倍尔这样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德国党的历史，不知道有一个时期，在实行特別法的情况下，奧古斯特·倍倍尔犯了机会主义的錯誤，可是党糾正了这些錯誤，党給倍倍尔指出了方向②。

(三)"社会民主党党团繼續参加国家杜馬……只会給无产阶級带来害处……降低社会民主党的尊严和威信……"只要指出1909年的預算辯論，指出別洛烏索夫的演說，就可以說明，在这些极端夸张的說法中"量变怎样进到質变"，从这种极端夸张的說法中怎样产生了(不以召回派同志的意志和認識为轉移)无政府主义的空談。如果認为这些演說"带来了害处"，而不能証明利用杜馬講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末意見分歧就超出了对演說的估价的范圍，而成为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基本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

…… (1)"开始……广泛展开'打倒第三屆国家杜馬'的口号

① 罗馬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話中的雅典娜。根据神話，雅典娜誕生时，戴盔披甲，直接从宙斯(相当于罗馬的丘必特)被劈开的脑袋里跳出来。——譯者注

② 我們打算专門写一篇文章来談談这一段有教益的历史，談談这段历史怎样駁斥了德国那些同我国召回主义近似的流派。

的宣传……"

我們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已經說过，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反对召回派的工人的口号是不正确的①。这不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号，就是重复在自由派的杜馬掩飾反革命的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眞正敌人的那个时期里背熟了的詞句。

(2)"召回……党团，就可以强調出……杜馬的性質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

这是套用莫斯科召回派的論点：召回党团就可以强調出革命并沒有被埋葬。这样的結論(我們把"无产者报"第39号的話再說一遍)不过是"强調出"那些善于这样論断的社会民主党人被埋葬了。他們就这样埋葬了自己，使自己不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他們丧失了鉴别眞正无产阶級革命工作的能力，所以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个"强調"革命空話的手法。

(3)"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組織和准备……公开的……斗爭"(因此就要放弃杜馬講坛上的公开宣传!)"……和宣传"等等。

社会民主党放弃杜馬講坛上的宣传是很不体面的，这一点召回派忘記了。

他們在这里向我們提出了某些最后通牒派不断重复的論点："把力量花在这种沒有希望的杜馬工作上是不合算的，讓我們更有成效地使用一切力量吧。"这不是什么合算不合算的論点，而是詭辯，这种詭辯必然引伸出(这也不以起草人的意志和認識为轉移)无政府主义者的結論，因为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指出社会民

① 見本卷第262—278頁。——編者注

主党議員的錯誤的时候，号召他們拒絕“和資产阶級議会打不合算的交道”，把“所有这些力量”都用到組織的“直接行动”上。但是，这样就会瓦解广泛的全面的工作，而空喊一些由于脫离群众因而軟弱无力的“口号”。只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才会以为这是新的只适应于第三屆杜馬的論点。不是的，这是一个全欧洲的常見的非社会民主党的論点。

———

所以，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孟什維克赶忙說，当然是由整个布尔什維主义的錯誤造成的。这样的結論对孟什維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不过很可惜，客观事实不是証实而是推翻了这个結論。这些客观事实告訴我們，不仅在布尔什維主义的发展上，而且在全俄国的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上，都有一个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时期；俄国的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这种成长中的病症、同这种扩大自己影响范围过程中的病症作斗爭当中巩固和成长的。俄国的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

但是，只是从19世紀90年代的后5年起，当俄国的馬克思主义書刊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浪潮”开始出現的时候，俄国的馬克思主义才开始成为俄国的社会思潮和工人运动的一个組成部分。結果怎样呢？这个浪潮带来了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一个是司徒卢威主义，一个是工人事业主义和“經济主义”。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就是因为它不掩飾分歧，不玩弄外交手腕(不象孟什維克对馬斯洛夫、切列万宁、庫斯柯娃、普罗柯波維奇、瓦連廷諾夫、叶尔曼斯基之流那样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对俄国生

活的可悲条件和俄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轉折中所产生的歪曲进行并且完成了胜利的进攻。布尔什維主义不掩飾俄国生活的可悲条件和反革命时期的轉折所造成的歪曲正在开始把布尔什維主义弄得面目全非，而是公开向群众解释，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要把党团和党引向什么样的泥潭，因此，布尔什維主义一定会成长和巩固起来。

載于1909年4月4日(17日)
"无产者报"第44号附刊
按附刊原文刊印

資产阶級的"向左轉"和无产阶級的任务

关于工商业資产阶級"向左轉"的問題，在我国合法报刊上已經談論很久了。人們指出并認为，十月党的报刊常常抱怨"农民"(应讀作：农奴制地主)杜馬和沙皇政府的有关政策；同时指出并認为，工商界的許多地方的和全国的同业团体，从地方交易委員会到"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員会"，近几年来，特别是在最近，都对地主的政策表示不滿。这些报刊还报道了莫斯科"百万富翁与科学界的握手言欢"，即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大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古謙、沃尔斯基等人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和著作家曼努伊洛夫、司徒卢威、基捷韦帖尔之流的秘密会議。不用說，自由派报刊，一直到孟什維克的机关报，对每个这样的消息都談得津津有味，而且用各种各样的調子来吹噓自由主义的复活和更新。

資产阶級的所謂"向左轉"具体表現在沙皇政府的"政治"措施和杜馬的发言中。俄国商界的宠兒(同时也是官場老手)季米里亚捷夫先生被任命为工商大臣。3月13日，他在杜馬中发表了长篇"綱領性的"演說，——这样的大臣演說在世界各国黑帮資产阶級的和純資产阶級的議会中叫做綱領性的演說，完全是"为了裝装样子"。事实上，这位沙皇大臣根本沒有談到什么綱領，只是照例发表一些空洞的議論，向資本家献殷勤，向工人阶級施加威胁，这种

威胁当然是同官方的虚伪的“同情”詞句結合起来的。3月19日，这位大臣又同資本家的領袖在莫斯科接吻了：季米里亚捷夫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莫斯科交易所协会的会議上相互亲切致詞。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在对最尊敬的季米里亚捷夫致欢迎詞时說：“俄国正在害病，但是只要妥善照料，它的病并不可怕，很快就会好的。”季米里亚捷夫則对最尊敬的克列斯托夫尼科夫表示感謝，并代表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用斯托雷平經过考驗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来“照料”病人。

試問，促使資产阶級这样“向左轉”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它的阶級意义是什么呢？馬尔托夫同志在“复兴”杂志[114]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題为“資产阶級的‘向左轉’”的文章，用这位作者不很常見的直率和明确的态度回答了这些問題。他写道：“实际生活表明，如果进行資产阶級性的改造的經济发展条件已經成熟，而資产阶級又不能成为这种改造的动力，那就是說，在这个阶級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以前，这种变革无法完成。”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又写道：“誰要認为，現行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和資产阶級这样两个全是‘反革命因素’的有机結合，誰就可能以为，类似上述的現象”(即資产阶級的“向左轉”)“只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沒有必然联系的局部情节…… 只有 a priori① 深信社会发展的进程肯定会使俄国資产阶級这个阶級同……六三政制尖銳对立起来，只有这些人才会認为，这些孤立的現象具有征兆性的意义。”

請把这些話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2号的声明对照一下：“……我們也贊同高加索人的建議(即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謝

---

① 事先。——編者注

明諾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議上提出的)：不要把俄国的君主制說成是'資产阶級的'，而要說成是'财閥的'，因为这个修正根本否定了布尔什維克决議的錯誤論断，即俄国沙皇政府开始代表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

在这里，我們看到了我国孟什維主义的全部政治理論及其全部結論：如果我国的革命是資产阶級性的，在資产阶級沒有成为这个革命的动力以前，这个革命就不能完成；資产阶級的"向左轉"証明，資产阶級正在成为这种动力，根本不能說它是反革命的；俄国的沙皇政府正在成为財閥的、而不是資产阶級的沙皇政府。显然，由此就会得出一个結論：要維护工人政党在我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維护无产阶級支持自由派的策略，而反对要无产阶級在資产阶級革命中联合农民、不管自由派的动搖和叛变而起領导作用的策略。

我們看到，孟什維克的策略是馬克思主义的贋制品，是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掩飾起来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貨色。这种策略所依据的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推論方法，而是披着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自由派的推論方法。只要大致回顧一下德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历史和結果，就可以証实这一点。馬克思在"新萊茵报"上談到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資产阶級，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資产阶級，同反动派訂立了攻守同盟。"[115] 馬克思和德国一切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观点来評价1848年革命和德国資产阶級后来的策略的。大資产阶級的反革命性并沒有妨碍它在比如60年代的立宪爭执时期"向左轉"，但由于无产阶級沒有采取独立的坚决的行动，这种"向左轉"并沒有产生革命，而只是产生了懦怯的反对派，促使君主制愈来愈变成

資产阶級君主制，而不破坏資产阶級同容克即反动地主的联盟。

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看的。相反地，自由派却認为，工人由于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表現了缺乏理智的革命性，不适时地攻击了自由派，因而把自己可能的同盟者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妨碍了德国自由事业的胜利。

十分明显，我們的孟什維克在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来掩飾赝制的馬克思主义，掩飾他們从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轉变。

不論是在1789年后的法国，还是在1848年后的德国，君主制都“在向資产阶級君主制轉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沒有疑問的。資产阶級在这两次革命以后，都变成了反革命，这也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这是不是說，在1789年后的法国和1848年后的德国，資产阶級的“向左轉”和后来发生的資产阶級革命就沒有基础了呢？当然不是。尽管法国資产阶級具有反革命性，但是它在1830年还是“向左轉”了，德国資产阶級在1863—1864年也“向左轉”了。由于无产阶級沒有独立行动，沒有在資产阶級革命阶层的帮助下夺取哪怕是一个短时期的政权，資产阶級的“向左轉”并沒有引起革命（德国），只是使君主制在向資产阶級君主制轉变的道路上又迈了几步。只有无产阶級采取了独立行动，而且同資产阶級革命阶层結成联盟夺取了政权，推翻了旧政权（法国在19世紀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情形），資产阶級的“向左轉”才会成为新的資产阶級革命的序幕。

可是这些历史常識，我們的孟什維克居然都給忘了，并且作了歪曲，采取了自由派的观点：在資产阶級沒有成为动力以前，俄国不会发生資产阶級革命！这是完全不懂历史辯証法和19世紀的教訓的表現。恰恰相反，如果同資产阶級的革命分子（即我国的农

民）結成联盟的无产阶級不能撇开动搖的和反革命的資产阶級的动搖和叛变，成为独立的动力，俄国是不会发生資产阶級革命的。

可爱的孟什維克同志，俄国沙皇制度不是在尼古拉二世时期，而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开始轉变为"財閥"君主制，"开始代表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的。但是，沒有資产阶級独立的阶級組織，沙皇制度是不可能代表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的。1905 年的革命使我們走上了更高的阶段，旧的斗爭在政治关系更加发展的情况下又重新开始了。第三屆杜馬是地主和大資产阶級的各种政治組織在政治上已經形成的全国性联盟。沙皇政府企图借助这两个阶級的各种組織来解决客观上必然提出的历史任务。它的这种企图能得逞嗎？

不能得逞。看来，不但是沒有成立"上层"阶級的全国性代議机关的財閥沙皇政府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就是借助黑帮資产阶級杜馬的半資产阶級沙皇政府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杜馬在帮助沙皇政府解决这个任务，但是这种帮助看来是很小的。促使資产阶級"向左轉"的客观事实是，尽管沙皇政府实行了斯托雷平的革新，資产阶級的发展并沒有得到保証。1905 年以前，在沙皇政府沒有成立任何代議机关的时期，地主和貴族首領的"向左轉"是危机迫近的征兆，同样，在 1909 年，在沙皇政府为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們成立了全国性的代議机关的时期，这些大亨的"向左轉"是"俄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沒有得到解决"、"引起 1905 年革命的基本因素还在繼續发生作用"（代表会議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議）的征兆。

孟什維克仅仅抱住这样一个論断：我国的革命是資产阶級性的，我国的資产阶級在"向左轉"。仅仅抱住这一点，就是把馬克思

主义从“行动的指南”变成了死的教条，就是贋制馬克思主义，实际上采取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有的資产阶級革命中，无产阶級可能不会取得任何徹底的胜利，結果旧的君主制慢慢地轉变为資产阶級的和資产阶級帝国主义的君主制（如德国）。在有的資产阶級革命中，无产阶級可能采取一系列的独立行动，因而取得徹底胜利而又遭到严重失敗，結果建立起資产阶級共和国（如法国）。

試問，这两条路走哪一条的問題，俄国的历史解决了沒有呢？孟什維克不懂得这个問題，不敢提出这个問題是迴避这个問題，沒有了解到，迴避这个問題实际上就等于在政策上跟着自由資产阶級跑。我們認为，俄国的历史还沒有解决这个問題，最近几年的阶級斗爭一定会解决这个問題，我国第一次資产阶級革命运动（1905—1907年）不容置辯地証明了我国資产阶級的极端动搖性和反革命性，証明我国无产阶級能够成为胜利的革命的领袖，証明民主农民群众能够帮助无产阶級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們又看到了孟什維克对我国劳动派农民的純粹自由派的观点。孟什維克說，劳动派充滿小資产阶級的空想，他們要求土地的斗爭是为了实現土地社会化或平均使用土地这些荒誕的反动的口号。“因此”，劳动派要求土地的斗爭削弱了要求自由的斗爭，劳动派的胜利是农村战胜城市，性質是反动的，——这就是馬尔丁諾夫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0—11号上发表的議論和馬尔托夫在“20世紀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文集中发表的議論的主要內容。

对劳动派农民的这种估計，同对資产阶級革命的上述論断一样，是对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如果馬克思主义者不善于分析这种在民粹派学說（把这种学說当做社会主义学說来評价，它的

确是一种荒誕的、空想的、反动的学說）的掩飾下反对整个現代地主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斗爭的現实意义，那是最坏的教条主义。孟什維克对馬克思主义辯証法表現了惊人的盲目无知：他們看不到，在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下，俄国农民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性在思想上只能表現在"信仰"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在經济学的形式上是錯誤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116]，——对恩格斯的这句話，我們的孟什維克永远也想不通。他們这些学究在揭露民粹派学說的錯誤的同时，沒有看到这些冒牌社会主义学說反映出来的現代資产阶級革命中的現代斗爭的眞相。

而我們說，必須坚决反对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之流的冒牌社会主义学說，直截了当地、坚定不移地認为，无产阶級在資产阶級革命中必須同革命农民結成联盟。这个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把平分土地的救星作用这个学說化为泡影，但是农民群众在目前的斗爭中，通过这个学說所反映的正是他們那种将要肃清俄国各种各样农奴制残余的历史性活动的广泛、有力、勇敢、热情、眞誠和不可战胜。

孟什維克說，資产阶級在向左轉，打倒劳动派的空想学說，支持資产阶級万岁。而我們說，資产阶級在向左轉，这就是說，俄国革命的火药桶在装新火药。如果今天，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之流說"俄国正在害病"，这就是說，明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級就会率領民主农民行动起来，而且說"我們来把这个病治好！"

載于1909年4月8日（21日）
"无产者报"第44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現在我們把杜馬代表苏尔科夫在杜馬討論主教公会預算案时的发言，以及我們杜馬党团会議討論这篇发言稿的材料刊登出来，因为这两个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別迫切的問題。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經引起"社会"各界人士、以至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識分子和某些工人群众的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該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說，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辯証唯物主义，它完全繼承了法国18世紀的和德国19世紀上半期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統，即絕对无神論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統。我們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看过該書的手稿)，自始至終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論者杜林沒有坚持唯物主义，給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須指出，恩格斯在論述費尔巴哈的著作中責备費尔巴哈，說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創造出一种新的、"高尙的"宗教等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义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117]。馬克思主义始終認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資产阶級反动派用来捍卫剝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級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譴責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譴責他們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綱領里直接承認无神論来对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談到当时亡命倫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認为他們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們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責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級斗爭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級群众参加自覚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談而已[118]。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无情地斥責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讓步，即使是些微的讓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責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說，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本人更俾斯麦一些”，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爭的复轍（所謂“为文化斗爭”，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麦在1870年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党，即反对“中派”党的斗爭）。俾斯麦的这場斗爭，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战斗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某些工人阶层和民主派忽視革命的阶級斗爭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視最表面的、資产阶級騙人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說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努力組織和教育无产阶級，使宗教漸漸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119]。这个观点已經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給耶穌会教徒以自由，主张允許

他們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的斗爭手段。"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綱領"(1891年)的一个有名的条文，这一条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現在竟然成为陈規陋矩，竟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歪曲，即把馬克思主义歪曲到它的反面，即歪曲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綱領的这一論点說成这样，似乎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我們的党，認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說对于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来說，对于我們党来說，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19世紀90年代，恩格斯虽然沒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爭辯，但是他認为必須堅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辯論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認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說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說决不是私人的事情[120]。

从外表上看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問題表示意见的經过就是如此。輕率看待馬克思主义的人，不善于或不願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經过只是表明馬克思主义自相矛盾和搖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无神論，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革……革……革命的战爭，另一方面懦怯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們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沒有原則"的动搖。在无政府主义空談家的作品中，这种攻击馬克思主义的說法是很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認真一些研究馬克思主义、考虑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經驗，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彻底的，是經过馬克思和恩格斯周

密考虑的；在迂儒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現，其实都是从辯証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結論。如果認为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謂“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把”工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地，馬克思主义在这个問題上的政治路綫，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义或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坚决反对宗教。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唯物主义比百科全書派和費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領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領域。我們应当同宗教作斗爭。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义的起碼原則。但是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認为必須善于同宗教作斗爭，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說明群众信仰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爭不应該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結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該把这一斗爭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級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級的落后部分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級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資产阶級的进步人士，即激进派或資产阶級唯物主义者回答說，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因此，他們認为主要任务是打倒宗教，拥护无神論，宣传无神論观点。馬克思主义者說：这話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資产阶級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这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說明宗教的根源。在現代資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所受到的社会压迫，

使他們在資本主义的盲目势力面前，在这些时时刻刻使普通劳动人民受到比任何非常事件——如战爭，地震等等——所引起的最可怕的灾难和最残酷的蹂躪还要厉害一千倍的盲目势力面前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創造神”。現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資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預見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們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餓死。凡是不願一直留在預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資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資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沒有学会团結一致地、有組織地、有計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資本統治，那末无論什么启蒙書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因此是否可以說，反宗教的启蒙書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結論。这只是說，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論，应当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剝削群众反对剝削者的阶級斗爭。

对辯証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沒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許不能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了解）这条原則。怎么会这样呢？进行思想宣传，宣揚某种思想，同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同支持了数千年之久的敌人（即宗教）作斗爭，为什么要服从阶級斗爭，服从在經济政治方面实現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爭呢？

这种反对意見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意見，这証明反駁者完全不懂得馬克思的辯証法。使这种反駁者感到不安的

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辯証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誰認为在理論上宣传无神論，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級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級斗爭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間有一种絕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辯証地看問題，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絕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現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說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門的无产阶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覚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当然是无神論者，另一部分則是相当落后的，他們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們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經济斗爭引起了罢工。馬克思主义者应該首先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場斗爭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論者和基督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論就显得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由于象庸人那样考虑到不要把落后工人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等，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級斗爭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級斗爭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論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論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論，就只能有利于僧侶，因为他們恰恰最願意用信不信神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其实是帮助了僧侶和資产阶級（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終帮助資产阶級一样）。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但是他們应当是辯証唯物主义者，就是說，他們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爭的問題，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純粹理論的、始終不变的宣传来进

行反宗教斗爭，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級斗爭提出这个問題。馬克思主义者应該善于估計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条界綫是相对的，是可能移动的、可能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資产者或自由主义知識分子那种庸俗主义和机会主义，不要象他們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爭，忘記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宗教信仰，不从阶級斗爭的利益出发，而斤斤計較細小的得失：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极頂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讓別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枝节問題，都应該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經常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司祭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員，人們通常根据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經驗对这一問題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經驗并不完全是把馬克思主义学說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結果，而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們到下面再談)，所以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宣布說司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員，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規定。如果有一个司祭願意到我們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誠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綱，那我們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們党綱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許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組織要用考試的方法检驗自己成員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綱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絕无仅有的，在俄国更是

难于想象了。如果这位司祭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末党当然应該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們不仅应当容許，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信神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們絕对反对任何侮辱他們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們吸收他們是要用我們党綱的精神来教育他們，而不是要他們来积极反对党綱。我們容許党內自由发表意見，但是以自由結合原則所容許的一定的范围为限；我們沒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內多数人摈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員声明"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員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离开了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离开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离开的意义和所謂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一个鼓动員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講話的人，为了說得明白一点，为了給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为了用不觉悟的群众最熟悉的說法更具体地說明自己的观点，而說了这样一句話，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作家开始宣传"造神說"或造神社会主义（就同我們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过分限制鼓动員的自由，限制运用"教育法"来影响群众的自由，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須而且应該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論点，对某些人来說，是从宗教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說，則是从社会主义轉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现在来談談欧洲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点遭到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一般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的影响，机会主义也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

根本的利益。无产阶級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認为同麻醉人民的鴉片作斗爭，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爭的問題是“私人的事情”。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这样，似乎社会民主党認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見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們的杜馬党团在討論有关宗教問題的演說时完全沒有加以說明）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問題采取了目前这种可說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斗爭在历史上是革命資产阶級的任务，在西方資产阶級民主派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說在他們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紀制度的时代已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爭取完成）这个任务。无論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資产阶級反宗教斗爭的传統，这个斗爭在社会主义运动（百科全書派，費尔巴哈）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在俄国，由于我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工人阶級的肩上。同欧洲比較起来，我国小資产阶級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不是太多（象“路标”文集[121]的那些新出現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就是这样想的），而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資产阶級反宗教斗爭的传統在西欧早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爭所作的純粹資产阶級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說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資产阶級，但是他們还是站在資产阶級世界观的立場上。拉丁語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国的莫斯特（附带說一句，他曾經是杜林的門生）之流，奥地利8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教斗爭中把革命的空談弄到了 nec plus ultra①。难怪

現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而做得矫枉过正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忘記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方，自从民族資产阶級革命結束以后，自从实現了比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反宗教的民主斗爭問題在历史上已被資产阶級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爭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資产阶級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 quasi② 自由主义的“討伐”，轉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 Kulturkampf 以及法国資产阶級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爭，都带有这种性質。資产阶級的反教权主义斗爭，是轉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爭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該使反宗教斗爭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爭，借以对抗資产阶級和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級是我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領袖。无产阶級政党应当成为思想上的領袖，領导反对一切中世紀制度的斗爭，其中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企图等等。如果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的主张偸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說也是私人事情，如果說恩格斯糾正这种机会主义所用的方式还比較緩和，那末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該受到恩格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責。

① 极点。——編者注

② 冒牌。——編者注

我們的党团在杜馬講坛上声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先例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問題发表意見都应該遵循的。是不是还应該更进一步，把无神論的結論发揮得更詳細呢？我們認为是用不着的。这样，无产阶級政党就会有夸大反宗教斗爭意义的危险；这样就会抹杀資产阶級反宗教斗爭同社会主义者反宗教斗爭之間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黑帮杜馬中应該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經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許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明教会和僧侶支持黑帮政府和資产阶級反对工人阶級的阶級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問題还可以說得很多；今后社会民主党人談这个問題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些补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們党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級党組織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詳尽地說明經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遺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中，别洛烏索夫在这个問題上犯过錯誤（这个錯誤“无产者报”曾及时指出了）。党团內的討論情况表明，党团爭論无神論問題，却没有正确說明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們决不把整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錯誤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此。我們公开承認这是全党的过錯，因为我們党对这个問題解释不够，没有讓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認識到恩格斯批評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党团內的討論情况証明，这正是由于对問題了解得不清楚，而不是不願意考虑到馬克思的学說，所以我們深信，党团在以后发言时一定会糾正这一錯誤。

我們再說一遍，总的說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各級党組織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討論，証明党团在兢兢业业地完成它所肩負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責。不过我們希望报道党团內部討論情况的通訊能更經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得党团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內部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載于1909年5月13日（26日）
"无产者报"第45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各阶級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

国家杜馬討論了主教公会的預算問題，討論了还俗人員恢复权利的問題以及旧教徒公会的問題，这次討論提供了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可以从俄国各政党对待宗教和教会的态度来說明这些政党的性質。现在我們来浏覽一下这些材料，主要是談談关于主教公会預算的討論（討論其余两个問題的速記記录我們还沒有收到）。

在研究杜馬的討論时特别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結論，就是好战的教权主义运动在俄国不仅存在，而且显然是愈来愈强大，愈来愈有組織了。4月16日，米特罗范主教宣称："我們在杜馬的第一步活动，就是我們这些受到人民崇高的选举尊敬的人，在杜馬里要超越党派的分裂，成立一个僧侶集团，这个集团要根据自己的倫理观点来闡明各方面的問題……可是我們沒有达到这种理想的境地，原因是什么呢？……这要怪那些同你們"（即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坐在一起的、属于反对派的僧侶代表。他們先是提高嗓子說这无非是建立教权主义的政党，这是极不应該的。当然，关于俄国正教僧侶的教权主义是用不着談的，我們从来沒有过类似的傾向，我們所以願意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集团，是为了追求純道德的和純倫理的目的，可是現在，諸位先生，由于左派代表在我

們弟兄中間制造不和，結果弄得四分五裂，而現在你們”（即立宪民主党人）“却拿这一点来責备我們”。

米特罗范主教在他的文理不通的演說中泄露了一个秘密：你們看，左派的过錯就是使杜馬中的一部分僧侶不同意成立特殊的、“道德的”（这几个字眼当然比“教权主义”更能欺騙人民）集团！

过了一个来月，5月13日，叶夫洛吉主教在杜馬中宣讀了“杜馬僧侶的决議”：“杜馬中的正教僧侶絕大多数人認为”……为了保持“正教教会优先和統治的地位”，不能讓旧教徒享有传教的自由，未經官方准許不得建立旧教徒公会，旧教的僧侶不准称为神职人員。俄国司祭的“純道德观点”完全暴露了他們純粹教权主义的眞面目。叶夫洛吉主教发言所代表的所謂“絕大多数”杜馬僧侶大概就是第三届杜馬的29名右的和中右的司祭，也許还有8名十月党人司祭。屬于反对派的看来是进步派和和平革新党人集团的4名司祭，以及波兰-立陶宛集团的1名司祭。

“絕大多数杜馬（必須补充說明是六三杜馬）僧侶的純道德和純倫理观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請看几段发言的摘录：“我只是說，这些（即教会的）改革应当从教会內部发起，而不应当从外面，从国家方面发起，当然也不应当从預算委員会方面发起。教会是神的和永恒的机关，它的法則是固定不移的，然而大家知道国家生活的理想是經常改变的。”（叶夫洛吉主教，4月14日）发言者追溯了“令人不安的历史上的同类事件”：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时曾經沒收过教会的財产。“預算委員会今年主张把它們（教会財产）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誰能担保明年它不主张把这些財产移交給全国的国庫，以后又从教权手中全部轉交給民权或政权管理呢？……教規上写着，既然基督徒的灵魂都托付給了主教，那末教会的財产

就更应当托付給主教……　現在在你們(杜馬代表)面前的是你們的教母，是神圣的正教教会，它不仅是站在人民代表的面前，而且是站在自己的教子的面前。”(同上)

我們看到的是純粹的教权主义。教会高于国家，正如永恒的和神圣的东西高于暂时的、世俗的东西一样。教会不能原諒国家沒收教会的財产。教会要求有优先的和統治的地位。在教会看来，杜馬代表不仅是人民代表，而且是“教子”，更确切些說，与其說是人民代表，不如說是“教子”。

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說得对，这不是披着袈裟的官吏，而是披着袈裟的农奴主。維护教会的封建特权，公开捍卫中世紀制度，——这就是第三届杜馬大多数僧侶的政策的实質。叶夫洛吉主教决不是一个例外。格彼茨基也大喊大叫反对“沒收”，認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侮辱”(4月14日)。司祭馬什克維奇攻击十月党人的报告是企图“破坏我們教会生活所依据的和应当依据的历史基础和教規基础”，“把俄国正教教会的生活和活动从教規的道路移到另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眞正的教会王公——主教將不得不把自己从使徒那里承繼来的权利，几乎全部都讓給世俗王公”……“这无非是……侵犯他人的所有权，侵犯教会的权利和財产”。“报告人引导我們去破坏教会生活的教規制度，他想使正教教会及其一切經济职能服从国家杜馬，服从由各种各样的分子(既有信仰我国容許的宗教，也有信仰我国不容許的宗教的分子)組成的机关。”(4月14日)

俄国的民粹派和自由派长期拿下面这种“理論”来安慰自己，确切些說，是欺騙自己，說俄国沒有好战教权主义的基础，沒有“教会王公”同世俗权力斗爭的基础等等。我們的革命把民粹派和自

由派的这种幻想連同他們其他一些幻想一起粉碎了。在专制制度完整地和不可侵犯地存在的时候，教权主义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警察和官僚的专权蒙蔽了“社会”和人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阶級斗爭，特别是看不到“披着袈裟的农奴主”同“賤民”的斗爭。革命的无产阶級和农民打开了农奴制专制制度的第一个缺口，把隐蔽的变成了公开的。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民主派的先进分子在1905年末爭得了政治自由、組織群众的自由，当他們刚开始运用这种自由的时候，反动阶級也就力图建立独立的和公开的組織。他們在完整的专制制度之下沒有組織起来，沒有明目张胆地出来活动，这并不是因为他們軟弱，而是因为他們强大；并不是因为他們沒有能力組織起来进行政治斗爭，而是因为他們当时还沒有看到成立独立的阶級組織有很大的必要。他們不相信在俄国可能发生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主的群众运动。他們滿以为有鞭子就足够控制老百姓。专制制度初次受到的創伤迫使拥护专制制度、需要专制制度的社会分子出头露面。要对付那些能够制造一月九日事件，举行1905年的罢工运动和十月－十二月革命的群众，单靠一条旧鞭子已經不行了。必須登上独立的政治組織的舞台；必須讓貴族联合会把黑帮組織起来，并展开最疯狂的蠱惑人心的宣传；必須讓“教会王公——主教”把反动僧侶組成独立的力量。

俄国反革命的第三届杜馬和第三届杜馬时期的特点，正就是这种組織反动势力的活动趋于表面化，并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內展开，要求有特殊的黑帮-資产阶級的“議会”。好战的教权主义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經不止一次地观察了并参加了教权主义資产阶級同反教权主义資产阶級的冲突。既然我們的总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級团結成一个善于把自己同資产

阶級民主派分开的特殊阶級，那末总任务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是要利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包括利用杜馬講坛，向群众解释社会主义者的反对教权主义同資产阶級的反对教权主义的区别。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馬中反对极右派、反对教权派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了資产阶級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这就大大有助于我們实現这一任务。立宪民主党人和所謂进步派的合法刊物，現在特别注意旧教徒的問題，注意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一道反对政府的問題，注意他們"已經开始实行"——虽然是小規模地实行——10月17日所答应的"改革"。然而我們更感到兴趣的是原則方面的問題，即整个資产阶級，包括想取得民主派称号的立宪民主党人在內，对宗教和教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我們不应当讓一些比較带有枝节性的問題——如旧教徒同占有統治地位的教会的冲突問題，同旧教徒有联系的、甚至在財政方面部分地依賴旧教徒的十月党人（据說，"莫斯科呼声报"[122]就是旧教徒出錢办的）行为如何的問題——把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和阶級政策的根本問題掩盖起来。

請看烏瓦罗夫伯爵的演說，这人按他的傾向說是十月党人，虽然他退出了十月党党团。他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之后发言，一开始就不願把問題提到工人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原則基础上去。烏瓦罗夫仅仅攻击主教公会和主教公会检察秘書不願向杜馬报告教会的某些收入和教区开支总額。十月党人的正式代表卡緬斯基也是这样提問題（4月16日发言），他要求恢复教区"以利于正教的巩固"。所謂"左派十月党人"卡普斯亭更加发揮了这种思想，他喊道："如果我們看一看人民的生活，看一看农村居民的生活，那末我們現在立刻就会看到一片可悲的景象：宗教生活动搖了，居民道

德体系的最伟大的和唯一的基础动摇了…… 有什么能代替罪恶的概念，有什么能代替良心的启示呢？要知道，这是不能用阶級斗爭或者某一阶級的权利的概念来代替的。这种已經进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概念是可悲的。为了使宗教这种道德基础能繼續存在，能为全体居民所接受，必須讓宗教的传播者享有应有的权威……”

反革命的資产阶級的代表想巩固宗教，想加强宗教对群众的影响，但是感到“披着袈裟的官吏”降低了教会的威信，已經不中用了，过时了，甚至給統治阶級带来了危害。十月党人攻击教权主义的极端措施和警察的监督，是为了加強宗教对群众的影响，是为了用比較精巧、比較完善的愚民办法来代替某些过于粗暴、过于陈旧、过于腐朽而不能达到目的的办法。警察式的宗教已經不能愚弄群众了，那就給我們更文明、更新式、更灵活、更能在自治教区起作用的宗教吧，——这就是資本向专制制度要求的东西。

而立宪民主党人卡拉烏洛夫正就是完全站在那样的立場上。这位“自由主义”的叛徒（从“民意党”演变成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大声疾呼反对“教会非民間化，認为这是把人民群众即俗人排斥于教会建設之外”。他認为群众“沒有宗教信仰”是“可怕的”（原話如此！）。他的叫嚣完全是緬施科夫式的：“教会本身巨大的价值降低了……这不仅对教会的事业，而且对国家的事业也有巨大的危害。”狂热的信徒叶夫洛吉說“教会的任务是永恒的、固定不移的，也就是說，要把教会同政治結合起来是办不到的”，而卡拉烏洛夫把这种令人反感的虚伪說法称为“金玉良言”。他抗議教会同黑帮联合，为的是使教会“能够比現在更有力和更光荣地完成自己伟大的、神圣的、符合基督精神的事业，即爱和自由的事业”。

别洛烏索夫同志在杜馬講坛上嘲笑了卡拉烏洛夫的这些“抒

情詞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嘲笑一番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須闡明，而且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必須在杜馬講坛上闡明，立宪民主党人的观点同十月党人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前者无非是表明，"文明的"資本力求使用宗教麻醉来愚弄人民，不过采用的教会欺騙手段，比生活在过去的普通的俄国"神父"所采用过的要精巧些。

野蛮的地主和旧时的警察通过普利什凱維奇的嘴說，为了使人民处于精神奴隶的地位，教会同黑帮必須建立最紧密的联盟。反革命的資产者通过卡拉烏洛夫的嘴反对他們說：先生們，你們弄錯了，你們用这种手段只能使人民完全离开宗教。讓我們干得更聪明、更狡猾、更巧妙一些吧，我們要丢掉过于愚蠢和粗暴的黑帮分子，宣布反对"教会非民間化"，我們在旗帜上写下叶夫洛吉主教的"金玉良言"：教会高于政治，——只有这样行事，我們才能至少欺騙一部分落后工人，才更能欺騙小市民和农民，我們才能帮助革新后的教会完成使人民群众繼續处于精神奴隶地位的"伟大的、神圣的事业"。

我們自由派的报刊，包括"言論报"在內，最近猛烈地抨击"路标"文集的作者司徒卢威及其同伙。但是，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馬的正式发言人卡拉烏洛夫很清楚地暴露出这些对司徒卢威及其同伙的責难和否認是极其卑鄙虛伪的。司徒卢威嘴上所說的，正是卡拉烏洛夫和米留可夫脑子里所想的。自由派責备司徒卢威，只是因为他粗心大意地說出了真相，把牌摊得太多了。自由派責备"路标"派，而又繼續支持立宪民主党，这就是一方面譴責粗心大意的露骨的言論，一方面又繼續干着符合这种言論的行动，这是最无耻地欺騙人民。

关于杜馬中的劳动派在討論上述問題时的表現，沒有多少可

談的。同往常一样，在劳动派农民和劳动派知識分子之間暴露出明显的差別，这对于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决心較大的劳动派知識分子是不利的。不錯，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上的不自覚，他也重申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見解，說俄国人民同盟并不是有助于巩固宗教，而是有助于破坏宗教，他沒有能提出任何綱領。但是当他开始直率地講到一些赤裸裸的事实眞相，如僧侶的勒索，司祭的敲詐，他們向举行婚礼的人除了索取金錢还要求給"一瓶烧酒、一盘小吃、一斤茶叶，有时还提出我在讲台上不敢講的要求"（4月16日，速記記录第2259頁），黑帮杜馬就忍不住了，从右边的席位上发出了野蛮的咆哮。黑帮分子大喊大叫："这是多大的侮辱！这太不象話了！"他們感到庄稼汉的一篇簡单的发言，講一講敲詐勒索和圣礼的"法定价格"，比任何理論上或策略上的反宗教反教会声明更能使群众革命化。于是在第三届杜馬中維护专制制度的一帮死硬派便威胁他們的奴才美延多尔夫主席，强迫他制止罗日柯夫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人，还有某些劳动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等联名抗議主席的这种行为）。

劳动派农民罗日柯夫的发言虽然非常簡单，但是它清楚地表明了立宪民主党人虛伪地、居心反动地保卫宗教同农民那种原始的、不自覚的、保守的宗教信仰是有天壤之别的；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他违反自己的意志不自覚地产生一种反对勒索的眞正革命的憤恨和坚决反对中世紀制度的决心。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資产阶級的代表。他們想用改革和巩固宗教来反对人民。罗日柯夫这类人是革命的資产阶級民主派的代表，这一派是不成熟的、不覚悟的、閉塞的、不独立的、分散的，但是在反对地主、僧侶和专制制度的斗爭中，他們却蘊藏着还远沒有发揮出来的革命干劲。

劳动派知識分子罗札諾夫是接近立宪民主党人的，而且比罗日柯夫要覚悟得多。罗札諾夫会講述教会同国家分离这一"左派"的要求，但是他忍不住說了一些反动的、市儈式的空話，說什么"修改选举法的方針应該是不讓僧侣参加政治斗爭。"一个典型的普通农民在講起自己生活的眞相时，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革命性，这种革命性在劳动派知識分子身上是找不到的，他們只有一种含糊不清的、有时簡直是卑鄙无耻的空話。俄国的农民群众只有跟着无产阶級走，才能推翻压抑他們、摧残他們的农奴制地主、披着袈裟的农奴主、拥护专制制度的农奴主的压迫——，这个眞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已經得到第一百次、第一千次的証实。

在整个杜馬中，只有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級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苏尔科夫，才把討論提到了眞正的原則高度，他直截了当地說明了无产阶級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一切彻底的和有生命力的民主派应該对教会和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人民的錢一文也不能給这些蒙蔽人民意識、沾滿鮮血的人民敌人"——社会主义者的这种直率的、大胆的、公开的战斗呼声听起来正象是对黑帮杜馬的挑战，这种呼声获得了千百万无产者的响应，他們要在群众中传布这种呼声，只要时候一到，他們就会把它变成革命的行动。

載于1909年6月4日(17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
按"社会民主党人报"原文刊印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議[123]

（1909年6月8—17日〔21—30日〕）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公报

讀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决議全文。参加会議的有：4个“无产者报”編委，3个在彼得堡、莫斯科省（俄国中部）和烏拉尔的地方組織工作的布尔什維克代表，5个中央委員（布尔什維克）。

会上展开的爭論无疑对全党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次辯論，布尔什維克派的領导机关近来一貫执行的、最近在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維克的同志中受到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綫，就十分清楚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議上，反对派有两个代表同志参加，双方都做了必要的說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編輯部将尽一切力量整理和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議記录。在这个公报中，我們只想談談在某种解释中可能引起而且已經引起国外同志誤会的几个問題。其实，詳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議决議，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会議記录将为透徹了解整个决議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議对于派别內部的意义。

首先談談“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議。

对于决議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沒有表示重大异議。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承認，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为一定的派别，那就离社会民主党愈来愈远，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召回派的公認的領袖斯塔·[124]同志，甚至还有了“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会上一致認为，必須同召回主义这种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爭。至于最后通牒主义，情况就不同了。

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在会上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們两人在决議付表决时，提出書面声明說，他們是最后通牒派，决議提出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对他們来說，就是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因此他們不能同意。后来，又有一些决議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了，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書面声明說，他們認为会議的决議是不合法的，会議通过这些决議，就等于宣布派别的分裂，他們将不服从和不执行这些决議。这件事情，我們下面还要詳細談到，因为这件事使一个反对派的代表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脫离了“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在这里，我們想从另一方面来講講这件事。

評价最后通牒主义其实也同評价那个叫做召回主义的彻底的最后通牒主义一样，可惜的是我們根据的材料主要不是書面的，而是听到的。直到现在，无論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沒有体現在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綱領”中。因此，在观察最后通牒主义时只好根据它的下面这种唯一具体的表現，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它必須具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否則就放弃代表資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

言，这样說明最后通牒主义的特征是完全确切的。正因为如此，参加会議的两个最后通牒派当中的一个馬拉特同志声明，这种說明不符合他的情况。馬拉特同志認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因此，他并不主张現在就向它提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認为，党应当用各种办法对杜馬党团施加压力，直到向它提出上述的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在一个派别內共处，当然是可能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把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完全取消。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不是排斥，相反地，是要求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馬党团改进它的工作，是要求进行长期的頑强的工作，来巧妙地利用杜馬活动进行宣传和組織工作。既然杜馬党团活动显然有了改进的趋势，那就应該継續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努力。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漸漸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維克是談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議和"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的决議所說的划清界限，对他們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某一实际問題的不同提法和不同的解决方法而已；这里并沒有什么比較明显的原則分歧。

决議認为作为党內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維主义必須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是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对杜馬党团进行长期的工作，不要党在工人中間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来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馬提供的丰富的宣传材料。这种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要党对杜馬党团进行积极的、創造性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派的唯一武器就是最后通牒，他們要党把它当作一把利劍，放在杜馬党团的脖

子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它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經过长期頑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眞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議会制度的全部經驗。要在这种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間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們紧紧地結合在一起了。因此，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內革命派别的布尔什維主义，必須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会議說的这种"划清界限"，我們应該如何理解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說，会議宣布了布尔什維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証明呢？沒有材料可以証明。会議的决議声明，在布尔什維克派內部出現了反对布尔什維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維主义的是我們党內的布尔什維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許許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間甚至会有尖銳的矛盾。在德国党內，除了考茨基的鮮明的革命派之外，还有伯恩施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內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朝一定的方向影响党，使党尽可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原则。为此，就必須要有眞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維克派內部冲突这个問題的眞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們对党的統一和对派别的統一的要求是不同的。会議并沒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人員認为，会議的决議号召我們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組織中驅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組織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錯誤。我們提醒地方工作人員，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派在工人群众中間还沒有形成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那就一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要拥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比較彻底一些，那就是自絕于派别，自絕

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緒的可能是大批的工人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杜馬党团的活动。同这种召回主义斗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向工人广泛地全面地介紹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对待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馬代表同志同工人举行一些座談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緒。因此，必須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組織上分裂。只要稍微坚决彻底地跟召回主义和同它相近的工团主义进行思想斗爭，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組織分裂的議論成为无稽之談，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集体脫离布尔什維克派，脫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上的情形也是如此。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議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維主义立場，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項基本的原則性的决議通过以后，他声明說，他認为这些决議是不合法的，尽管通过这些决議时是十票对两票，而有些决議則是一票反对（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議）。当时，会議就通过一項决議，声明会議对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負任何責任。問題很清楚，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堅决反对会上絕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則性的决議，他就应該知道，他同会議已經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失去了党内派别存在的这一基本条件。不但如此，馬克西莫夫同志还坚决声明說，他不仅不願意执行这些决議，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議。因此，会議也不能对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負任何責任，会議还声明（見圣彼得堡代表米·托·125等人的声明）："这里的問題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馬克西莫夫同志退出了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①

我們認为，还必須使同志們特别注意会議的下列决議："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正确了解布尔什維克的"党的路綫"以及对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杜馬講坛的态度这两方面的問題的提法。

我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項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和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进行斗爭。来自右面的取消派說：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需要的，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該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利用合法的机会上。来自左面的取消派則完全相反，他們說：在他們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无論如何要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一切。这两派大致一样，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去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計划地适当地結合起来，"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維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崩得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維克中間有一种回到党性上面来的值得注意的現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議决議所說的，"該派别的少数"（孟什維克中的）[128]"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

① 馬拉特同志也曾經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議的决議，但是服从这些决議。馬拉特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認为，同召回派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爭是必要的，但是不贊成同召回派进行組織上的斗爭和使布尔什維克派分裂。至于一般地談到組織上分裂的問題，那末从会議"关于国外某地的党校"的决議[126]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127]的拥护者进行了分裂活动，因为办这所学校无疑是企图建立新派别的思想和組織上的新中心。

后，已經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并替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合乎党性的基础"①。

布尔什維克应当怎样对待这部分目前人数还不多的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維克呢？毫无疑問，布尔什維克应該竭力接近这一部分馬克思主义的有党性的护党分子。这决不是說抹杀我們同孟什維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維克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綫的行为，我們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爭。很显然，这决不是說把布尔什維克派融化于党內。布尔什維克在夺取党的陣地方面做了許多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許多工作要做。作为党内一定的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維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应当牢牢記住一点：会議决議談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責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維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工作，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是布尔什維克担負的。这些坚定地徹底地保卫党性的人，现在担負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有利于党的建設的人參加党的建設工作。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期，如果我們不向其他派别的那些維护馬克思主义和党性、反对取消派的护党分子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場，会上的絕大多数人，包括所有地方組織的布尔什維克代表在內，都認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搖摆不定，不敢采取明确贊成我們或者反对我們的立場。尽管如此，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議采取了这样的路綫而責备会議"背叛了布尔什維主义"，采

① 决議所說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編輯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諾夫同志退出該报編輯部，根据普列汉諾夫本人的声明，他不得不退出的原因完全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編輯部的取消主义傾向。

用了孟什維主义的观点，等等。我們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請你最好在报刊上，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維克派，把这些話公开地談出来，这样我們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眞正含意和你“維护”布尔什維主义的行为的实質。

我們建議同志們注意会議“关于……对杜馬活动的态度”的决議。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合法机会”的問題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关系。現在，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議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絕的，在議会迷看来，整个党組織归根到底应該把工人集中起来利用“合法机会”，特别是进行杜馬活动，召回主义則不了解利用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議的决議認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議中，任何地方都沒有把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看做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們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現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議对这一点已經做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說来，現在与其談“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居什么地位，不如談如何利用現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的經驗。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說了。在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維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須比过去更加注意、更加主动、更加努力。我們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現在我們学习秘密活动的方法那样，頑强地学习。会議号召一切珍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这样頑強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的机会。

我們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該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基本任务。只有使党巩固了，我們才能为党的利益来利用那些合法机会。現在应該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集团，对党的工作的总的領导应該轉到（而且正在逐漸地轉到）这些工人集团手中。我們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促使这些集团产生眞正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載于1909年7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按附刊原文刊印

关于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問题的講話

（6月11日〔24日〕）

我認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从实質上回答馬克西莫夫同志，就是說，用不着反复地向他說：他在脫离我們，在建立一个諷刺画中的布尔什維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在“无产者报”上已經談过，发表过，反复地講过，着重地指出过。我現在要說的只有一点，就是請你把你在这屋子里說的一切刊印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够停止这一場进行了三天多的无謂爭吵，才好进行一場思想斗爭。請你把你下面这些話印出来，說什么我們是“新布尔什維克”，“是新‘火星报’所說的”“新无产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維克），說我們“倒退了两步”，我們“在破坏俄国革命最珍貴的遺产——布尔什維主义”，請你把我从你的发言中記录下来的这一套印出来，这样，我們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大家指出，你就是一个諷刺画中的布尔什維克。請你把你下面这些話刊印出来，說什么我们——我又引用你的話——“如果当了普列汉諾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們“将在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請你把这些話刊印出来，我們好再一次对布尔什維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別作出对党有益的說明。旣然你拒絕这样做（从1908年8月起，我們就在編輯部的会議上正式建議你出一本小册子来闡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們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絕公开斗爭，繼續在內部爭吵，那我們就不得不設法把

你从我們的派别內（不是从党內，而是从派别內）直接划分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見，以便进行思想斗爭，使党学会許多东西。

1934年第一次載于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
会議記录"一書

按手稿刊印

关于布尔什維克在杜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講話和决議草案

我們的辯論就要結束了，我認为，不必专門就这些辯論作出決議，作決議应該愼重。本来把問題互相解释清楚就算了。为了回答弗拉索夫[129]关于利用合法机会的問題，我現在把決議草案讀一下：

"布尔什維克中央决定：布尔什維克派为了眞正实現——就是根据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和方針来实現——目前已經为全体布尔什維克公認的目的，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階級組織，特别是利用杜馬講坛的目的，就一定要把培养有經驗的、精通自己业务的、能够坚守自己的特殊的合法崗位（工会、俱乐部、杜馬委員会等等）的布尔什維克干部这个任务清楚地提出来，并且无論如何要完成这个任务。"

弗拉索夫指出，这是領袖們的事情。这話不对。問題是：在我們布尔什維克派內部，普遍認为不需要这种专家。我們的力量很少，因此必須使用他們，分配給他們合法的职务，委托他們用派别的名义执行这些职务。旣然我們說要建立党的支部，那就应当有能力把它建立起来。我草拟了一个关于用传单进行宣传的決議：

"布尔什維克中央討論了布尔什維克在杜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問題，特决定：应該使所有的地方組織重視使用传单（除了地方的和省的刊物以外）向群众宣传社会民主党在杜馬中的工作情况并且指导这一工作。这些传单的內容可以是指出应在杜馬講坛上闡明的問題，总結社会民主党在杜馬中的活动和党派的分野，为宣传这些問題的演說拟訂提綱，分析社会民主党在杜馬中发表的一

些特别重要的演説有什么政治意义，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馬中的演説有哪些地方还不透彻不确切，最后，也可以摘录这些演説中对宣传和鼓动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实际結論，等等。"

在非正式会議[130]上就对待杜馬活动的态度問題談到的几点，我也拟了一个决議草案：

"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利用杜馬同改良主义者的（或者更广泛一点說：机会主义者的）利用杜馬的区别可以用下列的几点（不能説很全面）来表明。

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所謂外部关系来看，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馬与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必須反对在任何資产阶級社会（特别是在反动时期的俄国）都会自然产生的意图，即反对議員和經常在議員周圍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把議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和独立存在的活动。尤其是必須尽力使党团确实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职能之一，并且使党团同党保持經常的联系，不是同党隔离，而是貫彻党的观点，貫彻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机关的指示。

从党团活动的内容来看，必須指出：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活动的目的与其他一切政党根本不同。无产阶級政党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討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农奴主-資产阶級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級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組織性。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該服从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应当更多地注意在杜馬講坛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应当尽力使群众能更經常地听到从杜馬講坛上宣传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目标的演説。其次，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繼續进行的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

要使杜馬党团經常同反革命大肆攻击‘解放运动’的行动进行斗爭，同斥責革命、詆毁革命以及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等的各种流派（公开的反动派、自由派，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爭。社会民主党的杜馬党团应当高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先进阶級——俄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領袖——的旗帜。

其次，必須指出，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当前极重要的任务是积极干預所有劳动立法的問題。党团应該利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丰富的議会斗爭經驗，同时要特别防范机会主义分子歪曲这方面活动的作用。党团不应該縮小自己的口号和我党最低綱領的要求，而应当拟訂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法案（以及对政府和其他党派的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向群众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虛伪和謊言，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經济斗爭和政治斗爭，只有这一斗爭才能使工人取得真正的成果或者把那些在当前制度的基础上的不彻底的和騙人的‘改良’，变为前进的工人运动在通向无产阶級彻底解放的道路上的据点。

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于机会主义者的动搖在党內最近产生的改良主义，也应当采取这种立場。

最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馬与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还应当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党必須从各方面向群众說明所有資产阶級政党的阶級性質，不仅要攻击政府和公开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資产阶級农民民主派的动搖。”

写于1909年6月12—13日（25—26日）
1934年第一次載于“‘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記录”一書
講話按該書原文刊印
决議草案按手稿刊印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决議

1. 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我們党內的革命派提出的抵制布里根杜馬和第一屆国家杜馬的口号，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带动了工人阶級中一切最积极和最革命的阶层。

随后，广大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爭时期为艰难的反革命时期所代替；社会民主党人必需根据这种新的政治局势采取自己的革命的策略，因此，利用公开的杜馬講坛来帮助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工作和組織工作，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可是，一部分参加过直接革命斗爭的工人在事情发生急剧轉变的情况下，未能立即应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反革命的新情况下所采取的策略，依然簡单地重复在公开的国內战爭时期的那些口号，固然这些口号在当时是革命的，但是現在空洞地重复它們，就会阻碍无产阶級在新的斗爭条件下团結起来。

另一方面，在发生这种艰难的轉变的条件下，在革命斗爭处于低潮，甚至一部分工人也情緒低落、不知所措的气氛中，在工人組織遭到破坏，沒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腐蝕性的影响的时期，在工人阶級当中，有一部分人不关心政治斗爭，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馬工作尤其冷淡。

在这种情况下，所謂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就能在无产阶級的这些人当中得到暂时的胜利。

公开嘲笑工人的困境的第三届杜馬所做的工作，加强了这部分工人的召回主义情緒，这些工人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不够，还不能够了解到，第三届杜馬的这种活动使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这个剝削阶級的代議机关，向广大人民群众說明专制制度和一切反革命勢力的眞正性質，以及革命斗爭的必要性。

这部分工人之所以会有召回主义情緒，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在过去，特別是在第一年的活動中犯了极端严重的錯誤。

鉴于这种召回主义情緒在对工人阶級进行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方面起着不良的作用，布尔什維克派認为：

（一）对于这些工人，必須进行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坚持不懈地說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在政治上毫无用处，說明在反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議会斗爭的眞正意义和杜馬講坛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和整个杜馬工作，必須使杜馬党团同先进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全面地帮助杜馬党团，全党有組織地对它进行监督，并且采用公开說明它的錯誤的办法来影响它，党必須切实对杜馬党团这一党的机关的活动进行領导，总之，布尔什維克必須貫徹最近一次全党代表会議的有关决議，因为只有使工人对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的活动更加注意，使他們有組織地參加社会民主党的杜馬活动，才能眞正糾正我們杜馬党团的策略；

（三）对于把杜馬党团引上反党道路，因而使它脫离工人的先鋒队的党內右派，必須不断地进行不調和的斗爭，揭穿这种对党

有害的策略。

* *
*

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过程中，許多人加入我們的党，并不純粹是由于拥护我們党的无产阶級綱領，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們党为爭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輝的堅决的斗爭，他們在接受无产阶級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沒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整个斗爭联系起来。

这些对无产阶級观点还不够了解的分子，在我們布尔什維克派里也有。这些分子在艰苦的情况下，愈来愈暴露出他們缺乏社会民主党人的堅韌精神，由于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則的抵触情緒愈来愈尖銳，最近一年来，他們一直在建立一种派别，企图完成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論，其实，这不过是把一些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議会斗爭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馬工作的錯誤观念奉为原則，把这些錯誤观念加深而已。

这种想把召回主义情緒变成一套召回主义政策的企图，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理論，它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对政治冷淡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无政府主义的动搖思想。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論尽管充满革命的詞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立宪幻想的另一面，同样希望国家杜馬本身能够满足人民这种或那种迫切的要求，它实質上是用小資产阶級的傾向来頂替无产阶級的思想。

所謂最后通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派别，它在原則上反对利用第三届杜馬講坛，或者企图用各种实际的理由来为自己不履行这个义务作辯护，它不是长期地教育杜馬党团，糾正党团的錯誤，而

是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力图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对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危害并不比公开的召回主义少。現在，最后通牒主义同召回主义在政治上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最后通牒派硬說最后通牒主义同我們这个派别在革命某一时期实行过的抵制是一脉相承的，这完全歪曲了我党絕大多数人运用得十分正确的对布里根杜馬和第一届国家杜馬的抵制的眞实意义和性質。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議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結論說，抵制路綫是布尔什維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这就表明，它們实質上是孟什維主义的反面，因为后者鼓吹，有代議机关就应該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过去企图从原則上为自己的理論寻找根据的种种作法，不可避免地会使他們否定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們提出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同在俄国現在条件下运用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策略彻底断絕关系，而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傾向。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宣传已經很明显地損害了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这种宣传如果繼續下去，就会危害党的統一，因为这种宣传已經造成了一些怪現象，例如，召回派同社会革命党人（在圣彼得堡）联合起来拒絕帮助我党杜馬代表，并且同某些明显的工团主义分子一起向工人发表公开演說。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声明，布尔什維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定的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維克派必須同这些离开革命馬克思主义道路的傾向作最坚决的斗爭。

2. 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

第二屆杜馬被驅散以后，反革命获得了大胜利，这种客观形势向整个党的活动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獗，在无产阶級阶級斗爭的浪潮十分低落的情况下，把在无产阶級斗爭最高潮的时期建立的党組織，即自覺地站在正統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把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組織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統一策略的組織保存下来。

这两年的保卫党和党性的斗爭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同那些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卷入党內来的分子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团結了。一方面，很清楚，社会民主党过去的那些同路人离开了党，完全轉到各种合法組織（合作社、工会、教育团体、杜馬党团下面的委員会）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了，在那里，他們不但不执行党的政策，反而同党斗爭，力图使这些組織脫离党，同党对立。这些人——党內公开的取消派——盲目崇拜合法活动，把工人运动暂时的低落和分散所造成的狹隘活动形式当成原則，現在他們，正象大家所知道的，在理論上和策略上已經站到修正主义立場上去了。为我們杜馬党团出主意的知識分子謀士硬要我們党团执行机会主义路綫的前后經过，取消派同护党派在合法的工人組織里、在四个代表大会（人民大学代表大会[131]、合作社代表大会[132]、妇女代表大会[133]、工厂医生代表大会[134]）的工人代表团里的全部斗爭，現在十分清楚地表明和証明了，組織上的取消主义（反对党的机关）同反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綱基础的原則斗爭，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的。

另一方面，在这反革命大胜利的时期，担負全党領导工作的党內左派不仅在理論上承認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适当結合的策略，而且实际上实行了这个策略。如党对杜馬党团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党在无产阶級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組織中进行的一切工作就是如此。当前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提出来的这些工作形式，补充了党的主要的工作形式，是秘密的党影响比較广大的群众的形式。实际上，事实上，党就是在这些工作形式上同取消主义发生了冲突，严重地打击了取消主义。实际上，过去和現在党內各派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起来的①。最后，正是在关于党在第三届杜馬时期的策略和組織这些問題上，布尔什維克派公开同那些打着所謂"召回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党的新活动形式的、假装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分子划清了界限。

目前，"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在規定布尔什維克的基本任务时，应当指出：

（1）在今后的保卫党和党性的斗爭中，布尔什維克派仍然应当是保卫党性和党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路綫的先进战士，它的任务是从各方面积极地支持党的中央委員会和中央机关报。在目前党內力量重新組合的时期，只有全党的中央机关才能成为党的路綫的有威信、有力量的代表者，而只有通过党的路綫才能把一切眞正保护党的和眞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团結起来；

（2）在党內孟什維克的营垒中，在該派別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維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該派

① 如关于工会、合作社的决議和若干关于杜馬工作的决議在中央委員会一致通过。在最近这次全国代表会議上，絕大多數人拥护党的路綫。办中央机关报的經驗、上述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工人代表团等等。

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經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并且替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合乎党性的基础（如圣彼得堡"維波尔格区"孟什維克的信，莫斯科孟什維克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編輯部的分裂，崩得內部的这种分化等等）；

（3）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党的团結一致的先鋒队的布尔什維克，不仅必須繼續同取消派和各种修正主义作斗爭，而且必須同其他派別中的馬克思主义的和护党的分子接近，这是为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斗爭的共同目标所要求的。

3. 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維克代表会議的宣传

鉴于：自从恢复党的統一以来，布尔什維克派在那些全党爭論的問題上，通过在全党范围內为爭取按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問題而进行的思想斗爭（在党的支部和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平行的綱領和进行爭論），划分出了和团結了自己政治路綫的拥护者；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保証团結真正思想一致的同志，把所有实質上同布尔什維克派接近的分子吸引到布尔什維克派方面来；

——为了实現我們的基本目的，为了通过影响党的办法使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綫在党內取得彻底的胜利，只有在全党的范围內把布尔什維克区分出来，才是唯一正确的和唯一合适的办法；

——另一种办法，即召开布尔什維克单独的代表会議和代表大会的办法，必然会使党发生自上而下的分裂，使主动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这种彻底分裂的派別遭到致命的打击；

鉴于这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决定：

（1）提醒全体思想一致的同志，不要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这种宣传客观上会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在党内取得的陣地遭到沉重的打击。

（2）最近一次布尔什維克代表会議預定在召开下届党代表会議期間举行，而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思想一致的同志的会議，将是整个派别的最高会議。

（3）由于目前摆着許多使党和布尔什維克派不安的重要問題，特委托中央委員会中的布尔什維克坚持尽速（在两三个月内）召开全党代表会議，然后坚持尽速召开党代表大会。

4．关于在国外某地的党校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在研究了关于某地学校的問題以后，認为发起办学校的人（包括“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委員之一馬克西莫夫同志）在創立这个学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瞒着“无产者报”編輯部，同时他們还进行了反对編輯部的宣传。这些发起人到今天为止的所作所为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們以办这个学校为名，建立一个脱离布尔什維克的派别的新中央。这个学校的发起人背着共同的中央机关，同俄国的許多委員会建立了关系，設立了独立的財务处，募集了經费，甚至还背着“无产者报”編輯部和全党的中央，建立了自己的代理机关。

扩大編輯部認为，由于目前缺少有經驗的党的工作人員，如果办好一个真正的党校，哪怕是办在国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方組織从工人中培养得力的党的工作人員，并且認为，編輯部本身也必須在我們組織的情况所允許的范围内，尽力在这方面帮助

地方組織，但是，扩大編輯部根据某地学校的发起人的整个活动方式看来，断定这些发起人所追求的不是整个派别的目的，也就是說，不是作为党內的一个思想派別的布尔什維克派的目的，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的。“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認为，看一看我們派別內部在关于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造神說宣传的态度以及整个关于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等等問題上所发生的意見分歧，看一看某地党校的发起人和組織者都是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說的代表人物这个情况，这个新中央的思想政治面貌就十分清楚了。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声明，布尔什維克派对这个学校不能負任何責任。

5. 关于断絕和馬克西莫夫同志的关系

鉴于“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十个委員同馬克西莫夫同志之間在議程的全部問題上，很明显地缺乏原則上和策略上的一致，其次，鉴于馬克西莫夫同志近来的行动，是在破坏布尔什維克派組織上的統一，最后，鉴于馬克西莫夫同志对是否服从和执行“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决議的問題做了否定的回答，因此，“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今后对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負任何責任。

載于1909年7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按附刊原文刊印

取消取消主义

讀者在今天的"无产者报"的特别附刊中，可以看到布尔什維克会議的报道和会議通过的决議全文①。在这篇文章中，我們打算从我們派别的角度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角度来談一談如何估計这次会議的意义和会上一小部分布尔什維克分裂的問題。

大約从1907年六三政变起到現在为止的最近两年，是俄国革命史上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中的急剧轉变、严重危机的时期。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国代表会議，对目前的政治形势、革命运动的状况及其前途、工人阶級政党当前的任务等問題作了总結。这次代表会議的决議是党的牢靠的財产，孟什維克机会主义者拚命想批評这些决議，不过是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他們的"批評"軟弱无力，在这些决議中解决了的問題上，根本提不出任何有道理的、完整的和有系統的东西。

但是，党代表会議給予我們的还不止这一点。它在党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指出了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这两派都产生的新思想派别。可以毫不夸大地說，这些派别的斗爭充滿了整个党的历史，不管是革命到来以前，还是在革命期間。因此，新思想派别的出現是党內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現象，所有社会民

① 見本卷第397—419頁。——編者注

主党人都应当考虑，了解和弄清这种現象，以便能自覺地对待新形势下的新問題。

这些新思想派别的出現，簡单說来，就是在党的两个派别中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反对取消主义的斗爭。孟什維克中的取消主义在1908年12月以前，就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是当时同它进行斗爭的差不多都是其他的派别（布尔什維克、波兰和拉脫維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部分崩得分子）。孟什維克护党派，孟什維克反取消主义派，当时刚开始形成一个派别，还沒有比較一致的和公开的行动。而在布尔什維克里面，两派都已經清楚地出現和公开地行动了：一方面是占絕大多数的正統的布尔什維克，他們坚决反对召回主义，根据自己的主张通过了代表会議的全部决議，另一方面是占少数的“召回派”，他們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屡屡得到在他們和正統布尔什維克之間动搖不定的“最后通牒派”的支持。召回派（还有最后通牒派，因为他們滚向召回派）是变相的孟什維克，是新型的取消派，关于这一点，在“无产者报”上已經多次地談过和說明过了（請特别参看第39、42、44号①）。总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国代表会議上所表明的党內状况是这样：在孟什維克方面，取消派占絕大多数，护党分子对他們的抗議和斗爭刚刚开始；在布尔什維克方面，少数召回派公开出现，正統派占完全的优势。

什么是取消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取消主义？为什么召回派（和造神派，我們在下面会談到他們）也是取消派，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維克？一句話，我們党內出現新的思想派别有什么社会意义和

① 見本卷第262—278、329—332頁和第356—368頁。——編者注

社会作用呢？

狭义的取消主义，孟什維克的取消主义，就是从思想上否認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革命阶級斗爭，特別是否認无产阶級在我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导权。否認的形式显然不同，否認的作法或多或少是有意識的、激烈的、一貫的。可以拿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来作例子。前者对无产阶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估計，使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整个編輯部还在內部（即普列汉諾夫、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馬尔丁諾夫）分裂以前，就不得不同切列万宁脫离关系，虽然这件事該报編輯部作得极不体面：它在《Vorwärts》①上向德国人宣布同这位彻底的取消派脫离关系，而且不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向俄国讀者发表自己这种声明！波特列索夫在“二十世紀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这本書中的一篇文章里，非常成功地取消了关于无产阶級在俄国革命中的領导权的思想，以致普列汉諾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編輯委員会。

在組織上，取消主义就是否認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因而脫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組織、工会、合作社和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等等。这种孟什維克取消主义的例子，近两年来，在俄国任何一个党組織的历史上都非常多。我們曾經指出过（“无产者报”第42号，以后轉載于“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議”这本小册子中），孟什維克的中央委員企图直接破坏党中央委員会，使这个机构不起作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取消主义的例子。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議的“高加索代表团”完全是由侨居国外的代表組成，党

① “前进报”。——編者注

中央委員会确認（190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編輯部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同目前在俄国活动的一切組織沒有任何关系，这可以說是在俄国的孟什維克秘密組織几乎完全瓦解的标志。

所有这些取消主义的表現，孟什維克都沒有加以总結。一方面是他們有意隐瞞这些表現，另一方面是他們自己也糊里糊塗，不知道个別事实的意义，陷于一些瑣碎、意外和私人的事情当中，不会总結，也不懂得当前的事情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在資产阶級革命时期，在危机、瓦解和崩潰的情况下，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作取消派的俘虏。在資产阶級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資产阶級同路人（德語称为 Mitläufer）参加无产阶級政党，他們最不能領会无产阶級的理論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潰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瓦解一发生，很多孟什維克知識分子和孟什維克作家实际上就投向了自由派。知識分子大批脫了党，所以孟什維克的組織垮得最厉害。那些眞正同情无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贊同无产阶級的革命理論的孟什維克（而这样的孟什維克过去是常有的，他們总是希望用一切形势的变动和复杂的历史道路的曲折，來替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进行辯护）"又一次成了少数"，成了少数派中的少数，他們沒有决心同取消派进行斗爭，沒有力量胜利地进行这場斗爭。可是，机会主义同路人愈来愈走向自由主义，以致普列汉諾夫无法容忍波特列索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无法容忍切列万宁，莫斯科的工人孟什維克无法容忍知識分子孟什維克，等等。孟什維克护党派，孟什維克正統馬克思主义者开始分化出来，旣然他們走向党，那就势必走向布尔什維克。我們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計地处处尽

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維克护党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不过这不是要消除原則性的分歧，而是为了使眞正統一的工人政党团結起来，使党內的意見分歧不致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和共同的斗爭。

但是，无产阶級的小資产阶級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維克派才有呢？不是的。我們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已經指出①，布尔什維克也有，彻底的召回派的整个論証方法，他們論証“新的”策略的企图的整个性質就証明了这一点。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論那一个比較大的派別，实际上在資产阶級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現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資产阶級革命的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級經常同小資产阶級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經常不断地从这些阶层中吸取力量。这种現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級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們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他們，善于及时地認識到誰是眞正的外人，在某种条件下，必須同他們清楚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在于：孟什維克成了取消派（即“同路人”）的俘虏，如在孟什維克自己的队伍中，莫斯科的孟什維克的拥护者在俄国国內、普列汉諾夫在国外脫离了波特列索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都証明了这一点，而在布尔什維克当中，召回主义和造神說的取消派分子一开始就是占极少数，一开始就不能为害，随后就被拋开了。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維主义，它也必然走向只是形式稍微不同的取消主义，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談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个別集团，而是这个派別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別不

---

① 見本卷第262—278頁。——編者注

再是一种簡单的情緒，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的派别。布尔什維克在革命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們不是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特殊派别，而是想根据我国革命的新条件，运用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統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則；第二，即使在斗爭以后，在用尽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以后，历史迫使我們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慢慢前进，布尔什維克也能在最艰难的、緩慢的、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完成自己的职責。任何一个細心一点的讀者都会在1905年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派别的义务，是自覺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这个无产阶級所面临的义务，必須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現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被吸收到社会民主党里来的人，主要是受了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鮮明性”所吸引的人，缺乏一种不仅在革命順利时期而且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爭的精神的人，进行不斷的教育和改造。其中一部分人已經逐漸熟悉了无产阶級的工作，掌握了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記了几个口号，却沒有領会，他們不斷重复旧的詞句，而不会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則。那些想抵制第三届杜馬的人的变化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1907年6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馬的人在布尔什維克派中占多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綫。生活检驗了这条路綫，过了一年，“召回派”在莫斯科組織——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的布尔什維克中变成了少数（1908年夏天是14票对18票）。再过一年，在全面和反复地解释了召回主义的錯誤以后，布尔什維克派（最近的布尔什維克会議的意义就在于此）終于彻底清除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

底清除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願人們不要因此責备我們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們的会議的报道中，我們詳尽地說明了我們的任务和我們的态度。我們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說服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我們在这上面做了一年半以上的工作。但是，我們作为一个派别，即作为党內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是不能进行工作的。脫离派别并不等于脫离党。脫离我們派别的人絲毫沒有丧失在党內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們仍旧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們卷进来；或者他們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們想坚持和发展自己的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这是他們的合法权利），那全党很快会清楚地看到我們在上面尽量在思想意义方面給以估价的那些趋势的实际表現。

布尔什維克必須領导党。要領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不要再浪費时間去說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見的人进行派别內的斗爭。召回主义和滾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們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講法語"，就是說，学会把推动前进的口号尽量提出来，鼓起群众直接斗爭的毅力和勇气。現在，在停滯、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們必須学会"講德語"，就是說，学会緩慢地（在新的高漲沒有到来以前非这样不可）、不断地和頑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爭取胜利。誰感到这种工作沒有味道，誰就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轉弯的地方也必須保存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基础，誰就是徒有馬克思主义者之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們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只是包括孟什維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們的机会主义的策略，

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維主义。它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因为它們反对党执行当前的、反映时局特点的任务，即反对执行利用杜馬講坛和建立工人阶級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的和合法的組織作为据点的任务。它包括造神說和維护根本脫离馬克思主义原則的造神說傾向的企图。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在1906—1907年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維克中央委員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脫維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沒有支持純粹孟什維克的中央委員会），而現在則是耐心教育护党分子，团結他們，建立一个眞正統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級政党。布尔什維克在1903—1905年和1906—1907年，已經同反党分子进行了不調和的斗爭，为保卫党性扫淸了道路。布尔什維克現在应該来建立党，把派别建成党，利用經过派别斗爭所取得的陣地来建立党。

这就是我們派別在当前政治局势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总的情况下面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最近的布尔什維克会議的决議又做了一次特別詳細的叙述和发揮。为了进行新的斗爭，队伍已經整頓好了。变化了的条件已經考虑到了。道路已經选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快就会成为任何反动势力也不能动搖的力量，成为我国下一次革命运动中起来斗爭的各阶級人民的領导力量①。

载于1909年7月11日(24日)
"无产者报"第46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

① 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5号和"崩得評論"[135]第2号出版了。上面又是一大堆取消主义的典型例子，这些例子需要在最近一号的"无产者报"上用专文来分析和評价。

評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半世紀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紀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鎮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鎮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領袖們从40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說，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19世紀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漸漸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沒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但是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資产阶級政府的国际反动派已經完全形成，这些政府看到了无产阶級的起义，意識到劳动同資本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它們为了共同对付无产阶級，准备对任何居于王位的冒险家和强盗表示欢迎。因此，当20世紀初沙皇政府受到对日战爭和1905年革命的极其沉重的打击的时候，国际資产阶級就跑来帮助它，用几十亿的貸款支持它，竭尽全力制止革命烈火的蔓延，恢复俄国的“秩序”。你帮我忙，我帮你忙。在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資产阶級政府打击民主派的时候，沙皇政府曾經不止一次地帮助了这些政府。現在，对无产阶級来說已經成为反革命的欧洲資产阶級，帮助沙皇政府打击了革命。

盟国都在庆祝胜利。暴君尼古拉到欧洲向国王們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統致賀去了。国王們和总統狂热地准备欢迎这个俄国黑帮反革命势力的領袖。但是，这些黑帮和資产阶級反动派的高貴騎士所以能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他們消灭了自己的敌人，而是由于他們分裂了敌人的力量，由于各国无产阶級沒有同时成熟。工人阶級的联合起来的敌人取得胜利的代价是推迟举行决战的日期，是扩大和加深那个将不断地（虽然可能比我們所希望的要緩慢一些）增加无产者的人数、加强他們的团結性、在斗爭中鍛炼他們、使他們习惯于同联合起来的敌人作战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資本主义，它曾經喚醒了罗曼諾夫王朝貴族的宗法的“世袭領地”，現在正在一个个地喚醒亚洲的国家。

盟国在庆祝胜利。但是，暴君尼古拉和欧洲資产阶級政府領袖們的每次庆祝，都有革命工人群众的呼声象回声般地伴随着。尼古拉和威廉，爱德华和法勒埃尔在密密层层的士兵或一长列軍艦的保护下握手致意，他們欢呼：我們把革命鎮压下去了。而革命力量通过各国觉悟的无产阶級的領袖，象回声一样回答說：我們要把你們一起打倒。

暴君尼古拉出国訪問去了，临行前，参加黑帮杜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宣布了俄国全体觉悟工人的共和信念，提醒他君主政体必然要崩潰。尼古拉到了瑞典。那里，他受到了宫廷的祝賀，受到了士兵和密探的欢迎。瑞典工人群众的領袖社会民主党人布兰亭的欢迎詞却是抗議劊子手的訪問污辱了瑞典。尼古拉还要前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国王和宫廷显貴、大臣和警官都在准备欢迎他。工人群众也在准备欢迎他：英国将举行群众抗議集会；法国将举行表示人民憤慨的示威；意大利将在他到达的这个不祥日子举

行总罢工。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社会党議員——英国的梭恩、法国的饒勒斯、意大利的莫尔加利都已經响应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号召，向全世界宣布，工人阶級憎恨和鄙視这个正在鎮压波斯人民并向法国派遣大批俄国間諜和奸細的暴徒尼古拉、絞刑手尼古拉。

所有这些国家的“有名的”資产阶級报紙暴怒若狂，不知該怎么謾罵社会党人的言論，不知应怎么替打斷社会党人講話的大臣們和議長們帮腔。但是狂怒也无济于事，因为在眞正立宪的国家里，要封住无产阶級議員的嘴巴，要不讓群众集会是不行的。俄国沙皇不敢在倫敦、巴黎、罗馬露面，这一点无論对国内和国外都是瞞不住的。

国际反动派的領袖們本想趁俄国和波斯的革命被鎮压下去的时机，隆重地庆祝一番，但是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級一致的勇敢的抗議之下，庆祝活动被破坏了。

从彼得堡到巴黎，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馬，社会党人到处都在抗議沙皇专制制度，保卫革命和革命的口号，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我国自由派向沙皇政府卑躬屈节的那副可耻的奴才相便显得分外淸楚了。以黑帮杜馬主席为首的几个杜馬代表，其中包括溫和的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現在正在英国訪問。他們引以为荣的是他們代表了杜馬的多数，杜馬中眞正的中派，即旣沒有极右派也沒有极左派。他們装成“宪制”俄国的代表，他們頌揚“革新后的”制度和“賜給人民”以杜馬的可敬的君主。他們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青蛙那样，鼓着气，胀起肚子，儼然象是击敗了据說是希望废除俄国“宪制”的黑帮反动派的胜利者。“立宪民主”（別开玩笑吧！）党的領袖米留可夫先生在市长举行的早宴上致詞时宣布：“只要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預算的立法的議院，俄国的反对派始終是屬于皇上的，而

不是反对皇上的。”(圣彼得堡通訊社旧历6月19日电)十月党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在6月21日发表了一篇社論，用了一个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标题，叫做“欧洲和革新后的俄国”，社論热烈欢迎立宪民主党人首領的講話并且指出，他的“温和立宪主义”的言論“可能标志着立宪民主党政策的一个轉折点，标志着放弃为当反对派而当反对派这种不妥当的策略”。

警察办的“俄国报”于6月23日也就米留可夫的講話发表了一篇社論，社論在轉述了屬于皇上的反对派这句“名言”以后說：“米留可夫先生在英国对俄国反对派承担了某种义务，如果他能履行这一义务，他就会对祖国作出重大的貢献，使他过去的不少罪过可以得到寬恕。”立宪民主党人先生們，你們出头了：“路标”派，特别是司徒卢威得到了黑帮暴徒的“大主教”安东尼·沃倫斯基的贊許；党的領袖米留可夫得到了警察办的出卖灵魂的报紙的贊許。混出头了！

我們只要指出一点，就是我們从1906年起就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实質上就是十月党人，当时在杜馬中的有名无实的“胜利”冲昏了許許多多自私的和不自私的幼稚者的头脑。

我們要指出的只是，我們在20多个月以前，在“无产者报”第19、20号(1907年11月)上評論第三屆杜馬选举的結果时，就揭露了現在看得特别明显的沙皇政府玩弄第三屆杜馬的实質。1907年11月，我們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議的决議都指出，在第三屆杜馬中可能有两种多数：黑帮-十月党的多数和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多数，这两种多数都是反革命的。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組織的决議(“无产者报”第19号)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議的决議(“无产者报”第20号)都指

出："杜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上玩弄两面手法。"①

这种对形势的評述現在已經完全得到了証实，暴露出那些准备宣称社会民主党人要再次"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人目光是多么短浅。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十月党人，并不是把十月党人当做眞正的敌人而是当做竞争者。为了"爭取"选民——我們就称自己为"人民自由"党。为了証明自己的"庄重"——我們在第三屆杜馬中把馬克拉柯夫这些人捧出来，我們通过米留可夫向欧洲宣布，我們是"属于皇上的反对派"。黑帮沙皇政府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讓黑帮沙皇匪徒在事实上主宰全国一切，讓他們而且完全讓他們去解决一切眞正重要的政策問題。"我們"需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是为了玩弄把戏，为了向欧洲"显示"，为了更容易借到錢，为了"糾正"黑帮的偏激，为了用国家参議院修改过的……"改革"来欺騙傻瓜。

皇上了解自己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派也了解自己的斯托雷平和自己的尼古拉。我国的自由派和大臣們不費什么劲就学会了欧洲議会那套并不深奥的虛伪和欺騙的学問。两者都卓有成效地学来了欧洲資产阶級反动派的手法。

不断加强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級的团結的俄国无产阶級，一定要同两者进行坚持不懈的革命斗爭。

载于1909年7月11日(24日)
"无产者报"第46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121、127頁。——編者注

关于馬·利亚多夫給“无产者报”編輯部的信[136]

我們很乐意发表利亚多夫同志的公开信，只是向他提出以下几点意見：

利亚多夫同志，維护布尔什維主义的传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正統的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統——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維护这个传統，就是要不讓布尔什維主义受到象諷刺画那样的歪曲。而召回主义和造神說頑强地表現自己，正好是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这一点我們在許多文章中已經詳尽地証明了，而且現在已經被布尔什維克派所正式肯定。

至于利亚多夫同志向“革命倫理”呼吁，那我們尽可以放心地听其自便，利亚多夫同志及其志同道合的人早就应当向全党公开說明自己的“原則立場”了，不然人們还一直相信他們的話，以为他們除了召回主义和造神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最后，我們相信，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工作多年的利亚多夫同志，不会长久地留在造神派-召回派或簡称“通神的召回派”这一新派别里，而回到布尔什維克的队伍中来。

載于1909年7月11日(24日)
“无产者报”第46号
按“无产者报”原文刊印

給喀普里党校組織者的信

1909年8月18日

各位同志!

前几天接到了你們的邀請。你們信中說附来一份教学大綱,可是我并沒有收到。

我对喀普里島学校的态度在"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决議(見"无产者报"第46号的附刊和正刊①)中已經表明了。如果你們沒有看到"无产者报"的正刊和附刊,以及已印成单頁发給布尔什維克党員的专門关于学校的信件,編輯部很願意把这些材料都寄給你們。我应該直截了当地答复你們,在我看来,喀普里学校就是在我們党內成立一个新的、我所不同情的派别,当然,我不会因为有这种看法而拒絕給俄国各地方組織派来的同志講課。不管这些同志的观点如何,我都乐意就社会民主党所关心的問題給他們講課。到喀普里去講課,我当然是不会去的,但是我很願意在巴黎講課。讓俄国派来的9位同志到巴黎来(我說的人数是你們認識的列瓦同志告訴我的),这样做在財政开支方面也比3个报告人(据我所知,你們还邀請了列瓦和印諾肯齐[137])从巴黎到喀普里去花費少。除了財政方面的理由,还有其他許多重要得多的、你們无

---

① 見本卷第418—419頁和第420—427頁。——編者注

疑十分清楚的理由，都可以說明把国外眞正的党校設在巴黎比較适宜。总之，我可以保証，"无产者报"編輯部將尽一切努力在巴黎組織你們所希望的講演。　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尼·列宁

又及：你們忘記把学校的正式通訊处告訴我了。

1909年載于"关于党校問題"的通报
按手稿刊印

布尔什維克中央給喀普里学校委員会的信的草稿[138]

布尔什維克中央执行委員会非常高兴得到“喀普里党校委員会”1909年8月16日的通知，說它毫不反对布尔什維克中央的“思想监督”。

但是布尔什維克中央能不能担負起这种监督并实現这种监督，它能不能根据学校委員会的請求給学校以教材和財政方面的支援，这些問題必須在了解了学校的詳細情况之后才能解决。而布尔什維克中央对学校的詳細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学校委員会从印发的决議中，从“无产者报”上知道布尔什維克中央的看法，并且从前任中央委員那里可以了解到布尔什維克中央的成員，因而能够討論（如学校委員会所写的）学校同布尔什維克中央的关系問題，然而布尔什維克中央却无法討論布尔什維克中央对学校委員会請求的态度問題，因为布尔什維克中央不了解：（1）学校委員会是什么；（2）学校执行委員会是什么；（3）学校的教学大綱怎样（学校执行委員会答应把它寄来，但是沒有寄来）；（4）現在在学校講課的是些什么人；（5）学习的是些什么人；（6）現在学校的經費怎样；（7）各課的学习期限多长；（8）学校学員同現在学校的所在地即喀普里島有多少联系；（9）学校学員能否到巴黎来（3个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在私人信中已經談

到了这一点)，什么时候来，等等。

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布尔什維克中央暂时只能表示一点：布尔什維克中央准备在教材和师资方面尽力帮助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組織的全体党員，同样也帮助这些組織派来的全体同志，帮助他們掌握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并且不拒絕在討論了帮助各地方組織的問題以后，在可能的范圍內給予財政方面的援助。

布尔什維克中央正式給学校委員会寄去：(1)"无产者报"第39—46号合訂本；(2)布尔什維克中央关于学校的信(鉛印的)；(3)布尔什維克中央的决議。　　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执行委員会

写于1909年8月5日和17日
(18日和30日)之間

1933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25卷

按手稿刊印

給喀普里党校学員尤利、万尼亚、薩維里、伊万、弗拉基米尔、斯塔尼斯拉夫和弗馬諸同志的信

1909 年新历 8 月 30 日

敬爱的同志們！你們寄来的教学大綱和两封信都收到了，在后一封信中，你們向我提出了一个問題，要我說明宣布学校为新的派别組織的理由，我認为我有責任再一次向你們說明我的观点。你們說，“說学校有派别背景，这純粹是虛构”。“凌駕于学校之上的領导权是不可思議的，因为委員会中的大多数是我們。”

我肯定地說，这显然是你們自己欺騙自己。問題完全不在于責备你們“直接参加派别活动”；問題也完全不在于誰在委員会中占大多数。問題在于学校是（1）由新的派别組織发起建立的，（2）完全是新的派别組織出錢办的，（3）設立在只有新的派别組織的講师的地方，（4）設立在除了极罕有的例外不可能有其他派别組織的講师的地方。

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取决于你們的意志。你們是不能改变这些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已經預先决定了学校的性質，你們的任何良好的意图和你們委員会的任何决議都决不能改变任何实質。

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課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員来决定。同志們，你們明

明知道，任何“监督”、任何“領导”、任何“教学大綱”、“章程”等等对教学人員来說都是空談。任何监督、任何教学大綱等等，絕对不能改变由教学人員所决定的課程的方向。而且，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組織、派别或团体，都不会来为一个学校分担責任，既然这个学校的已經由教学人員預先决定的方向是和自己敌对的。

现在来看看預先决定学校的性質和方向的教学人員吧。同志們，你們在給我的信里签了名，但是你們以党校学員和講师的名义写給中央委員会的信里（这封信的副本我是和教学大綱一起收到的），講师并沒有签名。因此，我不能十分确切地知道哪些人是教学人員。但是就从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已經足以給教学人員下判断了。

中部工业区的地方組織从俄国写信給我們說，最积极的、也許是唯一的一个宣传成立喀普里学校的人是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听过他的报告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小組已經把他选为講师。这位斯塔尼斯拉夫同志是最坚决的召回派，是在哲学上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批評的“批評家”。想想下面这些事情就够了：（1）他在他的著名的哲学小册子里是怎样大罵考茨基的；（2）他在1908年12月的党代表会議上是怎样同彼得堡的召回派符謝·一起分裂为特别的召回派組織的；（3）他怎样校改“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那篇召回派“工人”的文章，这篇文章連“工人旗帜报”自己也承認是充滿无政府主义观点的。

請你再看一看你們現在在喀普里可以看到的那些講师吧。他們当中沒有一个是布尔什維克。可是新的派别組織（召回派和造神派）的一切拥护者几乎都全了。如果我說，在喀普里的講师中你

們可以看到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阿列克辛斯基諸同志，我不見得会有多大錯誤。正是这批同志从1908年春天起組成了“无产者报”的反对派，在俄国和国外进行反对“无产者报”的宣传，在1908年12月的党代表会議上分裂出来成为特殊的派别組織（或者支持这个派别組織），最后則完全成为特殊的派别組織。

否認这批同志进行反对“无产者报”的宣传，支持和維护召回派，那就是嘲笑党內人所共知的事实。否認喀普里島甚至在整个俄国著作界中都已經得到造神派作家中心的名声，那是对事实的一种揶揄。所有的俄国报刊都早已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在喀普里島上宣传造神說。巴札罗夫在俄国帮助他。波格丹諾夫在国內公开出版的上十种的書籍和文章里，在国外作的上十次专题报告里，都为同样的哲学观点辯护。我在1908年4月到过喀普里島，并且对所有这三位同志声明，在哲学上我同他們有絕对的分歧（而且，我当时建議他們把共同的物力和人力用来写与孟什維克取消派的革命史相对立的布尔什維克革命史，但是喀普里的人拒絕了我的建議，他們願意从事的不是整个布尔什維克的事业，而是宣传自己的特殊的哲学观点）。你們在喀普里的这批講师中間大多数是著作家，而这些著作家当中就从来沒有一个人在报刊上抨击过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札罗夫的造神說宣传！

同志們，尽管有这一切事实，你們在写給我的信里还是說，認为学校同造神派和召回派有联系是“誤会”，而且“完全”是我这方面的“誤会”，因为“这样的目的在学校这里不仅沒有提出来，而且根本談不到”，——我只有对你們的这种极端天眞的想法感到惊奇。我再說一遍：学校的眞正的性質和方向并不由地方組織的良好願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員会”的决議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綱”等

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員决定的。如果教学人員一直是完全由新的派别組織那个圈子中的人物来决定，那末，要否認学校的派别組織性就簡直是可笑的。

为了結束关于教学人員的問題，我还要告訴你們一件事。这件事是印諾肯齐同志对我說的，它表明党內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你們企图否認的事情，即喀普里学校的特殊派别組織性。在最近这次"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开会前不久，馬克西莫夫同志在⑦巴黎請托洛茨基到喀普里学校去当講师。托洛茨基对印諾肯齐同志談到这件事，并且对他說：如果这是党的事业，我很願意去；如果这是喀普里的著作家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一伙的特殊事业，那我就不去了。印諾肯齐回答：請你等候"无产者报"編輯部的决議吧，我会把这些决議寄給你的。由此可見，不屬于任何派别組織的托洛茨基立刻就懂得（就象任何多少有些經驗的党的工作者懂得这一点一样），在喀普里島办学校就是使学校避开党，就是預先把学校同一个特殊的即新的派别組織联系起来。

現在来談談关于巴黎的問題。我写过信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眞是对我和我的同志們的講演感到兴趣的話，你們就应当到巴黎来。你們回答我："考慮到費用，去巴黎是完全不合适的。"

我們来看看，我們当中究竟誰說的不合适。

你們是經过維也納到喀普里島去的。如果你們从原路回去，那末你們可以从意大利北部轉道来巴黎，而从巴黎就可以直达維也納。这样因繞道巴黎而增加的旅費大概每人不超过 60 法郎（根据日內瓦〔我在那里住了很久〕到巴黎的票价是 80 法郎来推算）。你們的信有 8 个人署名，同时，有一个人声称"今后不再通信"，这就是說，他显然不願意来听我的講話了。还剩下 7 位同志。費用

是 7×60＝420 法郎。

你們从巴黎請 4 位講师(列瓦、我、格里哥里、印諾肯齐)。从巴黎到喀普里来回旅費約 140 法郎，总計 4×140＝660 法郎。

8 个学員繞道来巴黎要比 4 个講师专程去喀普里的費用少些。

但是，正象我在前一封信①里已經对你們說过的，經費問題远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請想一想，选择地点是对外来的学員容易些呢，还是对本地的講师容易些？你們到外国来是专門为了进学校学习的。这就是說，你們到有大批講师的地方去，到可能真正有党在安排工作的地方去是不会有什么阻碍的。

而講师們就不能离开党中央到喀普里島去。我来談談自己的情况。我不能丢开"无产者报"編輯部——我不能丢开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我不能丢开設在巴黎的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协助委員会——我应当在住着成百成千俄国工人的巴黎工人住宅区的"无产者报"俱乐部講演等等。党的著作家們从巴黎到喀普里島去是絕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对学校来說，正象对党的事业一样，重要的不仅是布尔什維克的講师。巴黎是一个最大的侨民中心，在这里可以經常听到一切派別組織公开作的专题报告，举行討論会、举行各种小組活动；这里有两三个不坏的俄文图書館，有几十位在社会民主党內长期起作用的組織者等等。巴黎有社会民主党的三种俄文报紙出版。总之，对任何一个哪怕是只知道一点点国外情况的人，事情都很明白，就象明朗的白昼那样明白：誰要是到巴黎去学习社会民主主义，他就是真正去学习社会民主主义。誰要是到喀普里去学习，

① 見本卷第 434—435 頁。——編者注

他就是去学习特殊的派别組織的"科学"。

誰在巴黎办学校，他就是真正在办党的学校。誰在喀普里島办学校，他就是在使学校避开党。

喀普里的学校是故意避开党的学校。

无論是你們今天所求教的中央委員会，或者是你們昨天所求教的"无产者报"編輯部，都絕对不可能对喀普里的学校进行任何监督、任何"思想領导"。在这里談监督和思想領导，那是空話。任何人都不会有派遣党的"視察員"到喀普里去监督学校这种荒唐想法；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派遣真正的党的講师到喀普里去（除去极少的例外）。如果俄国各地的党組織不知道这一点，学校的創办人是清清楚楚地知道的。正因为如此，他們才在喀普里办学校，以便掩盖学校的派别組織性，使学校避开党。

你們看看那些不屬于任何派别組織的、非常熟悉国外工人阶級运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帕尔烏斯和罗莎·卢森堡（德国）、沙·拉波波特（法国）、罗特施坦（英国）。你們看看不屬于任何派别組織的社会民主党著作家，如梁贊諾夫，你們就可以立刻看到（如果你們不願意閉上眼睛不看的話），在巴黎，只要党作一些努力，他們多半都能来作报告，而喀普里他們是絕对不能去的。办学校的人用来派遣学員和講师到极其遙远的外国地方（喀普里）去的那些錢，已經足够用来在巴黎請这些講师中的某些人举办講座了。

其次，你們看看社会民主党內的新的分派情况，对国內的同志来說，了解这些分派情况是很重要的（崩得中护党派和取消派的斗爭；拉脫維亚人中的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斗爭；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斗爭；孟什維主义的分裂，普列汉諾夫出版了揭发波特列索夫和正牌孟什維克的取消派立場的"日志"；有人

企图創立“革命的孟什維主义”等等)。在喀普里就不能好好地了解党的这些重要現象。在巴黎却有充分的机会直接得知这些情况，而不是仅仅得自传聞。

最后，你們再看看喀普里学校的教学大綱。在4个部分里有1个部分(第3部分)的标題是“无产阶級斗爭的哲学”。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里，这一类宣传課程的教学大綱有几十个、几百个(如果不是几千个的話)。但是你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无产阶級斗爭的哲学”。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无产阶級斗爭的哲学”。而且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中誰也不会懂得这指的是什么。只有那些熟悉斯塔尼斯拉夫(阿·沃尔斯基)、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这几位哲学家的著作的人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在講授“无产阶級斗爭的哲学”以前，必須先把这种哲学編造出来。刚才提到的这批新派別組織的成員一直在編造这种特殊的哲学，这种哲学距离无产阶級的世界观愈远，它就愈加頻繁地用“无产阶級的”字样来对天发誓。

我的信快写完了。同志們，如果你們坚持不願到巴黎来(同时又硬要人相信你們願意听我的講演)，那末，你們就將最后以此証明：不仅喀普里学校的講师，而且連那里的某些学員，也受到新的造神派和召回派的狹隘小集团政策的熏染了。　　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尼·列宁

1926年第一次載于
“无产阶級革命”杂志第2期
(总49期)

按手稿刊印

注 释

1 “走上直路”一文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26号上发表。

“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維克在党的第四次(統一)代表大会以后創办的秘密报紙，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由列宁主編。“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員会和彼得堡委員会的机关报出版的，有一段时期也曾作为莫斯科专区委員会、皮尔姆委員会、庫尔斯克委員会和喀山委員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实际上該报是布尔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一共出版了50号；前20号在芬兰出版，其余各号在国外——日內瓦和巴黎出版。該报发表了列宁100多篇文章和短評。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維护和巩固布尔什維克組織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

在1910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上，調和派通过了停办“无产者报”的决定。——(正文第1頁)

2 *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是指政府驅散第二屆国家杜馬和修改杜馬选举法的反动政变。按照新的选举法，地主和工商业資产阶級在杜馬中的代表增加了很多，而本来数目就不多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則减少了好几倍。这个法律剝夺了俄国亚洲部分的大多数居民的选举权，把波兰和高加索居民的代表名額减少了一半。根据这个选举法选举出来的、在1907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屆杜馬，按成分来說，是黑帮-立宪民主党的杜馬。

六三政变开始了以“六三政制”著称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正文第1頁)

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是指秘密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

报"，1908年2月創刊，1917年1月停刊，共出了58号。創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移至国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后来在日內瓦。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的决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由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組成。"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載了列宁80多篇文章和短評。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內为貫徹彻底的布尔什維主义路綫进行了斗爭。一部分編委(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对取消派采取了調和主义的态度，企图阻撓列宁路綫的貫彻。有些編委如孟什維克馬尔托夫和唐恩一面在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內实行怠工，一面又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替取消主义辯护。由于列宁同取消派展开了不調和的斗爭，馬尔托夫和唐恩于1911年6月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从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編。——(正文第1頁)

4 "工人旗帜报"是布尔什維克的秘密报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委員会、莫斯科委員会和莫斯科专区委員会的机关报；从1908年3—12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7号。——(正文第4頁)

5 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于1878年在德国施行。根据这一法令，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組織、群众性的工人組織的活动被禁止，工人报刊被封閉，社会主义書刊被沒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該法律在1890年被廢除了。——(正文第4頁)

6 "言論报"(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906年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員会查封。——(正文第6頁)

7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統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代表57个地方党組織的112名具有表决权的代表，以及22名具有发言权的代表。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波兰、立陶宛、拉脫維亚和崩得等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布尔什維克的許多組織在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后被政府破坏了，未能派遣代表参加。孟什維克在会上占了多数，虽然是微弱的多数。

列宁在大会上就土地問題、当前形势問題、对国家杜馬选举的策略問題以及武装起义等問題发了言。

孟什維克在大会上的占优势，决定了大会决議的性質：在許多問題上大会通过了孟什維克的决議（土地綱領以及对国家杜馬的态度的决議等等）。

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員資格的条文。代表大会接受了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拉脫維亚的社会民主工党这两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組織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且預先决定了崩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問題。

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員会由3个布尔什維克和7个孟什維克組成，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則全是孟什維克。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一著作中，对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分析（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286—351頁）。——（正文第6頁）

8 "*劳动派政策*"就是"劳动团"的政策。劳动团是第一屆国家杜馬的农民代表于1906年4月組成的小資产阶級民主派集团。到杜馬工作开始的时候，参加劳动团的有107个代表。在第二屆杜馬中，参加劳动团的有104个代表，在第三屆杜馬中有14个代表，在第四屆杜馬中有10个代表。他們要求废除一切等級的和民族的限制，要求城乡自治机关民主化，要求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馬。他們的土地綱領是根据民粹派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則制定的：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劳动土地份額）构成全民的后备土地；对出讓的私有土地規定給予报酬。土地改革由地方农民委員会进行。——（正文第6頁）

9 *古尔柯，弗·约·*是副內务大臣。——（正文第10頁）

10 列宁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2版第1卷的跋（見馬克思"資本論"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7頁）。——（正文第15頁）

11 *柏姆-巴維克，欧·*是奧地利的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正文第16頁）

12 “革命工团主义”是19世紀末在西歐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現的一种小資产阶級半无政府主义派别。

工团主义者否認工人阶級进行政治斗爭的必要性，否認党的領导作用和无产阶級专政。他們認为，工会（工团）不用革命，只要組織工人总罢工就能够推翻資本主义，取得生产的管理权。——（正文第20頁）

13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出版，起初在日內瓦出版，后来在巴黎出版。——（正文第22頁）

14 «*Die Neue Zeit*»（“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85—1895年，“新时代”杂志发表了弗·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經常給杂志編輯部作指示，并且尖銳地批評它离开了馬克思主义。恩格斯逝世以后，从90年代后半期起，該杂志經常刊載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期間（1914—1918年），杂志采取了中派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立場，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正文第27頁）

15 杜姆巴澤，伊·安·是沙皇軍队的将軍，黑帮分子；他在担任雅尔塔市市长时，以对和平居民特别残酷暴虐聞名。

“里加博物館”是里加警察局偵緝处的拷問室，被捕者在这里受审时經常被严刑拷打。后来警察局的这种行为在报刊上被揭露了，沙皇政府企图否認拷打的事实，便声称偵緝处的刑具是收集来“成立博物館”的。因此，里加拷問室就叫做“里加博物館”。——（正文第28頁）

16 *1905年12月11日（24日）*法令是第一屆国家杜馬的选举法。根据这条法令，选民被分为土地所有者（地主）、市民（資产阶級）、农民和工人等4个选民团。地主的1张选票等于城市資产阶級代表的3张，农民的15张，工人的45张。这一法律保証了杜馬中一小撮地主和資本家的絕对优势。——（正文第28頁）

17 指恩格斯給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級斗爭”一書写的“导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5—98頁）。——（正文第29頁）

18 斯特列尔措夫，罗·叶·是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主义者。——(正文第29頁)

19 «Frankfurter Zeitung»（“法兰克福报”）是德国的資产阶級报紙，1856年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創刊。——(正文第30頁)

20 “和平革新党”是資产阶級-地主的反革命組織，成立于1906年，是由左翼十月党人和右翼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成的。列宁称“和平革新党”是“和平掠夺党”。——(正文第30頁)

21 指立宪民主党人同特列波夫(副內务大臣)关于能否成立立宪民主党內閣問題的談判。——(正文第30頁)

22 列宁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讓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部的分歧，本文載于1908年4月«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杂志第2期。

«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社会民主党評論”）是1902年至1904年以及1908年至1910年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罗·卢森堡的直接参加下在克拉柯夫出版的杂志。——(正文第32頁)

23 “首都邮报”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日报，1906年10月到1908年2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32頁)

24 見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評(三)从5月到10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俄文版第8卷第258—262頁)。——(正文第33頁)

2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倫敦举行。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維克在列宁領导下籌备和召开的。这是第一次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

列宁拟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議程是：一、組織委員会的报告。二、策略問題：(1)武装起义；(2)在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对政府政策的态度(这一項包括两个問題：(一)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二)关于臨时革命政府)；(3)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三、組織問題：(4)工人和知識分子在党組織中的关系；(5)党章。四、对其他党派的态度：(6)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

的态度；(7)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8)对自由派的态度；(9)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具体协议。**五、党内问题**：(10)宣传和鼓动。**六、代表们的报告**：(11)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2)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报告。**七、选举**：(13)选举；(14)宣读代表大会决议和记录，新选出的人员就职。

在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就草拟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各主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加以论证。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就下列问题发了言：武装起义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党章和其他一些问题。代表大会的记录中载有列宁的138次发言和提议。

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一)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二)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及其同各地方委员会的关系；(三)改变了党中央的组织机构：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唯一有充分权力的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以代替三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党总委员会)。

关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意义，见列宁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412—418页)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125页)。——(正文第37页)

2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在伦敦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36名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105人，孟什维克97人，崩得分子57人，波兰社会民主党44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29人，"无派别的"4人。布尔什维克领导着波兰和拉脱维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占有稳定的多数。代表中有列宁、伏罗希洛夫、杜勃洛文斯基、斯大林、邵武勉和雅罗斯拉夫斯基。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1)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及其组织。(3)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4)国家杜马。(5)"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6)工会和党。(7)游击活动。(8)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9)组织问题。(10)斯图加特国

际代表大会(五一,軍国主义)。(11)軍队工作。(12)其他事項。代表大会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对資产阶級政党的态度問題,列宁就这个問題做了报告。在各个根本問題上,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維克的决議案。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維克5人、孟什維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脫維亚社会民主党1人組成的中央委員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員的有布尔什維克10人,孟什維克7人,波兰社会民主党3人和拉脫維亚社会民主党2人。

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維主义对党內机会主义翼——孟什維克的巨大胜利。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見列宁的"对資产阶級政党的态度"一文("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476—496頁)。——(正文第37頁)

27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05和108頁。——(正文第40頁)

28 波兰社会党(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是1892年成立的小資产阶級民族主义政党。波兰社会党以爭取波兰独立为自己綱領的基础,它在波兰工人中間进行分离主义、民族主义的宣傳,力图使他們不同俄国工人一起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資本主义的斗爭。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成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波兰社会党"右派"("弗腊克派")。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影响下,以及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普通工人党員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漸清除了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大部分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場,并且在1918年12月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这是波兰共产党在1925年以前的名称)。

"右派"波兰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繼續奉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他們組織了波兰軍团,同德奥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作战。

波兰資产阶級国家成立后,波兰社会党右派又采用了波兰社会党这个名称。它領导政府以后,就把政权交給了波兰資产阶級,一貫地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支持反苏的侵略政策,支持占領烏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并对它們实行殖民压迫的政策。皮尔苏茨基的法西斯政变(1926年5月)以后,波兰社会党在形式上处于反对党地位,但是实际

上同法西斯分子合作，繼續进行反苏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波兰社会党又分裂了。一部分是反动的沙文主义派，取名«Wolność, równość, niepodległość»（“自由、平等、独立”），同法西斯分子合作，并参加在倫敦的波兰反动流亡“政府”。另一部分是波兰社会党左派，取名“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在1942年成立的波兰工人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反对希特勒占領者的統一战綫，为波兰擺脫法西斯奴役进行斗爭，采取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立場。

1944年，波兰东部从德国占領下得到解放，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恢复了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并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設。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了波兰統一工人党。——（正文第42頁）

29 杜巴索夫，費·瓦·是莫斯科总督，曾經鎮压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正文第46頁）

30 “維堡宣言”是第一屆国家杜馬代表发出的“人民代表告人民書”。这篇宣言是在第一屆杜馬被驅散后，在1906年7月9—10日（22—23日）举行的維堡会議（到会的代表約200名，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上通过的。宣言号召人民对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沙皇沒有規定选举新的杜馬以前不納稅、不出壮丁。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公开承認“消极抵抗”“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正文第46頁）

31 “解放社”是1904年彼·司徒卢威在国外成立的自由保皇派組織。“解放社”拥护君主立宪，渴望同沙皇政府勾結，用假“民主主义”来掩飾其反对革命的斗爭。“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正文第47頁）

32 “十九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这篇著作是列宁在1908年为格拉納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辞典写的，但是由于書报檢查机关通不过，沒有发表。这篇著作于1918年在莫斯科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第一次印成单行本。

列宁在写这篇著作所用的有关土地問題的統計数字和表格都引自

他的"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这两部著作(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和第13卷第200—409頁)。——(正文第50頁)

33 指內务部中央統計委員会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1905年度地产統計。欧俄50个省資料汇編"一書。——(正文第50頁)

34 指尼·亚·魯巴金于1905年4月20日(5月3日)在"祖国之子报"第54号上发表的"我国当权官僚的数字"一文。——(正文第53頁)

35 列宁在这里所列举的农民类别是沙皇俄国存在过的农奴制和半农奴制关系的残余。

钦舍維克就是享有世袭租佃权的农民,他們有权祖祖輩輩永远占有土地,而交納的租稅即世袭封建地租則几乎毫无变动。世袭租佃关系主要盛行于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烏克兰黑海沿岸一带。

列泽施是莫尔达維亚和貝薩拉比亚两地的小土地私有者。

帖普佳里是从烏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迁移到巴什基里亚定居的新巴什基里亚人。——(正文第55頁)

36 指薩拉托夫省地方自治局于1888年在薩拉托夫出版的"薩拉托夫省統計資料汇編。第1卷。薩拉托夫县"。——(正文第55頁)

37 指«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s Russischen Reiches und der angränzenden Länder Asiens». Auf Kosten der Kaiser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von K. E. Baer und Helmersen, St. Petersburg, 1845("俄国及其毗邻的亚洲諸国研究概論"。由皇家科学院出資,由卡·埃·貝尔和格尔美尔先主編,184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正文第60頁)

38 該書的全称是:"业主經济中的自由雇佣劳动以及工人迁徙与欧俄工农业統計經济概述"。由謝·亚·柯罗連柯于1892年在圣彼得堡編纂(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編的农业統計資料,第5輯)。——(正文第63頁)

39 **根垛租**是沙皇俄国許多区域的一种盘剝性的实物租。佃农以"根垛"

为单位把收成的一半(有时还多)交给地主，此外还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式各样的"工役"。——(正文第65页)

40　指下列几本书：

(1)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于187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瓦·奥尔洛夫："莫斯科省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形式"，(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4卷第1编)；

(2)弗·特利罗果夫："村社和捐税。(调查资料汇编)"1882年圣彼得堡版；

(3) Johannes Keussler.«Zur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s bäuerlichen Gemeindebesitzes in Russland», Teil 1—3, 1876—1887(约翰·凯斯列尔"关于俄国农民的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和评论"，第1—3册，1876—1887年)；

(4)瓦·沃·："农民村社"(见"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做出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1892年莫斯科版第1卷)。

瓦·沃·是19世纪80—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正文第70页)

41　"北方通报"是自由派的文学、科学和政治杂志；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在出版初期曾登载了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瓦·巴·沃龙佐夫、谢·尼·克利文柯等人的一些文章。从1891年起，该杂志实际上变成了俄国象征派和颓废派的机关刊物，宣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正文第71页)

42　指尼·卡雷舍夫的"农民的非份地租佃"一书(见"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做出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2卷1892年德普特版)。——(正文第74页)

43　尼古一逊是19世纪80—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尼·弗·丹尼尔逊的笔名。——(正文第78页)

44　指"捷姆梁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迭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即沃龙涅什省地方自治局于1889年在沃龙涅什出版的"沃龙涅什省统计资料汇编"第3、4、5、6各卷的附录。——

（正文第85頁）

45 德·尼·日班科夫"农妇国"这篇特写載于"科斯特罗馬省統計材料"一書第8編中，該書由科斯特罗馬省統計委員会于1891年在科斯特罗馬出版。——（正文第87頁）

46 "欧洲通报"（月刊）于1866—1918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該杂志宣揚俄国自由資产阶級的观点；从90年代起經常反对馬克思主义。——（正文第91頁）

47 这个材料載于薩馬拉省地方自治局于1892年在薩馬拉出版的"薩馬拉省統計資料汇編"一書第8卷第1編。——（正文第96頁）

48 指米·謝·烏瓦罗夫在1896年7月出版的"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上发表的"論季节性生产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一文。——（正文第97頁）

49 这里列宁所使用的数字引自斯·費·鲁德涅夫在1894年"薩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文集"第6期和第11期上所发表的"欧俄农民的副业"一文。——（正文第98頁）

50 指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于1896年在赫尔松出版的尼·伊·帖賈科夫的"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組織"一書。——（正文第100頁）

51 这里列宁所使用的材料引自189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尼·安·布拉戈維申斯基的"地方自治局按戶調查經济資料綜合統計汇編。第1卷。农民經济"一書。——（正文第108頁）

5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80—191頁。——（正文第113頁）

53 見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1936年俄文版第2卷第2册第8—9頁。——（正文第115頁）

54 "革命思想报"是社会革命党人团体的机关报，1908年4月到1909年12月在国外出版。共出了6号。——（正文第123頁）

55 “劳动旗帜报”是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7月到1914年4月出版。——(正文第123頁)

56 “普列韦制度”是1902年俄国內务大臣維·康·普列韦实行的一种残酷的政治制度，目的在于反对革命运动。——(正文第128頁)

57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是作者对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00—409頁)一書的簡要叙述。列宁写这篇文摘是为了讓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土地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文摘发表在1908年8月“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第6期上。——(正文第132頁)

58 約翰 即孟什維克彼·巴·馬斯洛夫。——(正文第136頁)

59 万第 是法国一个省名，該省在18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时代爆发了反动落后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国民公会的反革命暴动。暴动是在宗教口号下由反革命的僧侶和地主領导进行的。——(正文第136頁)

60 柯斯特罗夫 即高加索孟什維克首領諾·尼·饒尔丹尼亚。——(正文第136頁)

61 “教育”杂志是文学、通俗科学、社会政治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在1902—1908年期間，該杂志曾刊載过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文第137頁)

62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805—807頁。——(正文第139頁)

63 見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1936年俄文版第2卷第2册第8—9頁。——(正文第139頁)

64 “曙光”杂志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1902年由“火星报”編輯部在斯图加特出版。出了4期，共3册。

“曙光”杂志刊載了列宁的下列几篇文章：“时評”、“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汗尼拔”、“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的前

4 章(題为“土地問題上的‘批評家’先生們”)、“內政評論”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綱領”。——(正文第 143 頁)

65 “生活”杂志(月刊),1897—1901 年在彼得堡出版,1902 年改在国外出版。自 1899 年起,該杂志成为“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正文第 143 頁)

66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1059—1062 頁、1057—1058 頁、1053—1054 頁和 1054—1055 頁。——(正文第 145 頁)

67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1040—1046 頁。——(正文第 145 頁)

6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180—191 頁。——(正文第 145 頁)

69 見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1936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1 册第 138 頁。——(正文第 145 頁)

70 列宁引自馬克思于 1871 年 4 月 12 日給路·庫格曼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 年俄文版第 263 頁)。——(正文第 152 頁)

71 “社会民主党評論”(«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杂志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办的杂志。——(正文第 152 頁)

72 利亚霍夫,弗·普·是沙皇軍队的上校,曾經指揮俄国軍队鎮压过 1908 年波斯的民族革命运动。——(正文第 157 頁)

73 «*L'Humanité*»(“人道报”)是讓·饒勒斯在 1904 年創办的法国社会党机关报(日报)。社会党在图尔代表大会(1920 年 12 月)上发生了分裂,成立了法国共产党,不久該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直到現在还是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巴黎出版。——(正文第 159 頁)

74 这篇短評作为“彼得·馬斯洛夫怎样修改卡尔·馬克思的草稿”(見“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宁全

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76—284页）一文的按语发表在“无产者报”上。——（正文第163页）

75　见列宁以“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为题的两篇文章（“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59—65和66—76页）。——（正文第166页）

76　**“美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是列宁就1908年9月7日（20日）工人在柏林集会反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而写的。本来准备在“无产者报”第36号上刊载，但是没有发表。——（正文第184页）

77　«*Vorwärts*»（“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该报于1876年起由威·李卜克内西等人主编出版。恩格斯曾利用该报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从90年代后半期起，经常刊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文章。——（正文第186页）

78　指1908年10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36号“党的生活”栏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决定。彼得堡委员会号召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公开反对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号召，并使大学生运动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中的任务。——（正文第191页）

79　**柏林条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各国政府代表会议在1878年7月13日（新历）签订的条约。——（正文第197页）

80　**“新时报”**（日报）于1868—1917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最初属于温和自由派，从1876年起变为反动贵族官僚集团的机关报。该报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运动。1905年起成为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列宁称“新时报”为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正文第199页）

81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是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从1905年起，列宁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

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正文第 205 頁)

82 指孟什維克集团用«Russisches Bulletin»(“俄国簡报”)的名称在柏林出版的簡报。从 1907 年出版到 1916 年。——(正文第 205 頁)

83 中央委員会国外局 是根据 1908 年 8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决定成立的，是全党国外代表机构，从屬于中央委員会俄国局。

在 1910 年中央委員会一月全会以后不久，在中央委員会国外局的成員中取消派分子占了多数，于是中央委員会国外局就成了集合反党力量的中心。中央委員会国外局的取消主义的策略迫使布尔什維克在 1911 年 5 月从国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亚历山大罗夫——尼·亚·謝馬什柯)。随后，波兰和拉脱維亚的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表。

中央委員会国外局于 1912 年 1 月自行取消。——(正文第 206 頁)

8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 年俄文版第 396—399 頁和第 414—416 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 年俄文版第 28 卷第 319—321 頁。——(正文第 210 頁)

85 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 1904 年成立的犹太小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組織。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竭力把犹太工人同国际无产阶級的革命斗爭隔离开来，并且鼓吹同資产阶級妥协，爭取建立犹太国家。——(正文第 216 頁)

86 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 是 1906 年成立的小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組織。它的綱領的基础是要求犹太人的民族自治，即建立犹太人的超地域的議会，这种議会有权决定在俄国的犹太人的政治結构問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并同他們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文第 216 頁)

87 斯克沃尔佐夫，亚·伊·是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写过許多关于农业問題的著作。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批判过斯克沃尔佐夫的观点（見“列宁全集”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177、450—452 頁和“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33 頁)。——（正文第

221页）

88　见马克思“资本论”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998页。——（正文第223页）

89　这篇文章是为了答复彼·马斯洛夫发表在1908年9月波兰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7期上的“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答列宁）”一文而写的。马斯洛夫反对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原作者的摘要）一文（见本卷第132—155页）中所阐述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维护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正文第231页）

90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25—331页）和“反克利盖的通告”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9—12页）。——（正文第237页）

91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369—370页。——（正文第248页）

92　1878年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汉米德解散了议会。直到190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土耳其才恢复宪制，成立议会。——（正文第249页）

93　所谓*召回派*是指一部分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布勃诺夫等人）。召回主义直接继承了1907年布尔什维主义内部以波格丹诺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思潮——抵制主义。1908年，召回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集团，反对列宁。召回派坚决拒绝参加杜马、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组织，力图把自己局限在秘密组织里。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实际上是执行取消派的路线：他们企图使党不能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使党脱离非党群众，遭受反动派的打击。列宁把召回派叫做“新式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

最后通牒主义是变相的召回主义。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主张先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被接受，就把社会民主党代表从杜马中召回。

最后通牒主义实际上是隐蔽的、伪装的召回主义。列宁把最后通牒派叫做"羞答答的召回派"。

1909年春天，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成立了一个发起小組（波格丹諾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着手在喀普里島办一个反党的学校。这个小組实际上就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这些反党派别的中心。

1909年6月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通过的决議中說，"布尔什維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定的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維克同这些离开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傾向进行坚决的斗爭。召回派的慫恿者波格丹諾夫（馬克西莫夫）后来被开除出布尔什維克的队伍。——（正文第262頁）

94 布朗热主义是19世紀最后25年法国的反动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領导人布朗热將軍而得名。

布朗热曾經批評执政的温和的共和派的政策，假裝反对保皇派，企图借此在小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中贏得威望，并且利用他們对政府的不滿来获取个人的名利。暗地里布朗热同保皇派保持联系，接受保皇派的津貼。

布朗热运动沒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不久就瓦解了。——（正文第270頁）

95 "内行人"当时充当了第三届国家杜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顧問。他們大多数人是取消派，如耶·斯米尔諾夫、亚·波特列索夫、普罗柯波維奇等人。

这些"内行人"利用布尔什維克党的領导人处于地下，不能公开参加杜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党团的活动引上孟什維主义的道路。

在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上，列宁建議使几个布尔什維克公开活动，以便对杜馬党团进行帮助。会議决定成立一个杜馬党团协助委員会，并选举列宁为委員。——（正文第273頁）

96 "俄国报"是警察黑帮派的日报，1905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官方报紙。——（正文第275頁）

97　烏格留姆－布尔切也夫是米·叶·薩尔梯柯夫－謝德林“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書所描写的一个愚蠢笨拙、目光短淺的官吏的典型。——(正文第281頁)

98　貴族联合会是反革命的地主組織，成立于1906年5月。

該联合会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在第三屆国家杜馬时期，有很多会員都参加了国家参議院和黑帮組織的領导中心。——(正文第282頁)

99　乔治，亨利是美国的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和政論家。馬克思在1881年6月20日給弗·左尔格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349—351頁)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級状况”一書美国版序言(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状况”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12頁)中，都对乔治的观点作了批判。——(正文第288頁)

100　别洛烏索夫关于土地問題的发言草稿是列宁写的。别洛烏索夫引的統計对比和統計数字，引自列宁当时没有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200—409頁)和“十九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見本卷第50—121頁)。——(正文第291頁)

10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議的有彼得堡、烏拉尔、高加索、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等几个最大的党組織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出席会議的有16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維克5人，孟什維克3人，波兰社会民主党5人，崩得3人。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的代表。

代表会議討論了下列問題：(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員会、崩得中央委員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組織、莫斯科和中部工业区組織、烏拉尔和高加索等組織的工作报告；(2)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3)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4)因政治情况改变而发生的組織問題；(5)在各地同民族組織統一的問題；(6)国外事务等等。

列宁在会上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就杜馬党团、組織問題和其他問題发了言。布尔什維克在会上展开了反对党內的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反对党內公开的敌人取消派和反对党內暗藏的敌人召回派"。代表会議根据列宁的建議斥責了取消主义，号召所有的党組織同取消党的企图作坚决的斗爭。关于代表会議情况見列宁"走上軌道"一文(本卷第318—328頁)。——(正文第294頁)

102　标題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302頁)

103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020—1061頁。——(正文第307頁)

104　爱尔福特綱領是1891年10月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正文第307頁)

105　指普列汉諾夫退出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編輯部的声明。声明本来要登在該报准备出版的第10—11号上。編輯部同普列汉諾夫再次会談以后，这篇声明就从报紙的版样上抽掉了，而要目中提到这个声明的地方就用紙貼掉了。但是冲突并没有徹底消除。1909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4号发表了普列汉諾夫的信，他在信中告訴讀者，他已正式退出編輯部。——(正文第331頁)

106　"前进报"(周报)是布尔什維克的秘密报紙；从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到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該报的組織者、思想上的鼓舞者和領导者。参加編輯部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专門的决議，指出"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維主义、恢复党性的斗爭中，在提出和闡明已經开始的革命所提出的問題方面的卓越作用，并对該报編輯部表示感謝。——(正文第333頁)

107　"党内消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中央委員会的机关报；在党的第四次(統一)代表大会前夕在彼得堡秘密出版，共出了两号；1906年

2月7日(20日)一号和3月20日(4月2日)一号。"党內消息"編輯部由布尔什維克报紙"无产者报"的編委和孟什維克报紙新"火星报"的編委各一半組成。代表布尔什維克参加編輯部的有列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內消息"就停刊了。——(正文第336頁)

108 "人民杜馬报"是孟什維克的日报,从1907年3—4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339頁)

109 指1908年12月在普腊加(华沙市郊)举行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內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議。

代表大会对取消主义傾向进行了反击,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是为实現无产阶級在革命农民帮助下夺取政权而斗争。——(正文第341頁)

110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的秘密机关报,从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报紙編輯部掌握在孟什維克手里。——(正文第346頁)

111 "新萊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从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倫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該报的領导人,总編輯是馬克思。該报出了第301号以后,便在反动派的迫害下停刊了。

列宁在这里引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6月14日和7月30日的"新萊茵报"上发表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辯論"和"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两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73—74頁和第330—331頁)。——(正文第350頁)

112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05頁。——(正文第351頁)

113 手稿沒有标題。标題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353頁)

114 "复兴"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杂志,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370頁)

11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73頁。——(正文第371頁)

116　列宁引自恩格斯給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書写的"德文第一版的序言"(見馬克思"哲学的貧困"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正文第375頁)

117　見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3頁)。——(正文第376頁)

118　見恩格斯"流亡者的文献。二、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15卷第224—230頁)。——(正文第377頁)

119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3—335頁。——(正文第377頁)

120　指恩格斯为馬克思"法兰西內战"一書写的"导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458頁)。——(正文第378頁)

121　"路标"是立宪民主党人写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有尼·别尔嘉也夫、謝·布尔加柯夫、彼·司徒卢威、米·格尔申戚和其他反革命自由資产阶級代表的文章。"路标派"在論述俄国知識分子的文章中,企图貶低俄国人民的优秀代表(包括别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內)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統,他們誣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謝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獄"把資产阶級从"人民的怒火中"救了出来。文集号召知識分子去为专制政府服务。列宁認为"路标"文集在哲学方面和政論方面的綱領同黑帮报紙"莫斯科新聞"的綱領不相上下,并且称該文集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書"、"流入民主派的一股反动浊流"。——(正文第384頁)

122　"莫斯科呼声报"(日报)是大工业資产阶級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党——十月党的机关报,从1906—1915年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392頁)

123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

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議的有，以列宁为首的9名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是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倫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派选出的），以及彼得堡、莫斯科省和烏拉尔等組織的代表。

会議是为了討論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行为而召开的。

会議討論了下列問題：(1)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2)关于社会民主党內的造神說傾向；(3)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馬活动的态度；(4)布尔什維克在党內的任务；(5)关于在国外（喀普里）的党校；(6)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維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維克代表会議的宣传；(7)关于断絕和馬克西莫夫同志的关系等等問題。

会議是在列宁領导下举行的。列宁就議程上所有的主要問題发了言。在会上代表并坚持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有亚·波格丹諾夫（馬克西莫夫）和維·尙采尔（馬拉特）。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采取了两面派的立場。

会議斥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鼓吹者波格丹諾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維克的队伍。会議也斥責了造神說，并决定同它进行坚决斗争，揭穿其反馬克思主义的性質。

本卷发表的列宁講話的标題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397頁）

124　*斯塔·*——*斯塔尼斯拉夫·沃尔斯基*即安·弗·索柯洛夫，是莫斯科召回派的領袖。——（正文第398頁）

125　*米·托·*，即米·巴·托姆斯基。——（正文第401頁）

126　“*在国外某地的党校*”是波格丹諾夫（馬克西莫夫）、阿列克辛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在馬·高尔基的参加下，于1909年在喀普里島（意大利）办的一所反党学校。該校是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派別組織中心。

波格丹諾夫派打着党性的旗帜，从社会民主党的几个地方組織里招收了13个学員。

学校办了大約4个月（8—12月）。1909年11月，以工人尼·叶·

維洛諾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員弄清了学校的派別性質，便坚决地同波格丹諾夫派划清了界限。他們寄了一份抗議書給"无产者报"編輯部，抗議教員們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們应列宁的邀請来到巴黎，听了許多講座，其中有列宁講的"目前的形势和我們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留在喀普里的一部分学員，同教員們一起于1909年12月組成了反党的"前进"集团。

"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斥責喀普里学校是一个"脫离布尔什維克的派別的新中心"。——(正文第402頁)

127 造神派是一种同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文学和宗教哲学的流派；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党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在1905—1907年革命失敗以后离开了馬克思主义，于是产生了这种流派。

造神派(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等人)宣传創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把馬克思主义和宗教調和起来。馬·高尔基有一个时期也同他們接近。"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譴責了造神說，同时在专門的决議中声明：布尔什維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見"列宁全集"第14卷)中，以及在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給高尔基的信中揭露了造神說的反动本質。——(正文第402頁)

128 指孟什維克护党派，这是以普列汉諾夫为首的、脫离了孟什維克取消派、反对取消主义的孟什維克小团体。

1908年12月普列汉諾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編輯部，在1909年8月重新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普列汉諾夫和他的集团一方面仍旧保持孟什維克的立場，一方面也主张保存党的秘密組織和秘密工作，并力求同布尔什維克达成协議。

列宁号召布尔什維克要尽力促使孟什維克护党派同取消派分离，在保卫思想性和党性的基础上同护党派接近，建立一个护党分子的統一联盟，联盟內部的"分歧不应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和"共同"为保卫党，反对取消派而"斗爭"。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諾夫的建議，同他訂立了暂时的联盟。普列汉諾夫派同布尔什維克一起参加了地方的委

員会和布尔什維克的“明星报”和“工人报”。普列汉諾夫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

列宁的这个同拥有一部分工人群众的普列汉諾夫派結成統一战綫的策略，有助于布尔什維克在合法的工人組織中更广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把取消派排挤出去。

1911年末普列汉諾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維克的联盟。他借口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部的“派別活动”和分裂活动，企图使布尔什維克同机会主义者和解。普列汉諾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議，开始对布尔什維克大肆誹謗。——(正文第402頁)

129　弗拉索夫，即阿·伊·李可夫。——(正文第408頁)

130　非正式会議是列宁在“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前夕召开的布尔什維克列宁派的会議。会上列宁詳細地介紹了布尔什維克派內部的情况以及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斗爭。列宁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論点就是“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决議的基础。——(正文第409頁)

131　全俄人民大学協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月3—6日(16—19日)在彼得堡举行。人民大学的活动的問題是代表大会的主要問題。大会上，布尔什維克領导的工人小組提出一項决議案，要求工人組織有权单独派代表参加人民大学理事会，要求承認工人組織有权决定課程的大綱，指定它們所希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承認各民族有用本族語講課的权利。

大会以微弱的多数(110票对105票)否决了这个决議案，認为它超出了代表大会的范围，于是工人代表便退出了代表大会。——(正文第415頁)

132　全俄合作社机构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4月16—21日(4月29日—5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21名代表，其中有45名以上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

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不顧孟什維克的阻撓，組織了社会民主党党

团，并領导工会組織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反对在会上占多数的資产阶級合作社派。

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国际合作社运动、关于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消費合作社在俄国的法律地位等报告，但是大会主席团禁止对这些报告进行討論。

在警察局宣布禁止在代表大会上談論阶級斗争、工会、职員的状况、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对工人的援助、合作社的宣传、出版等問題以后，代表大会就不开了。——(正文第415頁)

133 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2月10—16日(23—29日)在彼得堡举行。在大会的代表中有許多是女工。在女工們的压力下，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对酗酒、关于农村妇女的状况、关于妇女和兒童的劳动保护、关于工艺合作社、关于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等决議。关于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公民地位这个主要的問題，女工們提出了一項决議案，要求实行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的、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記名的选举制。代表大会主席团拒絕宣讀这个决議案，而代之以一个充滿自由資产阶級精神的决議案。为了表示抗議，女工們退出了代表大会。——(正文第415頁)

134 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9年4月1—6日(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的代表有52个工人，他們主要是由大工业中心的工会选出的。工人代表們(其中大部分是布尔什維克)的发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并且在全国得到了反应。关于卫生监察組織的問題(布尔什維克提出的决議案被通过了)和关于工人选举工厂視察員的問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特别热烈的爭論。

代表大会沒有开完就被警察局禁止了。——(正文第415頁)

135 “崩得評論”是崩得国外委員会的不定期的机关刊物，从1909年8月—1911年2月在日內瓦出版，共出了5期。——(正文第427頁)

136 这篇短評是对馬·尼·利亚多夫給“无产者报”編輯部的信的按語，信中表示不同意“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决議。——(正文第433頁)

137 列瓦，即米·康·弗拉基米罗夫；伊諾肯齐，即約·費·杜勃洛文斯基。——（正文第 434 頁）

138 喀普里島上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学校委員会請求布尔什維克中央（“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在教学人員和經費方面給予援助，列宁写的这封信的草稿就是对請求的答复。

手稿没有标題。标題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 436 頁）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1908年3月—1909年8月）

1908

3月19日（4月1日）	列宁的“走上直路”一文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26号上发表。
3月26日（4月8日）	列宁的“論俄国革命的‘本性’”一文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27号上发表。
4月3日（16日）以前	列宁为“卡尔·馬克思（1818—1883）”文集写的“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完稿。
4月6日和18日（4月19日和5月1日）之間	列宁应邀到喀普里島訪阿·馬·高尔基，在那里列宁向波格丹諾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声明，在哲学問題上同他們有分歧。
4月16日（29日）	列宁的“沿着老路走去！”和“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是否結成了联盟？”这两篇文章在“无产者报”第29号上发表。
4月24日（5月7日）	列宁在日内瓦做題为“对俄国革命的估計和革命可能的前途”的专題报告。
4月	列宁的“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一文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第2期上发表。
5月1日（14日）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巴黎支部委員会組織的集会上做关于俄国革命性質的专題报告。

5月初	列宁出席社会民主党巴黎支部委員会的会議，会議作出决議，声援因梯弗里斯劫夺案在瑞士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
5月10日(23日)	“无产者报”第30号发表了列宁的两篇文章：“第二批登場的立宪民主党人”(社論)和“談談对俄国革命的估計”(轉載自波兰“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第2期)。
5月	列宁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写“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
5月—6月上半月	列宁写“向报告人提十个問題”，作为約·費·杜勃洛文斯基(印諾肯齐)在日內瓦就亚·波格丹諾夫的报告发言的提綱。
6月18日(7月1日)	列宁为格拉納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辞典写的“十九世紀末俄国的土地問題”一文完稿。由于書报检查的关系，这一著作沒有发表，直到1918年才以单行本出版。
	列宁写信給敖德薩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告訴他同波格丹諾夫集团在哲学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已經加深，分裂是肯定了。
6月	根据列宁的建議，“无产者报”开展了关于召回主义問題的辯論。
7月2日(15日)	列宁的“論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一文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32号上发表。
7月5日(18日)	列宁介紹自己著作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載于1908年8月波兰“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第6期)完稿。
7月23日(8月5日)	“无产者报”第33号发表列宁的以下几篇論文：“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社論)、“好战的軍国主义和社会民

	主党反軍国主义的策略"和"彼得·馬斯洛夫怎样修改卡尔·馬克思的草稿"。
8月11—13日(24—26日)	列宁在日内瓦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发言揭露孟什維克企图以情报局代替中央委員会的办法来取消中央委員会。布尔什維克委員选举列宁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編委。
8月	列宁在"无产者报"編輯部会議上建議波格丹諾夫在报刊上公开說明自己的观点。
9月11日(24日)	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35号上发表。
9月25日和10月2日(10月8日和15日)之間	列宁的"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在彼得堡出版的"卡尔·馬克思(1818—1883)"文集中发表。
9月27日(10月10日)	列宁参加布魯塞尔社会党新聞工作者代表会議的工作。
	列宁在布魯塞尔"民众文化館"出席无产阶級保卫和平的国际集会。
9月28日(10月11日)	列宁参加布魯塞尔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議，发言批評考茨基的关于允許英国工党加入国际的决議案，反对吸收犹太复国社会主义者加入国际俄国支部社会民主党分支部。
9月29日(10月12日)	列宁在布魯塞尔出席国际社会党議員代表会議。
9月	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的序言。
10月3日(16日)以前	列宁为"无产者报"第36号写了"英国和德国工人的和平示威"一文。
10月3日(16日)	列宁的"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一文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36号上发表。

10月14日(27日)	列宁写信給安·伊·叶利札罗娃，告訴她"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已經完成，請她把可靠的地址寄来以便寄送手稿。
10月16日(29日)	"无产者报"第37号发表了列宁以下三篇文章："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議"和"彼·馬斯洛夫的歇斯底里发作了"。
10月28日(11月10日)	列宁拒絕孟什維克提出的为預定出版的孟什維克文集写稿的建議。
10—11月	列宁的"对彼·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見"一文在波兰"社会民主党評論"杂志第8—9期上发表。
10—12月	列宁領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的籌备工作。
11月1日(14日)	列宁的"对目前时局的估計"一文在"无产者报"第38号上发表。
11月4日(17日)以前	列宁把"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的手稿按秘密地址寄出，准备在莫斯科公开出版。
11月13日(26日)	列宁的論文"普列汉諾夫这伙人怎样維护修正主义"和"关于两封来信"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发表。
11月29日和12月1日(12月12日和14日)之間	因"无产者报"改在巴黎出版，列宁和克魯普斯卡婭从日內瓦迁居巴黎。
12月1日(14日)	列宁的"第三屆杜馬关于土地問題的討論"一文在"无产者报"第40号上发表。
12月21日(1909年1月3日)	列宁在巴黎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	列宁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的工作，做了"关于目前形勢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关于这个問題的决議案以及其他决議

	的修正案。
12月27—29日（1909年1月9—11日）	列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的工作，全会批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議的各項决議。
12月	列宁在巴黎做关于俄国目前形势的专题报告。

1909

年初	列宁在巴黎布尔什維克小組中作关于哲学問題的講演。
1月7日（20日）	列宁的“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結革命，革命又怎样給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結”一文在“无产者报”第41号上发表。
1月22日（2月4日）	列宁在巴黎做关于俄国的政治形势的报告。
1月28日（2月10日）	列宁的“走上軌道”一文作为社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上发表。
2月1日（14日）	列宁在“无产者报”編輯部会議上要求編輯部公开反对卢那察尔斯基鼓吹的造神說。
2月12日（25日）	“无产者报”第42号发表了列宁为“論迫切問題”一文所写的、目的在于反对召回主义的按語。
2月17—23日（3月2—8日）	列宁在尼斯休息。
3月5日（18日）	列宁在巴黎的侨民集会上发表了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演說。
3月9日和21日（3月22日和4月3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发表了列宁的“无产阶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
3月10日或11日（23日或24日）	列宁把“第四章第一节的补充。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寄往莫斯科，以便載入他的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
3月23日(4月5日)以后	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員会提出抗議，抗議“前进报”歪曲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意見分歧的实質。
4月4日(17日)	列宁的“歪曲布尔什維主义的諷刺画”一文在“无产者报”第44号的附刊上发表。
4月8日(21日)	列宁的“資产阶級的‘向左轉’和无产阶級的任务”一文在“无产者报”第44号上发表。
4月29日和5月4日(5月12日和17日)之間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書在莫斯科出版。
4月底—6月上半月	列宁进行“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准备工作。
5月8日(21日)	列宁在巴黎“无产者报”編輯部的俱乐部做題为“宗教和工人政党”的报告。
5月13日(26日)	列宁的“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作为社論在“无产者报”第45号上发表。
6月4日(17日)	列宁的“各阶級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一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发表。
6月7日(20日)以前	列宁召开“无产者报”編委和各地社会民主党組織代表的非正式会議，在会上介紹了党內的状况。
6月8—17日(21—30日)	列宁領导“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在討論时发了言，对某些决議提出了修正案，并提出了某些問題的决議草案。 会議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通过了列宁的决議案。
7月3日(16日)	列宁写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会議的公报”在“无产者报”第46号的附刊上发表。
7月11日(24日)	“无产者报”第46号发表了列宁的以下两篇文章：“評

	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社論)和“取消取消主义”。
7月	列宁同中央委員会俄国局書記座談，指示同鑽进党組織队伍的奸細作斗爭。
7月底—8月	列宁和家里人(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克魯普斯卡婭的母亲和瑪·伊·烏里楊諾娃)在巴黎近郊的彭彭村(塞納-卢瓦尔省)休息。
8月5日(18日)	列宁写信給喀普里学校的組織人,拒絕去学校講課,并邀請学生到巴黎来听布尔什維克的講課。
	列宁写信給布尔什維克中央經济委員会，反对帮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維也納“眞理报”。
8月中旬	列宁把他接到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关于組織群众大会和集会抗議西班牙政府在摩洛哥执行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秘密通告送交中央委員会国外局。
8月17日(30日)	列宁写回信給喀普里党校学員，說明这个学校的反党性質,再次拒絕去学校講課,而邀請他們到巴黎来。
8月	列宁参加社会民主党第三屆国家杜馬党团协助委員会的工作。
夏季	列宁拜訪保尔·拉法格,并同他交談自己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